

中信商业经典
■ ■ ■

他是攫财大亨中的攫财大亨

他与J·P·摩根、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齐名

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尔·盖茨

他既是当时最伟大的金融和商业天才，也是引起最广泛仇恨的恶魔



华尔街的 恶魔天才

杰伊·古尔德传

〔美〕小爱德华·J·勒内汉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Dark Genius of Wall Stre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的恶魔天才——杰伊·古尔德传 / (美) 勒内汉著, 周晓慧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Dark Genius of Wall Street

ISBN 978-7-5086-0765-8

I. 华… II. ①勒… ②周… III. 古尔德—传记 IV. K83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773 号

Dark Genius of Wall Street by Edward J. Renehan, Jr.

Original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Edward J. Renehan, J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华尔街的恶魔天才——杰伊·古尔德传

HUAERJIE DE EMO TIANCAI

著 者: [美] 小爱德华·J·勒内汉

译 者: 周晓慧

审 校: 余江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插 页: 1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5-5588

书 号: ISBN 978-7-5086-0765-8/F·1084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010-85322522



1892年12月中旬的一天，银行家杰西·赛里格曼（Jesse Seligman）接受了《纽约论坛报》记者的采访。赛里格曼的朋友杰伊·古尔德已于一个星期前去世，他向记者讲述了这位逝去的商业巨头的一生。古尔德的商业帝国包括西部联盟电话公司、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和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同时，他也是19世纪最被人误解、最重要又最复杂的企业家。赛里格曼说，他发现在谈到美国近代金融历史时，古尔德总被认为是头号恶魔，这一点很有讽刺意味。他反问：如果古尔德是罪人，那么谁又是圣人呢？

赛里格曼提到了一系列那个时代的竞争者。第一个人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个满口粗话、残忍的老海军准将除了扩张便再也没有什么蓝图和规划了。难道他真的值得尊敬吗？（有一次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被问及对穷人的贡献时，范德比尔特使用了他最谦虚的开场白。他指着那队等待面包的穷人，用一种丝毫不带嘲弄的口吻说：“让他们做我已经做过的事吧！”）接着，赛里格曼还回忆了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一位虔诚的德鲁神学院的创始人。古尔德与吉姆·菲斯克（Jim Fisk）曾和他联手击败了范德比尔特，赢得了伊利铁路公司的控制权。19世纪20年代末，这位《圣经》宣讲人德鲁先生在阿勒格尼贩卖牲畜，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此后他将牛贩子的惯常做法带进了华尔街，在股市下注就像给牛饮水。“德鲁先生真的比古尔德先生强吗？”赛里格曼反问道。至于约翰·洛克菲勒，这个控制了运输线（他的运输合约也是古尔德通过一种秘密

的合作关系达成的，使他们一起控制了利润丰厚的伊利铁路公司的子公司）的贪婪、破坏竞争的寡头，在古尔德控制的伊利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为什么在公众的印象中，”赛里格曼问道，“洛克菲勒比古尔德享有高得多的声誉呢？”

在提到那场具有传奇色彩的伊利铁路收购战时，赛里格曼说：“当然，古尔德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不太好的。”他还提到1869年古尔德与菲斯克联手狙击黄金市场那件不太光彩的事情：“那场恶作剧引发了‘黑色星期五’大恐慌，使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这件事使古尔德被人们看做金融市场的吸血鬼。记得当时有一家积极的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这件事，当发现古尔德是真正的幕后操作者时，他们便不管事情真假大肆报道，自己的杂志也在大街小巷销售一空。”但同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不同的是，赛里格曼并不认为古尔德罪孽深重：

在道德品质方面，我不想说古尔德比他那一代精明的玩家更好、更坏，或者有所不同。我了解他们。我认为古尔德比他们大多数都强。我可以告诉你，他不应该比他的同伴或对手承担更多的恶名。如果说他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战略家，一个天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华尔街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

三代传记作家都忽视了赛里格曼的忠告。他们仅从媒体对古尔德的负面评价中寻找线索，将古尔德描述成一个具有瓦格纳信徒特质的恶魔——阴暗、无情、不可理喻。在《美国豪门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1909）一书中，作者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用他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一贯论调，评论古尔德是一个食人者，吞噬了无数无辜者的血肉；一个缺乏基本公平观念、不守赌规的赌徒；他的算计、阴谋和陷阱处处表明他是马基雅维利描述的恶魔的化身。社会学家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他那本关于大萧条的《攫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中，将古尔德塑造成一个令人诅咒的形象——冷酷的盗贼，狂妄自大，“甚至没有人类最基本的公正、爱国和怜悯之心”。28年以后，理查

德·奥康纳 (Richard O'Connor) 在《纽约时报》最畅销的一期《古尔德的百万财富》(Gould's Millions) 中则完全模仿了约瑟芬森的论调。事实上，自从 1892 年古尔德去世以后，只有两位学者型的商业历史传记作者对古尔德做过较为公正、客观、合理的评价——朱利叶斯·格朗斯基 (Julius Grodinsky) 的《杰伊·古尔德：他的商业生涯》(Jay Gould: His Business Career) 和莫里·克莱因 (Maury Klein) 的《杰伊·古尔德的生活与传奇》(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y Gould)。这两本书都描述了古尔德辉煌的职业生涯。

经过了这么多年，古尔德在公众中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完全一维的形象——美国金融史上的恶棍：一个狡猾的、从别人创造的商业价值中获利的华尔街机会主义吸血鬼。罗伯特·瑞吉尔 (Robert Riegel) 在《西部铁路公司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Railroads) 中写道：“古尔德所有的兴趣就是操纵各种公司的股票。古尔德对美国铁路行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从中获取的财富都被用在金融交易上了。”

但在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具有长远眼光的首席执行官。这位具有丰富想象力、不留情面，而又易招诽谤的“镀金时代”股票市场的操纵者，其实是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企业家、一个不遗余力地整合垂死的铁路产业，将它变成高盈利的辐射网的工作狂。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使两家联合公司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在 19 世纪 80 年代波涛汹涌的经济大潮中，娴熟自如地乘风破浪。

关于对古尔德的其他诽谤，仔细看来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很多人指责古尔德没有为慈善事业捐献过一分钱，因而对他的品质进行猛烈攻击。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关注过古尔德的善举。在古尔德意识到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他的善举后，他对慈善事业的捐助就一直以匿名的方式进行。古尔德仅有的几个署名捐助都受到了《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的嘲弄和诋毁，其他报纸则专心致志地批评他。古尔德的每一次捐赠，都被记者捕风捉影地描述成“羸弱的签名是为了挽回在深重罪孽重压下的苍白的颜面”。在几次这样的经历后，古尔德再也不公开自己的捐赠了。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捐赠，只是每一次都明确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与慈善事业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媒体就开始批评他缺乏善心。“此人做起好事来太低调了，以至于完全

逃脱了公众的注意。”《纽约世界报》在1891年10月这样写道：“对他来说，逃脱公众的注意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金钱和实物，都无法让他赢得大家的尊重或激励后人。”

我们应该将古尔德当成一个在餐桌旁和街头遇到的普通人。他曾被约瑟夫和其同伴描述为：粗暴、不宽容、粗鲁、残忍、看不起下层人、恶魔一样的挑剔者，总是十分骄傲自满，歧视任何其他血统的人。罗伯特·I·瓦肖（Robert I. Warshaw）在《财富的故事》（*The Story of a Fortune*）一书中写道：“古尔德的盟友很多，但朋友很少；在他的生命中，他几乎和每一个合作者都闹掰了。”但事实上，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古尔德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罗素·塞奇（Russell Sage）、波士顿的埃米（Ame）家族、希德尼·狄龙（Sydney Dillon）以及无数将自己的财富与古尔德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从个人层面讲，他的佣人，包括他曾提供过奖学金的几个学生，在古尔德死后几十年后回忆起他时仍然十分怀念。同样，媒体中所描述的那个难以接近的古尔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仍然与他童年时代在卡茨基尔结识的大部分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朋友中大部分是地位低下的农民和商人。

古尔德被媒体错误而残忍地歪曲了一辈子，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正名。虽然他犯过他们那一代金融家所犯过的每一项罪行，但是实际上却没有比那些输给他的金融家或实业家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那些金融家或实业家比古尔德享有更高的声誉。他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输给他以后，就向饥渴的媒体提供各种歪曲的素材，以便将古尔德描述成华尔街的恶魔。当然，说他是撒旦的同谋比承认古尔德是“华尔街的米开朗琪罗”（在处理一些原始问题时，可以灵活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巧妙地运用现存法律的天才）更能抚慰那些受伤害者的自尊心。

古尔德的故事太重要了，所以不容误传，因为他对国家和那个时代具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在最近一个对美国最富有的人（排除通胀因素，用其财富占GNP的比重计算）进行的排名中，古尔德排在第8位。虽然他位居洛克菲勒（第1位）、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第2位）、约翰·雅各布（第3位）之后，但却位于亨利·福特（第11位）、安德鲁·梅隆（第12位）、山

姆·沃尔顿（第14位）、J·P·摩根（第23位）、比尔·盖茨（第31位）之前。他的成功具有深刻的意义，他的创造性令人吃惊，他做事的动机和策略异常奇妙，令人眼花缭乱。

通过本书崭新而全面的描述，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没有被歪曲的古尔德，无论是作为一个金融家还是一个男人。在叙述古尔德的商业生涯时，我无意成为他的检察官或者辩护律师，我只想将事实呈现给大家。至于古尔德的私人生活，我主要是想填补以前的传记作家所留下的巨大空白。总之，我将努力在第一时间，对复杂（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古尔德进行最真实、客观和完整的刻画：一个高深莫测的华尔街强盗、一个冷静的公司管理者和一个时代的帝王。



Contents

前 言	/V
第一章	神秘的大胡子古尔德 /1
第二章	祖先 /9
第三章	深夜的十二行诗 /17
第四章	思想成熟的学生 /25
第五章	老鼠夹子和地图 /33
第六章	生死背后的秘密 /43
第七章	古尔德斯博罗 /51
第八章	最好的朋友才会指出我们的错误 /59
第九章	狡猾的精神病患者 /69
第十章	古尔德斯博罗之战 /77
第十一章	独特的未来 /85

第十二章	太多需要做的事情	/99
第十三章	伊利铁路	/107
第十四章	蓝火	/117
第十五章	荒谬的法律机构	/127
第十六章	巧取豪夺	/139
第十七章	恶棍	/151
第十八章	美国最聪明的人	/161
第十九章	一切化为乌有	/175
第二十章	恶魔墨菲斯托菲里斯	/191
第二十一章	一个特殊的恶臭弹	/197
第二十二章	被诅咒的恶棍	/213
第二十三章	横贯大陆的铁路	/225
第二十四章	整合	/239
第二十五章	只缺一个好名声	/257
第二十六章	电报和高架铁路	/269
第二十七章	壮志已酬	/283
后 记	杰伊之后的古尔德家族	/305



第一章

神秘的大胡子古尔德





1892年12月5日至6日

在纽约第五大道47街区东北角的别墅外，一个小商贩正在兜售刚刚印好的刻有古尔德的儿子——爱德温·古尔德名字的电话卡。“这个肯定好用，绝对没问题。”他劝说那些正在犹豫着掏不掏这两块钱的顾客。然后，当他的第一位顾客被告知余额不足不能使用的时候，这个小商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僵硬而冰冷地躺在第五大道579号起居室里的杰伊·古尔德如果看到这一幕，可能会称赞这个小商贩的勇敢和狡猾。杰伊始终相信，聪明的天资一定会有回报，而愚笨将会得到惩罚。他鄙视愚笨。

每一个从拥挤的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罗素·塞吉、J·P·摩根、威廉·洛克菲勒都属于这样的人。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站在棺材旁边，听人们称赞着遗体保存得很自然。一个管家告诉米尔斯，杰伊的尸体在三天前就被放在装满冰块的柜子里冷冻起来了，所以才有现在健康而红润的脸色。铁路大亨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正在研究棺材周围的鲜花，包括撒在棺材上拼出“祖父”字样的兰花，然后他评价说，杰伊会多么喜欢它们。“杰伊喜欢花，”维拉德自言自语道，“这是少有的几件能体现他仁慈的事情。”讲话的时候，他还顺手摘了一朵放在遗体前方的漂亮的花。这些鲜花整齐地摆放着，拼出“航行结束，在港湾中安息”的字样。

航行确实结束了。美国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评价杰伊艰辛的一生和商业航行旅程，令人毫无喘息的机会。从波士顿到圣佛朗西斯科，评论家们竞相使用最蔑视的话语，甚至杰伊家乡的媒体都不为他辩护。“他对于那些有商业梦想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纽约先驱报》的发行者詹姆斯·高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这位长期仇视古尔德的作者这样写道：

这种影响将会降低商业交易中道德的声誉。他所做的事情对于任何

一个试图模仿他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使用的方法是应该绝对被禁止的。他所取得的金融成功，从获取的方式来看，并不值得羡慕。他为他的巨额资产付出了巨大代价。他游戏人生，从来不把可能造成千万人毁灭的事情当回事儿。

贝内特的竞争者《纽约时报》在古尔德去世期间大大称赞了阿斯特（Astor）和 A·T·斯图尔特（A. T. Stewart）。“这两人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服务了公众，而古尔德却是国家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在《纽约时报》看来，古尔德的财富是他使用诡计“攫取了其他人的利益，然后再改变原来的用途”获得的。《纽约世界报》（古尔德在将它卖给约瑟夫·普利策之前曾短期控股这家报纸）的评论员说道：

一万个苦难的人们将会诅咒这个死去的人。罪犯们可能会奇怪，与古尔德相比，他们究竟缺乏什么样的十恶不赦的品质，让自己不能拥有像古尔德那样的事业。公众并不会对古尔德的去世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他一生都没有对公众显示出什么兴趣……他的死去将不会引发公众的哀伤。

在那个星期天许多牧师都坚持认为，古尔德这个在 12 月 2 日（星期五）去世的人，已经被投入 18 层地狱的烈焰中。“他是人类贪婪的化身，游荡在同伴周围伺机偷窃的盗贼。”麦迪逊大道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区长这样说道。他的教徒几乎全部是有钱的贵族，都痛恨古尔德在商业交易中使用狡猾阴暗的手段来摆脱贫穷。他们都认为尽管古尔德有 7.2 亿美元的资产，但从人格上讲却比自己差得多。“今天，美国的社会、才智和精神生活的祸根在于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一位评论员在《纽约世界报》中呐喊，道，“没有什么事情比古尔德所谓的成功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我们必须拒绝宣传古尔德在现代社会取得如此显赫地位所使用的肮脏手段。”据说还有一位牧师补充说，不要指望从具有古尔德血统的人那里得到任何好的东西。

听到这些，古尔德可能觉得好笑。他出生时接受过不太虔诚的洗礼，还

举行过一个草草的天主教婚礼，这个留着大胡子的金融家长期以来一直都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象。在那个反犹太人之风盛行的时代，当杰伊·古尔德被媒体描述成一个狂妄的犹太人、吝啬的夏洛克时，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沉默。约瑟夫·普利策（长期以来一直鄙视犹太人）说道：“这个神秘的大胡子古尔德是个像蝙蝠一样，出没于美国人民视线中的邪恶家伙。”与此同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将他哥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在铁路上的竞争对手描述成一个“复杂的犹太人……身材矮小、微不足道、阴暗、面色枯黄、沉默寡言、鬼鬼祟祟”。古尔德本人则自嘲地接受了这样的描述，他对同伴说，“他所谓的希伯来血统”只会扩大他战无不胜的名声。

✦ ✦ ✦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古尔德唯一的犹太朋友杰西·塞利格曼对以上观点做过什么评价。塞利格曼站在第五大道 579 号那布满纱绸的大厅里的人群中，静静地凝视着这罕见的景象：杰伊·古尔德安息了，杰伊·古尔德再也没有日程安排。古尔德安详地躺在黑胡桃棺木中，他的家人和朋友围成一圈。他们才是最了解古尔德的人，比那些胡言乱语、随意拼凑的记者了解得多。

然而，记者们还在这里喧嚣。“来这里参加葬礼的人从来没有真心喜欢过他，而这个死去的人也没有真心喜欢过他们。”《纽约世界报》的一位作者这样声称，仿佛他了解一切：“他没有爱过任何人，也没有救过任何自己的同族；所以这一冷酷的事实是造成葬礼上没有悲痛的原因。这里只有得体的尊敬——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对于那些在场的显赫人物而言，他们的悲痛却是真真切切的。人们看到塞利格曼在哭泣；怀特劳·里德（Whitelaw Reid，《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该报一直很友好地对待古尔德）将古尔德的大女儿、23 岁的海伦（也叫奈尔）搂在怀里哭泣，长达半个小时；洛克菲勒、塞吉和维拉德则高声唱着圣歌。

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28 岁的乔治·古尔德一直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祷告。乔治没有他父亲瘦削的身材，也缺乏反应迅速的头脑和良好的个人修养。没有人知道他是在祷告父亲不朽的灵魂，还是祈祷获得操纵父亲复杂商业王

国的智慧。然而，大部分人希望乔治能聪明一点，祈祷得到父亲的智慧。哭泣的奈尔旁边是古尔德其他的子女：爱德温（25岁）、霍华德（20岁）、安娜（16岁）、弗朗克（在他父亲去世时刚过15岁生日），所有人都被悲痛笼罩。他们爱这个对其他人来说像谜一样的人。钱的问题放在一边，没有人知道离开这里后将何去何从。

确切地讲是6号早上10点，因为以往古尔德总是很守时，由八辆黑色轿车组成的送葬队伍开往布鲁克林的伍德公园公墓。一小时以后，棺材被抬出来放置在巨大的花岗岩和大理石陵墓前。陵墓坐落在一片空地上，可以看见远处秀美的湖水。古尔德上一次来到这个肃穆的地方是1889年1月，他花了12.5万美元建造这个陵墓。那天早上和今天非常相似：凛冽的寒风；刺骨的寒冷，护柩者抬着海伦（与古尔德生活了26年的妻子）瘦小的身躯走在结冰的小路上，一直将她送到那空洞的坟墓中。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当时，古尔德的悲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事实上，这就是全部的故事。“这个沉痛的打击让他改变了很多，”《纽约世界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这件事压弯了他微微佝偻的身躯，让那饱经风霜的脸变得更加憔悴。古尔德先生本人身体并不十分健康……妻子的死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此刻，近4年后的今天，杰伊回到了海伦的身边，从此再也不会离开她。

在这个宏伟的陵墓前，纽约城市大学的校长亨利·米切尔·麦克拉肯（Henry Mitchell MacCracken）宣读了悼词。在他后面，两个工人正准备完成一项可怕的任务，他们戴着厚厚的橡胶手套，拿着几桶滚动的水银。他们依照麦克拉肯的手势走向前，一勺一勺地将那些液体浇铸在古尔德棺材里面，然后将棺盖封严。“那一幕太可怕了！”古尔德的侄女爱丽丝·诺思洛普（Alice Northrop）许多年后回忆道，“那一刻，时间过得太慢了，异常残忍地慢！”最后，那些工人将杰伊·古尔德的棺材放到他妻子的身边，然后用大理石盖住陵墓。

古尔德豪华的坟墓不仅仅代表一个镀金时代的大亨希望得到法老般的永恒，它还是一种最后的交代和逻辑的终点，古尔德多年来已经习惯这种戒备森严的生活方式。《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没有忽视葬礼现场的一些状况：在公墓的周围，有一些“脏兮兮、留着长发”的人，戴着红色的围巾。这些

不满者（反对者）抱怨着、诅咒着，发誓要实施暴力。不过，就像以前一样，这次他们仍然待在那儿，鬼鬼祟祟地盯着强壮的私人侦探。他们和古尔德的送葬人群一起过来，然后又护送家属离开。出现在伍德公墓的私人侦探和用水银封缄的棺材，不但是为了防止反对者的破坏，也是为了防止盗墓者盗墓。因为就在许多年前，A·T·斯图尔特的尸体被盗，窃贼向家属进行勒索。当然，纽约金融街也流传着不同的解释。《纽约先驱报》的贝内特猜测，私人侦探和封缄的棺材是为了防止古尔德从地下跑出来再次袭击华尔街。

✱ ✱ ✱

在距伍德公园西北210公里的卡茨基尔山罗克斯伯里镇，很少能听到对古尔德的批评。在这里，得知古尔德去世的消息后，一些乡下人聚在山间的一个小教堂里唱圣歌，为古尔德祈祷。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莫尔（More）家族，是古尔德母亲的亲戚，她在古尔德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其他人则是古尔德的老友，在很久以前，他们曾与少年时代的古尔德玩摔跤游戏，并且在1856年即古尔德雄心勃勃的20岁那年，曾庆祝过古尔德的第一本书《特拉华的历史和纽约边界之战》（*History of Delaware County and Border Wars of New York*）的出版。

这些善良的基督徒可能无足轻重，他们是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小老百姓。他们对青年时代的杰伊在这个小城之外寻找财富的故事知之甚少。（古尔德并不是那种喜欢利用自己过去卑微的背景自我炒作的人。古尔德曾经告诉一位固执的记者：“我父亲很贫穷的事实对我来讲不名一文。”）仅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才非常渴望重温年轻时的点滴，所以经常回到罗克斯伯里。1887年、1888年夏季，古尔德曾回去待过几天。在后一次旅行中，他已经患有严重的肺炎，并几乎使他丧命，但他却从未提及。在1888年由他的儿女和侄女陪同的那次旅行中，古尔德漫步在罗克斯伯里城那条未铺柏油的小道上，拜访了几位老朋友，然后漫步到当地的公墓。他在阿克维尔附近的佛露湖（Furlow）边钓过鱼。后来又有谣言说，乔治·古尔德（人们谈论最多的长子和继承人）在佛露湖边买了一块地，打算在那里建一栋别墅。现在，在这个纪念仪式上，杰伊的朋友和堂兄妹摇着头说他的去世真令人遗憾，他们盼望

着这个灿烂的男孩能再次回家。

不过，并不是古尔德所有的罗克斯伯里老朋友都这么怀旧。朱利叶·英格索尔（Julia Ingersoll），古尔德商业生涯中第一位重要的支持者赞达克·普拉特（Zadock Pratt）的女儿这样说：

他留下了7.2亿美元，但他仍然欠我父亲几千块钱。在死后仍然欠别人东西，难道他不觉得难过吗？当一些人提到古尔德这个可怕的名字时，我的父亲总是要说：“嘘！不要大声。”父亲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个人的忘恩负义。这就是我奇怪地感到自己好像从来不能说古尔德坏话的原因吗？他究竟在上面的金库里放了什么，他又去哪里了呢？

新平知覺
PDG

第二章
祖 先



从纽约州的小镇罗克斯波里出发，沿着西部拓荒者之路前行两英里^①（以前叫做比佛丹，后来成为西部定居点），在一片布满岩石的陆地上耸立着一座坚实的木屋。这座木屋坐落在山脊下，面朝着一条狭长的山谷。两百多年前，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既没有标注也没有名称，杰伊·古尔德 1836 年 5 月 27 日就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他早期的童年生活。1880 年，《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的记者奉命调查古尔德的底细，并这样描述这片 150 英亩^②的土地：“房屋背靠着山尖，山脚下对着高速公路的另一端。最近的邻居也相隔 1/4 英里。随处可见的石头栅栏，淹没在山毛榉和枫树丛中。山下有一片苹果园，一条小溪蜿蜒流淌在树木掩映的山谷中”。

杰伊出生时，古尔德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两代人，但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古尔德家族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杰伊的曾祖父亚伯拉罕·古尔德（Abraham Gold，1732 年生于康涅狄格的费尔菲尔德，那是一个坐落在长岛海峡的海滨城市）曾在费尔菲尔德民兵第五团任陆军中校，1777 年 4 月 27 日在里奇菲尔德战役中牺牲。这个亚伯拉罕是美国第一代古尔德家族的内森·古尔德（Nathan Gold）少校的曾孙。内森是个清教徒，也是一位精力充沛而贪婪的企业家。1647 年他从英格兰的圣·埃德门兹伯利（St. Edmundsbury）移民，而后积聚了大量财富。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内森是 17 世纪 70 年代费尔菲尔德最富有的人。在 1674 年间，内森和 18 个殖民者一同发起了要求查尔斯二世将康涅狄格划入版图的运动。内森的财富主要来自土地和商船，这使他有大量空闲时间参与公共活动。他当过当地民兵组织指挥官、政府文员和殖民地高等法庭的法官。

内森唯一的儿子内森·古尔德二世出生于 1663 年，他继承了父亲参与公

① 1 英里约合 1.6 公里。——编者注

② 1 英亩约合 4 047 平方米。——编者注

共活动的传统，曾在费尔菲尔德城中当了两年职员。此外，他还担任过两个职务——康涅狄格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康涅狄格州副州长，直至 1723 年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汉娜·淘考特（Hannah Talcott）是费尔菲尔德众多淘考特家族成员中的一员。后来，内森·古尔德二世又与萨拉·波尔（Sarah Burr）结婚，波尔家族在费尔菲尔德也同样地位显赫。（萨拉是亚伦·波尔的姑姑——她曾愿意资助普林斯顿大学）。在内森二世当政时期，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公理会或长老派类的清教徒，对于美国主教制教会教徒非常难以容忍。在他担任副州长时期，曾促使法院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斯特拉特福的主教制牧师到社区传教，从而将他们驱赶出费尔菲尔德。内森二世和他第一任妻子汉娜生了 7 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塞缪尔（Samuel）——1692 年 12 月 27 日生于费尔菲尔德。塞缪尔后来成为当地的富商，于 1716 年 12 月 7 日与以瑟·布拉德利（Esther Bradley）结婚，婚后育有 6 个子女，其中最小的一个是亚伯拉罕，杰伊·古尔德的曾祖父，他后来死于里奇菲尔德战役中。

亚伯拉罕于 1754 年与费尔菲尔德的约翰·波尔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1777 年，他在与英国人的战役中牺牲后，留下伊丽莎白和 9 个儿女。两年后，在英国人开始有组织地将费尔菲尔德付之一炬以后，伊丽莎白和家人便无家可归。但是，伊丽莎白坚强而勇敢地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并挑起抚养 4 个女儿（艾比盖尔、伊丽莎白、黛博拉和安娜）和 5 个儿子（埃兹凯斯、约翰波尔、亚伯拉罕二世、杰森和丹尼尔）的重任。古尔德家族是从亚伯拉罕和伊丽莎白的子女开始使用“Gould”而不是“Gold”作为姓氏的。根据安娜的后代讲述，改姓是为了简便：虽然在书写时可以写做“Gold”，但发音仍然是“Gould”。

后来他们的三个儿子（埃兹凯斯、约翰波尔和丹尼尔）从事了航海业，并最终葬身大海。至于杰森，他结了婚并在费尔菲尔德终其一生。但是杰伊·古尔德的祖父，亚伯拉罕·古尔德二世，走上了一条最原始，也最史无前例的路。他在 1788 年 22 岁那年与安娜·奥斯本（Anna Osborne）结婚，不久之后，他告诉新娘想去航海，安娜想到了他死去的三位兄弟，于是向他提出另外一个计划：到纽约卡茨基尔山新开垦的处女地垦荒。于是，亚伯拉罕和安娜加入了移民康涅狄格的大潮，亚伯拉罕的堂兄淘考特·古尔德也在

其中。

根据 W·H·蒙塞尔 (W. H. Munsell) 的《特拉华县历史 1757 ~ 1880》(*History of Delaware County, 1757 ~ 1880*)，这群来到特拉华的“寻地者”包括 1789 年来自费尔菲尔德的 20 多个家庭。他们从奥克兰山跨越哈得孙河，穿过哈德逊市，来到格林区的卡茨基尔镇。然后，他们沿着崎岖的小路，跨过没有桥梁的河流，仅靠树上刻的路标指路。这队朝圣者在早春来到斯坦福德，在露斯河口（特拉华的一条东部支流）不远处搭起了帐篷，但是在那里，他们的几匹马走失在丛林中。亚伯拉罕·古尔德二世和乔治·斯奎斯 (George Squires)、犹西亚·帕钦 (Josiah Patchin) 去追赶马匹。这三人沿着露斯河顺流而上，发现雅各·因曼正牵着他们的马匹。因曼是最早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人之一。他带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同伴，赶着马匹到了附近一个村庄，“用人们所熟知的先驱者的好客方式宴请他们吃了一顿鹿排大餐”。后来，当因曼得知他们的意图时，便帮助他们选择了附近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他们察看了福尔布鲁克山谷的土地，”年轻的古尔德在《特拉华县历史和纽约边界之战》(*History of Delaware County and the Border Wars of New York*) 一书中这样写道，“决定在这里定居以后，他们带着丢失的马匹回到移民大队。此时另有两个人——尼赫迈亚·海斯 (Nehemiah Hayes) 及戴维·斯奎斯 (David Squires) 加入了他们，所以总共留下了 5 个人。”这样，这 5 个家庭签订了租约，签名向庄园主交租金，庄园主拥有哈登贝赫的所有权，此地后来成为西部居留镇，再后来被称做罗克斯伯里。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在相邻的村庄定居下来，其中大部分在霍巴特和斯坦福德，都成为哈登贝赫领主的佃户。

一百年后，当杰伊·古尔德再次探寻童年的足迹时，他或许会苦苦思索为什么祖先会在这样一片“贫瘠而没有希望”的土地上安家落户。与杰伊一起长大的著名自然学家约翰·伯勒斯 (John Burroughs) 的描述则让这片土地浪漫起来。在他 19 世纪 70 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伯勒斯这样写道：“特拉华东部支流灌溉着这片田园诗般美丽的乡村，被卡茨基尔山平息的冲动，使这片乡村环绕在绵长的丘陵和布满岩石和树木的山脉中”。但是这片被伯勒斯称做“理想的天然牧场”的地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妙。厚厚的红色泥土上覆

盖着顽固的泥盆纪岩石和页岩。上面的斜坡上长满了高大的橡树、枫树、山胡桃、樱桃、桃树、山毛榉、榆树、云杉、栗子树，还有一簇一簇的铁杉。这里的泥土坚硬无比，新开垦的几片土地除了草其他什么都不长。因此，亚伯拉罕·古尔德上校（古尔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这样称呼他的祖父）和他邻居的主要工作就是挤牛奶，除了满足自己的日常消费，还制作奶酪和黄油出售到阿尔巴尼和曼哈顿。

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与亚伯拉罕在费尔菲尔德的富裕生活相比差得太远。通过几年坚定而耐心的努力，亚伯拉罕建立了自己的农场（牛从没有超过20头），拥有了150英亩的土地。说不上富裕，但至少摆脱了贫穷。亚伯拉罕和安娜迎来了自己儿子的诞生。约翰·波尔·古尔德（John Burr Gould）生于1792年10月16日，是西部居留镇第一个白人男孩，也就是杰伊·古尔德的父亲。他们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伊利莎白，接着又生了8个孩子。1823年亚伯拉罕上校死后，约翰继承了这片贫瘠家园的契约。在当时这是一个好机会而不是陷阱，也是在这种充满希望的状态下，约翰娶到了妻子。

* * *

默斯维尔（Moresville，现在叫大乔治，从西部居留地横贯山区）的莫尔家族是卡茨基尔这个蛮荒之地最能配得上古尔德这个贵族的家族。英格兰斯特朗斯佩本地人约翰·摩尔（John More）和他的妻子贝蒂·泰勒·摩尔（Betty Taylor More）1772年带着两个孩子移民到这里。在他们到达纽约不久后，摩尔在哈伯特修建了房屋，成为定居在特拉华的第一位白人。后来，他移居到哈德逊的卡茨基尔城附近，在1786年建造了他最后一座房屋，后来成为默斯维尔城的“广场”。在几个铁路交汇点居住过以后，摩尔开了一家旅馆，并慢慢富裕起来。为了抚养6个孩子，他在空闲时间还做过修理工、书记员、邮递员和世俗牧师。到了19世纪20年代，默斯维尔已经由一个孤寂的边远小镇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城镇。贝蒂死于1823年，享年85岁。精力充沛的约翰一直活到1840年，去世时95岁。他留下了88个孙子和无数曾孙。

摩尔大多数后代居住在默斯维尔以外的西部居留地，有一个儿子亚历山大·泰勒·摩尔（Alexander Taylor More）留在了城里。他和他的妻子南希·哈

里（Nancy Harley）生育了 14 个子女。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玛丽生于 1798 年 6 月 20 日，正是这个玛丽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深深吸引了约翰·波尔·古尔德。我们对于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好像很漂亮，她的虔诚弥补了约翰·古尔德家族的清教徒主义。他们的恋爱过程好像都是依照《圣经》进行的，因此也进行得非常缓慢。在他们 1827 年结婚时，约翰已经 35 岁，玛丽 29 岁。玛丽将她的织布机搬到约翰 5 间大卧室中的一间，同时也带来了家具和她以前得到的纪念品。她将这些东西放在过道左侧的大起居室，过道里放了一个大壁炉。在古尔德家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玛丽每天都在屋子周围种花，渐渐地这里开满了茂盛的玫瑰花和风信子。

约翰·古尔德需要几个强壮的儿子帮助他经营贫瘠的农场。在这里不仅需要放牧、做奶酪和黄油，还要从小果园摘苹果，榨苹果汁，做枫叶糖。因此，有几个结实的孩子会帮上大忙。但玛丽和他接连生了 5 个女儿：萨拉（Sarah，1828）、安娜（Anna，1829）、南希（Nancy，1831）、玛丽（Mary，1832）、伊利莎白（Elizabeth，1834）。直到 1836 年，这对夫妻才生了一个男孩，一个瘦小的早产儿，他就是杰伊·古尔德。这个男孩在世界上的时间和他的身躯一样短少。从体形上看，在 56 年的生命中他一直都比同龄人显得瘦小，但在其他方面他却成了巨人。

新平船

第三章

深夜的十二行诗



杰伊·古尔德的父亲约翰·波尔·古尔德是一个复杂而带有悲剧性的人物。约翰·古尔德的父辈告诉他，古尔德家族非常显赫：成功的古尔德、波尔和淘考斯的历代子孙在康涅狄格州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和他的父亲一样，约翰不稳定的地位在他们高大的祖先面前显得相形见绌。

诚然，在他周围的邻居看来，约翰·古尔德已经非常成功了。换句话讲，他并不比大多数人活得差。除了牲畜、牧场、枫糖、果园，他在城里还有一家榨汁厂，但这些对他来讲都不重要。约翰·古尔德从博学的父母那里受到了全面的教育，对于贫穷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很早就形成的恃才傲物性格，被人认为是一种势利的表现，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古尔德的乡村邻居太少，无处发挥他的智力水平。无论如何，作为当地一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这个小山村所不能提供的更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总是带着嫉妒蔑视外面更大的世界。约翰·伯勒斯在回忆起“古尔德先生”时说，他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家伙，总是寻求“一种比其他人更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约翰·波尔·古尔德有些自命不凡，但是其他古尔德家族的人，就像大部分生活在罗克斯伯里的人一样过着踏实的生活。玛丽亲自为家中所有的人做衣服。他们的食物大多由自己耕种得来，家具也是自己做的。家里仅有的几件买来的东西中，有一件是进口的茶具（但是并不贵）。为了这套茶具，玛丽特意让他的丈夫做了一个精致的装有玻璃门的橱柜。这套茶具在家里摆放了几年，很少使用，唯恐磕碰或摔碎。杰伊·古尔德的姐姐安娜回忆说，这套茶具（在那时的农村很少见到）是家庭地位的无言象征，能够代表一定的生活品位，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仍然显得很卑微。

事实上，我们了解到的关于杰伊·古尔德早年的大多数家庭生活都是应他大女儿的要求，由古尔德的姐姐们提供的。“当你的父亲来到这个家时，”安娜写道，“家里有5个女孩。一天早上，祖母告诉我们有了一个弟弟。我们

看着他，快乐无比。很快，我们抱着他，逗他笑，他伸出小手拥抱我们。”杰伊的大姐萨拉早年这样回忆：“他是家里的宠物和玩具，被所有的姐妹们宠爱，一半是兄弟，一半是玩具。”

杰伊姐姐们的回忆也让我们对杰伊的母亲玛丽有了一些了解。她死于1841年1月，那时杰伊只有5岁多一点。“在他（杰伊）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告诉我关于母亲仅有的记忆，”萨拉写道，“我们从学校被叫回来，因为母亲临死前要为我们祈祷。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最后一次吻他时那冰冷的双唇。”萨拉相信杰伊的雄心与平和的性格得益于他从小就能控制住自己，长大后更是如此，这些优良的性格都是来自于其母亲，他也继承了母亲能将任何事情转化为他的商业利润的能力。

约翰将玛丽葬在斯特拉顿瀑布附近，位于凯利角（Kelly Corner）和罗克斯伯里之间的老牌浸信会教堂公墓。公墓紧邻“黄色礼拜堂”（Yellow Meeting House）。玛丽在世时总是在那里做礼拜（39年以后，杰伊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方尖塔来纪念他的父母和两个姐妹）。安娜·古尔德在母亲去世时11岁，她记得那地上堆着厚厚的积雪，父亲和几个人将母亲抬进了坟墓。她还清楚地记得泥土撒落在手工制作的棺木上的声音，肃穆的圣歌回荡在荒凉的墓地。小杰伊走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好奇地看着这一幕，显然他还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死亡成了古尔德家的常客。由于这个大家庭需要一位母亲，约翰1841年再次结婚。新婚妻子伊莱扎（Eliza）只和他生活了一个夏天，就在12月19日去世。约翰将伊莱扎和玛丽一起葬在了“黄色礼拜堂”的墓地。5个月后，50岁的古尔德又结婚了，这次是同玛丽·安·科尔宾（Mary Ann Corbin），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邻居。婚礼之后，这个家度过了一段貌似平静的日子，但是命运另有安排。1842年末，11岁的南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在萨拉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她描述了这一次大雪中的墓地之旅，当时她的继母玛丽·安挺着大肚子艰难地爬山。1843年3月3日，玛丽·安为约翰生下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为了以示区别，他被哥哥姐姐叫做艾布拉姆或艾比。欢乐再次回到了这个家。但两年后，玛丽·安也去世了。或许是认为自己克妻，约翰从此再没有结婚。他将照顾两个男孩

(一个9岁，一个2岁)的责任留给了4个女儿。

* * *

萨拉认为杰伊在10岁之前就经历了一系列“灾难”。这些灾难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死亡，还有其他的事情，塑造了约翰·古尔德的叛逆性和非常独立的政治信仰。

与他大部分邻居不同的是，古尔德这个政治上的民主党人，拒绝参加19世纪40年代主宰着卡茨基尔和邻近的哈得孙河谷的起义活动。那时，当地农民都拿起武器反对各种土地受让者，包括广阔的哈登贝赫封地的所有者。这些地土地是安妮女王1708年封给约翰尼斯·哈德伯格和他的同伴的。（“哈登贝赫的巨大封地的边界，”这位未来的垄断者古尔德在《特拉华的历史和纽约边界之战》一书中写道，“被勘测并确定下来——这片200万英亩的土地被赐给了个人——这是一种垄断，即使是具有贵族观念的英国政府都没有机会享受此等好事。他们后来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单个人的封地超过1000英亩，如果还有同伴一起受封，那么每个人的平均封地也不得超过1000英亩。”）在这场反对租地的运动中，这群武装起来的下层佃户穿着印花的衣服，脸上涂着油彩，将自己装扮成印第安人。他们用焦油和羽毛吓唬收租者，同时，使用相同的方式逼迫其他佃户参与到反叛运动中来。罗克斯伯里的人们经常使用传统的通知开饭的号角召集同伴，因此，他们曾经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大家出于习俗目的使用这类号角，免得与他们混淆。杰伊·古尔德写道：

1844年夏天，各派势力经常互相仇视。那些想法偶尔和他们不同、爱好和平的市民以及在法律上被称做上层佃户的人经常受到威胁……第一次公开的敌视发生在6月6日，约翰·古尔德的房屋前。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在中午吹起号角，这时，5个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出现在门口，他们认为我父亲依然使用号角做开饭的信号，无视禁吹号角的法令。他们要求他改正自己的行为，因为他蔑视了公众的权威。一场热烈而火药味十足的争论开始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撤退……

第二天星期二，另一伙“印第安人”来到老古尔德先生家，奉命夺

取号角，如果必要，还可以送他一件涂有焦油和羽毛的衣服以示惩罚。太阳正好升至子午线，机会到了，随着一声信号，一群野蛮人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鬼哭狼嚎地跑到古尔德面前，将他包围起来。老古尔德和他的儿子站在房前的空地上——我就是他的那个儿子，这是段多么令人难忘的记忆。那些可怕的面孔围着父亲，15支枪在一英尺远的地方对着他，那个头领拿着剑，凶恶地比画着。啊，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回忆，我每一刻都在想父亲会不会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地上……但他仍然坚定地站在那里，没有半步退缩……

约翰·古尔德让他雇来的工人从屋里拿出步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没有一点畏惧——最后，一些邻居围了过来，那些穿印花布衣服的“印第安人”再一次被赶跑了。那些下层佃户再也没有骚扰过古尔德家。”1845年，在纽约政府宣布特拉华为紧急状态后，老古尔德接管了当地的民兵组织，恢复了当地的秩序。

这场佃户战争造成的紧张状态几乎渗透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有一次，一个下层佃户的儿子威胁说要将杰伊“淹死”在“石头壶”（Stone Jug），一个靠近米克峡谷（Meeker's Hollow）的小学校。后来，约翰·古尔德便不让他的子女再去那所学校上学。他和他两个富农佃户的姐夫，菲特斯（Philtus）和蒂摩赛·科尔宾（Timothy Corbin）在他们自己的农场的旁边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学校，取名为比奇伍德神学院（Beechwood Seminary）。

✱ ✱ ✱

注定背负各自恶名的约翰·伯勒斯和杰伊·古尔德在一起读了10年书，开始在“石头壶”，后来在比奇伍德神学院。40多年后，杰伊的姐姐贝蒂告诉她的女儿：“你的叔叔和伯勒斯总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伯克斯在80岁时还身体健康，坚持写作，在回忆起他的老友时写道：“在杰伊犹太人的脸孔下，可以看到优异的学习成绩和骄傲的举止，这些都预示着他以后不平凡的事业。”他们在露斯河、佛露湖和米克峡谷一起捉鱼，伯勒斯经常睡在古尔德家中。伯勒斯回忆说，在当时一项最流行的校园运动中，瘦小而看似

羸弱的杰伊出乎意料地“勇敢和强壮……他好像是钢筋和橡胶做成的”。

像其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一样，古尔德和伯勒斯在遇到困难时总是互相帮助。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1848年的一天（当时古尔德12岁，伯勒斯11岁），伯勒斯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想起来还要写一份家庭作业，他从年鉴上抄了一篇，企图蒙混过关。老师识破了伯勒斯的诡计，为了惩罚他，老师责令其当天必须上交一篇十二行诗，写不出来就不能回家。趁老师不注意，杰伊很快地在石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然后用胳膊肘碰碰伯勒斯，从课桌底下传给他。于是，伯勒斯很快完成了任务，从而避免了被留在学校。

杰伊的诗是这样写的：

时间飞逝而过
深夜将要来临
我只写了两行
这你们都知道
在深夜前
我必须上交这首十二行诗
要不然
就要留在这里继续写
我只写了八行
但是你知道还差四行
只要到了十二行
我就什么都不要

在帮伯勒斯写的这首诗中，杰伊显示了他生涩但不乏优雅的经济天赋，同时也显示了他日后处理各种麻烦时的性格。他快速地组织语言，以使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一项特定任务。杰伊就是用这短短12行字帮助伯勒斯完成了任务：达到老师的要求，不需要的东西一概不要。

第四章

思想成熟的学生



杰伊·古尔德是一个挑剔而严肃的孩子，表面上脆弱，但遇到挑战时却很坚强，拥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他做事非常专注。“我记得有一次，他了解出一道对数难题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萨拉回忆说，“在做难题时他拒绝任何帮助。”

杰伊的坚韧大部分源自他早年就认识到自己厌恶耕种。作为家里的长子，他需要做家里最重的活。每天他将奶牛带上前来挤奶，然后再将它赶到草场。每次做黄油搅拌工作时也拣最重的活做，每个季节都榨苹果汁，收集并熬熟枫糖浆。父亲很依赖他，在切草时让他骑着马拖着干草耙。这些不需要用脑的苦差事被古尔德视做一种“折磨”。所以，当父亲叫他做什么事情时，他经常藏在某个角落学习算术、词汇和拉丁文。“这些东西非常讨厌，”他对萨拉说，“你知道我必须学习。”

1849年春天，在认为自己已经学到比奇伍德神学院能教给他的一切后，13岁的杰伊要求父亲将他送到哈伯特的汉福德先生开的私人学校读书，那里距离古尔德的农场有9英里。一开始，约翰·古尔德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当他意识到杰伊的要求不能被拒绝的时候，便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几个星期坚持不懈的要求和争论，父亲对儿子说：“好吧。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确信你以后不会做农民。”在哈伯特，杰伊寄宿在一个铁匠家，白天就去学校上课。这种生活持续了5个月，每个周末杰伊都徒步走回家看望他的兄弟姐妹，以确信他们一切都好。秋天到来时，比奇伍德神学院来了一位毕业于阿尔巴尼州师范学校、富有活力的新老师，于是杰伊又搬回了家。

约翰·伯勒斯回忆说，在詹姆斯·奥利佛（他称做“一个出色的人”）的指导下，他和其他罗克斯伯里的孩子才有了“真正的起色”。古尔德也称奥利佛是一个品德高尚、思想深刻的人。1893年，这位早已退休的绅士仍被他那些已经地位显赫的学生称做“奥利佛先生”，而他则称14岁的杰伊是一

个“思想深刻”的学生。“他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爱玩，也不粗野、喧闹，从不喊叫、上蹿下跳以及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过他并不像一些传记作家写的那样是一个告密者和谄媚者。“他的性格和道德观念使他不可能向老师告发某个同学。他的自立和自尊会反对这种做法。”和萨拉一样，奥利佛也对杰伊完全的独立和拒绝帮助的个性印象深刻。“如果被叫到黑板前做一道数学题，他就会待在那里直到完全解出来为止，从不向任何人求助。”

1850年4月9日，奥利佛让高年级的学生写一篇题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文章。古尔德按照要求完成，写出了一篇可以让许多报纸评论员自愧不如的文章。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诚实、诚实地思考、诚实地做每一件事情是最好的方式，它最符合推理的规则。诚实具有自我否定的本质；要诚实就必须自我否定；诚实要求我们不应与邪恶走得过近，不能与粗陋的习惯结交朋友；同时，我们必须遵守良心的警告。

如果我们做不诚实的事情，良心就会对我们施加最大的影响，警告我们这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做了不诚实的事情，这个忠心的监视者就会谴责我们。良心的声音不是响雷，是一种温柔但让人印象深刻的声音。它不强迫我们遵守这个要求，但会和我们一起思考，摆出支持正确做法的论据。

既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少了例证的支持，那我们就引用一些已发生的事例来证明这个论断是无可厚非的。道德高尚、被载入史册的乔治·华盛顿，他从不说谎。在年轻的时候，他克服了空虚的激情，寻求真理，遵循良心的教诲，“从来不说一句谎话”。关于他童年的那段轶事，充分显示了他的真诚。亚历山大主教在他那篇《关于人》（*Essay on Man*）的文章中写道：“诚实的人是上帝最尊贵的臣民。”

我们再次发现，《圣经》中有无数的片段都和诚实有关，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得不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杰伊·古尔德

当杰伊正在努力完成这篇作业时，他的父亲正遭遇着最严酷的现实。1850 年秋，22 岁的萨拉和 16 岁的伊丽莎白（贝蒂）应聘到学校当老师。21 岁的安娜和 18 岁的玛丽（也叫波利）留在家里，但是她们都有了心上人，好像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家。（事实上，波利后来嫁给了詹姆斯·奥利佛。）而家里的长子和继承人杰伊，早已明确表示不要这片付出太多但收获太少的农场。至于艾布拉姆，他只有 7 岁，不可能为家里做出什么贡献。因此，这些事实让约翰·古尔德不得不重用他雇用的一个年轻人——彼得·范·阿姆伯格（Peter Van Amburgh）。这个年轻人非常勤奋，也值得信赖。但是约翰已年近 60 岁，农场对他来讲实在太太，难以照料，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更极端的办法。

1851 年 7 月，约翰·波尔·古尔德与罗克斯伯里的居民汉密尔顿·伯翰斯（Hamilton Burhans）签订了一份文件，同意用古尔德的农场交换伯翰斯在镇上梅恩大街的生意，以及在埃尔姆大街（Elm Street，今天的维加山路）的房产。伯翰斯的哥哥爱德华是城里最大的富商，当时正在做锡货、铁皮和炉子的生意。这是一桩约翰一点都不懂的生意，但是他希望在自己聪明的儿子杰伊的帮助下能顺利经营。“我不可能将杰伊变成一个农民，”他对萨拉讲，“但是如果我做一些改变，他可能会满意一些。”换句话讲，约翰·古尔德希望这个拒绝在农场劳动的固执孩子能够同意学习做锡货生意。1852 年 4 月这个互换协议将生效，7 个月之前，也就是 1851 年 9 月，15 岁的杰伊被送到伯翰斯家，在制锡店工作，学做生意。

杰伊在比奇伍德神学院的日子正式结束了，但是他还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学习应用数学，尤其是工程学和勘测学。那个秋季的一天，他从爱德华家借了勘测工具，开始自学如何使用。事实上，杰伊并没把罗克斯伯里的锡货生意当做自己未来的职业。杰伊告诉萨拉，勘测将是他离开这座城市的“通行证”。“杰森并不想待在比佛丹……”萨拉在 2 月份给侄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去哪儿。”但是杰伊的确走了。在比奇伍德神学院，亚伯·克罗斯比（Abel Crosby）曾经介绍他认识一个叫斯奈德（Snyder）的测量家。在勘测并制作附近的乌尔斯特地图的项目中，斯奈德每月给杰伊 20 美元让他帮助自己工作。

3月，杰伊拿着斯奈德的工作邀请，向姐姐讲了他的工作机会，并以此作为和父亲艰苦谈判的序曲。“我们乞求他不要走，”萨拉回忆道，“我们认为他太年轻，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最后，虽然约翰非常失望，但还是同意杰伊去做那份工作。4月初（离他16岁生日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在那个星期，全家离开农场搬到了城里），杰伊启程去了乌尔斯特，口袋里只有5美元。

* * *

杰伊·古尔德不是那种将自己早年的奋斗描述成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小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事实上，他只在19世纪80年代讲过一次，那时他被美国参议院传讯，要求对自己的历史宣誓。这样，年轻杰伊的冒险经历才第一次出现在国会的记录里。

地图绘制者斯奈德给杰伊提供了测量工具，让他在乌尔斯特一个特定的小角落工作。他还交给杰伊一个账本。“在你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他说道，“你可以对一些小额消费签单，例如你吃东西可以先记个账，我随后会替你买单。”这样，杰伊背着工具出发了，绘图、丈量、画出原始草图，这些慢慢形成了斯奈德主要地图的一部分。杰伊出发后三天，停下来在一个农夫家过夜后，他想用他的账簿支付房费和饭费。这个农夫阻止了他：“喔，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已经赖了三次账。他欠这里每一个人的钱，我知道你已经得到钱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支付这笔钱。”听到这个后，杰伊翻出他的口袋说：“你瞧瞧，我没有说谎，我没有钱。”农夫点头说：“我相信你，但是我不相信那个人。”

根据杰伊的证词，他此后大多数日子没有吃饭，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一天傍晚，他一个人待在树林里，流下了眼泪。“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内心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么放弃回家，要么继续向前。”杰伊定了定神，最后选择了后者。他鼓起勇气走到下一个人家要食物，得到了那家农妇的热情招待。当杰伊要求将这笔钱记到账上时，农妇答应了。但是，几分钟后，当杰伊带着工具在路上飞奔时，他听到那个农夫在背后喊他。他停下来，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当得知农夫只是希望他能回来做一个正午标记（一个通

过窗户的南北线，太阳在正午时正好照在这条线上，这样可以依照这条线设定时钟）时，他长舒了一口气。完成这项工作后，农夫付给他1美元，但是杰伊让他从中扣除自己1先令的饭费。“这是我职业生涯挣到的第一笔钱，”杰伊回忆道，“对我来讲，这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从那一刻起，我坚持工作，完成了测量任务，并且通过在不同地方做正午标记支付了自己的开销。”

9月，到了斯奈德承诺给杰伊和另一位年轻的测量者彼得·布瑞克（他也从事乌尔斯特地图的测绘工作）支付报酬的最后期限，斯奈德又一次破产而不能支付他们的报酬。为了抵付薪水，古尔德和布瑞克拿走了斯奈德的地图所有权，并和另一个年轻的测量者奥利佛·蒂尔森结成了合作伙伴。和其他两个伙伴不同的是，古尔德并没有什么现金；他给其他两个合作伙伴当雇员，每月得到30美元的工资外加食宿，同时他还同意减少未来地图的分红。（布瑞克和蒂尔森将得到未来收益的80%，杰伊得到剩下的20%。）“那些天，杰伊·古尔德每天拼命工作，就像他现在一样，”40年后，蒂尔森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道，“甚至吃饭的时候他都在绘制地图。他是一个工人，我父亲常常说：‘看古尔德，难道他不像一个司机吗？’”三个月后，地图完工，三个合作伙伴也各奔东西，杰伊从地图收益分红中获得了500美元。

杰伊在罗克斯伯里的新家度过了1852年的圣诞节，然后启程去阿尔巴尼，在那里他成立了一个小组，为阿尔巴尼和夏克尔维尔（Shakersville）之间即将修建的公路做勘测。在阿尔巴尼，他住在舅舅摩尔家，与他的表兄埃瑞姆·摩尔（Iram More）一起进入阿尔巴尼学院上学，这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这所学校上午9点上课，下午2点放学，”杰伊在给他姐姐的信中这样写道，“课间休息5分钟，一天两顿饭。”在他们不上学时，阿拉姆帮助杰伊做修路勘测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杰伊自学如何使用经纬仪，这件复杂仪器可以更精确地测量水平角。）两个年轻人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工作，还曾经作为院外游说团叩响纽约议会大厦的大门。他们支持的议案是为建立纽约全州的勘测体系提供资助。这个由曼哈顿议员提出的议案最终失败，该议案要求对每个区做一个单独的地图，这一过程由一系列单独的招标完成。“如果这个议案通过，”杰伊写信给詹姆斯·奥利佛，“我想我可以到耶鲁大学读书，这是我的梦想。”

他给家里的信总是显得严肃而冷静。但是，他的姐姐们却担心杰伊与阿拉姆的交往，因为阿拉姆曾因酗酒被里奇蒙德维尔的卡茨基尔学校开除。古尔德家的姑娘对酒精异常敏感。她们清楚地记得母亲玛丽在临死之前，祈求外祖父亚历山大·泰勒·摩尔戒酒的一幕。“这个可怜的人，”波利·古尔德曾写道，“……当看到他醉醺醺地回来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现在，慢慢衰败的牛奶生意和对经营不善的锡器店的转让，以及那些越来越不合时宜的贵族习惯，让约翰·古尔德也拿起了酒瓶。“父亲有个坏毛病——你和我都知道。”波利在给奥利佛的便条中这样说。她还写道：“考验和折磨诸如此类的痛苦让他采取了一种可怜的方式来解决麻烦，以前他可不是这样。我希望他能改过，虽然我知道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惯，它是如此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对杰森来说我希望这是一个教训，我也确信杰森会明白。”波利其实不用担心什么。在她向杰伊抱怨父亲后不久，杰伊就向一个朋友坦率地讲述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幸福不是放纵，而是自我约束。

成年后的杰伊出于礼貌，有时会喝几杯红酒或香槟，但是他一般很少饮酒，就像他很少抽烟、玩乐和说脏话一样。或许他认为这些事情是邪恶的，或者他认为没有益处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倾向于后者。与他的父亲完全逃避教堂不同，杰伊会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开始是迁就姐姐们，后来是迁就虔诚的妻子和女儿。但是他不像母亲、姐姐、妻子和女儿那样通过宣称自己在耶稣中“重生”表达自己的虔诚。对教条的狂热笃信不是杰伊的风格，他似乎只具备最基本的宗教信仰：对上帝这个抽象概念有名义上的、社交上的可以接受的虔诚，仅此而已。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当前，是现在。“对于未来世界，”他对朋友说，“除了《圣经》里讲的，我并不想深究它的奥秘；但是对于现在，我决定尽最大的努力将生命里所有的可能变成现实。”

第五章

老鼠夹子和地图



完成公路勘测项目之后，杰伊于1853年3月离开了阿尔巴尼学院，启程去参观他感兴趣的4所大学：耶鲁大学、罗特格斯大学、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还计划去看看曼哈顿——他的车票由外公摩尔购买，条件是帮外公一个忙。杰伊与表兄埃瑞姆一起上路，并随身带着一个精巧、漂亮的桃木盒子，里面装有埃瑞姆醉醺醺的老祖父认为最具创意的东西：一件他亲手制作的精美的捕鼠器。杰伊的任务是带着这件小东西给各地的工厂看，然后参加在纽约举行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

这个捕鼠器使杰伊的第一次旅行上了纽约的报纸：一篇关于盗窃的报道。当时，杰伊和埃瑞姆走在去40街区第五大道水晶宫的路上，一个男子突然冲到杰伊面前，抢了那个盒子转身就跑。追了几个街区，两兄弟终于抓住了那个被杰伊后来称做“非常强壮”的劫匪。这个小偷个头很高，非常结实，杰伊后来回忆说，他几乎“后悔”追上他了，“并想放他走，但是我的一个手指头别在他大衣扣眼里，还没来得及离开，就已经有一堆人围了上来，警察也来了”。那个小偷坚持说那个盒子是他的，是杰伊和埃瑞姆想偷走。于是警察将他们三个带到了警察局以便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一到警察局，杰伊便大声地向那个小偷挑衅，让他说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以证明这个盒子的归属。当然，那个小偷是不可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的。杰伊说出了里面装的东西，让警察把盖子打开。古尔德后来非常愿意讲这段故事，当看到这个荒唐的东西后，小偷被逮捕了。看到“那个小偷脸上沮丧的表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处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在法庭记录上这样写道，嫌疑人是这个老鼠夹子捉到的最大的老鼠。）《纽约先驱报》用了半个专栏讲述关于这两个游览纽约的“勇敢的参观者”的冒险故事——这也是古尔德为数不多的几次受到报纸友好的对待。《纽约先驱报》的报道还引起了大家对那个捕鼠器的兴趣，于是杰伊为外公摩尔签订了一个小小的授权协议。

那桩生意做完后，埃瑞姆·摩尔回到大山中，杰伊又花了两个星期游览了他永远无法就读的4所大学。没有记录证明他在费尔菲尔德做了停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在纽黑文停留，拜谒过祖上的旧址或者看望他父亲的堂兄——约翰·古尔德上尉，老亚伯拉罕上尉的兄弟杰森的儿子，一个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船主。约翰·古尔德上尉刚刚将伊丽莎白·波尔·古尔德在大革命时代的房子换成一所大公寓。不过，杰伊似乎不知道这些，两边的家庭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当然，杰伊卑微的出身也使他不愿意露面。

4月初，杰伊回到罗克斯伯里，他看到了残酷的一幕。波利随天气的变化反复发烧，还伴有可怕的咳嗽。此外，杰伊的朋友奥林·赖斯·伯顿（Orrin Rice Bouton，大杰伊7岁，同伴都用其中间的名字赖斯称呼他）也中断了在斯塔奈卡第联合大学（Schenectady's Union College）的学业。他躺在父亲罗克斯伯里的家中，与危及他生命的严重伤寒病做斗争。玛丽·摩尔·伯汉斯（Mary More Burhans，爱德华的妻子，杰伊表兄的母亲）同样在发烧。杰伊和他的姐姐贝蒂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前去探望，并帮助照顾赖斯和玛丽。事实上，可能由于杰伊在伯汉斯家中待的时间太长，城里传出了他和伯汉斯的女儿玛瑞亚的绯闻。星期天，这是他唯一一次来伯汉斯家，他护送姐姐安娜去温德姆（Windham）教堂的阿萨尔·哈夫（Asahel Hough）牧师那里，安娜对这个牧师有浓厚的兴趣。（许多年后，安娜还记得弟弟赶着三座的马车送她去温德姆的事情，当时那辆马车由一队“精神昂扬的灰色高头大马”拉着。）晚上，杰伊给父亲记账，看到了老古尔德恶劣的财务状况。此外，更雪上加霜的是杰伊还得到了从阿尔巴尼传来的纽约州勘测议案被否决的消息，议案的发起者也去世了。

虽然经受了这么多打击，古尔德对自己的前途依然很乐观。一天晚上，他和亚伯·克罗斯比在锡器店里围着火炉聊天，在轻松地聊了几个小时的别的话题后，杰伊突然宣布：“克罗斯比，我将会很有钱。我已经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告诉你我将会很有钱。”当克罗斯比问杰伊采用什么方式时，杰伊回答说：“我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仅仅看到了目标。计划必须跟着目标走。”

随着发财梦的不断膨胀，他的大学梦慢慢消退了。“很长时间以来，我

一直认为财富可以提供给我更好的教育，”他给表兄泰勒·摩尔写信时说，“但除非我做出很大的牺牲，否则这一天将越来越远，我担心它永远不会实现。我希望自己的财富能迅速积累到足够我去上大学的程度，但是由于父亲希望我能在这里陪他，所以离开这里的任何决定似乎都是错误的。”不久之后，当感觉不能实现大学教育的梦想时，他开始贬低大学教育的作用，认为它是没有必要的，不能代替在现实世界学到的知识。他对朋友说：“几何、化学、代数、哲学等所有常规教育的组成部分，从一个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担心，所有这些会阻止我对老鼠夹子和地图世界梦幻般的访问。”

杰伊当下的计划就是独自承担阿尔巴尼区的勘测和绘制地图工作。他那时 17 岁，他给当地一些名人写信，希望他们能够下订单，这样他就可以向他们提供不同城市和居民的信息，了解谁的产业最赚钱。他雇了两名助手（表兄埃瑞姆和一个年轻人），指导他们进行勘测的基础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杰伊忙着监督指导助手，有时候自己也做一些勘测工作。他从阿尔巴尼叔叔的家中走出去，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自己的地图。他还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销售自己的地图。

同时，杰伊开始计划在特拉华区进行类似的活动。他在 8 月份阿尔巴尼的勘测工作刚刚结束时，就开始给潜在的购买者寄送说明书，这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在招募了他在罗克斯伯里的同学约翰·查普林加入他的特拉华项目后，杰伊劝说另一位当时的大人物——西蒙·D·钱皮思（Simon D. Champion），当地《布卢姆维尔镜报》（*Bloomville Mirror*）的编辑和发行人，帮助他销售地图。几个月前，当钱皮思希望扩大报纸的读者范围时，杰伊给他寄了 5 美元支持自己的工作。“5 美元的确很少，”杰伊写道，“但是我确信将来可以做得更好。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作为报纸的朋友，我们应该在不涨价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扩大发行；每年或在有政治运动时，我都会交 5 美元。我将给你寄一份贫穷家庭的名单，你可以将报纸寄给他们。”作为交换，杰伊给钱皮思写信说：“在特拉华区，老师应该通过购买每个学习街区的地图来鼓励地图在学校的使用。我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达到这个效果……你必须使这篇社论符合你的风格，同时又必须有说服力，并出自你

之手。”

杰伊在夏末回到罗克斯伯里，以便更加仔细地指导特拉华的地图项目。碰巧当时醉醺醺的约翰·波尔·古尔德因喝多而摔倒，不得不拄了几个月的拐棍。“父亲老得太快了，”波利写道，“我发现他的大脑和身体都在衰老。”因此，作为副业，杰伊同时管理着这个不怎么盈利的锡器店。麻烦事一个接一个，杰伊都必须处理，其中一个持续的麻烦就是雇员问题。最后，杰伊不得不因为工作马虎和酗酒而解雇了埃瑞姆。其他勘测项目也开始进行。查普林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所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就在查普林离开的时候，杰伊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因为他对建造先前勘测过的阿尔巴尼到夏克尔维尔的公路发生了兴趣。

阿尔巴尼的律师、政治家汉密尔顿·哈里斯（Hamilton Harris）许多年后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杰伊的情景。哈里斯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代表杰伊上过无数次法庭，进行了无数次游说。1853年8月初，哈里斯在办公室会见了夏克尔维尔公路公司的经理，这个知名人士由一个“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深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的人陪同。哈里斯认为这个孩子是经理的儿子。那次会谈讨论的是这条公路某一段的反对者正寻求得到建设禁令的问题。这个小男孩提出的一个问题使哈里斯几乎无法用精巧的法律辩词来回答。杰伊问道，在反对者获得禁令前还有什么事情阻碍建设进行吗？当哈尔斯回答说“没有”时，这个“小家伙”坐下来“开始在桌子上做起了计算”。算了一小会儿后，杰伊抬起头来问哈里斯，如果没有禁令，他能否在公路建设过程中保护他们不受起诉。“我告诉他可以。我可以一直提供保护，直到有建设禁令为止。”哈尔斯回忆说。

因为后来又见过多次，杰伊已经可以使用法律条文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服务。就在那一天，杰伊雇用了他可以找到的工人，租用了每一辆马车。第二天早上，他以夏克尔维尔公路公司的信用做抵押，买来了大量木材。然后，将工人分成三组，每8个小时换一班，日夜不停地干，晚上工作的那组使用火把照明。到公路反对者得到建设禁令的那天早上，那段有争议的路段已经建设完毕。

✱ ✱ ✱

从1853年冬天到1854年春天，古尔德的工作量一直在增加。在特拉华地图项目仍在艰难地寻求出版时，纽堡和锡拉丘兹铁路的所有者让杰伊对这条铁路线的特拉华段进行勘测。杰伊自己的特拉华项目还带来了其他的收获，纽约州农业协会（成立于1832年，主要目的是巩固、提高和促进纽约的食品和农业产业）交给他一个项目，让他根据原始文献和当地老居民的访谈，写一部关于他家乡的完整史书。

这几项任务成为这个刚刚18岁的孩子的沉重负担。“他事必躬亲，”查普林在几十年后回忆道，“他的工作太繁重了。”最后，在6月份完成铁路地图勘测的几个星期后，杰伊终于病倒了，得了严重的伤寒，在罗克斯伯里休息了3个星期。波利这样描述杰伊当时的情形，“我们不知道杰伊是否能经得住这么严重的打击。他的大脑和他的身体一样虚弱，他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孩子而不是杰伊。”波利在给奥利佛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太虚弱了，因此，我们避免说或者做任何使他兴奋的事情。他常常发抖，因此需要不定时地叫医生来。”

杰伊的病情推迟了他姐姐萨拉和乔治·W·那思罗普（一位带着5个孩子住在乌尔斯特区莱克沃克的鳏夫）的婚期。他们原定于6月28日结婚，但是直到7月13日才最终完婚。在生病期间，杰伊只能喝牛奶、鱼汤和大麦咖啡。许多年后，亲戚们回忆起当年虚弱苍白的杰伊像木棍一样站着，穿了一件有他两倍大的衣服，像一个虚弱的幽灵。他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为了获得现金，杰伊出售了特拉华地图的所有权，但是仍然负有最终完成地图的责任。“他将特拉华地图卖给了史密斯，”波利那时在信里写道，“扣除所有成本后还剩1 000美元。我们认为如果他自己销售地图会更好……他需要学习如何花钱！懂得如何花钱和懂得如何挣钱一样重要。”

萨拉结婚后，迅速增加的工作（虽然有两个助手帮忙，可是工作增加得太多太快了）又一次将杰伊的身体搞垮。他在7月31日得了肠道感染，只有注射大量吗啡才能稍微减轻他的痛苦。萨拉结婚后住在锡拉丘兹，贝蒂在玛格丽特维尔教书，家里只有安娜和波利日夜照看他。杰伊生病时，从老农场

雇来彼得·范·阿姆伯格负责管理店铺。连续三天，已经皮包骨头的杰伊一点都不能进食，好像快要死了。“你知道这个病在一点一点地破坏杰伊的身体，他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波利给萨拉写信，让她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最坏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杰伊渡过了难关，10天后，他已经可以小心地走到店里了，讲讲他所有的烦心事。“我很高兴地图已经做好，”萨拉写道，“因此，这个孩子可以少操心点了，否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痊愈。”杰伊的医生建议他暂时放下工作，但是波利向萨拉报告：“放下所有工作好像只会让他的情况更坏。”

杰伊的身体仍然很虚弱，直到9月份才完全恢复。然后，他作为罗克斯伯里的代表参加了特拉华区民主党大会。西蒙·查普林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他们两个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当地政治运动的活跃者。虽然杰伊在这次会议上游刃有余、穿梭自如，他的姐姐依然很担心他的身体。他已经完全恢复体重，但是姐姐们还很担心他持续不断的咳嗽。“如果他活在世上的时间很短，”波利在结束锡拉丘兹的旅行后给萨拉写信说，“我也不会活得很长，因为在世上我只有他一个亲近的朋友。”

整个10月和11月，杰伊都待在家里，处理锡器店的事务，写一写关于特拉华的历史。12月初，杰伊不顾姐姐对于他还不能完全适应冬天天气的劝告，执意出去工作几天：察看特拉华地图的一些细节问题。在某个寒冷的一天，杰伊骑着马翻山越岭，停在莫尔斯维尔一位医生家里，他得了肺炎。两个星期后，杰伊才痊愈回到家中。安娜来到莫尔斯维尔，在外祖父莫尔留下的一个空房子里照看杰伊，他们的外祖父已在3月去世了。直到杰伊最后回到罗克斯伯里（就在圣诞节前夕），他仍然需要卧床休息，但他还是兴奋地给西蒙·查普林写了一封信：

罗克斯伯里，1854年12月28日

致 S. B. 查普林

亲爱的查普：

我该如何开始这封信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像商务信函那样称呼你“先生”，“亲爱的先生”，或者想象着我们正在面对面地谈话。你相

信吗？当然，在这封信的开头，你看到的依然是冰冷的正式称呼，但是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那些好像从没有消逝的时光，仍弥漫在我心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还想象着自己坐在《镜报》的办公室。除了一周前彼得先生带来过的一封信，我已经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由于每周《镜报》的邀请，我从上周开始写信，但是我的手颤抖得厉害，后来不得不放弃。查普，你现在是报纸和广告的支柱，也是《镜报》的所有者。我很想起来做些什么，但是医生在我身边批评我的每一个行动，警告我会有什么后果。他目前的忠告是：“什么都别多想，靠喝空无一物的影子汤过活吧。”他说提到“地图”这个词，就需要加一勺调味油；想到任何商业交易，就像冬天跳进水磨池。但是我已经不听这些了，我正在调整自己的食谱。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康复并恢复强壮。我有收割机和马具，如果你要油漆雪橇，我也可以帮你。查普，如果你有时间回信，记得给我讲个笑话，我已经5个星期没有笑过了。

尊敬你的杰伊·古尔德

新平船

第六章

生死背后的秘密



肺炎痊愈后，杰伊在罗勒斯伯里城及其附近待了整整 18 个月。到 1854 年 2 月，他有所康复，并在爱德华·伯汉斯的总店里做兼职，因此彼得·范·阿姆博格在锡器店里就没多少活了。在空闲时间，杰伊专注于写那本历史书。1855 年 3 月，杰伊又一次差点儿被击倒，古尔德家族的其他人也遭受了沉重打击。波利突然死于肺结核，约翰·波尔·古尔德告诉孩子们，这种病已经折磨了古尔德家族几代人了。波利的去世让她的未婚夫奥利佛悲恸欲绝，杰伊也感到有“一块黑幕”遮挡了“一切，甚至晴天也是如此”。直到 4 月莎拉的儿子霍华德·古尔德·那思罗普（Howard Gould Northrop）的出世才使杰伊恢复了精神。

糟糕的精神状态和虚弱的身体状况使杰伊安定下来，等待良机，并考虑自己未来的规划。他在银行里有 2 000 美元，那些地图和项目也带给他一些盈利。但是他有更大的计划，他感到需要更多的资本。杰伊一边给伯汉斯打工，一边偶尔进行一些投资。他把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变成现金。约翰·伯勒斯，当时已经是边远小镇的学校校长，买了他两本旧书：《德语语法》和《地理》。伯勒斯付给他 80 美分。“杰伊当时非常高兴。”伯勒斯许多年后回忆道。

在伯汉斯店里工作的时候，杰伊遇到了达特茅斯毕业的约翰·威廉·麦克劳瑞（John William McLaury），他后来成为古尔德在罗克斯伯里最后一个好朋友。当时，麦克劳瑞回到城里，在爱德华·伯汉斯资助的寄宿学校新罗克斯伯里学院任校长。在他到来之后不久，有一次去伯汉斯的店里拿课本。“我受到热情的招待，一个英俊的年轻绅士友好地帮助我选择需要的课本。”麦克劳瑞回忆道，“我拿起一支笔按照他说的记录着，他还偶尔推荐一下自己认为某一学科最好的书。”杰伊的评价给麦克劳瑞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很快知道他对于书的知识不仅仅限于数学和物理……他很喜欢文学和科学研究，

在空闲时间一定看了很多书，因为他的知识面太广了。”这两个人相处得非常好。不久以后，当得知杰伊在勘测方面的技能时，麦克劳瑞让他到学校教书，并给他一份薪水。

古尔德还积极参加罗克斯伯里学院的文学俱乐部。虽然这个俱乐部里主要是学生，但联系较为紧密的还包括几个社区的专业人士。在麦克劳瑞的邀请下，杰伊开始出席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他表现出了超越自己年龄的丰富的知识和超强的推理能力。麦克劳瑞回忆起杰伊“用清晰而有力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使他的辩论非常有说服力”。麦克劳瑞记得一天晚上，当讨论的主题转向来世时，杰伊变得异常兴奋。古尔德坚持认为人的存在有个“至高点”，但是只有一个人走到“更高的层面、更高层次即天堂的意识时”，这个点才会变得清晰。讨论结束后的某一天，杰伊和麦克劳瑞“碰巧在一个遇到麻烦的女士家中相遇。她为刚刚失去孩子而悲痛。任何人和她谈起婴儿在另一个世界的情况，都残酷地强调了那些永远失去的东西。她问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使得想努力安慰这位女士的杰伊考虑了一大堆关于信仰和信条的事情——不仅是基督教，还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麦克劳瑞惊奇地发现杰伊对这些事情如此熟悉。后来，只要他们在一起，就会愉快地探讨一些宗教命题。

麦克劳瑞和古尔德关于死亡思考一直延续到5月，这时他们承担了一个关于人死后的研究课题。他们来到了郊区的一个小木屋，带着医疗器械看望一个将要死去的年轻人阿墨斯·格雷。麦克劳瑞回忆道，整个晚上格雷都气若游丝，他可怜的老母亲焦虑地搓着双手。“我们被她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不过我们不允许自己被感情支配。或许我们已经到了认为哭泣和悲伤是懦弱行为的年纪。我记得我们两个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观看了死亡的全过程；我们希望探寻生与死背后的秘密，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格雷得了和波利相同的病，因此，杰伊强迫或希望自己做这件事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是杰伊这样做了。然而，他得到的启发却使他退却。可怜的格雷去了那个早已等候他的地方，在他们离开死亡小屋之后，杰伊悲伤地告诉麦克劳瑞，他认为所有这些哲学探讨只能给大脑提供咀嚼的“精神食粮”，对“现实世界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杰伊在童年时期就面对家庭成员的死亡，他自己也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加上最近波利的去世，这些都使他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短暂。“时间过得太快了！”他在12岁帮助伯勒斯写作业时就曾这样写道。古尔德的那首打油诗或许完全是胡闹的。不过，一个很了解他的侄子认为，那4个单词很“贴切地表现了杰伊·古尔德从童年时期就一直有的感觉，这种强烈的、可能是无意识的感觉刺激和驱使着他……使得他极少允许自己在休闲和娱乐中获得快乐。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生命的短暂，有时间的时候就一定要做些事情。”

* * *

度过了平静的1855年，进入1856年的1月，杰伊继续在罗克斯伯里学院教授文学和勘测，继续撰写他的特拉华历史书。就在他辛苦工作的时候，当地流传起他与玛瑞亚·伯汉斯的绯闻，这个绯闻后来也不止一次地被传记作家引用。这个绯闻在罗克斯伯里流传了很长时间，40年后汉密尔顿·伯汉斯觉得有必要拆穿它。“谣言说杰伊要与玛瑞亚结婚，”伯汉斯在1896年写道，“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杰伊·古尔德当时如此害羞，他没和任何人谈起过婚姻，他也从没有这种念头。”

害羞，或许吧，但也是好奇的。彼得·范·阿姆伯格结婚后，杰伊在一封信中向阿姆伯格询问道：“婚后的幸福生活，那片陌生而不平静的大海，我从没想过要在那里停靠。彼得，和你的老朋友分享一下你的秘密和快乐；事实上，我深深地为你祝福，你是那样成熟、勤奋和审慎，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烦，我将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在当时，婚姻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西蒙·查普林这样回忆杰伊：“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追过女孩子……我们都是单身汉，从来不讨论结婚的问题。”

不过，杰伊也有一些写情书的经验。据姐姐贝蒂回忆，“当时伯汉斯店里有个爱尔兰人，他的爱人在很远的地方。他不会写信，所以杰伊经常帮他写情书——通篇都是甜言蜜语。”贝蒂回忆说，杰伊“使用了所有的形容词和副词来告诉她是多么甜美……那个爱尔兰人非常高兴，在寄信之前拿给所有人看。他让杰伊大量使用这些辞藻，用的越多他就越高兴”。

至于杰伊和玛瑞亚·伯汉斯，如果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是

爱德华·伯汉斯和杰伊·古尔德一次生意上的不愉快——一个被认为是背叛的事件，这也是古尔德后来名声变坏的一个原因。这次不愉快无疑也使这段关系走到尽头。1856年初，当地几块小土地的继承人到店里找爱德华·伯汉斯（他也投资一些地产），希望出售他们的土地。但是伯汉斯并不想做这个交易。杰伊意识到交易价格很有利，于是迅速抢先购买了这些土地。在这次生意中，杰伊动用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有他父亲给他的几百美元。

根据汉密尔顿·伯汉斯（杰伊忠实的朋友和他哥哥爱德华的商业对手）所说，杰伊买下地不久，就将这些地卖给了周围的农民，用伯汉斯的话讲，这次交易“利润丰厚”。事实上，杰伊在归还父亲的几百美元后，还剩5 000美元，这对一个20岁的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这次交易的实际成本——爱德华·伯汉斯解雇了他——与收益比起来还是相当值得的。虽然完全合法，但是杰伊挤走付给他薪水的人还是有些不道德。当古尔德在其他方面也臭名昭著时，一个不太友好的媒体将这次土地交易作为年轻的古尔德成为金融大鳄的转折点。

在这些投机交易进行的时候，杰伊也最终完成了他的史书。这本厚厚的著作最终在1856年4月完成。虽然纽约州农业协会承担了一部分任务，但是出版需要杰伊自己负责。这个年轻人售出了几百套订单。然后，他选择了一个费城印刷装订厂印刷出版这些书。一切都太巧了，杰伊的手稿刚刚到达费城出版社的办公室，就传来不幸的消息：印刷厂办公室突发了一场大火，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我非常不情愿地告诉你，那场大火烧掉了我的《特拉华区历史》。”他给詹姆斯·奥利佛写信说。不仅手稿被烧毁，印版也没有了。“我一早就出发去费城，看看确切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补救的话，我就要重新写了。你知道的，我没有留备份的习惯，所以只好加班加点地工作。”

通过在印刷厂废墟中仔细地搜寻，杰伊和印刷商找到了残存的几页，杰伊将它们带回罗克斯伯里。整个5月和6月，刚满20岁的杰伊重新创作了他的作品。在这项工作中，杰伊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那几页残存的手稿、原来的提纲以及先前由查普林的《镜报》刊登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摘要。这本书最后完成于1856年9月，在他的家乡罗克斯伯里印刷，但是该书出版时他已不在

罗克斯伯里，所以没有看到它。杰伊已经离开这个城市（这个他再也不称为“家”的地方）去创造他的财富。

在当时杰伊的老朋友中，只有约翰·伯勒斯和约翰·查普林两个人被他的负面报道所吓倒，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其中约翰·查普林曾在密歇根州高等法院担任过首席法官。（在他们迟暮之年，伯勒斯还成为古尔德女儿的密友，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杰伊常常提到很喜爱他的书。）“在他离开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杰伊——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伯勒斯在1919年说道，“我们隔得太远了。我从没有接触过他所从事的职业。”19世纪60年代末，有一次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副审计长带来一些纽约银行的官员，让后来成为作家的伯勒斯（当时他是财政部的一名职员）带领这些绅士们参观金库。古尔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没有认出我，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带着他们参观金库，但始终没有让杰伊认出我。”

20年之后，伯勒斯已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他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古尔德的情景：

我正在第五大道上散步，看到一个街区外的马路对面有一个人向我走来。他的步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好像很久之前见到过。这会是谁呢？我想着，开始搜寻我的记忆。我以前见到过那种步伐。当这个人走近时，我看到了，原来是杰伊·古尔德。他走路的姿势与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有微妙的不同。我经常梦到家庭成员之外的两个人：爱默森和杰伊·古尔德；一个是我自觉亏欠得太多，一个我什么也不欠；一个人的名字我很尊敬，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很熟悉，就像整个世界很熟悉他的名字一样，一个使用不光彩的手段进行金融投机交易的人。

其他罗克斯伯里的人们还和他保持联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过古尔德的突然拜访。这位金融家由一小队人陪同，通常很友好地闯进来，就像蓝色的天空来了一场受欢迎的暴风雨，最多的情况是他在去更重要的目的地

的路上顺便拜访附近的一个或几个老朋友。后来移居堪萨斯的詹姆斯·奥利佛，曾接受过古尔德在视察西部铁路公司时顺路进行的无数次拜访。同样，每次即使古尔德离罗克斯伯里还有很远的距离，他都要去看望汉密尔顿·伯汉斯（他将古尔德的农产卖给赖斯·伯顿后，开了许多商店）和还在当农民的彼得·范·阿姆博格。古尔德也去看望西蒙·查普林，他一直在卡茨基尔的一些无名小报当编辑，还有亚伯·克罗斯比，他后来成为纽约州卡茨基尔南部的朗道特的一名成功的五金器具、钢铁和压榨设备批发商。

杰伊同样与赖斯·伯顿保持着联系。赖斯在密苏里查普尔希尔大学当了两年（1858~1860）校长，后来又在梅肯大学当了三年（1860~1863）校长。之后，他回到罗克斯伯里，接替了麦克劳瑞担任罗克斯伯里学院的校长，直到1869年学校关闭。在接下来的15年里，赖斯目睹了路德教派在卡茨基尔的博维纳、温德姆、斯坦福、富兰克林、考因曼山谷的各类集会。古尔德和伯顿在这段时间定期见面，1884年重新获得联系后关系更密切，那时赖斯已移居曼哈顿，接管位于纽约最差的贫民窟的著名的五点教会（Five Points Mission）。1884年后，直到1891年9月赖斯去世，杰伊一直和他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经常突然造访他的教会，或者邀请赖斯到第五大道的家中做客。

1875年的某一天，约翰·麦克劳瑞（在他们两个都离开罗克斯伯里后就失去了联系）突然造访了杰伊位于曼哈顿的豪宅。他们两个至少15年没有见面了。（其间，麦克劳瑞和一个来自卡茨基尔哈波斯菲尔德的姑娘结了婚，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在夏洛特大学——现在的夏洛特—北卡罗来纳大学数学部任主任）。“杰伊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麦克劳瑞回忆道，“他外表有一些变化，不过比我预想的要小。”这个大亨坚持让他的老朋友和家人一起吃饭。后来，当麦克劳瑞准备离开的时候，杰伊小声问他不是一切都好。“确实是这样，”麦克劳瑞回忆说：“我高兴地说，除了杰伊热情的握手和美好的回忆，我什么都不需要。”

第七章

古尔德斯博罗



在和萨拉·古尔德结婚的7年前，乔治·诺斯洛普就与两个卡茨基尔商人在费城合伙开了一家皮革厂。吉尔伯特和爱德华·帕林（诺斯洛普第一任妻子的哥哥）来到卡茨基尔的一个小村庄帕林维尔，他们的祖先乔纳森·帕林于1817年建了一家很大的皮革厂。

到1856年中期，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诺斯洛普·帕林在波科诺山（罗克斯伯里以南250公里）的投资开始盈利，这三个合伙人决定将家搬到工厂附近。

诺斯洛普·帕林工厂的旁边是宾夕法尼亚州门罗区的布罗德黑德河的东岸，最初以“雾镇”（Frogtown）著称。吉尔伯特·帕林给这个地方起了个更优雅的名字：卡纳登西斯（Canadensis），这个名字取自铁杉树的拉丁文“*Tsuga canadensis*”。这种树的树皮含有大量鞣酸，非常适合将生皮变成鞋底皮。诺斯洛普和帕林怀着巨大的梦想和企盼，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开辟他们新的前程，杰伊·古尔德也看到了皮革制造的巨大利润。

卡茨基尔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希望。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卡茨基尔山被称做“蓝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山的北坡和东坡上长满了蓝色的铁杉。当时，卡茨基尔山有不计其数的原始森林和铁杉，那些树都是100英尺高、4英尺粗，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些森林随着纽约和波士顿皮革市场的发展，在短短的50年里就消失殆尽，头脑简单的“剥树皮者”毁坏了无数的原始森林。1835年，纽约州大约40%的皮革制造商都在卡茨基尔区的特拉华、格林、奥伦奇、斯科哈里、沙利文和乌尔斯特进行生产。到诺斯洛普和帕林在卡纳登西斯建厂时，卡茨基尔山的铁杉养活制革厂的情形都已经成为回忆。（亨利·戴维·梭罗在1844年游览卡茨基尔时看着光秃秃的山，借用了他的朋友拉尔夫·瓦尔多·埃默森的话，将其比喻为“被吮过的橙子”。）像诺斯洛普和帕林一样的皮革商虽然只能使用下等的桤木或橡

树皮，但还是像蝗虫一样吞噬着北起阿迪朗达克南至阿莱干尼和普卡多绵长的未被开垦的铁杉林。

赞达克·普拉特（Zadock Pratt）也是当时参与这次经济迁移的一员，被称为“格林区皮革大王”。普拉特的家乡普拉茨维尔（以前的斯库海尔基尔）坐落在距离罗克斯伯里3公里的地方。1856年，66岁的普里蒂通过皮革生意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父亲老赞达克·普拉特也是卡茨基尔早期皮革商的一员，1802年在朱伊特、格林区开过皮革店。10年后的1812年，小赞达克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他向美国海军出售了10万个白蜡木船浆，这些船浆都是用北面和西面山坡上废弃的树木做成的。12年以后，在以14 000美元的价格将家族生意卖给他两个兄弟之后，34岁的赞达克利用斯库海尔银行贷款建立了自己的皮革王国。

普拉特的皮革生意越做越大，慢慢成为了最大的皮革制造商之一。高峰期时，他可以生产6万张鞋底皮，拥有100名工人。（根据普拉特的精确记录，20年里，他的皮革厂生产了超过150万张皮革。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记录中，在与杰伊·古尔德合作之前，普拉特使用了1万公顷树林，用掉了25万捆铁杉树皮，雇用了4万名工人，超过30名合作伙伴，所有这些他后来都“平静地处理掉了”。）普拉茨维尔的生意非常红火，直到1845年他关闭商店，这时方圆十几公里的铁杉树皮都被剥光，周围65~80公里类似的树也都被砍光。

像其他皮革商一样，普拉特只会出现在新的有铁杉的地方。但是与那些一旦铁杉用光就把自己的定居地当做鬼地方一样抛弃的人不同的是，普拉特希望重新利用这些被开发过的土地。（据报道，普拉特第一次在斯库海尔投资时就向当地居民保证，他希望“和他们一起生活，而不是单纯地利用它们”，并允诺成为当地的长期居民。）在买下斯库海尔山谷的森林后，他将那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希望在关闭制革厂以后，工人们能有钱经营农场。普拉特也鼓励投资其他生意（例如铁匠铺、木匠作坊、制帽厂、机器店、玻璃厂以及其他小工厂），来支持和帮助他撤出皮革厂以后的当地社区。

普拉特兴建了几百所住宅（每一所都装饰有壁柱和旭日型的山墙窗户），

向普拉维尔神学院捐赠，建造了三座教堂（荷兰革新派、路德教派、天主教），种了1 000株大树（山胡桃、枫树和榆树），在市中心修建了装饰性水池，铺了蓝色石头的人行横道。他自己用斯库海尔银行的贷款买下了365公顷的牧场。这个关心工人福利的理想主义者，计划建造纽约州第一个最大的社区：一个风景如画、田园诗般的花园，被当时的媒体誉为“卡茨基尔的宝石”。

普拉特20多年来每周有6天都会亲自到现场指导工厂生产，在他关闭制革厂以后，开始将空闲时间投向了政治。在担任治安法官和镇长后，他还在议会服务了两届，并于1848年被提名为民主党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但他拒绝了这项名誉。在涉足公共领域的同时，普拉特还继续与当地军队保持长期联系，他曾经在军队中升至中尉。（1825年，在法国将军拉斐特巡视美国期间，普拉特曾带领一个小分队护送他到卡茨基尔。）由于酷爱军事历史，普拉特曾经利用整个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和其他人排演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普拉特总是处于指挥的位置，例如拿破仑或是其他将军。

虽然普拉特拥有大量财富，他的私人生活却充满了悲剧。他在18年里安葬了三位妻子——比德·迪克曼和埃丝特·迪克曼姐妹，以及艾比盖尔·沃森。艾比盖尔给普拉特中尉生下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不幸夭折。艾比盖尔的姐姐玛丽于1838年和普拉特结婚，帮助他抚养一双儿女，她很快完成了从姨妈到母亲的转换。1868年，玛丽也去世了，老普拉特再次结婚。1869年，在他去世前两年，79岁的普拉特娶了来自曼哈顿商业杂志《皮鞋和皮革通讯》（*Shoe and Leather Reporter*）的28岁女职员苏西·格林。

和很多获得巨大成就的人一样，普拉特的性格有些古怪，并且非常自我。1843年他投资5万美元开了自己的银行，所有的支票上都印有他的头像。同年，一个巡回各地的雕刻家经过城里时，普拉特让他在斯库海尔基尔山谷中一块超过500英尺（约150米）高的石头上雕刻自己的头像。这项工作完成后，这个艺术家继续雕刻了普拉特生活的各种象征物：他最喜欢的马、铁杉树、皮革厂、普拉特的盾徽等等。普拉特甚至让他雕刻一座豪华坟墓，后来由于雨水渗入没能完工。在第一项雕刻完成后的许多年里，普拉特还做了很多事来纪念他的儿子乔治·沃森·普拉特。他是一位联邦军队的军官，在第

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也称做“布尔溪之战”中受伤，一周后死亡。“普拉特雕塑”一直保存到今天，坐落在普拉特最喜欢的 23 号路东向通往村庄的路边。

✱ ✱ ✱

杰伊·古尔德第一次遇到长他 46 岁的普拉特是在 1852 年的夏天。当时古尔德正在绘制乌尔斯特地图，普拉特和他的一些合作伙伴控制着乌尔斯特区塞穆桑维尔郊区的制革厂。1853 年 1 月，乌尔斯特项目一完成，古尔德就写信给普拉特表示希望认识他，并向这个中尉建议给格林区画一张同样的地图。普拉特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古尔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许诺以后的项目一定会留给他。

麦克劳瑞在 19 世纪 90 年代写道，在 1856 年那个寒冷的、被雨水浸润的春天的早晨，“一个头发灰白、个子挺拔、穿着靴子、带着马刺的老人来到罗克斯伯里。他的靴子高过膝盖，泥巴从头到脚溅了一身”，他高声地询问古尔德，并“自我介绍说是普拉特中尉，希望古尔德先生给他的牧场做勘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古尔德不仅勘测了普拉特在普拉维尔的农场，还在其他方面有一些作为。他一度建议普拉特写一本自传，而普拉特对此事的看法则无从考证，但这本书始终没有出来。

不过，普拉特希望雇用古尔德写一些其他东西，例如讲话和重要的信件。正如古尔德的姐姐贝蒂在古尔德去世后对她女儿说的那样，“普拉特中尉在金斯顿农业协会的演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你舅舅杰伊执笔的。那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这篇演讲配得上普拉特。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它，称赞作者的智慧。”贝蒂还记得在锡器店，杰伊大声地为她和父亲朗读演讲草稿的情景，那是一篇关于马作为一种劳力的文章，约翰·波尔·古尔德提了一些建议，“杰伊写在稿子中，然后又加以修正……你舅舅还给普拉特中尉写过很多东西。”根据杰伊的朋友彼得·范·阿姆博格的回忆，普拉特为金斯顿的那篇演讲稿单独付给杰伊 100 美元，当时一天 8 小时的平均工资是 1 美元。

但是，杰伊的目标并不是做普拉特薪水最高的捉刀人或秘书。他已经被乔治·诺斯洛普的皮革故事所吸引。他还知道普拉特早在 1849 年就已在宾夕

法尼亚的奥尔登维尔进行投资。在工作之余，他努力使普拉特对开设一家新的皮革厂产生兴趣。杰伊说他相信宾夕法尼亚卢泽恩区的利哈伊和特拉华河之间有未被开垦的铁杉林，那里肯定有商机。他告诉普拉特，不仅这片树林听起来很理想，而且最近修建的特拉华和拉克万纳之间的铁路也给建造皮革厂提供了很大便利，迄今为止都没有一条路可以从普卡多运送原材料并运出产成品。（特拉华和莱克瓦纳铁路的重要性没有被普拉特忘却，1847年他还自己捐出一万美元资助修建哈得孙河铁路，这也加速了他的皮革运往曼哈顿的速度。）

根据普拉特的指示，古尔德开始进行可行性调查，于8月初来到普卡多。在那里，他带着指南针和一些勘测器材，在树林里一待就是好几天。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星期后，古尔德带普拉特来到这里，让这位老人亲眼看到了目力所及的大片铁杉和白腊林。普拉特当即决定与这位梦想着干大事、有探索精神的小伙子合作，他们的收益五五分成。

这是一对古怪的组合。普拉特又高、又老、又有钱，杰伊又矮、又年轻、又贫穷。他们之间的合约现在已无从查找，也没有人知道合约的具体内容。不过有一点可以推测，普拉特的主要作用是他的技术和资本，而古尔德凭借的是他的青春和活力。在信中，普拉特清楚地写道，工厂每一天运行的日常责任（他将逐渐投入12万美元）都由杰伊自己承担。普拉特将随时提供咨询和建议，他将回答建设、管理、获取原材和销售产成品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而杰伊是真正的创业者。

8月底，古尔德就利用利哈伊银行的贷款购进皮革厂的设备，并与当地土地所有者签订了取走树皮的协议。9月初，他雇用了50名工人开始清理土地。根据古尔德的自述，为了给他的老伙伴做好准备，他亲自砍下第一棵树，然后看着它被切成木板，作为皮革厂第一座建筑结构——铁匠铺。古尔德的第一个夜晚是在铁匠铺新支起的房顶下，躺在铁杉树墩上度过的。4天后，杰伊和他的伙计们建成了一座宿舍，虽然简陋但是很大，可以使每个人都很舒适地居住。由于杰伊的无私奉献，这些粗犷的工人为他们矮小但受人喜爱的老板欢呼，并通过了一项动议：这个地方从此以后被命名为“古尔德斯博罗”（Gouldsboro）。在给普拉特报告这个消息时，杰伊还匆匆加上一句：“他

们为享誉世界的伟大的美国农场主赞达克·普拉特先生欢呼。同时，还有一声更加热烈的呼喊，我确信这个山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欢呼。”

从个人的角度讲，不到 21 岁的杰伊更应该高兴。外祖父摩尔拥有摩尔斯维尔，帕林拥有帕林维尔，普拉特拥有普拉维尔。“古尔德斯博罗”这个名字会不会让这个一直努力工作的男孩满意呢？这个男孩（现在已经是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呢？



第八章

最好的朋友才会指出我们的错误



在工厂开业之初，普拉特和古尔德的关系就像一个有成就的巨头指导教育一个感恩戴德，甚至有些被溺爱的学生。杰伊好像一开始就真诚地欢迎和接受来自普拉维尔的建议、指导和提议。“我很尊重并接受你的所有建议，”杰伊在圣诞前夜不停地对普拉特说，“我认为它们是一本好字典。”

普拉特告诉他，所有未鞣制的皮革和所有的普拉特 - 古尔德皮革都要通过科斯 - 普拉特（Corse & Pratt）曼哈顿经纪行获得或售出，这家经纪行由普拉特的儿子乔治所有。对此，古尔德没有任何意见。当普拉特这个闲不住的皮革商（总是寻求使用新的工具和技术）决定让古尔德斯博罗成为全美第一家使用和完善他的新技术的工厂时（这项技术是他在一本商业刊物上读到的），古尔德也默许了。潮湿鞣革过程需要大量潮湿的废弃树皮，这些树皮在传统的制革过程中都被丢弃作为燃料。在理论上，有了这些原料，古尔德斯博罗制革厂就可以利用蒸汽动力而不是水动力进行生产，这就消除了河流结冰期带来的季节性烦恼。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怎样使燃烧更有效率。

杰伊和他的工人又辛苦地劳动了一个冬天。第二个宿舍和一间机器房、马车库、邮局和四间住宅都建了起来。四间住宅是为几个有经验的高级制革技师准备的——他们拥有制革的独家秘籍，这些都是杰伊不知道的——普拉特招聘了这些技师，并在春天开工前及时地送到工厂。大多数制革设备都在1857年2月准备就绪，那时第一张皮革从科斯 - 普拉特经纪行运来。到3月，几位技师已经忙着指导工人了。这些工人起初是木匠，现在已变成古尔德斯博罗制革机器上的齿轮了，每个人都学习从铁杉上剥树皮，在发酵池里发酵生皮，或者完成其他技术任务。

古尔德对这些细节没什么兴趣，他宁可学习逻辑学。在给普拉特的信中，他列举和解释了自己怎样组织和管理皮革厂机器系统运行和现金账户。他也喜欢报告几个不受普拉特家长制作风影响的、直接生产领域以外的一些其他

活动。在古尔德斯博罗运行了几个月后，越来越多的妻子和儿女来到这里，杰伊便驾车出去为建立教堂和墓地募捐。他还建了一所学校，自己花钱请了一位老师，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接受教育。“社区的骄傲，”他给普拉特写信说，“将会激发和鼓励我们的工人在工作上认真表现。”

但是，问题也一直存在。工厂的开办以及他所有的建设无疑耗费了大量资本。杰伊定期从普拉特那里取钱。工厂一直没有收入，更别提利润，直到工厂有一定产量时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善。但是工厂的产量一直很小，于是主制革师尝试着改良这个潮湿鞣革程序。（再加上设计完工上的推迟，古尔德斯博罗制革厂购买的蒸汽机在运来后一直不能运行，它的制造商也无能为力，直到最后更换了一台。）“虽然你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懂这一行，”古尔德在10月有一点烦躁地写信给普拉特，不失尊重的口吻中带有一丝讽刺，“但我倾向于我最初的建议——在这个时髦计划之外建一个水车作为后备，可能会节省时间、开销，减少失败。”

当他的团队在古尔德斯博罗解决难题的时候，杰伊多次访问了曼哈顿的皮革区（也被称做大沼泽，Swamp），这片区域贯穿斯布鲁斯和费里大街的东侧，位于现在市政厅的南部。以前这里严格地讲是片沼泽，蚊蝇肆虐，环境恶劣。17世纪初由于当地居民抱怨从皮革店里传出的难闻气味，那些皮革商后来就从那里撤走了。在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初，纽约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皮革制造业也已延伸到了北部森林地区。“大沼泽”逐渐变成一排排店面和仓库，买卖双方以及经纪商在这里进行生皮和成品皮革交易。赞达克·普拉特在1853年写道：“大沼泽之于皮革商就像华尔街之于金融家。”像科斯-普拉特这样的皮革经纪行在这里都设有代表处，一些皮革进口商和出口商也都有办事处。乔治·普拉特这样的经纪商定期到运输厂，为他们的客户以最优的价格获得最好的生皮而讨价还价。同时也会以最高的价格将成品皮革卖出去，并赚取佣金。通常，这些经纪商也会向皮革制造者提供短期融资，以赊账的形式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然后扣除原材料成本和利息，再从皮革销售中获取买卖佣金。

“我已经意识到，经纪商才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巨头，”观察敏锐的古尔德在1857年夏季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制造商似乎占有最多股本，但只能使用

资本，它的成本很高，风险巨大，工作十分辛苦。提供原材料的是第二大股本拥有者，但是成本同样很高，工作繁重。而经纪商，表面上看所占份额最小，但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他们从制造商和原料商那里获得纯利，同时自己却不从事任何繁重的劳动。”在9月写给汉密尔顿·伯汉斯的信中，杰伊倾诉说：“我要和乔治·普拉特一起参与这个过程，学习大沼泽的运作方式。我不太确定普拉特先生是否喜欢我的想法，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了解这个过程。我希望懂得这项交易的知识，接触从事交易的人。我已经学了太多买生皮的知识，太多了，如果那个老顽固同意的话，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卖皮革。”

大约过了一年，这个年轻人终于开始参与交易了。在1857年夏季和秋季，一场金融危机横扫全美，结束了墨西哥—美国战争后10年的繁荣景象。这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8月俄亥俄州人寿信托保险公司纽约分公司的破产。这是一家很大的金融机构，由于挪用巨额款项而破产。紧接着，无数英国投资者提走了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这种挤兑破坏了整个金融体系）。同时，粮食价格的下跌损害了农村经济，造成工厂仓库货物大量积压。伴随着运输收入的下降，几个铁路公司也倒闭了，一系列和铁路基础设施相关的土地投资也随之失败。无数投资者面临破产。9月，30 000磅印有“SS Central America”字样的黄金从三藩市的金矿运往东海岸，这引起了一些投资者对政府保持币值稳定能力的怀疑，公众信心又一次遭受打击。到10月，情况更加糟糕，当局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实行银行休息日，到12月底，曼哈顿近千名经纪商宣布破产，仅纽约市就损失了1.2亿美元。

危机过后经济一直没有恢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直到内战爆发才完全消除。也有一些精明的消费者在毁灭中找到了商机。花旗银行的总裁摩西·泰勒（Moses Taylor）疯狂地吞噬铁路股票，利用同样低迷的股价趁机控制了纽约市最大的天然气公司。莱昂纳多·杰罗姆（Leonard Jerome），即后来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依靠在危机中卖空大量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海军中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又快又狠地入主了几条出现财务问题的铁路线（纽约至哈莱姆区），迈出了他在10年内垄断美国铁路的步伐。

就在华尔街的秃鹰们大饱口福之时，危机在10月重创了古尔德。在当月

的第二个星期，有谣言称普拉特和古尔德的工厂将暂停生产。古尔德给普拉特写信说，许多供应商催他立即支付货款：“每个人好像都害怕死亡。我应该尽力而为，不向你报告坏消息。不过我们有一个单子在这个月 27 号到期……我昨晚一夜没睡，害怕我们无法偿还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一切商品（包括皮革这样的商品）的价格都稳步下降，而这时，古尔德斯博罗第一张成品皮正好生产出来。两个月后，也就是 12 月，古尔德和他的制革工人们终于将潮湿鞣革程序中的最后一个小毛病处理掉，普拉特和古尔德的工厂才得以正常运行，但仍然没有盈利。低迷的皮革价格使普拉特的盈利计划遥遥无期。

1858 年初，杰伊·古尔德和赞达克·普拉特的关系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古尔德没有抱怨鞣革新技术拖延了生产，也没有抱怨金融危机，尽管如此，普拉特还是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年轻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古尔德学习了越来越多做生意的知识，也慢慢对自己的直觉自信起来。他向普拉特咨询得越来越少，也开始不那么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的关系充满了新的紧张因素。

普拉特以前那种鼓励式的信件现在变成了独裁，他严厉地批评古尔德的管理和记账方式。但是，古尔德很清楚自己一直都遵循普拉特的决定，并且在财务上还受这个善变、难以取悦的同伴的控制。“我在很多方面需要你有益的和有帮助的建议，”他在 1857 年圣诞前夕写道，“我的剪贴簿里有这样一句格言，‘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指出我们的错误’……我经常在雨天读你写给我的信，我总是感到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也逐渐有了自己的主意。1858 年初春，22 岁的古尔德做了一件普拉特不喜欢的事情，他打破了只与科斯－普拉特经纪行一家进行交易的状态。他的新合作伙伴是“大沼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经纪行——查尔斯·M·卢普公司（Charles M. Leupp & Company）。这家经纪行承诺以更优厚的条件向古尔德提供原料并销售成品。

这次合作交给卢普的生意量，也即科斯－普拉特经纪行失去的生意量都是很小的。虽然普拉特继续指责古尔德糟糕的管理，但是古尔德斯博罗制革厂的产量在 1858 年已经不低于 60 000 张，这个数字已大大高于普拉特在普

拉维尔的工厂最好年份的产量。9月，古尔德在给普拉特写信时一改往常“亲爱的朋友”的称呼，而使用“亲爱的先生”。他在信中愉快又略带扬扬自得地告诉中尉，制革厂每天的产量是300张。在数字面前，严厉的普拉特对工厂的产量很满意，但是对每张皮革的收益和年轻伙伴的独立作风不满意，他继续提供工厂需要的资金，同时也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

* * *

赞达克·普拉特在后来的几年很少提到与杰伊·古尔德的合作关系。在《赞达克·普拉特编年体传记》(*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he Hon. Zadock Pratt*)一书中——这本1868年出版的书其实名字起错了，因为与其说它是传记倒不如说是自传——普拉特连篇累牍地列举了无数合作伙伴和皮革厂的名字。在那里，他提到了古尔德、古尔德斯博罗或者普拉特-古尔德。(杰伊自己只有一次提到普拉特-古尔德公司的解体，即在许多年后在参议院的证词中。当时，他用一种平和的语调总结了当时的情形：“我们一起合伙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然后我买下了普拉特在工厂的所有权。”)普拉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于是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件事情可以从他后来的信件以及他女儿朱莉娅·普拉特·英格索尔痛苦的回忆中得到确认。就像以前大多数传记作家写的那样，古尔德抢夺和欺骗了单纯而容易受骗的普拉特，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被现存文献所证实，在综合考察所有事实后，我们甚至发现这种结论不能成立。关于普拉特-古尔德工厂解体的民间传说，最初是被一个粗制滥造混饭吃的传记作者所引用，并在古尔德死后一个星期出版的。后来，这种说法便被不负责任地复制了无数次，最近的一次是在查尔斯·R·盖斯(Charles R. Geisst)的《华尔街历史》(*Wall Street: A History*, 1997)中，在书中查尔斯明确地讲道：“有人发现古尔德在皮革厂伪造账簿……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资金抽到他后来的合作伙伴那里。”

这段盖斯和其他作家都没有搞清楚的传说是被这样传诵的：在整个1858年，古尔德一直从普拉特-古尔德公司的账上转走资金，并将一部分钱投资于利哈伊峡谷的土地，并在斯特劳兹堡开了自己的银行，将更多的普拉特-古尔德公司资金存在这个银行，以便吸引其他企业的存款。就像罗伯特·I·沃

肖（Robert L. Warshaw）写的那样：“制革厂的业务发展迅猛，资本充足，但是盈利却很少。后来普拉特进行了少有的几次视察，翻阅了包含原始凭证的账本。”沃肖还补充说：“古尔德……在斯特劳兹堡开了自己的银行……普拉特发现他利用公司的资金支持银行的运作。”理查德·奥康纳，一位和死亡有某种感应的作家写道：“普拉特生命中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的人，是像鸡窝里的黄鼠狼一样无情的畜牲。”由于这些原因，受骗的普拉特在1858年圣诞期间宣布终止与古尔德的合作关系。

斯特劳兹堡的城市年鉴和宾夕法尼亚的州银行记录显示，在1857年或1858年，古尔德没有自己开设银行，也没有入股任何一家银行。斯特劳兹堡地区土地购买者记录上的确有古尔德的名字，但是这些交易的投资量不超过4 000~5 000美元，这个数额大体相当于古尔德在罗克斯伯里土地交易中所获的收益。另外一个与传闻不符的事实是，普拉特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搞得倾家荡产，因为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如果普拉特是个白痴，他怎么会积累了那么多财富；人们也知道在很多时候他也非常刻薄。事实上，这只传递了一个意思，即普拉特-古尔德公司的解体显示普拉特第一次没选择好合作伙伴。

沃肖将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写成事实，“制革厂的业务发展迅猛，资本充足，但是盈利却很少。”盈利很少的原因（事实上不存在这种事情）并不是由于古尔德将利润转走。在1857年危机后，皮革价格一直非常低迷，利润也非常微薄。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皮革厂全面开工运行，他们的投资回报速度也会被低迷的经济所延缓。普拉特显然希望通过某个协议价格买断他合作伙伴的权益以提高自己的盈利。最了解内情的一个人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在古尔德斯博罗公司作为杰伊的助手）回忆说：“拥有最大份额权益的普拉特让古尔德卖掉股份或者全部买下，以为古尔德根本买不起，希望迫使古尔德出售自己的股份。”说得更具体一点，普拉特的条款是这样的：普拉特用10 000美元购买古尔德的股份；或者古尔德必须以60 000美元的价格购买普拉特的股份。普拉特还用一种无理的态度补充说，对于这项无利可图的生意杰伊可以有10天的时间考虑。

根据推断，普拉特以60 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股份纯粹是大意。普

拉特已经为工厂投入了 12 万美元。因此，他之所以敢以一半的价格出售股份，是因为他确认古尔德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他的真实目的是迫使古尔德以 10 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股份。以这种价格进行交易，普拉特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古尔德两年半以来全身心的管理投入，至于古尔德对工厂的所有权则根本没有考虑在内。但是，普拉特显然低估了这个年轻人。

在普拉特留给他的 10 天时间里，古尔德去了纽约的“大沼泽”，与查尔斯·M·卢普、他的合作伙伴和姐夫戴维·W·李快速签订了一个合约。卢普和李以总价 60 000 美元的价格获得普拉特-古尔德公司 2/3 的权益（每个人 1/3）。返回普拉维尔之后，古尔德要求履行收购公司的许诺，并拿出新伙伴的信件作为证明，这让普拉特大吃一惊。这项交易最后完成于 1859 年 1 月 27 日，普拉特最终损失了 60 000 美元。同时，也使古尔德在这家蓬勃发展的皮革厂中获得了 1/3 的股权，并与“大沼泽”最有声望的经纪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总之，以前那些作家描述的所谓古尔德的第一次“大型欺诈行为”实际上是他的第一个妙举。根据以上事实，普拉特后来绝口不提他与古尔德的合作关系，他被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扫地出门，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第九章

狡猾的精神病患者



查尔斯·M·卢普来自纽约一个显赫的家族，15岁就为曼哈顿最成功的皮革商（同时也是州立法委员、纽约市长以及民主党国会议员）吉迪恩·李（Gideon Lee）工作。后来，他与李的女儿结婚。1841年李去世后，卢普将公司的名字改成查尔斯·M·卢普公司，但仍然与李的儿子戴维保持合作关系，戴维是该公司的律师。到他与杰伊·古尔德合作的时候，卢普已经成为“大沼泽”地区最大的皮革经纪商。

与普拉特的农民出身不同（他曾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与普拉特做过生意），卢普是一位城市绅士、向往美好事物以及艺术的赞助人。他引以为豪的是在麦迪逊大道第25街区拥有一座价值15万美元的豪宅，也是纽约最豪华的建筑之一。1843年妻子死后，卢普在那座豪宅里含辛茹苦地照顾三个女儿。卢普有许多像记者、评论家纳撒尼尔·帕克·威利斯（Nathaniel Parker Willis）这样的作家朋友，也有很多哈得孙河画家杰斯珀·克洛普塞（Jasper Cropsey）这样的艺术家朋友。他是世纪俱乐部和无数艺术家社团的会员，也是几个慈善机构的发起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天主教大教堂（这是他资助建造的）和纽约社会图书馆（他在该图书馆担任理事）。卢普是纽约社交、金融和艺术领域的核心人物，有良好的声誉、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强大的手段。在今天，我们应该称他为“大玩家”。

在商业领域，卢普出了名的保守：他细心地计算风险，只进行最安全的投资。因此，人们起初很难理解卢普购买古尔德斯博罗控制权的决定。“大沼泽”的经纪商一般很少直接投资皮革制造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买卖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与古尔德进行合作将会使卢普和李面临与无数老客户疏远的危险，因为他们会质疑卢普公司的公正性。

为什么一向保守的卢普要入股古尔德斯博罗公司呢？当时没有几个人理解他的做法：卢普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后来，戴维·李告诉朋友，早在1853

年他就发现了卢普举止的异常，这个皮革经纪商开始表现得有些疯狂，一会儿极度高兴，一会儿极度悲伤，虽然只是偶尔如此。到了1856年，情况越来越严重，那种情绪变化也越来越频繁。李曾一度掌管公司，卢普则被送出去旅行放松自己。但是，1857年的危机导致市场环境非常恶劣，戴维无法应付这场金融风暴，所以卢普的康复旅行被突然打断，并勉强回到了“大沼泽”。到了1858年10月，他又一次陷入精神错乱。这样，这个疯狂的乐观主义投资者立刻同意给古尔德提供资金去对付普拉特，但很快就陷入焦虑，然后是猜测、怀疑。李后来说，他当时认为自己的伙伴完全疯掉了。“查尔斯的精神不是很健全，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好久了。这件事情是多么可怕，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几个人意识到他的精神状况并细心看护他的朋友和医生）都被这个狡猾的精神分裂者欺骗了。”

因为卢普的精神问题，古尔德、卢普和李之间原本很复杂的合作变得更加复杂。考虑到实际操作性以及公司的公共关系需要他们远离工厂的日常管理，卢普和李于1859年2月1日和杰伊签订了一个合约，让古尔德成为“唯一公开的合作者”。虽然查尔斯·M·卢普公司将承担制革厂所有信用问题（这使得杰伊可以使用“两个名字的票据”，以便他自己、卢普和李平等地承担债务），但最初通过的方案是让杰伊全权负责工厂运行。古尔德后来解释道，卢普和李希望他们的参与能够不被外界所知，因为他们担心公众知道他们“参与生产后会影响到公司票据在市场中的信誉”。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个管理协定使卢普公司可以继续作为古尔德斯博罗的经纪商，就像一年以来他们一直合作的那样。卢普公司购买生皮的佣金率是5%，卖掉成品皮的佣金率是6%，这些都没有变化。但有趣的是，合约要求卢普每月至少提供1800张生皮，这个数额还不到1858年他提供给饥渴的古尔德斯博罗每月5000张生皮的一半。或许已经拥有60000美元初始投资的卢普和李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自己在古尔德斯博罗的总风险。或许，这也符合卢普公司（对待其他皮革制造商）的目的，通过抑制古尔德的生产来提高成品皮革的需求和价格。上面两个商业常识和卢普日益糟糕的精神状况，以及卢普、李与古尔德不稳定的合作关系都使事情变得不确定起来。这三个因素和杰伊日益强烈的扩大收益、消除法律障碍的愿望逐渐冲突起来。

古尔德把1 800张的最小限额仅仅当做底线来看待，直到1859年仍没有任何减产的念头。减产虽然符合卢普和李的利益，但是会伤害杰伊的利益。进攻和扩张的性格使古尔德与卢普和李争论起来，开始还很客气，但在忍受了几个月的低产量之后，古尔德告诉他们，他将会在1859年的7月、8月、9月间生产21 120张皮革。如果卢普认为这是“安全而且明智的”，他6月的产量将达到8 000张。在要求最大产量的过程中，古尔德非常清楚地讲述了固定成本的简单计算方法，就像给白痴讲课一样。“由于管理成本不会增加，所以生产9万张皮革的成本比生产6万张皮革的成本低。”由于卢普和李仍然不接受这个逻辑，古尔德提醒他们，在过去的6个月里，由卢普和李签字的、与古尔德斯博罗有关的票据已高达10万美元，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能从经纪商那里获得足够的生皮供应以偿还这些债务。古尔德还隐晦地补充说，他自己购买卢普公司的原材料的票据也需要偿还。

到1859年夏季，几乎所有杰伊的交易都是与戴维·李进行的。从7月开始，卢普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起居室内有大象，肩膀上有吸血蝙蝠，同时开始出现妄想症的症状。他确信（或许是经过推理）有朋友在秘密监视他，纽约市警察局的侦探在跟踪他。由于治疗没有效果，他还患了心脏病。同时，心烦意乱的戴维在给古尔德的口述信中讲道，他一只手放在同伴的手腕上，检查他的脉搏，卢普每10分钟就让他重复一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确认我那可怜的、鬼魂般的姐夫仍然活着”。

律师出身、不喜欢做皮革经纪商的李也认为卢普公司分给古尔德斯博罗的份额太小。在整个6月和7月，李被古尔德坚持满负荷生产的想法搞得焦躁不安，提出用2万美元购买杰伊的股份。此项提议被杰伊拒绝了，相反，他还提出买断卢普和李的股份。由于不希望承担古尔德的票据，又不能确定古尔德是否会离开，所以李通过安排另一位皮革经纪商，波士顿的约翰·B·阿利（John B. Alley）替代卢普公司作为古尔德的原料供应商，来缓和与古尔德的冲突。通过这种方式，古尔德实现了满负荷生产，同时又没有过度扩大卢普和李的信用风险，后者和杰伊一样承担着偿还债务的义务。同时，卢普公司仍然负责销售古尔德斯博罗的皮革。但是在将来，他们就不会再承担来自由于古尔德斯博罗购买原料所不断扩大的信用额度，以及必须承担偿还义务的

双重风险。

到了8月初，古尔德和“大沼泽”的两位伙伴仅在一个问题上还存在争议。李坚持认为，在约翰·阿利进入公司之前，提供大量生皮的收益应该受到保护。而杰伊告诉他的伙伴，这些收益他用来作为过去9个月里为卢普和李背书票据的抵押。古尔德和李仍然试图打破僵局（使用合适的词语，反复进行礼貌的辩论）到了10月，下一场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戏剧开始上演。

* * *

10月5日（星期三），查尔斯·卢普将会在费瑞大街的办公室里花大半天的时间处理一些零星的业务，其实主要是向李和几个秘书抱怨他的健康状况、他不忠实的合作伙伴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敌人。工作结束后，卢普步行回到25街区的家里，在那里与他的女儿麦琪和劳拉吃了一顿沉闷的晚餐。后来，他最近经常轮流拜访的几个朋友之一——威廉姆·F·库克（William F. Cook）被邀请到家里喝杯啤酒。当库克举杯祝愿卢普身体健康时，卢普叹了口气，将脸埋在了手里，脸上浮现出一种绝望的“不自然的表情”。

激动的卢普要求库克在家里过夜，库克没有回答。几个小时后，当库克与卢普的女儿在楼上起居室聊天时，“眼神迷离”的卢普突然冲了进来。他的女儿早已经习惯父亲这种突然发作，卢普满眼含泪地拥抱并亲吻了他们两人，什么也没说，迅速调转身走到了门外。不久，卢普的卧室里传来了枪响。库克和卢普的女儿循着枪声冲过去，发现卢普躺在床上，鲜血从他胸前的伤口汩汩涌出，一把双管手枪被扔在地上。“可怜的父亲自杀了……”劳拉第二天写道，“这不是他的错，他精神错乱，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也会做这件事情……他很久以来就希望这样做了，不要责怪他。”在10月6日验尸前，戴维·李证实了卢普存在精神问题，他详细讲述了他姐夫长期以来的“精神疾病”并分析说：“就我所知，从卢普先生本人、家庭、社会关系、财产或商业环境方面，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他的忧虑和悲伤。”

* * *

卢普的自杀是几代传记作家力图妖魔化杰伊的另一个话题，其实他们都

完全搞错了。流行的说法是卢普的自杀是因为古尔德，为了使经济背景符合股市要求，还将卢普自杀的日期从1859年改到1857年。不要忘了，卢普和古尔德直到1858年才成为合作伙伴；不要忘了，卢普公司和普拉特-古尔德公司在1857年危机中的偿付能力都没有问题；也不要忘了，卢普死的时候公司没有破产，他们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古尔德使用了一种“两个名字”的票据，在1857年危机前夕，大肆投机生皮，垄断市场。到了1857年中期大危机来临时，杰伊在生皮和皮革大幅贬值中捞取了成百上千的利润，而卢普则被逼破产，于是导致了卢普的自杀。

根据理查德·奥康纳的叙述：“随后，1857年大危机来临，古尔德卖空皮革……同时，查尔斯·卢普发现自己不仅投资于古尔德斯博罗皮革厂，而且他的名字和信用还被利用为古尔德囤积和垄断生皮市场融资。”在沃肖、约瑟夫、奥康纳和埃德温·霍伊特的故事里，查尔斯·卢普和他的会计在危机中的一天来到古尔德斯博罗，在那里，就像以前的普拉特一样，卢普不但发现他要为古尔德失败的投资承担债务，而且账本中还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1857年大危机发生时，”查尔斯·盖斯在1997年《华尔街历史》一书中写道，“生皮市场轰然倒塌，古尔德几乎血本无归。这个消息不久传到了卢普那里，他赶紧去找古尔德。这个年轻人对将造成两个人破产的损失不屑一顾，只是当做运气太差。”霍伊特根据凭空想象生动描述了卢普死去的细节，一点也没有顾及官方验尸官的报告，他写道：

在离开古尔德返回的火车上，查尔斯·卢普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在麦迪逊大道的豪宅，进了门，走进书房，将门反锁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将枪管放在嘴里，扣动扳机，一粒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脑。这件事情发生在1857年夏季，卢普也成为第一个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损坏名誉的破产大亨。

卢普1859年自杀30年后，严肃的古尔德为自己莫名其妙地为卢普的悲惨结局承担了责任而感到恼怒。他抓住一个记者，用简洁但有些不耐烦的语调说，卢普是“自己心魔的受害者，没有人害过他”。

第十章

古尔德斯博罗之战



威廉·M·埃瓦茨是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出色律师，曾在1868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中担任主要辩护律师，后任美国司法部部长、国务卿、纽约州参议员。他参与了卢普和戴维·李漫长的遗产处理过程。与此同时，杰伊尽力不让古尔德斯博罗负债，主要因为当时全部或部分由卢普签名背书的票据，以及工厂运作所需要的信用额度都不可能延期。事实上，在短期内，古尔德的抵押贷款数额严格受到生皮市场和仓库里成品皮革市场价值的限制。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古尔德打算收购卢普和李在皮革厂另外2/3的股权。当时卢普的遗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处理好，卢普公司也没有恢复运行。在一份详细的计划书中，古尔德提出了一个对当时各方都有利的建议，这个建议剔除了卢普和李之间的复杂财务关系，以及和卢普没有关联的复杂信贷因素。卢普和李以6万美元参股古尔德斯博罗一年，古尔德打算用同样的价格让他们退出。杰伊说他每年偿还1万美元，收购资金将来自（古尔德斯博罗制造公司）发行的公司股票。对于古尔德斯博罗制造公司，杰伊不仅要求获得该皮革厂的所有权，而且要求拥有价值1万美元的原材料和成品皮革。李接受了这些条款，并在获得埃瓦茨同意的基础上，于1859年12月19日正式签订合约。9天后，埃瓦茨反对古尔德控制公司存货的条款。随后，双方修改了合约，古尔德同意补偿李和卢普存货价值的2/3。

所有的人都同意以后，杰伊收到了来自埃瓦茨的消息。埃瓦茨说交易只有在卢普的遗产全部清理完毕之后才能进行，杰伊十分气愤，因为彻底清理完毕还需要好几个月呢。“上帝的车轮，”他在写给姐姐萨拉的信中抱怨说，“转得太慢了。”杰伊被迫在这种半拥有所有权、半借贷的尴尬境地下运作工厂。当发现李希望在交易进行前插手公司管理时，他便不得不与之起争执了。李认为自己拥有公司2/3的所有权，有权参与公司管理。杰伊则紧紧抓住最

初与卢普和李签订的管理合同，指出古尔德斯博罗由他本人和卢普公司共同所有，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在杰伊·古尔德的名下进行的，这些合约证明在卢普的资产清算结束前，杰伊是“唯一公开的合作人”和管理者。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承担太多卢普公司的信用风险（此前该公司突然减慢了支付成品皮革货款的速度），杰伊开始独立在曼哈顿斯普鲁斯大街上从事皮革经纪业务，为古尔德斯博罗的皮革开拓市场。（那时，古尔德也是大沼泽威尔逊·普若斯公司的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合作者。）同时，他迫使李清算卢普公司的账务，偿还古尔德斯博罗公司所有到期的货款，这样，两者便互不相欠了。

从李这方面讲，他还有其他考虑。埃瓦茨对查尔斯·卢普资产和债务不断深入的调查也揭示了一些痛苦的真相。精神失常使卢普的财务状况逐步陷入无序的状态。虽然直到临死前，他仍是那个时代十分富有的人，但是这个百万富翁在1859年秋季的总资产仅仅是他以前资产的零头。在读了独立财务报告机构 R. G. Dun 公司对于卢普公司的财务报告后，埃瓦茨说：“乐观地看，卢普的财富不超过10万美元，这大大低于人们的想象。”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为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卢普的三个女儿，埃瓦茨和李在1860年初与古尔德签订了修改后的合同以后，便不择手段地处理卢普公司的事务，在遗产处理上锱铢必较。

在古尔德要求清算卢普公司账务的几个星期后，李终于在2月25日（星期六）安排了一场会面。古尔德和他的顾问杜波依斯来到曼哈顿，结果接到通知说会谈推迟到28日下星期二。当古尔德第二次来到李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又被告知，李改变了清算账户的主意，需要重新考虑，并将在第二天早上与他们见面。当古尔德和布迪瓦星期三再来办公室时，秘书告诉他们李先生病了，很抱歉会议被取消。

事实上，在引诱古尔德离开宾夕法尼亚制革厂的同时，李自己去了工厂，希望直接夺取公司的所有权。在几个星期后的证词中，他说自己之所以去制革厂，是因为听到关于古尔德不可靠、对制革管理毫无经验，以及皮革厂工人存在暴动情绪的谣言。但是关于古尔德不可靠的说法与产量稳步增长的事实不相吻合，也与他写给古尔德的信不相吻合。他曾代表卢普公司于12月

29日，即签完修订合同后的第二天，写信称赞古尔德的管理，他说道：“自从你为我们经纪行提供产品以来，你是我们最出色的供应商，我们这里曾出现过生皮票据到期前就将所有皮革销售一空的罕见现象。”

与古尔德的工人存在不满的谣言相反，接下来的事情证明李的想法是错误的。来到古尔德斯博罗公司之后，李做了一个抨击古尔德缺点的毫无激情可言的演讲，控告古尔德错误地将从卢普公司得到的25 000美元用于偿还皮革厂债务（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后来在法庭上李再也没有提过）。但在他讲完后，只有15个人愿意帮助他控制皮革厂。由于开始就碰壁，李又派人到斯克兰顿雇用了所有可以雇到的武装分子。那个人带了10个人回来，这样，加上李原来带来的人共25个人进驻了古尔德斯博罗制革厂，开始准备战斗。

古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咨询他的律师，安德鲁·H·瑞德。这位“滴血的堪萨斯州”的拥护奴隶制度的前州长，督促古尔德用武力夺回所有权。杰伊于3月5日到达皮革厂，在门口遇到了李和他的同伙，他们威胁杰伊如果不交出工厂将有生命危险。第二天一早，古尔德召集了200多个工人和市民，说服其中的100人帮助自己。然后，古尔德告诉李为避免流血冲突，希望李投降，遭到了李的拒绝，于是他开始采取行动。

“我悄悄挑选了50个人，”几天后他对记者说，“让其他的人远离这里。我将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到大楼的顶端，取下墙上的木板，这时我带领另一队人打开前门。”当杰伊突然打开大门冲进工厂时，“一阵枪林弹雨袭击过来”，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撤退。然后，他又准备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最后终于全部进入。“到那时，皮革厂大楼顶端的那一队也成功控制了入口，然后到处响起了枪声，来自各个方向的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经过一场激烈对抗，我们获胜，对手仓惶逃跑，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害怕直接从二楼跳了下来。”三人受伤。被杰伊赶出古尔德斯博罗的戴维·李的一个手指也被打中。

古尔德和李在法庭上相遇了。这场诉讼长达7年，当古尔德斯博罗倒闭停产、不名一文的时候，这场官司仍在继续。李最后赢得了3 500美元，作为对1859年末李和卢普公司拥有古尔德斯博罗存货份额的部分补偿。1868年，古尔德高兴地以总价1美元的价格将古尔德斯博罗卖给了李，愉快地为

他职业生涯中的这一章画上了句号。这一章虽然纷繁复杂，但是无疑将带领这个年轻人走入生命中的下一个旅程。

“古尔德斯博罗之战”后，古尔德被迫重新创业和积累财富。1859年初，卢普和李第一次进入古尔德斯博罗的时候，他个人的净资产是8万美元，主要是制革厂的股份，他在宾夕法尼亚拥有9000英亩森林，3万英亩森林的树皮使用权。到1860年2月末，在古尔德斯博罗战役的几个星期前，R. G. Dun公司称古尔德是一个“聪明、有开拓精神、有着良好性格和习惯的年轻人，值得信赖”。但是，当公众知道古尔德斯博罗之战，以及李对古尔德渎职的控告后，虽然这些控告没有依据，但它还是在不久后对杰伊的名誉和信用产生了不良影响。在1860年4月的公司备忘录中，同一个信用报告公司表示“古尔德在大沼泽的信誉受到极大损害，其财务状况不容乐观”。

古尔德最后关闭了在斯普鲁斯大街的办事处。他在威尔逊·普若斯公司的投资也随着该公司在1860年夏季的破产而被消耗一空，损失共计6万美元。不久之后，他被迫卖掉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树皮使用权和土地，获利微薄。这之后，杰伊在不满中度过了曼哈顿的整个秋季。他在思考自己的未来，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和事业方向。

✦ ✦ ✦

那段时间，古尔德住在位于第四大道17街联合广场东北角对面的高级酒店——埃弗雷特豪斯（Everett House Hotel）里。这说明虽然生意上遭受了损失，古尔德并没有一贫如洗。他还有足够的钱支付17岁的弟弟艾布拉姆在波基普西商学院的学费。艾布拉姆当时与刚刚从纽约塔克侯教堂搬来的新婚夫妇安娜和阿萨赫尔·霍夫（Asahel Hough）住在一起。

同年9月，杰伊去宾夕法尼亚参加了贝蒂和乔治·诺斯洛普的伙伴吉伯特·帕林的婚礼，又高兴地与艾布拉姆、安娜和所有家人重逢。严肃的约翰·波尔·古尔德作为承办人也出席了婚礼。这位老人并不需要走太远的路，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萨拉和乔治·诺斯洛普那宽大却拥挤的房子里，那儿离卡娜登西斯制革厂不太远。（除了诺斯洛普原来的5个孩子，乔治和萨拉还有5岁的霍华德、4岁的艾达、2岁的弗兰克和刚出生的里德，之后还生了4个

男孩和2个女孩。)

萨拉忙于照顾孩子和父亲。颤颤巍巍的老古尔德在1858年卖掉了锡器店，1860年又卖掉了在罗克斯伯里埃尔姆大街的房子。他已经老得脾气怪异，像小孩子一样了。一会儿他是慈祥的祖父，一个小时后喝了几口藏在萨拉家里的酒之后，便立刻变成一个阴森、表现完全相反的老酒鬼，一点儿不顾萨拉和乔治完全禁酒的信念。（萨拉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喝苹果酒或者无醇饮料，以免日后养成喝酒的习惯。）“杰伊悲伤地看着父亲，”萨拉在帕林婚礼后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他到底从这个可怜的人那儿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杰伊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他父亲在余生所为之奋斗的徒劳的骄傲和破碎的梦想幻象。杰伊几个星期后写信给奥利佛：“我要尝试在迷雾般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上开始自己的事业。在华尔街可以学到魔术师般的技巧，我希望能掌握它们。”

新平船

第十一章

独特的未来



与古尔德同时代的人物，银行家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曾在他 1908 年的回忆录《华尔街 50 年》（*Fifty Years on Wall Street*）中，讽刺性地描述了纽约金融街的地理环境。曼哈顿这条充满玩世不恭的交易和彻底贪婪的破旧街区，街口是一座教堂（百老汇附近的特里尼蒂教堂），向前延伸结束于东河（East River）码头。它的旁边是个地狱般的地方，不仅有海上走私交易，还充满了贪欲、放荡和暴力。1860 年的华尔街就是这样一幅景象，正是在那时，24 岁的杰伊·古尔德开始了在华尔街的奋斗。《纽约论坛报》一位匿名评论员写道：“通往地狱之路——与我们所听说的不同——并不是由良好的愿望，而是由鹅卵石、啤酒和背叛的诺言铺成的。这就是华尔街，平实而简单，背叛在这里生根，梦想在这里破碎，财富在这里被创造和毁灭。”

两百年前，荷兰殖民者在曼哈顿的低洼地区筑起了一座东西向的围墙，用来防御印第安人、海盗和其他敌人。后来沿墙的马路变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早期的商人开始在这里修建仓库、商店、市政厅和教堂（即前面提到的特里尼蒂教堂）。这条街的焦点是联邦大厅（Federal Hall）。1789 年，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曾站在大厅的第一级台阶上发表了就职演说。

一年以后美国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成立，不是在纽约而是在费城。当时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发行了第一期联邦债券，用于偿还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债务。不久，非正式的纽约交易也通过信使送到费城交易所而开始进行。各地的经纪商聚集在华尔街 68 号外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1792 年，24 个交易商签订协议建立起一个正式的纽约交易市场。“梧桐协议”要求签约者在成员之间进行交易，通过相互之间的合约确定交易费用，不参加其他证券拍卖。这个由“梧桐协议”发起的组织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1817 年成立），在 1863 年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建立之初，这个交易所就带有俱乐部性质。根据章程，新成员需要经过老成员投票确定是否同意其加入，反对票超过三票就会被否决。1817年，一个席位的平均价格是25美元，到了1827年涨到100美元，1848年达到400美元。他们的会员带着大礼帽，吹嘘说他们的交易所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这也是有理由的。此前，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未能偿付费城的票据和债务，导致经纪商在1837年大危机中纷纷破产。不管怎样，交易所虽仍实行会员制，但在1860年古尔德到来的时候，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聚集的并非全是精英。在沉闷的交易所墙外的大街上，有一批“马路经纪人”在进行股票的买卖。这些交易商除了在马路上从事交易，也在第五大道饭店的大厅、代尔莫尼克斯餐厅（Delmonico's）以及盖乐格晚间交易所（Gallagher's Evening Exchange）进行交易。1864年后则通过布罗德大街的“公开市场”（Open Board）进行交易，它的交易量通常是正规（Regular Board）交易所的10倍。19世纪60年代初，正规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约是700万美元，而公开市场的交易量为7000万美元。

1860年底至1861年初，杰伊·古尔德就穿梭在这群马路交易者中，在美国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寻找机会。对于交战双方的千百万美国人民来说，内战意味着鲜血和伤痛，而对于华尔街来说，它则仅仅是一次盈利的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丹尼尔·德鲁说，“我们在华尔街的伙伴们碰上战争这样的好运气，在股票市场上很有收获。这叫做浑水摸鱼。”德鲁比古尔德30岁，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卓有建树，也是最险恶、最自私的商人。

德鲁的样子看起来很让人吃惊：苍白消瘦、驼背，每天穿着同一件老式衣服走来走去，用一把伞杆表皮已经脱落的旧雨伞当做拐杖。虽然他住在靠近联合广场和埃弗雷特豪斯酒店17大道上的豪华公寓里，他的头发却像他的衣服一样褶皱，他的行为像他的出身一样土气。丹尼尔·德鲁1797年出生于纽约卡梅尔的一个农场，第一份工作是马戏团的场地工。1812年14岁的他参了军，后来还获得过100美元的奖赏，可他从没参加过对抗英国人的战斗。战后，他成了牲畜贩子，从威彻斯特和帕特南县的农场购买牲口，然后带到曼哈顿卖掉。在这个过程中，德鲁经常用盐水喂牲口，使它们变得非常口渴，然后让它们在哈勒姆村停下来饮水，这样到城里的批发商那儿过磅时，牲畜

的重量就会大大增加。

19世纪20年代，德鲁买下了26街第三大道某个角落的牛头旅馆（Bull's Head Inn），开始在曼哈顿定居。他自己做旅馆老板，并为牲畜贩子提供非正式的银行服务。19世纪30年代，他开始在华尔街从事投机交易，并从事哈得孙河的航运业务。他开辟了一条“人民线”（Peoples Line），并认识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德鲁后来将航线扩展，南至泽西海岸，向北穿过长岛海峡。）同时，德鲁也获得了说谎者和骗子的称号。当交易结束被识破时，他总是骂合约为“狗屎”，然后在诈骗诉讼到来时躲起来。

到古尔德来这儿的时候，德鲁已经有了若干个外号：“丹尼尔叔叔”、“大熊”、“执事”、“棕熊”。他也是华尔街的一个神话：一个完全肆无忌惮的金融市场的操纵者。德鲁的过人之处除了“票注”他控股公司的股票，通过过量发行、使股票的价格超过实际价值以外，就是“熊市狙击”。在这种狙击战中，德鲁和他的伙伴预计股价将下跌，所有人合伙便卖空某种股票，再按照市场价借入该股票，这样他们就可以较低的价格还给所有者，从中赚取差价。在一场典型的熊市狙击战中，一旦德鲁大量卖空股票，他就会散布谣言打压所选股票的价格。在这些操作中他很少失手。他曾经告诉古尔德，在华尔街投资，没有内幕消息就像在黑暗中赶着黑色的猪一样。

虽然令人鄙视和嫉妒，这个表面上虔诚、经常引用《圣经》的德鲁却给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个案。这些怀揣良心、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不久就意识到，道德和野心很难共存，至少在华盛顿广场南面的华尔街是这样的。当后人责怪古尔德厚颜无耻、诡计多端时，他们似乎忘了，那个时代古尔德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事实上，虽然他才华出众，但他仍然是那群人中的一个，只不过少了些厚颜无耻和愤世嫉俗。

* * *

来华尔街的第一个月，杰伊只是在一点一点啃噬它的边缘，做一些小额交易，或赚或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个年轻人怀着一一直都有的巨大决心，像苦行僧一样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其内在规律。他研究了最凌厉的玩家操纵市场的手法，学习和掌握如何利用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为自己下一步行动提供

必需的现金和信用。在埃弗雷特豪斯酒店的每个早上他都起得很早，然后冲出去吃早餐，狼吞虎咽地阅读纽约不同报纸的财经新闻。随后，他来到大街上，穿梭于经纪商的办公室，一整天都忙着买卖股票，直到晚上五六点钟，才回到埃弗雷特豪斯酒店或者什么餐馆吃晚饭。晚些时候，他来到盖乐格晚间交易所，这里聚集着一群饥渴的年轻的自我创业者——杰伊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周而复始的日子只有在周末才得以停下来。1861年4月20日星期六，萨姆特堡（Fort Sumter）战役的两个星期前，古尔德从埃弗雷特豪斯酒店走出来，看到10万个热情的北部支持者在联合广场集会。穿过广场，在第14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是百万富翁、西奥多的祖父科尼利厄斯·范·夏克·罗斯福（Cornelius Van Schaack Roosevelt）的砖墙公寓。罗斯福家和附近的联合广场饭店的屋顶都飘着美国国旗。广场上，一座新的乔治·华盛顿铜像被后来在萨姆特堡焚烧的那面国旗包裹着。根据银行家约翰·奥斯汀·斯蒂文（John Austin Stevens）后来的回忆，4月20日集会的目的是纽约广大市民希望获得保护自己，对那些代表财富和影响力的纽约商人们采取行动的论坛。你可能想知道，古尔德是否站在那里听演讲者演讲——他们中包括萨姆特堡战役的英雄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市长——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支持联邦政府。

杰伊·古尔德个人对于内战的情感无从考证。在他那个年纪，诸如废奴运动、分裂国家等政治和社会事件在他的私人信件中没有什么分量。如果他对此有大致的了解，那么他可能会像大多数人一样买一件代用军装支持自己的军队，可我们知道古尔德从来没有穿过制服。杰伊一直将心思用在生意和自己的前途上，好像不太关心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以及正在他面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认为古尔德完全不关心政治也是错误的。从家庭传统上看，他是一个民主党人，那些和古尔德最亲近的朋友，例如曾经在古尔德斯博罗之战中代表杰伊的安德鲁·瑞德律师，就是一个强烈支持奴隶制度的民主党人。古尔德在纽约的住所埃弗雷特豪斯酒店就是纽约民主党的总部。在未来的日子里，古尔德将讨好的许多纽约政客，例如“老板”威廉·马西·特威迪（William Marcy Tweed），都是与民主党坦慕尼派协会有关联的强势人物。在

后来的岁月里，古尔德也结交了一些共和党朋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乌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但是在当时，他还没有与格兰特发生纠葛。

严谨的杰伊整天忙于谋求利益，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不过他还是找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即便如此，他还是那样深思熟虑，缺乏幽默感。他似乎希望接触所有的事情，即使是无用功，却还像一台机器一样高速运行，没有一刻喘息的时间。亨利·克鲁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杰伊很想结识西切斯特区的社会名流克鲁格（Cruger）家族，后者于1861年夏季邀请杰伊乘船游览哈得孙河。旅行还没开始多久（主人将船开出克罗滕附近的克鲁格—哈得孙码头），杰伊就开始焦躁不安，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及时返回并赶上回曼哈顿的火车。整个下午，焦虑的杰伊都不愿深入谈论什么话题，只是不停地建议主人缩短航程，尽快返回陆地。根据克鲁斯的讲述（他是从航行俱乐部的一位成员那里听说的），最后老克鲁格感到厌烦，决定给这个令人讨厌的客人一个教训。他们在古尔德的哈得孙河火车开车前的几分钟回到岸边，老克鲁格故意将活动甲板放下来，结果游艇搁浅了。随后，克鲁格先生对古尔德说，如果他想赶上火车就必须自己游泳过去。古尔德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脱掉衣服，只穿一条“鲜红色内裤”，结果克鲁格家的年轻女性都“红着脸躲在阳伞后面”。接着，杰伊将干衣服举在头顶，用一只手蛙泳游到岸边。

这件事情体现了这个不太懂社交礼仪的年轻人虽然很有雄心，但还是没有摆脱偏僻山村的一些行为方式。即使不提及他最近的职业是华尔街的低级马路交易商，古尔德斯博罗之战后获得坏名声的古尔德能够结交莫里·希尔（Murray Hill）社交圈的名媛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海伦·戴·米勒（Helen Day Miller）小姐在距离杰伊住的埃弗雷特豪斯酒店不远的第17街，她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母亲安（Ann）是纽约两个最古老家族开普（Kips）和巴利（Baileys）的后代。他的父亲丹尼尔·S·米勒（Daniel S. Miller）是一个富商的后代，从1853年就开始集中精力在华尔街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米勒经常在黛特公司的办公室工作，他在那家公司拥有股权。R. G. Dun公司

在1860年的信用报告中称他是可信赖的、银行可接受的，“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

我们没有确切的记录了解杰伊和比他大两岁半的海伦是如何初次相遇的。虽然他们住得很近，但绝不可能像许多传记作家写的那样：羞涩的古尔德在路上遇到这位年轻小姐，然后和她攀谈。事情并非如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杰伊和海伦的父亲有生意往来，后者发现这个年轻人很守信用，便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虽然杰伊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他的一些特质吸引了米勒先生和他的女儿，其中包括谦虚、雄心和智慧。同时，杰伊也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头脑冷静的家伙。因此，他本人就像一件在未来华尔街的富翁中永远稀缺的商品，米勒先生也一定知道。

杰伊和海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外形上都不太引人注目。杰伊瘦弱矮小，海伦也身材娇小，相貌平平，有高高的鼻梁。他们都很喜欢安静的娱乐方式，喜欢亲密的家庭聚会，或者在晚会上朗诵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从现存的关于她的极少资料看，海伦像一只莫里·希尔“金丝鸟”，完全生活在黄金笼子里：一个奉献所有善心的、非常传统的基督教徒，订阅所有流行的基督教刊物。像她的父母一样，海伦热爱耶稣、莫里·希尔和美国大革命中的女英雄。她也像父母一样不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相信过度宽容会让美国的清教徒疏忽忘本。因此，可以猜测，杰伊的清教徒背景以及他的曾祖父是里奇费尔德战役的英雄的事实，这些都不会妨碍他1861年在米勒的客厅里热切地追求海伦小姐。

1862年初杰伊向海伦求婚。一些传记作家，例如埃德温·霍伊特在1969年的《古尔德家族》（*The Goulds*）中认为，海伦的父亲反对他们的结合，为了报复，这两个年轻人私奔了。但是，在纽约历史协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保留的杰伊和海伦的长女的文件资料中留下了一张打印好的结婚请柬，这使人对上述说法产生怀疑。根据这个请柬，杰伊和海伦于1863年1月22日在米勒家举行婚礼。1897年，杰伊的姐姐贝蒂回忆说，当时她和丈夫吉伯特·帕林、阿布拉姆·古尔德、安娜和阿萨尔·哈夫都参加了婚礼。只有萨拉和乔治·诺斯洛普因为要照顾不能出席婚礼的约翰·波尔·古尔德没有参加。

婚礼后，杰伊从埃弗雷特豪斯酒店搬出来住到了海伦家里。在那里，这对夫妇住了整整6年，三个孩子也相继出世。

✱ ✱ ✱

婚后的几年里，杰伊继续研究华尔街最老练投机者的操作手段。不久，他就成了老练的股市操盘手，擅长股市票注、打短线、组织集合基金、熊市狙击、熊市陷阱（指卖空股票的人被迫在股价上涨的时候平仓），以及其他标准的操盘技巧。这些技巧中的大部分在今天都是被禁止的，但在古尔德那个时代却很普遍。古尔德还成了一个使用杠杆套利的大师，这也是众多华尔街手法的一种，是指利用很多能起到放大作用的金融工具，例如可转换债券、权证和杠杆融资等，在很小的空间内创造资本，或用很少的钱控制一个公司。最后，古尔德的财政花招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但与德鲁不同的是，古尔德将华尔街的投资看做是达到更大、更复杂目标的重要手段。从长期看，他希望能够控制一家公司，进行管理、改善提高和并购。因此他将注意力投向一个不仅能提供最大、最有弹性的、也最有希望保持长期增长的市场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1863年秋季，曾与古尔德在威尔森皮革经纪公司合作过的D·M·威尔逊找到27岁的杰伊，要求帮助他卖掉价值5万美元的拉特兰-华盛顿铁路（Rutland and Washington Railroad, R&W）的第一抵押债券。古尔德知道1850年的《纽约通用铁路法案》（*New York General Railroad Act*）允许铁路运营商发行债券融资，也允许这种债券和普通股之间进行简单的转换，然后再变成债券。经过计算，杰伊立刻意识到威尔逊的债券中只要转换很小的一部分就能获得拉特兰-华盛顿铁路的控制权。

19世纪40年代，为了方便大理石运输，建立拉特兰、佛蒙特和纽约哈得孙河特洛伊港口之间的联系，人们修建了全长仅62英里的拉特兰-华盛顿铁路，从拉特兰到塞勒姆和纽约华盛顿区的鹰桥。在鹰桥，该铁路与瑞塞勒-萨拉托加铁路（*Rensselaer and Saratoga Railroad*）相连，后者可以到达特洛伊港口及周边地区。19世纪60年代初，拉特兰-华盛顿铁路运营不足，毫无盈利。这条铁轨像它下跌的股票一样都需要修复，它的员工素质也很差。

威尔逊急于从这项重要投资中解脱出来，因此以每股 10 美分的价格将所有股票卖给古尔德。

古尔德用了一部分自己的钱，一部分岳父的钱，还有一部分投机票据，在 1863 年圣诞节后不久完成了这项交易，合同新年开始生效。他一人兼任铁路公司的总裁、秘书、财务总监和运营主管。因此，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杰伊每周都有四五天时间待在拉特兰，进行改善拉特兰 - 华盛顿铁路的基础设施、交通和盈利能力的工作。古尔德的办公室设在拉特兰商业街（Merchants Row）的巴德韦尔豪斯酒店（Bardwell House Hotel）。凡是他不懂的铁路的相关知识他都要学习。“我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研究铁路，”几年后他回忆道，“我全权掌管这条铁路，学习怎样运营。我是公司的总裁、财务总监、运营主管……慢慢地，铁路有了起色，我继续坚持工作。”在雇用了富有经验的管理者和对铁路做了必要的修缮后，由于美国内战，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都暂时停止，大理石运输也陷入停顿，所以古尔德必须招揽新的货物和乘客。

杰伊发行了一种期限为 18 个月的债券，一方面支持基础设施改造，一方面进行短期融资。塞勒姆的本地人查尔斯·弗罗斯特（Charles Frost）原来曾长期从事铁路（后来变成特拉华和哈得孙铁路的分支）行李收发员和列车员工作，从 1864 年开始在古尔德的办公室上班。“弗罗斯特的工作并不是很繁重，”塞勒姆镇历史学家威廉·A·科米尔（William A. Cormier）写道，“他每天工资是 50 美分，负责清扫办公室、跑跑腿，有时也陪老板出去。”弗罗斯特这样回忆古尔德：

他身材矮小，有一张威严的脸，那一撇简洁并精心修剪过的胡子让他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在拉特兰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自己待在办公室……他判断迅速，言语和行动都很简洁。工作是他的爱好，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努力达到他想实现的目标。

有一次弗罗斯特要求加薪，被直接拒绝，古尔德说 50 美分一天“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已经很多了”。还有一次，弗罗斯特陪古尔德到附近的佛特蒙州西鲁伯特给机车购买木材燃料。途中，古尔德建议停下来吃午饭，这个

饥饿的男孩起先很高兴，但是不久就非常失望了。他们没有去饭店，相反，古尔德拿出他的小皮包（“他一直习惯带着”），从里面掏出一盒饼干和梅干，很和蔼地分给弗罗斯特吃。

另外一位当地的老人伊丽莎白·休斯（Elisabeth Hughes）在1937年接受采访时说，古尔德加入拉特兰－华盛顿铁路不久，就对当地板材业（很有希望刺激运输业的发展）进行了一笔小投资。“本·威廉是杰伊·古尔德的采石场老板，”休斯太太回忆道，她当时还是个小女孩，“每次杰伊·古尔德来到佛蒙特的中格兰德维尔，孩子们都会跑出来迎接他。一看到我们，他就说‘提起你们的围裙’，然后给我们几个硬币。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他总是精力充沛，穿着考究。”根据休斯的讲述，古尔德“总是很喜欢孩子”。

在开始管理拉特兰－华盛顿铁路之初，古尔德就显示出厌恶与家人分离的习惯。他每周都乘坐自己的火车，先从佛蒙特到鹰桥，然后再从瑞塞勒到萨拉托加再到哈得孙河，回家看海伦。大部分时候，他喜欢站在前面的机车里和工作人员在一起，他知道所有的人姓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哈得孙河上从阿尔巴尼到曼哈顿大部分的路程都在丹尼尔·德鲁号汽船上度过。每次沿着河一路走过，看到西岸阿尔巴尼的城镇，古尔德总是回忆起美好而遥远的卡茨基尔。但是对于杰伊来说，现在的家庭生活已经不同于以前在大山里所理解的那样了。

“我非常想念我亲爱的妻子，”他在1月末去拉特兰－华盛顿铁路的第一个月里提到怀孕的海伦时说，“我希望她不要感到思虑过重或不舒服。我知道她是一个既美丽又勇敢的人，我知道她将给我一个最大的馈赠。”2月初，在家度过周末后，杰伊回到拉特兰工作，这时候传来消息说，海伦生了一个男孩：乔治·杰伊·古尔德。“我的小王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杰伊在曼哈顿和儿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回到拉特兰后给家里写信问道，“告诉他，爸爸很想念他和他的母亲，爸爸很快就回家。”拉特兰－华盛顿铁路的人们好像已经听够了他说孩子有多英俊。有人说罗伯特·林肯是“铁路王子”，但是“乔治的母亲和我知道谁才是铁路王子。”约翰·波尔·古尔德从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写信来祝贺他从未谋面的外孙的诞生，但也很好奇“乔治”的名

字是怎么来的。约翰·古尔德说他们淘考特、波尔或者古尔德家族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这个名字。他猜想或许这个名字来自海伦的家族，特别是她可能有开普血统。“这个孩子说起话来就像一只小鸟，”杰伊在5月写信给萨拉说道，“我们自豪地推着他绕过联合广场，来到麦迪逊广场，然后回家。”

虽然古尔德很久没有见过他的姐姐，但是仍然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乔治出生后的一个月，阿萨尔·哈夫被任命为蒙大拿辖区天主教布道团的主管。杰伊给艾布拉姆安排了新的住处，帮他完成在波基普西的课程。同时，他还尽力帮助安娜准备去蒙大拿。“1864年，在我们启程去蒙大拿的前一天，”安娜许多年后回忆说，“我接到他的一封道别长信，由于担心我们微薄的薪水不能提供长途旅行所需要的舒适和便利，他给了我100美元。我亲爱的弟弟，多少次他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空给我写几行字，让我知道他没有忘记我，并且还给了我一份慷慨的礼物。”

✧ ✧ ✧

1865年4月，乔治·杰伊·古尔德已经14个月大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牵着父母的手开始蹒跚学步。走过一个街区后，杰伊让他骑在自己肩上，继续往前走。那天是25号，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他的父母会异常阴郁地从米勒家出来，向南走过三个街区来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站在14街和布罗德大街的街角，C·V·S·罗斯福豪华公寓的外面，他们看着亚伯拉罕·林肯的送葬队伍走进布罗德大街上，向西走向第14街。杰伊告诉姐姐贝蒂（贝蒂的第一个女儿安娜当时仅比乔治大三个月）：

乔治骑在我的肩上咯咯地笑着，他用他可爱的“鸟语”对着所有的高头大马和所有面无表情的鼓手们说话。显然他一定都没感觉当时场面的压抑。上帝保佑他。当然，所有这些都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人。报纸称林肯先生是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他们说得没错。这是唯一一个好消息。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来自南方还是北方，都得以平安地在战争中生存。现在是在埋葬死去人们的同时埋葬仇恨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建设、生产。太多的好肉被浪费在战争这条狗身上了。新的创业时刻来到了。

此时，贝蒂正准备和丈夫吉伯特·帕林离开卡娜登西斯，向西 57 英里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的唐克汉诺克（Tunkhannock），着手开始自己的一项新事业。帕林的兄弟除了乔治·诺斯洛普留在卡娜登西斯做生意以外，其他人都计划开一家新的皮革厂。在书信中，他们建议古尔德投一小笔钱开一家新的工厂，但是有个条件：他作为匿名投资者，并且要绝对保密。帕林很快就同意了，因为他知道古尔德在“大沼泽”的名声不太好。帕林在唐克汉诺克的工厂不像诺斯洛普在卡娜登西斯工厂，它一直运行了十几年，直到 1931 年才关闭。

在公开场合，古尔德与帕林的皮革厂保持距离，在往返于拉特兰－华盛顿铁路之余仍然精力充沛地亲自参与管理。1865 年 5 月，他将拉特兰－华盛顿铁路卖给了一个哈得孙河汽船公司老板威廉·T·哈特（William T. Hart）。他像老牌汽船运行商德鲁和范德比尔特一样，看到了铁路的光明前景，也开始对铁路产生了兴趣。（哈特已经控制了连接拉特兰－华盛顿铁路和哈得孙河的瑞塞勒－萨拉托加铁路。）杰伊的这笔交易额将能达到 10 万美元，这也将是他赚的第一大笔钱，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古尔德和哈特按照先前的约定，将特洛伊、塞勒姆和拉特兰铁路进行整合，这意味着拉特兰－华盛顿铁路将与瑞塞勒－萨拉托加铁路进行合并，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铁路运营方式被投入了市场。

这位后来的垄断者写信给哈特说：“我相信在未来的 10 年里，合并将是运输业最主要、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式。与单纯的联合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紧密的协作、近距离的垂直整合、未经稀释的经济规模以及不可挑战的垄断地位。主要城市之间的线路整合当然很重要，采石场、森林、主要港口及其之间的陆路或者水路连线则更为重要。”

童年时期，古尔德就对地图抱有浓厚的兴趣。现在，这位曾经的勘测者看到自己绘制的地图时眼睛里还是充满了新鲜和热情。他将商业枢纽和终端、主要的资源和工厂都标注出来，将一段段铁路描绘在地图上，就像一个人在做复杂的拼图，在成千上万的组合中仔细考虑哪一个能获得最大收益。

“我们面前有一个特别的、不可避免的未来等着我们去开拓，”他写信给以前的老师、现在是他的知音，“事情我已经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就像一

个艺术家得到了灵感一样。非凡的灵感？我说不清，但是我的路以一种最普通的方式呈现在了我面前。”他还说他感觉自己的生命之车终于装上了“所有的车轮”，这不仅指他的职业兴趣，还包括家庭：妻子和孩子。“我们度过了战争，建立了自己的城堡。现在，我就在这里，我奇怪自己是如何忍受以前的生活的。所有以前的事情好像都是在黑暗中搏击，没有理智地拼搏。现在我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也明白了我选择这条路的原因。现在那些勇气和雄心不再是盲目的，而是神圣、真实、崇高的必由之路。”

工作和家庭一直是古尔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新平知覺
PDG

第十二章

太多需要做的事情



整个1865年和1866年，杰伊花了大约一半的时间进行特洛伊、塞勒姆-拉特兰铁路的整合。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给威廉·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次当阿尔巴尼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古尔德便回去联系汉密尔顿·哈里斯律师。哈里斯长他16岁，12年前，当古尔德还是个在夏克维尔木板公路项目工作的孩子时，就认识了汉密尔顿。

哈里斯在阿尔巴尼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哥哥艾拉曾作为纽约“高等法院”（实际是纽约州最低的法院）33位民选法官之一工作了14年（1846~1860）。1861年，纽约人民选举艾拉·哈里斯为共和党参议员。哈里斯当时的对手是威廉·M·埃瓦茨和记者霍勒斯·格里利，古尔德在处理古尔德斯博罗财务问题的时候和威廉打过交道。在华盛顿的时候，哈里斯议员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密友。他的女儿克莱拉和他的未婚夫，异母兄弟亨利·R·拉斯伯瑞恩上校在林肯被暗杀的那天晚上，曾和亚伯拉罕·林肯及妻子玛丽·林肯坐在福特剧院的同一个包厢里。拉斯伯瑞恩在试图阻止布斯逃跑时被刺了一刀。至于汉密尔顿·哈里斯，当1865年杰伊·古尔德再次进入他的生活时，他已经是阿尔巴尼区的律师，同时是本州的共和党主席。

1865年，当哈里斯再次遇到29岁的古尔德时，已经很难将他与1853年那个小男孩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他的个子仍然很矮小，仅仅5英尺，但是此时的古尔德已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或许为了掩饰有些谢顶的头发，杰伊将自己大部分脸埋藏在大胡子后面。他的眼睛（一谈到生意就充满兴奋和活力）深陷而且眼袋很大。他抱怨某件事情时，就显得很疲倦。他的体质欠佳，或许与10年前一直与伤寒高烧做斗争有关系。这位律师记得古尔德的手是那么瘦小，像女孩的手，在思考问题或发表观点时，总是不安地反复搓着。哈里斯说：

这个小动作好像是唯一能够表现他羸弱的外表下充满活跃思想的一种方式。当然，他很少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或者明显写在脸上的疲倦。杰伊不愿意将谈话的时间浪费在诸如身体状况这样的小问题上……杰伊似乎很希望在市场竞争中保存实力，拯救自己。令人高兴的是，他从不做愚蠢的事，谈论无聊的话题。虽然听到笑话他也会哈哈大笑，但是他不能容忍冗长、无意义的谈天。不管是需要以礼相待的人还是自己热切盼望的人，不管是清洁工还是舰艇船长，他都能从与主题无关的交流中迅速跳出来。人们都有一个感觉：他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他认为自己的生命短暂，他有太多要做的事情。

亲戚、朋友以及他的商业伙伴这样评论杰伊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储藏时间的方式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就像他赚钱的方式和能力一样。“我们没有时间花在细微之处，”杰伊对他的助手说，“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大事情。”在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次召集下属开会，有人为了一个具体的标价是否太鲁莽与古尔德争执，这让古尔德非常不快，他让他们用内行的眼光看问题：“程序，先生们！程序！我们不需要为‘大小’而犹豫。”正如他要求自己迅速而永恒的判断能力——符合逻辑但是直切重点，不让自己陷入没用的细节——他也尊敬、崇拜和奖励同样的人，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拉特兰-鹰桥铁路的主管助理、年轻的默里向我提议按季节给粮食批发商的运费提供折扣，这让我大吃一惊。”古尔德在1865年9月写信给哈里斯说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一下子就比马车运输具有竞争力，被限制的运能也会被充分利用。每一块钱的运费都是纯利润。这个圣诞节，默里先生将收到特别的礼物，如果是其他事情，也许我很难将它记在脑中。”

古尔德在物色人才方面也很有创新才能，他选择自然产生的领导，从平庸的人中选择创新者，这对他未来的财富创造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经常会挑选一批军官，他们的想法、才智、创新能力和出身等各不相同。“最好的学校很少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他写道，“社会这所学校可以教给那些有能力学习的人最重要的知识。”汉密尔顿·哈里斯出生在罗克斯伯里向西几百公里的纽约科特兰区。那时候，古尔德的朋友圈还包括一位以前在佛蒙特州做

小生意的商贩。他是一个意大利移民，他唯一接受过的正规培训就是横帆船甲板水手，一度做过纽约州北部杂货店老板。古尔德自然而然结交的朋友总是一些很自立的人，他不喜欢那些拥有家族资本的人，即便他们继承了大量财富、悠久的贵族血统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 ✱ ✱

在不处理特洛伊和塞勒姆－拉特兰铁路事务的时候，古尔德继续做街头投资，为他未来的计划积累资本。在运作黛特公司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现代社会的交易商一样工作，只是没有互联网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无论在牛市和熊市杰伊都进行操作，不管那天行情如何，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投机者一起“吮吸华尔街每一个赚钱的奶头”（正如亨利·克鲁比喻的那样，这个比喻者一度比古尔德更像一个挤奶工）。到老约翰·波尔·古尔德去世，也就是1866年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前一天，如果他愿意，古尔德能用现金买下20个与老家规模相当的农场。有人认为，当古尔德和他的家人回到家乡，将老约翰安葬在黄色礼拜堂下时，或许就怀着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很可能不是这样的。

当时，约翰·波尔·古尔德在卡娜登·西斯·萨拉的家中，死于“老古尔德疾病”——肺结核。萨拉、乔治和他们的孩子回到卡茨基尔参加葬礼，遇到了来自唐克汉诺克的帕林。安娜和阿萨尔·哈夫因为远在西部的，没能赶来。22岁的艾布拉姆从纽约的塞勒姆（杰伊前不久刚刚安排他做特洛伊、萨勒姆－拉特兰铁路的计时员）回来。这个大家族几乎住满了罗克斯伯里的一家旅馆。除了霍华德、艾达、弗兰克和瑞德，诺斯洛普家又多了两个女儿：4岁的玛丽和1岁半的爱丽丝。杰伊和姐姐贝蒂都抱着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海伦·古尔德（杰伊叫她埃莉）不到一个月前，2月25日，又生了一个男孩埃德温。贝蒂·帕林在3月6日也生了一个男孩鲁弗斯。杰伊的朋友彼得·范·阿姆博格还记得杰伊的大儿子乔治和安娜·帕林，这两个刚学步的孩子在葬礼上嬉笑打闹。

据说，约翰的10个孙子出席了葬礼。他们中最大的是霍华德·诺斯洛普（后来和他的舅舅杰伊和艾布拉姆一起），以及范·阿姆博格、阿贝尔·克罗

斯比、汉密尔顿·伯汉斯、西蒙·查普林一起走到郊区。在那里，他们停下来，同在古尔德旧址居住的乔治·伯腾一家聊起来。后来，杰伊拜访了爱德华·伯汉斯，对于许多年前那件投资罗克斯伯里土地的事情，他们已经互相原谅，言归于好了。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后，伯汉斯作为第14区代表，担任了一段时间（1858~1859）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他和杰伊经常谈起阿拉巴尼的熟人。曾经和杰伊有绯闻的爱德华的女儿玛丽亚嫁给了彼得·劳伦斯，现在是他父亲的锡器店的老板。

这次葬礼也是杰伊的妻子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公公——那个僵硬、冰冷、严肃地躺在狭小棺木里的老人，岁月的失望和放纵雕刻在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埃莉终于见到了杰伊的大姐萨拉，他们两个后来成为了密友。贝蒂·帕林记得艾布拉姆在葬礼后的那天晚上一直哭泣，除了父亲的去世，更多的是因为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分散的大家庭再也不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重逢了。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们每个人在回首这一幕时，都怀有非常复杂的情感。杰伊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失去父亲的悲伤可能被一种放松的情绪所中和。许多年后，萨拉淡淡地评论起父亲的优点，她说杰伊如果没有继承约翰的生意技巧，那至少也继承了他“坚持不懈的决心”。但事实是，杰伊和约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他的眼里，以及所有了解约翰的人眼里，约翰·古尔德生命中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失败了，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让孩子们失望；最后沉溺于酗酒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在约翰去世很长时间以后，杰伊温和地这样评论父亲：

我的父亲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他走了一条艰难的路。世界并没有像对待对其他人那样，公平地对待父亲。他被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折翼的梦想和空想所折磨。他只好喝杯闷酒，然后便经常喝下去。我努力让自己实现他未完成的目标。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以我的行动让我的父亲获得荣耀。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也是我最大的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将我们最好的东西给他，但是他的内心需要的却不止这些。他没有受到成功之神的保佑。

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杰伊·古尔德已经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是还没有达到无人能及的程度。用当时的标准看，年近 30 的他已经相当富裕了，资产达到几十万美金。不过，他还达不到百万富翁的水平，在他的朋友圈之外也没什么名气。但不久之后，一切就将发生迅速的变化。生命的阶梯已经为他铺好，伊利铁路将使他的事业生涯步入更高的境地。

新平知覺 PDG

第十三章

伊利铁路



1867年初，杰伊·古尔德建立了一家新的交易公司：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大约与此同时，杰伊的岳父米勒从华尔街退休，卖掉了自己在黛特公司的权益。他的合作伙伴亨利·N·史密斯是一个经验老到的经纪商：亨利·马丁最初是一个来自布法罗的银行家。在日常交易中，马丁经常待在公司办公室，史密斯和古尔德则到街上，为自己以及不断增加的客户（其中很多是来自英国的大额投资者）进行大额或小额的交易。正是杰伊与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的结合才将他带到伊利铁路昏暗的会议室。

伊利铁路始建于1832年，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是连接纽约港和大湖区的一条庞大而重要的铁路线。由于需要许多区政府和无数地方委员会的合作，这条铁路用了19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甚至在那时候，伊利铁路已无法达到它最初的设想了。“完工”后的铁路并没有像原先设计的那样从曼哈顿进入布法罗，而是从泽西市（直接从曼哈顿穿过哈得孙）和位于哈得孙西岸、曼哈顿上游20英里的皮尔蒙特（Piermont），到了伊利湖的一个小村庄敦克尔克。更糟糕的是，由于是纽约州出资建设该项目，所以出于政治考虑，伊利铁路有许多路段都建在纽约南部地势非常差的地方，结果造成这段路线的保养费用非常高，并且不适合运送从宾夕法尼亚北部组织来的利润很高的货物。此外，伊利铁路跑起运输来像一个摇摇晃晃的机器人，仅1852年一年就发生了超过30起大的事故。

1853年丹尼尔·德鲁被选入伊利铁路的董事会，在1854年借给伊利铁路救命的150万美元之后，他成为财务总监。这150万美元以这条铁路线破旧的发动机和全部车辆（rolling stock）做抵押。为了迅速收回在伊利铁路的投资，德鲁在1850年《通用铁路法案》颁布后老练地将伊利公司的可转换债券转成普通股，进而控制了公司的股价。因为伊利股票在华尔街的许多地方都进行交易（交易所、公开市场、盖勒格以及其他地方），德鲁（不久就

获得了一个新外号——伊利铁路的“投机主管”) 仍旧趁混乱赚了钱。他习惯于先打压伊利公司的股票，将一个市场上的股价压低，同时在另一个交易所卖出同种股票，之后趁低吸纳，然后重复以上操作。德鲁对伊利公司的兴趣仅限于操纵它的股票。他的目的是抢夺公司控制权，然后通过减少公司权益压榨现金，使自己的铁路线能够蹒跚而行。金融界的权威人士很快就称伊利公司的股票为“华尔街的妓女”，一个帮助德鲁达到目的的妓女。

1859年，伊利公司的股票从最高点时的33美元跌至8美元，主要是因为1857年经济危机以及投机者的操纵。同时，实际已经破产的公司正在进行破产清算。无数债权人站在门口，善变而贪婪的德鲁站在队伍的第一排。在这种状态下，直到1861年雇用了严肃的内森尼尔·马什(Nathaniel Marsh)做总经理之后，伊利公司的股东才集体长舒了一口气。马什摧毁了德鲁的投机，并于1862年1月重组了公司。在任职初期，他将伊利公司无数未担保债券以及这些债券累积的未支付利息转换成优先股。这样公司债务减少了2000万美元——超过1110万美元的普通股和853.6万美元的优先股，这种财务结构引起了公司的争议。为了满足短期融资的需要，马什开始扩大生意，获得了一个通往布法罗的新路线，在皮尔蒙特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长码头”以方便货物转换，为宾夕法尼亚州煤炭的大好市场开辟了一条铁路线。

更为重要的是，马什将伊利铁路定位在帮助1859年刚刚发现石油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虽然伊利铁路没有到达该地区，它只连接了新大西洋-大西部铁路(A&GW)，但是这条路线离石油储备地非常近，因此，这个位置将会大大影响伊利铁路的运营和价值。早在1864年，马什就签订了一个合同，通过支付给大西洋-大西部铁路一部分钱买下所有穿过东部边界的运输。此外，作为合约的一部分，马什答应为大西洋-大西部铁路提供价值500万美元的机车，来提高大西洋-大西部铁路的运能，因此，这条铁路运输的货物将会通过伊利铁路向东行驶。

基于与古尔德参与的18个月重建拉特兰-华盛顿铁路同样的原因，马什所有的运作也是由于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战争经济，刺激了铁路运输，并扭转了1857年到1860年间为了和公路运输抢夺利润而不断降价的局面。到1864年春天救世主马什突然去世时，伊利铁路的运输量已扩大了两倍，这使

公司走上了长期盈利的道路。但是他的继任者为了实现马什的许诺，再加上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伊利铁路最后（在1866年）被迫借入200万美元来兑现为大西洋—大西部铁路提供机车的承诺。贷款者不是别人正是德鲁，他要求自己的贷款用公司28 000股股票作为担保，同时要求将面值300万美元的债券转换成3万股普通股。

伊利铁路的债权到那时已达到362.4万美元，一些有事实根据的谣言说财务人员的渎职造成了公司巨额亏损。早在1865年，人们就听说伊利铁路安排了几百万美元，用于解决它与海外某个像德鲁一样的匿名操纵者的债务问题。华尔街最敏感的分析师和评论家怀疑这是德鲁的又一次偷偷摸摸的操作。“很显然，”《美国铁路杂志》（*American Railroad Journal*）的编辑写道，“这条铁路通过与新大西洋—大西部铁路联合使自己的价值增加了一倍，不过它正被自己无数未清偿的债务搞得焦头烂额。”

这位编辑对伊利铁路财务状况的质疑虽是正确的，却过高地估计了伊利铁路与大西洋—大西部铁路联合的价值。这两条铁路在1866年合作得非常好，不过后来大西洋—大西部铁路希望与外资联合建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线，所以双方的主管都在等待他们合作关系的最后终结。然而不久，伦敦金融危机导致大西洋—大西部铁路的计划落空，还差点破产。更糟糕的是，宾夕法尼亚铁路通过费城和伊利之间的一条线路，将宾夕法尼亚石油城与东海岸连接起来，这条线路直接将石油城和纽约连接，比大西洋—大西部铁路或伊利线路更短、更省钱。

为了保持石油业务，大西洋—大西部铁路和伊利被迫大幅降低石油运费，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大打价格战。大西洋—大西部铁路每吨石油的费率从1865年的3.70美元降到1866年的2.87美元。虽然这次降价使大西洋—大西部铁路和伊利的运输量增加了一半，但是两个公司的盈利却大幅度下滑。到1867年，虽然运输量进一步增加，但是价格和盈利却下滑得更厉害，这引起了伊利股东和债券持有人的关注。那时伊利公司未清偿债务达到600万美元，危机一触即发。“无法隐瞒的事实是，”一位行业分析家写道，“这条铁路的运行状况已经在利益圈内引起了不好的担忧。”

波士顿的银行家约翰·S·埃尔德里奇（John S. Eldridge）希望建一条从

波士顿直达哈得孙的铁路，提出让伊利公司承担准备修建的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BH&E）600 万美元债券的利息。作为诱饵，埃尔德里奇承诺如果伊利公司联入这条新铁路，预计每年可能有 200 万美元的毛收入。此外，埃尔德里奇强调，这条铁路线路又直效率又高，只有几个小弯，整个路线的质量也非常过硬。考虑到伊利铁路当时的财务和市场状况，公司董事会开始时犹豫不决。埃尔德里奇说这条线路将至少穿过 11 条其他铁路，可以为伊利铁路的货物运输提供最大的运能，特别是运输宾夕法尼亚到新英格兰的煤炭和石油。他还补充说这条线路将是东部货物运往波士顿港口的最有效率的路线。埃尔德里奇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伊利公司的总经理们应该认识到的）是这条铁路面临目前运行和建设良好的波士顿 - 阿尔巴尼铁路（B&A）的竞争。从埃尔德里奇提议的铁路向北并且并行往前，阿尔巴尼铁路连接着全美财务状况最好的铁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纽约中央铁路。阿尔巴尼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效率很高，并受到高度重视，它们总共只有 1 700 万美元的投资，而埃尔德里奇提议的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的总资本是 4 000 万美元。

伊利公司的董事会对是否支持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犹豫不决。最后，经不住埃尔德里奇的多次游说，董事会于 1867 年 6 月表决同意担保 1867 ~ 1868 年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的 400 万美元债券每年 14 万美元的利息偿还，但是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条件。伊利公司要求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必须自己出售哈得孙铁路的债券，并且自己做好安排偿付利息；它必须拿出足够的利润来保证伊利公司的担保；必须允许伊利公司设定运往东部的煤炭和石油在转接路段的价格和费率。

埃尔德里奇对这些条款很不满意，他开始购买伊利公司的股票以便控制该公司，结果却引起了一场争夺伊利公司控制权的大战。

✦ ✦ ✦

早在 1857 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就开始趁股价低迷的时候收购伊利公司的股票。他长期但又很紧迫的愿望是最后获得这条铁路线的垄断收益。1859 年，范德比尔特进入伊利公司董事会，并一直持续到 1866 年。此后，

他安排他的侄子弗兰克·沃克（Frank Work），一个热情、忠诚、笨鸟先飞型的勤快人，进了董事会。弗兰克·沃克的后代成为英国王妃戴安娜的美国曾曾祖父。

1867 年中期，范德比尔特最后决定交出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他使用了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对待这位“华尔街的妓女”。哈勒姆铁路（范德比尔特与德鲁对战，步步为营取得其控制权）让这个老海军得到了在曼哈顿的终点站。哈得孙铁路（也是与德鲁经过一场恶战后获得控制权的）将范德比尔特的铁路帝国延伸到河的东岸一直到阿尔巴尼。从阿尔巴尼开始，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穿过莫霍克峡谷到达布法罗，与湖滨铁路（Lake Shore Railroad，范德比尔特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相连一直到达托莱多。通过这种方式，范德比尔特收购的这些资产可以很好地进行融资、管理和运营，给乘客和运货者提供伊利铁路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一条从曼哈顿到达湖区的、财务状况良好、运行高效的铁路。在 1867 年大部分时间里，范德比尔特主要进行的下一步扩张计划是获得密歇根南部铁路和芝加哥终点站的控制权。

虽然相差三岁，范德比尔特和他伊利公司的同事德鲁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从不假装自己是绅士；在纽约社交界都被看做低俗的人；同时，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攫取财富的欲望。范德比尔特有一次毫无歉意地告诉记者：“在赚钱这个问题上，我一生都是疯狂的。”但他们的相似性仅此而已。在做生意的时候，德鲁是一个真正的窃贼，但从外表看，表面虔诚的德鲁还是让人很舒服的，亲切、有趣，可以讲好听的故事。范德比尔特虽然以诚实著称，却小气、自负、公然漠视宗教。他为每一次财富损失而感到万分痛苦和惋惜，为他周围的人（不管雇员还是家人）受折磨而高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范德比尔特最亲密的朋友是像德鲁那样的老对手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们或者互相争斗，或者互为联盟，最后已经演变成一种扭曲而荒谬的忠诚。范德比尔特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与德鲁这样的竞争强手为敌，但是接下来又恢复了友谊，原谅了过错，开始了新的交易。

1794 年，范德比尔特出生在穷困的斯塔滕岛里士满港。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和摆渡工。11 岁时他退学帮助父亲务工，16 岁时，他劝说母亲给了他 100 美元买一条船，从事纽约和斯塔滕岛之间的摆渡和货物运输。这次成功

的冒险使他在一年之内就偿还了母亲 100 美元，外加 1 000 美元的奖金。在 1812 年战争期间，范德比尔特接受了政府的订单，负责绕过纽约军事要塞运送补给。从这个生意中获得巨大利润后，他买了一艘大帆船和两艘小船从事沿海贸易。后来他拥有了哈得孙河上最大的纵帆船，也由此得名“海军准将”。

到 1817 年，范德比尔特拥有了 9 000 美元的财产和若干商船的所有权。但不久后，他就卖掉了帆船，开始了新的事业——汽船运输。1818 年，他在托马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的公司里工作，开始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新泽西和纽约之间的汽船运输。这条线路是连接纽约 - 费城之间货物、邮件和客运的重要纽带。范德比尔特向每个顾客收取 1 美元，而他的对手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和富尔顿汽船发明的赞助人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同样的旅程要收取顾客 4 美元。

富尔顿和利文斯顿不久之后起诉了吉本斯和范德比尔特，要求法庭保护他们在哈得孙河的合法垄断权。这个著名的案子最后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在 1824 年对“吉本斯诉奥格登案”的判决中，法院对自由贸易予以保护，宣布纽约州授予富尔顿和利文斯顿的航运垄断权无效，同时强化了州际贸易应该在联邦政府的授权下进行的宪法原则。范德比尔特随后控制了哈得孙河的运输业务。在接下来的 11 年里，这位海军准将给自己和吉本斯赚了很多钱。范德比尔特的妻子则通过经营新不伦瑞克路上的客栈而赚钱，因为所有乘坐吉本斯汽船的人都要在那里停留。

临近 1829 年末，范德比尔特决定自己进行汽船航运生意，与丹尼尔·德鲁的纽约和皮克斯基尔（Peekskill）之间的人民航线（People's Line）展开新的竞争。范德比尔特与德鲁大打价格战，最后迫使德鲁退出纽约 - 皮克斯基尔的市场。接着，范德比尔特开始挑战哈得孙河协会在阿尔巴尼的业务。他又一次使用价格战略，但这次却让他的竞争对手把他赶了出去。因此，范德比尔特开始在长岛南部、普罗维登斯、波士顿以及康涅狄格的一些地方开展业务，与德鲁再次成为竞争对手。这个海军准将的船既舒适又豪华。到 19 世纪 40 年代，范德比尔特拥有超过 100 艘汽船，他的公司是当时美国雇员数量最多的公司。范德比尔特被认为对汽船的规模、舒适程度和美观等方面的改

进做出很大贡献，他的汽船被誉为“水上宫殿”。

永不满足的范德比尔特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并且总是能够找到。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人们乘船到巴拿马，从陆地绕过海峡，然后坐汽船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范德比尔特与太平洋汽船公司展开了竞争，他的路线是通过陆地穿过尼加拉瓜，这样可以节省600英里的路程，价格也便宜一半。这个项目使他每年净赚了100多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他改进了圣胡安河（San Juan River）的河道，在尼加拉瓜的东西海岸以及尼加拉瓜湖的维京海湾修建了码头，还修了一条可以到达西海岸的12英里的碎石路。他还着手组建了一支拥有8艘新汽船的舰队。范德比尔特的路线与通过巴拿马的线路相比，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还省了两天的路程，所以没过多久他便控制了这个市场。

整个19世纪50年代，范德比尔特还涉足北大西洋业务，试图与库纳德（Cunard）和科林斯（Collins）争夺纽约和勒阿弗尔的客运业务。当发现这次竞争无利可图时，他便在内战刚刚打响时以300万美元卖掉了大西洋航线。同时，范德比尔特开始扩张他的铁路运输版图，试图建立一个到芝加哥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帝国。正如莫里·克莱因所写，范德比尔特的铁路战略“既有效又重要”，包括购买铁路；认真管理；改进运营；通过与其他铁路联合来提高效益；票注股票，但仍然支付红利。

虽然使用这种逐步收紧的策略以及完全正当（不是通过卑鄙手段）的运作模式，令人吃惊的是，只要范德比尔特愿意，他仍然可以与德鲁坐在一起讨论生意。事实上，在1867年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将要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一度想把德鲁赶出伊利公司，于是忙着拉选票以便实现这个想法。同时，约翰·埃尔德里奇出于自己的考虑，希望控制伊利公司的董事会，也在到处筹集选票。

✱ ✱ ✱

当时，伊利公司大部分股票由英国投资者持有，出于习惯，他们都使用纽约经纪商的名字登记股票，由此免去了不必要的登记工作，因此成为经纪商根据客户的需要迅速买卖股票最有效率的方式。于是大部分华尔街的经纪

商在没有买卖指令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董事会投票，或者在需求最大的时候卖掉这种投票权，例如在公司收购战中。

31 岁的杰伊·古尔德和他的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并没有占有足以控制伊利公司的投票权。但是，古尔德手中足够的选举权可以引起约翰·埃尔德里奇的注意，古尔德保证在 1867 年 8 月期间支持约翰。同时，埃尔德里奇还与范德比尔特结合成同盟（后者是主要合作者）力图打败德鲁。最后的结果是德鲁没有被踢出董事会，10 月 8 日，他被选为董事，还担任财务总监。

此时，关于埃尔德里奇可能被推翻还是可能当董事会主席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第二天，金融媒体更是瞠目结舌，埃尔德里奇当选为主席。9 日早上，范德比尔特与充满歉意的德鲁含泪和解，冰释前嫌，并在董事会安排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德鲁不仅重返董事会，还被恢复财务总监的原职。在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猜测这三个巨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范德比尔特（由侄子沃克代表）、德鲁和主席埃尔德里奇。根据该记者的估计，只有这三个人才值得注意，董事会的平衡只是“一帮无关紧要的人”的平衡。

董事会的新成员中还有古尔德。另外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参与者是名叫詹姆斯·菲斯克的小经纪商。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不久之后就变得臭名昭著，成为最强有力的搭档组合，让整个华尔街都为之痛苦地震颤。

华尔街见闻
PDG

第十四章 蓝 火



如今回头看来，没有几个评论家会认为佛蒙特的小詹姆斯·菲斯克在1835年4月1日愚人节出生有什么不妥之处。菲斯克不是“愚人”，他是一个让人愉快而可爱的障眼法大师，一个最和蔼可亲的骗子。他是典型的贵族和惹人喜爱的坏男孩，妇女和银行家希望改造他，结果却徒劳无功。在一群人唧唧歪歪评论菲斯克和古尔德那次最耀眼的商业游戏的时候，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记者罗伯特·H·富勒（Robert H. Fuller），菲斯克小时候的朋友，认为菲斯克具有做骗子所必需的慷慨、亲切和不设防的品质。他从不会注意除票注外的其他股票，不会抢劫一个傻瓜，也不会给一个饥饿的流浪汉提供食物。他喜爱金钱的性格是那个时代忙于打败他人、获取利益之人的典型特征。他的慷慨在那个粗俗、懦弱、贪婪的时代里是非常特别的。至于他的轻浮和放任，则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纽约这个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贪婪投机者的地方，并不像厚爱吉姆那样厚爱他们。

另一位记者认为菲斯克没有什么哲学素养，也不信仰宗教，将生命、生意和爱仅看做会议室或床上精心制作的、荒谬、讽刺性的游戏。“他的存在，”《纽约太阳报》记者在菲斯克突然去世后写道，“一点也不使他烦恼，就像一个连续的笑话不停给他挠痒痒。”

和小他一岁的古尔德一样，菲斯克由于母亲去世过早，对母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老吉姆曾是一个小商贩，像老约翰·波尔·古尔德一样从事锡器生意。他与菲斯克的母亲洛夫·B·瑞安（Love B. Ryan）结婚。不久之后，菲斯克一家从佛蒙特的保纳尔搬到附近的本宁顿，并一直待到菲斯克15岁。在那里，他与富勒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富勒回忆道，

“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富裕的锡器商人，但他依然是村里孩子

们的领袖，每个人都很信任他。吉姆·詹姆斯（菲斯克的昵称）有白色的皮肤，脸颊泛起红晕，栗色的卷发，长大后变成棕色。他的眼睛是灰绿色，有一点点突出，眼睛很大。他非常自信，我们经常叫他厚脸皮。他在学校非常聪明，数学特别好。”

菲斯克童年时代居住的地方跟古尔德一样，是一个像田园诗一类的地方。菲斯克带领富勒和其他男孩进行了几年穿越树林、进入荒山的探险，那裸露的花岗岩就在那座城市的脚下。菲斯克还带着他的同伴到过从没有人去过的沃鲁姆塞克河（Walloomsac River）地区。那里一条湍急的奔流被修长宁静的平地所截断，然后沿着宽广的山谷向南流去。富勒回忆说，他和菲斯克不仅熟悉本宁顿附近沃鲁姆塞克河的每一个角落，还像古尔德和伯勒斯在罗克斯伯里一样，知道附近几公里内所有有鲑鱼的小溪。“我们在水里游泳，搭建木筏在水上航行，”富勒写道，“我们生起火，用树杈穿着活鱼烤着吃。我们被晒得浑身黝黑。”河流和森林在冬天也是一处绝好的避难所。那座荒山宽阔的斜坡可以当做滑雪场，结冰的沃鲁姆塞克河是绝好的溜冰场，玩耍过后，孩子们就在岸边生起篝火。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向南望去，还可以看到安东尼山脉甚至更远的地方，沿着马萨诸塞的边界可以看到格雷洛克山脉（Mount Greylock）和其他伯克郡的高山。

菲斯克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全家（现在还有菲斯克同父异母的妹妹明娜），从佛蒙特的西南部搬到该州东南部康涅狄格河边的布莱特尔博罗（Brattleboro）。老菲斯克清偿了所有的债务，利用前些年积攒的钱建了里维尔豪斯酒店（Revere House Hotel）。这座4层半高的希腊复古式建筑在1877年被大火烧掉前，一直是布莱特尔博罗最大的建筑。十几岁的菲克斯在不招待客人的时候，就帮助父亲在布莱特尔博罗的大街小巷叫卖各种生活用品。这两项工作发挥了他花言巧语的天赋。据说，他是一个讲故事和笑话的高手，而且他的故事有很强的讽刺性，所有人都会被逗笑。

在做小商贩之前，菲斯克曾跟随一个有名的范·阿姆博格马戏团到东北部演出，他负责看管动物，还当过售票员。后来，他开始了做小商贩的生活。1854年，在他19岁的时候，他与来自马萨诸塞斯普林菲尔德小他四岁的露

西·摩尔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关系（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对方奉献）维持了17年，但是他们却总是聚少离多。事实上，在他们婚姻的最后6年里，他们一直分别生活在两个城市：露西生活在波士顿，菲斯克生活在纽约。“她不是特别漂亮，”菲斯克对他无数女性朋友之一、演员克拉拉·莫里斯说，“我的露西只是一个丰满、健康、慷慨、普通的女人，一个男人在生命中遇到了她，然后和她一起第一次走进教堂，然后将自己交给了她。你看，这些普通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越来越有价值。”菲斯克还用同样的口吻赞扬了妻子的明智。“她从来不会突然来找我，上帝保佑她！”事实上，露西没有什么嫉妒心，也不会抱怨丈夫无数次的背叛。在婚姻的早期他们就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吉姆不是露西喜欢的类型。在她若干漫长的“孤独”岁月里，露西一直和她童年时代不能分离的伙伴范妮·哈罗德（Fanny Harrod）住在一起。

在和露西结婚的那段日子里，菲斯克开始通过使用在马戏团学来的宣传和营销策略推广自己的商品。他称自己为“朱庇特”，穿上马戏团指挥那样的条纹裤子，戴上高帽，将自己的马车漆成马戏团那样的红色边框和黄色车轮。他总是喜欢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他快乐而喧闹的个性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拿着国王的权杖，讲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笑话，英俊而轻浮的菲斯克使生意迅速扩大，将各类披肩、家庭用具以及其他小玩意出售给那些难缠却乐于被奉承的主妇。他的足迹覆盖了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南部、马萨诸塞北部和纽约东部。用一个早期传记作家的话讲：“在他经过的每个地方，主妇和少女没有人不承认吉姆·菲斯克是最有吸引力的商贩、最时髦的车夫和最高贵的旅行者，无论他在量丝绸、抽鞭子还是在客栈结账。”他短暂的生命中经常出现由于他的勾引而发生的风流韵事。

作为一个小商贩，他也是这样的。菲斯克的供货商——受人尊敬的波士顿杂货商乔丹与马什公司的埃本·D·乔丹，将菲斯克列为公司最成功的交易商。1860年，乔丹在波士顿给他提供了一个地方让他代表公司进行批发业务。起初，菲斯克卖掉了自己的行头和露西一起来到波士顿，但是这项新业务做得并不是很成功。他的魅力对于那些一直从乔丹、马什那里批量购货的严肃商人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们不听奉承，也不会多买或多卖。直到美国内

战爆发，菲斯克才开始赚钱，因为他找到了愿意听奉承话从而多买多卖的批发商。

菲斯克将目标锁定在提供军需品的军官上——那些管理巨额消耗（不是他们自己的）补给的代理商。他在1861年来到华盛顿特区，在最好的维拉德饭店开了一家“宜人家居”。在这里，菲斯克又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高兴地将露西安安置在波士顿，在这里尽情地娱乐。“在几个马萨诸塞和布莱特尔博罗区议员的帮助下，”富勒回忆说，“吉姆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供他们吃喝玩乐，直到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立场，享受美好生活……吉姆是这个领域第一个为政府官员们提供避风港的人，那些薪水微薄的官员们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抽上等雪茄，喝他们喜爱的美酒。”同时，如果需要，菲斯克还在政府合约中给官员提供回扣。“吉姆知道如何用最小的付出堵住他们的嘴。他总是自己亲自做这些事情。”

虽然受贿之风盛行，虽然物价飞涨，乔丹与马什公司（不像其他供货商那样忙于行贿和超额要价）却以产品质量过硬和送货及时而闻名：这个事实使军需采购者知道了应接受谁的贿赂。毯子、衬衫、鞋子和其他主要物品从乔丹的仓库由铁路运往联邦军队。结果，埃本·乔丹不但没有责怪菲斯克在维拉德昂贵的消费（最高达到一天1 000美元），反而将这个年轻人提升自己的合伙人。菲斯克后来进一步赢得了乔丹的欢心（乔丹本人也对南方种植业垂涎已久），他设计了一个计划，成功地绕过南部邦联的北部关卡以及南部邦联禁止向北方销售棉花的法令。南部走私棉花销往北部有巨大需求的制造厂，提供更多的原材料为联邦军队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使菲斯克小赚了一笔。（此外，牺牲自己去走私棉花的人是菲斯克的父亲，在帮助儿子偷运棉花之后，他的精神有些失常，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

菲斯克既慷慨又唯利是图，经常做一些鲁莽而敏感的善举。他第一次成为全美瞩目、性格鲜活而善良的慈善家是在1864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当时菲斯克碰巧在波士顿，听到广播说，前一天麦克莱伦（McClellan）与李将军之间的战役，造成安蒂特姆河战场上死伤22 000人。（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是美国内战期间每天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死伤的全部人数还多。）菲斯克告诉乔丹，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可怜的冤魂”，他捐赠了许多必需品帮助“孩子们”，不管他们是蓝眼睛还是灰眼睛。

曾和菲斯克组织该次捐赠的马什公司的一位雇员回忆道，菲斯克当时站在波士顿特里蒙特神殿，周围都是板条箱、纸盒和木桶。“菲斯克是所有事情的中心。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充沛的精力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那个星期天的奇迹。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捐赠中去。他一人一个小时可以做三个人的活，那里也有许多干活麻利的工人。他事无巨细，下每一道指令，检查每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按照他说的去做。结果从早到晚，没有人从他那里得到好评。他自豪吗？你认为呢？”

1864年末，南部邦联不断显出战败的迹象，联邦军队的军需开始下降。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战利品落到北部军队手上，菲斯克那桩走私棉花生意的盈利也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菲斯克关闭了在华盛顿特区的办事处（或许是唤起了战前他在乔丹公司生意不成功的回忆），撤出了公司，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他的老朋友乔丹，共获得65 000美元。稍后，在波士顿尝试了一桩不成功的买卖后，菲斯克背起行囊，去了那个直觉告诉他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需要出色的剧团经历，这个地方没有确定的规则，（他自称）“这是可以做大事的地方”。这就是华尔街，对它来说，菲斯克完全是一个新手。

菲斯克当时29岁、声音宏亮、习惯了华盛顿那种高质量的生活。他还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充沛的精力，还因为他在马什公司获得的利润。在城里待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在百老汇大街上开了一家花哨的经纪行。同时，他搬进位于24街第五大道豪华的第五大道饭店。该饭店在百老汇西边和第五大道一起穿过麦迪逊广场。第五大道饭店是纽约最好的饭店，第五大道的街边就有许多在交易所规定时间之外进行的股票和债券交易。住在这里不仅有利于日常生活，还方便了交易。（菲斯克又一次将露西留在波士顿，让她住在特里蒙特豪斯酒店。）

菲斯克在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有正常的营业时间，对来交易的经纪商和投机者提供不同饮料。但是，此时他要招呼的不是没什么野心的小本客户，他们是没有良心的恶狼，寻找盈利机会的恶狼。在开始的几个月里，菲斯克就像一只没有头脑的羔羊，被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同伴自私的建议搞得焦头烂

额。“他被熊市残酷地拥抱，”一个早期的传记作家写道，“被牛市随意地踢来踢去，但因为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对未来的盲目乐观，直到被华尔街吞掉了所有的钱他才醒悟过来。”当市场在冬季突然变成熊市时，毫无防备的菲斯克发现自己危险地持有了大量正在下跌的股票，濒临破产的边缘。接下来他试图在伦敦交易所卖空联邦债券的决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又重返华尔街，继续听从以前那些玩家的建议，结果又栽了大跟头。菲斯克一点都没有丧气，他对朋友说：“我在20天之内就会重返华尔街，如果不把事情搞得有点起色，我就只喝骨头葱头汤，直到‘正义之日’到来。”

菲斯克总是有意外发现珍宝的好运气，在从纽约返回波士顿的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个后来长期帮助他赚钱的绅士——缅因州人约翰·古尔丁（John Goulding）。他来到纽约试图推广他父亲改进的织布机发明专利，但是失败了，只好坐火车回家。菲斯克在乔丹公司的时候了解过一些关于纺织品制造的知识。古尔丁给菲斯克讲解和演示了他的装置，这个机器在华盛顿获得专利，在新英格兰的许多纺织厂已经广泛使用。古尔丁现在要做的是通过法律手段从使用这种机器的纺织厂那里收取专利费。菲斯克迅速从乔丹和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以两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专利权。同时，作为最后收益的部分享有者，他还组织了一个律师团打赢了许多侵权官司，获得了很多赔偿金。

但是，与古尔丁的交易并没有帮助菲斯克解决当时的资金需求。因此，他又一次求助于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埃本·乔丹。他利用埃本·乔丹提供的资金，在1865年末重返纽约，再次入住第五大道饭店。在那里，他认识了丹尼尔·德鲁，一个参加饭店的闭市交易常客，被一群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包括乔丹）邀请参加购买德鲁在斯托宁顿的汽船航线：包括行驶于曼哈顿和康涅狄格斯托宁顿之间的长岛海峡南部的9条汽船。德鲁想卖掉这条盈利微薄的航线。菲斯克作为经纪商以230万美元的价格将该航线卖给这帮波士顿的辛迪加，不仅获得了丰厚的佣金，还引起了德鲁的关注。这两个前马戏团演员合作得非常好。在几个月里，一直在寻找另外一个好经纪人帮他控制伊利公司和其他股票的德鲁，帮助菲斯克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到1866年春天，菲斯克与威廉·贝尔登（德鲁朋友的儿子）一起组建了菲斯克与贝尔登

公司，处理了丹尼尔大叔许多购并业务。

作为菲斯克与贝尔登公司的一部分，吉姆·菲斯克参与了德鲁在1866年操纵伊利公司股票的游戏，并获得了丰厚的佣金，并在德鲁的帮助下进行内幕交易，获得了大量利润。菲斯克不再是一只软弱的羔羊，他已经变成华尔街最有能力的恶狼之一。经纪人福勒（W. W. Fowler）在菲斯克成功返回纽约金融界后写道：“金发碧眼、风风火火、吵吵闹闹的詹姆斯·菲斯克……像一个杂技明星来到华尔街马戏团：新鲜、活力四射、浑身闪着亮片，翻着筋斗。很显然，他的自娱自乐能够影响看台上所有的观众。他是第一也是最后一个，也一直都是能制造戏剧效应、变幻莫测的蓝色火焰。”

到1866年底，菲斯克花了75 000美元给露西和她的朋友范妮在波士顿最繁华的切斯特大街建了一座高级别墅。他自己也住到了第五大道饭店最昂贵的套房，成为纽约最高档餐厅——戴尔莫尼克的常客。香槟早餐、最精致的丝质衣服、镶金手杖成了他永恒的装束。女演员和歌舞团的女孩们纷纷为他着迷，聚在他的周围，不仅是因为他幽默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还因为他经常慷慨地送给她们小礼物。

★ ★ ★

这就是德鲁乐天派、花里胡哨、暴风骤雨般热情的盟友，他和深沉、严谨的古尔德在1867年秋季一起出现在伊利公司的董事会里。如果说吉姆·菲斯克是“蓝火”，那么古尔德则具有除了“蓝火”之外的任何特征。对他们两个很了解的富勒写道：“吉姆和古尔德的组合太完美了。吉姆个性张扬，喜欢热闹，他的弱点一眼就能被人识破；古尔德却生性节制。吉姆喧闹而自信；古尔德沉默，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自信。吉姆鲁莽；古尔德谨慎。吉姆想到什么说什么；古尔德则很少发表意见。吉姆挥金如土、一掷千金；古尔德却勤俭节约、从不消费。然而，他们两个在工作的时候都有无穷无尽的力气，而且都非常聪明。一旦结成同盟，将坚不可摧。”

第十五章

荒谬的法律机构



古尔德和菲斯克进入伊利公司董事会的时候，正是伊利公司内部利益冲突激烈的关头，董事会有各种各样、通常是拜占庭式的议事日程安排。在新董事会刚刚组建时，伊利铁路主要的西部路线——大西洋—大西北铁路正在进行破产清算。伊利公司本身在两年前它的救世主内森尼尔·马什死后仍然乱作一团。背负着600万美元的危险债务，管理混乱、设备破旧的铁路第一次受到了范德比尔特资金充足、运行良好、新修建的公路运输的挑战（从大西洋纽约到布法罗的大湖区）。范德比尔特在伊利公司董事会的控制地位更增加了伊利铁路前景的不确定性。每一个正常人都会看到，范德比尔特的步伐是清晰的：以一种渐进的、轻松的方式控制伊利铁路，从而控制从西部进入纽约的大部分主要路线。同时，伊利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约翰·埃尔德里奇只有一个目的和兴趣，即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铁路。同时，菲斯克的老朋友埃本·乔丹也是其中的赞助者。至于像老德鲁这样的会在任意特定时间做任何可能的事情的人，想的则是怎样赚取最多的钞票，用《纽约先驱报》的话说，德鲁是一张“任意牌”。

但自从范德比尔特的侄子沃克在10月份默认了埃尔德里奇和董事会的新成员提议并通过了担保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铁路债券利息支付的决定后，范德比尔特在伊利公司的决定性地位慢慢受到挑战。让埃尔德里奇高兴的是，如果没有意外，此次伊利公司的担保将不会包含上次担保提议中大部分终止支付的条款。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公司所能做的就是，在1870年1月之前使铁轨和车辆达到每年运送30万吨煤炭的运能。之后，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公司还需要从煤炭盈利中拿出一部分为债券持有者的托管人支付担保债券的利息。在这项交易进行的同时，沃克还参加了由几个董事会成员包括德鲁、古尔德和菲斯克，以及几个外部人包括菲斯克的合伙人埃本、古尔德的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史密斯和马丁，还有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组织的聚会，

他们决定建一个基金拉升伊利公司的股票，这个基金无可争议地由股票操纵大师德鲁进行运作。

范德比尔特和沃克不再控制伊利公司的暗示肇始于11月份，当时伊利公司的董事会否决了参与建立另一个基金的建议。范德比尔特提议伊利铁路与纽约中央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联合，平分这三条最终通向纽约东南部铁路的利润，这样可以避免使范德比尔特扬名的消耗式价格战。在向伊利公司游说的时候，他已经劝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同意这个计划，他满心期待伊利公司能够让他如愿以偿。（事实上，一些人猜测，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伊利铁路的联合将成为10月入主新董事会秘密交易的关键。）但是，这个计划在董事会上提出来时，只有沃克一人投了赞成票，其他董事坚持认为伊利公司在计划中所占的股份不够大。一个月后，也是对范德比尔特的另一个打击，伊利公司董事会绕过沃克的反对，直接与密歇根南部与印第安那北部铁路公司进行谈判，使伊利公司获得了一条通往芝加哥的路线，这样就可以和纽约中央铁路—密歇根南部铁路齐头并进。

在这项交易进行的同时，德鲁运作的股票基金项目在艰难推进，但是未取得预期效果。伊利公司的股票上涨得很缓慢，到1868年1月底达到最高点79美元，在2月4日一天的交易中又跌到71美元。授权德鲁运作股票的范德比尔特和其他成员感到迷惑，他们没有意识到德鲁私下里正在使用他转换债券、抛售股票、卖空市场的老把戏——典型的熊市狙击。正如《纽约先驱报》的一个记者所说的那样，在下跌的时候“秘密投机者用尽全力……制造恐慌和错误传言，其他股票一切正常，伊利股票很有问题”。经纪商威廉·富勒在交易所和公开市场闭市后仍然进行晚间交易，他回忆说：“华尔街的所有能量似乎都倾注在第五大道饭店的大堂。丹尼尔·德鲁比平时更加严肃和焦虑，他站在楼梯旁边，看着那些受害者在痛苦地扭动，他是最后一只快乐的牛。”最后，德鲁获利匪浅，但不是从拉升股票价格而是从卖空股票中获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也是让德鲁高兴的事，到4日晚上其中一个受害者冷汗直冒，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弗兰克·沃克。他从德鲁那里购买了大量基金，以便使自己可以从上升的股价中获利。后来，当沃克发现购买的股票来自自己基金的经纪人时，他勃然大怒。亨利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

当后来在他们《伊利的故事》（*Chapters of Erie*）中记录了沃克的尴尬境地，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亚当家人写道：寡廉鲜耻的德鲁“将基金的钱借给某一个基金持有人，让他卖空基金的股票；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悄悄地背上负担，然后控制分配利润，暗自将受害者自己的一部分钱作为股票收益支付给受害者。”

随后，虽然自己在德鲁未经授权的此轮阴谋中获取了很多收益，但范德比尔特仍然很不高兴地离开。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于，让不受控制的投机者返回到伊利公司的董事会。范德比尔特也意识到伊利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了沃克没有几个是可以相信的。因此，范德比尔特最后决心结束几年前就开始的糊里糊涂状态，准备马上采取措施获得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让代理人帮他买下所有能买到的伊利公司股票，同时让沃克去找纽约高等法院法官乔治·G·伯纳德（George G. Barnard）——一个在曼哈顿活动的坦幕尼派民主党人，也是一个很容易被贿赂的官员。范德比尔特想通过他发一个禁止令，禁止德鲁和伊利公司的操纵者们发行债券、转换债券、卖出伊利股票或者为其他铁路公司的债权做担保。这个禁止令在2月17日发布，后来延期到3月3日，目的是想最终将德鲁从财务总监的位子赶走，并迫使他归还1866年给他做抵押的58 000股股份（28 000万股加上300万美元可以转换成30 000股股票的可转换债券）。通过这种方式，范德比尔特希望使用德鲁惯用的技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保护自己和那些购买伊利股票的人的利益。通过控制可转换债券，德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的话）任意扩大或缩小已发行的伊利证券规模20%以上。由于自己是财务总监，德鲁还可以（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的话）通过获得董事会绝大多数选票的方式操纵尽可能多的可转换债券。

当时，伊利公司有1 750万股普通股，850万股优先股。范德比尔特还需要另外1 000万股，再加上自己目前所有的股份才可以取得控制权。这个数目只是海军准将净资产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资本被套在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中，所以他的现金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不过，范德比尔特仍然是华尔街最有融资能力的“强盗”，加上德鲁和他的同党之间存在内部消耗，于是他决定对伊利股份进行出击。同时，他找了里昂纳多·杰罗姆

(Leonard Jerome) 这样的有钱人和他并肩作战。

* * *

范德比尔特犯了两个错误：

一方面，在开始制作交给伯纳德的禁止令的时候，沃克忽视了一个关键用语的细微差别。伯纳德的命令禁止财务总监和伊利公司董事会从事“伊利债券和股票的出售、转换、交出、处置或联合行为”。然而，古尔德这个活力充沛的阅读爱好者就会猜测，伯纳德的命令中没有提到限制伊利公司执行委员会的行动，后者被伊利公司的章程赋予在两次董事会例会期间代行董事会的权力。所以在3月4日将要闭市的时候，由德鲁、埃尔德里奇、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的执行委员会击破了范德比尔特接管铁路的计划。委员会同意发行500万美元的债券，并同意将它卖给德鲁的经纪商威廉·希思(William Heath)。在几个小时之内，这些债券就转换成5万股股票。希思将这些股票连同德鲁手中的股票在当天晚上向市场抛售。在此之前，市场上已发行的股票有251 050股。范德比尔特的代理们疯狂吞噬着新发行的伊利股票，支撑价格。同时，德鲁自己也在纽约每个交易市场上卖空股票，由于范德比尔特不知道已发行伊利股票的实际数额，或者说伊利的每股价格在公平价值之上的相对浮动，因此，最后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范德比尔特忽视了，也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痛苦但明显的事实：在这样一个高度腐败的司法体系中，他可以通过贿赂官员对德鲁和其他伊利股东发布禁止令，其他人同样也可以这样做。

实际上，虽然纽约“高等”法院的名称中有“高等”二字，实际上它却是纽约州级别最低的法院，是人们提出第一次诉讼而不是最终诉讼的地方。在当时共有8个不同选区，除曼哈顿地区有5个法官外，其他各选区选出4个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们每14年选举一次，当选法官组成该区受理上诉的第一层次法庭。在当时狼狈为奸的环境中，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都听从于各自的政党，其中大部分是民主党）通常是执行当地政治联盟和朋友的旨意：那些人在第二天就会将上诉裁判权交给他们。

法官选举制源于激发并促成1846年新州立宪法的平民主义热潮，这是一

种植根于杰克逊主义的相信普通人具有最终的智慧的信仰。但是在实践中，正如亚当他们在《伊利的故事》中指出的那样，选举方法让法庭充斥着政治的仆从。他们写道：“公众投票选举法官的体制……带来了苦涩的结果，那些被选到法官席上的人本该被送上被告席。”

在商业纠纷的裁决中，纽约的法官们都是依据《民事诉讼法》来判决。《民事诉讼法》由曼哈顿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起草，在1846年宪法颁布不久由纽约州议会通过。后来，“菲尔德法典”的思想成为联邦层次的法律，在全美26个州包括英国都在采用。虽然菲尔德法典是一个完美的模型，但在实际中却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使事情复杂化，至少纽约法庭的腐败便属于这种情况。根据这些法律，高等法院的法官虽然只是由他所在的选区选出来的，但是他们被授权可以在全州参与审判。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裁决属于其他选区裁决权的案件。此外，法官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布禁止令和指定单方面申诉的接受方——即只听取案子一方的申诉。菲尔德法律的特点、纽约高等法院奇怪的诉讼结构以及裁决的任人惟亲，将在接下来的伊利之战中起到重要作用。

纽约最好的律师一直以来就为高等法院的这些缺点而痛心。曼哈顿律师乔治·坦普尔曼·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日记中抱怨说：

“法律并不保护财产权。这种荒谬的法律机构对财产所有者来讲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没有一个银行家或商人能够确定，在一件案子中，某个所谓的接收方会不会在什么时候走进法院大门，要求拿回他的所有财产，并停止所有生意。要想一个星期后撤销这个判决，你需要交10万美元或一些所谓‘补助’换取另一个裁决指令。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这样荒谬的法律体系中长期繁荣昌盛，资本一定会流到更安全的地方。”

因此，范德比尔特在3月5日发现古尔德代表那些反对他的同党找到了自己的法官时大吃一惊。来自伊利铁路所在的科特兰市之外的法官兰塞姆·巴尔科姆（Ransom Balcom）很高兴地发布了一个禁止伯纳德的曼哈顿法庭在4月7日听证会之前，对伊利公司进行进一步审理的命令。同时，巴尔科姆还暂

停了弗兰克·沃克在伊利董事会的权力。在巴尔科姆终止了伯纳德法庭对于伊利公司的一切审理之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盟友理查德·斯凯尔（Richard Schell，他也是伊利基金的一个成员，和沃克一起参与了那次不愉快的投机）提请高等法院的丹尼尔·P·英格拉哈姆（Daniel P. Ingraham）法官在6日发布了一个命令，禁止伊利公司董事会在沃克缺席时从事任何交易。

笼罩在公司的不确定气氛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纽约先驱报》评论说：

“华尔街的人都害怕持有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伙在3月10日早上持有10万股股票。支持他们的人正全力以赴……有谣言称，市场上普通股的数量远远大于大家预料的那样，因为老债券加上新发行债券转换成普通股，所以现在人们很难估计普通股的数量。”

由于《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这些谣言，伊利公司的股价一路下跌。由于范德比尔特用伊利股票作为抵押，几个银行也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借钱给他，这迫使范德比尔特仓促采取行动。他威胁银行说要将纽约中央铁路（大部分纽约银行都持有它的股票）的股价从目前的68美元打压到50美元，除非银行立刻给他提供50万美元，拉升伊利的股价到50美元，否则，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使许多机构破产。那些银行迅速投降，给范德比尔特提供资金再一次稳定伊利的股价。

范德比尔特一直确信，既然到那时还没有其他法官明确撤销伯纳德的禁令，那么德鲁的股票操纵一定会被迫停止。然而，在范德比尔特的手下买空了所有新近发行的伊利股票之后，伊利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又发行了第二笔500万美元的债券，转换成股票，抛向了市场，并且建立了一个50万美元的法定储备金。3月10日早上，几乎在执行委员会做这项工作的同时，菲斯克经纪商的合伙人伯尔登对布鲁克林的法官吉尔伯特（Gilbert）提起上诉。伯尔登请诚实、公正的托马斯·G·舍曼（Thomas G. Shearman）、亨利·沃德·比切的布鲁克林教堂的主日学校校长代表诉讼，提出禁止“先前与该案有关的所有利益方禁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吉尔伯特还要求除了弗兰克·沃克以外，任何一个伊利公司的董事可以根据需要继续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同一天

早上，伯纳德法官则宣布撤销他自己禁令以外的所有命令。

古尔德和他的朋友很高兴看到这种僵局。“一个法官禁止他们行动，”亨利和查尔斯·弗兰克斯·亚当斯写道，“另外一个法官不让他们坐以待毙。如果伊利董事会召开会议进行交易，那么他们违反了其中一个规定；如果不进行交易，则违反了另一个。”埃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Edmund Clarence Stedman），一个坐在第一排观看第一次伊利之战的银行家、经纪商和小诗人，指出了德鲁、古尔德和菲斯克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好处：“因为伯纳德禁止他们将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禁止他们不转换股票，所以即使最挑剔的人也不能指责他们所采取的行动。”

经纪商威廉·福勒在10日早上一直待在公开市场，看着范德比尔特吸筹伊利股票：

整个市场只有一个单词在不停出现——伊利。市场上不断响起公开市场副总裁乔治·亨瑞克斯（George Henriques）尖细的声音。他快速依次说着政府债券、州债券、太平洋邮政、纽约中央铁路，随后他顿了顿，一丝阴影浮现在他的脸上，接着大厅里传来了他更加尖细而颤栗的声音——伊利！在十分钟里，整个大厅像解了禁的疯人院一样，一片混乱嘈杂。所有的操盘手和经纪人都焦急不安地尖叫着、比划着。与众不同的范德比尔特经纪人们站在大厅中央，像陀螺一样从左转到右，挥舞着胳膊，吞噬着所有卖给他们的股票。随着主持官员的大锤落下，大厅里响起他洪亮的声音：“成交，先生们。我会精心处理好每一个报价。”伊利的股价涨到80美元。疯狂的人群将其他未叫价的股票全部抛在脑后，一股脑跑到了这里，这里只听见人们叫伊利的声音。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下令购买伊利每一股报价的股票，在这种巨量购买之下，到中午12点的时候，伊利的股价已经涨到了83美元。

到了下午，范德比尔特碰巧买到了菲斯克刚刚签发的新股票。但在他购买股票的行动正热火朝天的时候，这位海军准将意识到他可能遇到麻烦了。此时，市场上有谣言说，一批数量不明的新伊利股票已被投向市场，于是股

价又做自由落体运动，到下午3点降到每股71美元。此时，范德比尔特已经投入了700万美元的借贷资金。当意识到一旦他停止购买，股价将下跌得更厉害时，他明白这不仅将威胁到他自己，还会威胁到其他许多人，于是范德比尔特选择继续他的计划。“他从不退缩。”福勒曾钦佩地回忆说。

这位老海军让他的代理人继续买进伊利股。到晚上，他已经创造出足够的需求将股价控制在每股76.125美元。闭市时，范德比尔特拥有或者说控制了20万股伊利股票，至少是那个至今不明的总价值的一半，但是事情还不明朗。这些股票能占到伊利股份的大多数吗？天晓得。范德比尔特当然不知道。事实上，仅仅两天后，当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公开市场宣布伊利公司在3月7日以后买卖的证券无效时，范德比尔特超过50%的股票已经受到了挑战。

更雪上加霜的是，范德比尔特必须支付那些巨额借款的浮动利息，于是他被迫在10日继续借款。那天早上，德鲁根据古尔德的建议，偷偷提高了借款利率。这位投机者拜访了城里许多家银行，将最近出售伊利股票所得的将近700万美元的收益从银行中提出，然后将这些钱安全地放在杜南大街（Duane Street）伊利公司的办公室。莫里·克莱因将这一手法精妙地比喻为“引起货币市场的收缩痉挛”，使得短期率猛然攀升。这样，以古尔德为主要谋略家的古尔德、德鲁、菲斯克同盟就可以牵着范德比尔特的鼻子走来走去了。

11日早上，威廉·福勒和古尔德他们三个待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伊利公司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他写道，“正在公司的办公室热烈庆祝他们的胜利……丹尼尔大叔展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哈哈笑个不停。杰伊·古尔德那双金融天才的眼睛流露着笑意，闪烁着光芒。金发碧眼的大块头菲斯克则油腔滑调地讲着笑话。”但当听说范德比尔特的律师正在忙碌的消息时，屋子里的气氛迅速发生了逆转。福勒回忆说，伯纳德自己发布了“一个法庭传票，控告他们藐视法庭指令”。伯纳德下达的逮捕德鲁、菲斯克和古尔德的命令“将很快由当地治安官的得力干将执行”。

根据《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报道，不久后，一名警察在杜南大街巡逻时发现：

“一群衣着体面但神色难看的人慌乱地从伊利大楼里运下来几麻袋

钞票、账本和许多用红带捆着的文件。那个警察心想这里一定发生了违法案件，这几个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他走上去盘问，却发现是个误会。他们是伊利公司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想逃脱那个海军准将的报复，运走他们在最近战役中获得的战利品。”

他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会面临被囚禁的后果。同样，他们意识到被送进监狱将意味着失去控制整个事件、现金和股票的能力。因此，他们决定立刻逃脱纽约警察的管辖范围。慌张的德鲁带着公司无数关键文件和记录乘坐下一班轮渡穿过哈得孙河来到新泽西。同时，古尔德和菲斯克留在曼哈顿，在最后逃离前和经纪商和银行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他们派德鲁带走了许多文件，自己保管从伊利保险柜里取出的 700 万美元。菲斯克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富勒：“这些钱放在我和杰伊这里，比放在丹尼尔大叔那里要安全得多。”

那天晚上，古尔德和菲斯克十分放松地坐在菲斯克最喜欢的戴尔莫尼克餐厅吃饭，几个守卫在外面替他们把风。吃到一半的时候，把风人通知他们法庭警察要来了，于是他们从餐厅的后门跑出来，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古尔德拖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 700 万美元，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们送到海边。在那里，他们从圣约翰号上雇了两个船员，让其开着一辆救生艇将他们送到新泽西。

正如菲斯克后来对记者描述的那样，那次旅行让人毛骨悚然。3 月中旬，纽约港的水依旧冰冷刺骨，在水里没几分钟就会被冻死。海浪向北推向哈得孙河口，这大大增加了他们试图沿着东西方向穿过海峡的难度。再加上那个晚上没有月光，海上弥漫着浓雾，许多疾驰的汽船和运输船在视线里忽隐忽现，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他们的航行灯模糊不清，他们的舵手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这只小船的存在。一只大船曾一度突然出现在这只小船的旁边，“他们用了最大的力气”才驶出了大船的行线，避免了相撞。在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状况后，这伙人“决定求助”，他们向一艘来自新泽西的船呼喊，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绝望中，菲斯克一把抓住隆隆转动的轮船巨桨的外架，结果“他们一下子被拉到船桨旁边，几乎被抛出了小船。最后他们被救了上来，爬上甲板，不久之后就安全到达了新泽西，但是全身都湿透了”。

第十六章
巧取豪夺



古尔德、菲斯克和德鲁，以及埃尔德里奇及几个助手一起在新泽西海岸边的泰勒饭店建立了他们的总部。这个饭店正好位于伊利铁路终点附近，毗邻郎沃夫城（Long Wharf）。他们占了饭店整整一层楼，此外为了给跟随他们来到这里的记者提供方便，他们还在饭店的女士休息室开辟了一间会客室。菲斯克在佛蒙特的老朋友富勒记得菲斯克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雪茄、饮料和食物。他也是追踪报道这伙逃出来的伊利公司董事的一名记者。菲斯克用最热情的方式招待媒体，并和他们攀谈，这是古尔德交给他的任务。包括范德比尔特在内的大部分人，后来才意识到当时的古尔德已经取代德鲁成为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谋士。

“与古尔德相比，菲斯克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应付媒体，”富勒写道，“古尔德总是很认真，因此显得很严肃。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样处理好手头的事情上。他比吉姆更强硬，因为他更加坚忍不拔，但是他有点不太了解人的个性。”从另一方面讲，菲斯克是一个天才的推销员。他对记者说：“那个海军准将占有了纽约，那里的股票交易所、大街小巷、铁路和大多数汽船都属于他。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那里没有我们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壮大。”当一个记者问到德鲁并不年轻时（事实上他和范德比尔特是一代人），菲斯克回答说：“丹尼尔大叔说，当他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时，他感觉自己只有两岁。”

媒体问到伊利公司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菲斯克回答说，伊利将成为一家新泽西公司，然后为广大民众服务，而如果范德比尔特被允许建立连接纽约和西部铁路垄断的话，那么普通民众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他说：“那个海军准将除非控制所有铁路，可以随意提高运进纽约货物的运费，否则他是不会满意的。他一点都不会在意市民为咸肉和鸡蛋支付多少钱，一点都不会，只要市民们把钱支付给他就行。但是，只要我们这帮流亡的伊利人还在巡逻，

他就不能控制伊利公司。在我们遇到强盗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去做。”菲斯克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公众已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纽约先驱报》写道，就连发生在首都的弹劾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进程都被伊利之战所掩盖了。

在菲斯克对媒体发表谈话时，是古尔德在为他起草谈话要点。在这场反对范德比尔特的斗争中，他绝妙地引用了人民党的一句话来定义这场战争：一场反对贪婪的崇高战役，一场反对垄断的战争。古尔德还出主意在伊利高层中迅速组织了一个报告，证明最近公司是多么需要发行债券，报告热切地描述了伊利铁路可怕的路况。一年前，为了应付联邦检查员的检查，伊利高层曾经发布了一个同样的报告，宣称伊利铁路“是过去10年里条件和装备最好的铁路”。但幸运的是，那帮嗜酒的雇用文人们，包括为格里利《纽约论坛报》撰稿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纽约先驱报》和其他纽约的报纸都没有深挖伊利公司声明的前后不一致。

为了让他们的反垄断战役看起来更真实，古尔德和菲斯克不久就和纽约中央铁路打起了价格战，他们将运费和客运价格降到了伊利铁路的盈亏点上。同时，他们开始在茨伦顿寻求必需的法律保护，支持伊利公司在新泽西设立新公司，而不去理睬来自哈得孙东岸的禁令，允许这群伊利董事发行更多债券和股票的法律地位。新泽西的承认也可以为伊利公司在纽约的财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避免被范德比尔特通过纽约法庭占有。

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限于防止财产被占有。如果他们回到纽约，古尔德和其他同伴的人身安全便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古尔德还听说范德比尔特悬赏5万美金缉拿伊利同党返回纽约法庭的管辖权。还有谣言谬称，这帮伊利同党将在3月16日采取转移行动，一帮全副武装的黑帮分子将从纽约帕沃涅的各个渡口出发，在伊利铁路的终端集合。但这的确是古尔德为自己防备的最后一着棋。《纽约先驱报》记者描述说：“15名从新泽西警察中物色的精英，在警长福勒的带领下拿着手枪和警棍”，在现在被称做泰勒堡（Fort Taylor）的地方采取了行动。除了在休·马斯特森（Hugh Masterson）检察官的命令下福勒和其他几个人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外，他们还还为伊利铁路组成了一个特别高级保卫组。虽然准备了如此充足的火力，伊利的马斯特森花了几

个小时就确信纽约来的这帮人没有任何用处。古尔德、菲斯克和德鲁在保卫森严的宾馆中是不可能被掳走的。

在纽约派来黑帮的同一天，伯纳德法官宣布起诉任何一个在纽约的伊利逃亡者。同时，德鲁在新泽西也很快变得不悦起来。这个投机总监和古尔德一样是一个恋家的男人，他十分想念他的妻子和家人。此外，这个神秘秘的德鲁不喜欢和他的伙伴过于亲密。“他几乎不能容忍伊利的同伴们被安排在泰勒饭店，”福勒写道，“他不愿意那些更年轻、更强健的同伴们看到他懦弱、摇摆的本性。长期以来他个性太强，为当时的处境感到痛苦万分。他怀念那美好的家庭生活，在那儿他经常烤着香喷喷的鸡翅，梦想着经济恐慌。”

最初，古尔德猜测德鲁可能想通过与范德比尔特的单独和解获取利益。那个海军准将总是能够原谅德鲁，然后又像从前一样。这次为什么不会如此呢？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阻止这两个老冤家签订协议，而把古尔德和菲斯克扔到一边呢？德鲁这种背叛的劣迹太多了。古尔德、菲斯克和其他华尔街的人士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既定环境下，德鲁总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因此，在来到新泽西的几天后，德鲁开始行动了，但古尔德一直派人在暗中监视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古尔德和菲斯克既有些烦恼但也并不感到意外。财务总监德鲁从公司的新泽西银行里提走了700万美元，然后通过邮递员分别存入几个纽约银行，在那里，这笔钱将很容易迅速地被范德比尔特扣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古尔德和菲斯克就立即扣下了德鲁在伊利公司数量可观的证券（这些仍然在新泽西），要求德鲁迅速归还700万美元。德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还在犹豫之中。这件事情之后，这个日益疲倦和绝望的老人便放弃了所有财务总监的权利。当艾布拉姆兄弟掌管了财务大权后，德鲁便“不再是伊利的强权人物”。

从那时开始——在过去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仅仅有两次明显的例外，与其说德鲁是事情的始作俑者，倒不如说他是事情的受害者。在大事上都是如此。就像《纽约先驱报》所说的那样，“现在在这个城市进行的伟大的伊利铁路诉讼案将是所有选区民事法庭所遇到的范围最广、最复杂的案件。”在争斗中，双方配备的武器总价达到1.2亿美元。参与伊利控制权竞争的人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玩家。

在暴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伯纳德法官就任命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查尔斯·S·奥斯古德（Charles S. Osgood）接管先前伯纳德禁止销售的股票。古尔德也找到了一个友善的乌尔斯特区法官T·W·克勒克（T. W. Clerke）终止查尔斯的接管，伯纳德则反过来宣布排除克勒克的干涉。这场管辖权上的羽毛球赛将会无休止地以平局不断进行下去，除非奥斯古德要求撤换自己。既然奥斯古德将要接管的财产在新泽西，那么这种争斗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下一个被任命的接管人彼得·B·斯威尼（Peter B. Sweeny）是特维德老板的坦幕尼派的管家。他除了最后从伊利赚取15万美金服务费以外也无事可做。布鲁克林的吉尔伯特法官先前曾命令伊利债券转换为股票，现在却宣布撤销自己的命令，声称自己被错误的事实蒙蔽才发布了先前的裁决，这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 * *

在接下来的星期天（安息日），古尔德和德鲁都去了纽约。纽约法律规定，在安息日，司法官员、令状、传票和传令都可以暂停休息。经过周密计划，德鲁和古尔德午夜12点一过，就乘坐租来的小船在纽约炮台公园登陆，24小时后的12点之前再返回。这样他们每周都可以同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安全度过一个夜晚和整个白天。从炮台公园出来，他们和两个带着武器的护卫（只是以防万一）各自回到与第十七街只相隔一个街区的家里。一个护卫跟着德鲁，既保护又监视他的行为，另一个跟着古尔德。

菲斯克则安安心心待在新泽西过着舒服的日子。从戴尔莫尼克餐厅运来的食物不断穿过海峡运到这里，雪茄、美酒，最重要的是“爱情”也被运了过来。后者主要是指音乐厅里的女演员，一位名叫海伦·约瑟芬·曼斯菲尔德（Helen Josephine Mansfield）的妓女。“卓西”（她的昵称）比菲斯克小12岁，出生在波士顿，但在16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圣弗朗西斯科。17岁时，她嫁给演员弗兰克·劳勒（Frank Lawlor），但是在他们到纽约不久后就离婚了。在曼哈顿时，卓西住在一个叫安妮伍德（Annie Wood）的小姐开设的第34街妓院，根据1866年的《纽约目录》（*New York Directory*）记载，她在名义上从事的职业是演员。菲斯克是在1867年臭名昭著的“安妮伍德妓院”建立的时候认识卓西的。不久之后，他就为她在美国俱乐部饭店开了一套房

间，并开始资助她的演艺事业。

正如富勒讲述的那样，在泰勒堡，菲斯克将卓西安排在一个“连接他的浴房的舒适房间里”。富勒还回忆了古尔德首次出现在曼斯菲尔德小姐居所时的情形：“他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她，摸着自己的胡须，但是没有做任何评论……记者们后来逐渐听说了卓西，但都没做任何报道。”然而，德鲁这个除了做生意，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对此深感愤怒。整日泡在酒精里已经让德鲁强烈反对，现在丹尼尔大叔还要面对菲斯克被厚厚面纱掩盖着的私通事实。“德鲁唯一见过的‘妓女’就是伊利铁路，”富勒写道，“他不介意去看她，但是不能忍受自己和曼斯菲尔德小姐呼吸同样的空气。德鲁神学院的理论基础里没有对妓女的耐心和仁慈。他不仅这样要求曼斯菲尔德的同伴，也憎恨这种东西。”

当然，伊利同党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在新泽西继续待下去几乎不可能。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或者与范德比尔特握手言和，或者接受纽约法庭最近对伊利的裁决。范德比尔特依然忙着贿赂伯纳德法官，似乎没有和解的意思。因此，古尔德决定将注意力放在获得阿尔巴尼法律支持上。不久以后，愤世嫉俗的评论家开始为古尔德的伊利议案欢呼，这个议案由乌尔斯特区的代表提出，是对纽约最腐败机构之一的恩惠。《纽约先驱报》曾这样描述伊利议案：

“它是上帝赐给饥渴的法官和议员们的天赐良物，他们在那时太穷了，以至于他们的女人和佣人都要造反了。伊利议案声称将对议会大楼发起攻击，议会大楼里里外外的政客对此非常着迷，那些有经验的说客本来已经对阿尔巴尼彻底绝望了，现在也重新打上领结，试图在其中分一杯羹。有传言说范德比尔特决定打败这个议案，他已经动用了令人吃惊的数目来实现这个目的。”

3月20日，古尔德和汉密尔顿·哈里斯在伊利的董事约翰·E·戴文利的帮助下，忙着游说（或者说贿赂）纽约立法机关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部分“黑骑兵”。但是当范德比尔特在阿尔巴尼的代理人约翰·B·达彻（John

B. Dutcher，他是哈勒姆区的主管，范德比尔特的另一个女婿贺瑞斯·F·克拉克协助他工作）出价比戴文利和哈里斯高时，有不利报道说立法机关在3月27日将交由下议院铁路委员会决定议案是否通过。在此之后，下议院进行投票，结果83票反对，32票同意，但此时有消息传来说议案可能会被重新考虑。亨利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这其中的含义是丰富的；逃亡的伊利董事们必须通过更慷慨的贿赂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纽约州参议院的附属委员会最近被列入调查逃亡的伊利董事操纵公司财务问题的小组名单，他们中将有二个或三个反对古尔德。参议院调查团中有二个接受了古尔德的贿赂，还有二个接受了范德比尔特的贿赂。另外一个A·C·马通接受了双方的贿赂，但是最后选择支持范德比尔特。

由于哈里斯和戴文利没有从下议院获得预想的结果，所以古尔德决定亲自去一趟阿尔巴尼，如果必要，这次旅行还不一定安排在星期天。通过传信人，古尔德和伯纳德取得了联系，并同意在4月4日出席伯纳德的法庭，但是他要求在此之前自己不能被逮捕或挑衅。由于安全得到了保证，古尔德于3月30日带着满满一箱钞票和伊利公司的备用支票启程离开新泽西。到达阿尔巴尼后，古尔德已经准备好以每张投票大大高于先前戴文利提供的1000美元的价格对抗范德比尔特的代理人。他们双方都在阿尔巴尼的戴拉万豪斯酒店（Delavan House Hotel）开了豪华套间，所以议员们可以方便地从一个鸡尾酒会溜达到另一个，看看自己的投票累计能卖多少钱。在这一轮的竞赛中，范德比尔特的代理人正是坦幕尼协会的领袖特维德老板，当时他作为州议员从中斡旋。特维德在他7个房间的套房里设了不止6个吧台，古尔德也大致相同。在参观了古尔德的房间之后，《纽约先驱报》记者这样挖苦道：“堆满了成千上万的美钞，被用来从事与立法活动相关的某些秘密行动。”这两个队伍在投票价格上互相竞争，创造了一个民主市场的大牛市。

杰伊在4月4日中断了竞价返回曼哈顿。在那里，他遵守诺言如约来到伯纳德面前。伯纳德将会面推迟到4月8日，但还坚持让古尔德待在那儿接受法庭官员的羁押。在法庭大楼外，古尔德清楚地告诉无知的看守，他一定要回阿尔巴尼。看守表示反对，古尔德回答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这样他便继续保持在监管之下。4月8日，古尔德宣称自己生病了，派了一个律

师向伯纳德解释。正像亚当斯兄弟说的那样，古尔德“非常健康地顶着早春的暴风雪赶赴议会大厦，但一想到返回纽约便生起病来”。

当企图使铁路维修的债券发行合法化的伊利议案在4月15日被拿到参议院而不是众议院重新审议时，冥冥中似乎老天在帮助古尔德，伊利铁路的车厢翻出了破旧的铁轨，最后被抛在纽约的杰维斯港，伤亡26人。三天后，由成千上万的钞票堆出来的伊利议案在参议院以17对12票通过。这次马通投了赞成票。“一个更彻底、更羞愧的可鄙和腐败之人，”亚当斯兄弟说道，“和一个更完美的讨价还价的立法者的典型是不能和睦相处的。”

同时，各大报纸早已使用反垄断的社论标题站在逃亡者一边。受人高度尊敬的《商业和金融编年史》（*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清楚地记述说：“关系到我们伟大商业利益的问题在于——我们主要的商业道路应该被巨大的垄断霸主控制，还是应该通过所有运输公司的竞争扩大和促进？”《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却唱相同的论调。这个从来没有出现在古尔德未来的合作队伍中的人说：“任何一个试图控制伊利、纽约中央铁路、哈得孙河和哈莱姆区的人都是明显违背公众利益的，”贝内特写道，“垄断者可以对运费和票价施加影响，除非法律对他做出限制，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由于舆论和公众都支持伊利的逃亡董事，有人考虑范德比尔特可能会在参议院投票之后的4天时间里突然进行战略性撤退，停止所有的游说和贿赂。一天后，即4月20日星期一，阿尔巴尼的气氛完全改变了。“上午10点钟，”《纽约先驱报》记者写道，“人们纷纷冲进戴拉万豪斯饭店的57号房间，在那里大款古尔德正在给大家发钱。据说投票的价格迅速下跌。那些以前要价5000美元的人现在只要100块钱。但是，伊利公司的大保险箱已经上锁，因为再也不需要它们了。”下午晚些时候，众议院的一些人谴责范德比尔特，因为他的明显退出使自己损失了几千美金——以悬殊比例101:5迅速通过了伊利议案。

观察家们想知道，为什么古尔德以如此低廉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却丝毫看不出高兴。我们并没有很确切的资料证明，古尔德和菲斯克是什么时候知道德鲁和埃尔德里奇的波士顿团伙开始同范德比尔特进行秘密会谈的。当时德鲁已厌倦新泽西，也讨厌古尔德排挤自己，而埃尔德里奇关心的就是波士顿 -

哈特福德—伊利铁路能否马上带来收益。埃尔德里奇、德鲁和范德比尔特于星期天下午在曼哈顿俱乐部进行会谈，消息传到古尔德那里最晚是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上。

埃尔德里奇、德鲁和范德比尔特将他们的股份合在一起，并在三个方面达成一致。第一，范德比尔特最近购进的股票将按他购买时的价格从他手中全部购回。第二，范德比尔特的侄子弗兰克·沃克以及其他在德鲁股票操纵中受损的人将全部得到补偿。第三，德鲁撤出未来伊利公司的管理。最后一个条件对这个老人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实际已经被古尔德和菲斯克踢出管理层。

在最后的决战中，争斗双方的关键人物都不示弱。事实上，纽约法庭一直在与古尔德和菲斯克争论有关他们自由的问题。这种处境让他们两个在众议院通过伊利议案后的一个半星期，即5月的某个清晨突然拜访了范德比尔特在华盛顿街10号的豪宅。菲斯克回忆说，1869年纽约参议院调查伊利公司之前，他们没有预约便直接来到范德比尔特的家中，“古尔德想等到海军准将起床后再进去，而我却按响了门铃。门一开，我就冲了进去。那个海军准将坐在床边，一只脚穿着鞋子，另一只脚还没穿。”尴尬的古尔德则在楼下客厅里谨慎地踱着步。当在范德比尔特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菲斯克要求范德比尔特取消伯纳德的命令时，范德比尔特则要求菲斯克和古尔德加入德鲁和埃尔德里奇，为自己购买的巨额股票找一个“体面的出路”。菲斯克回忆道：“范德比尔特说我必须站在我目前的位置上，他将让他的猎犬……跟着我们。如果他没有跟住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股票从他手中拿走，他将会受到谴责。我告诉他我有自己的方式，如果我拿走他的股票我也会受到谴责。这是他自己自作自受。他说除非我们与他清算，否则这个案子将永远不会撤销。”在这种威胁下，菲斯克同意了范德比尔特的大部分条件：“在与他进行清算后，我认为这是一场巧取豪夺，我们将自己出卖给了恶魔，古尔德也是这样认为的。”

古尔德和菲斯克在这次冒险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虽然是一个心知肚明的协议，但是德鲁、埃尔德里奇和范德比尔特都在这次争斗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眼睁睁看着古尔德他们一无所获。6月初，埃尔德里奇没有如约与

古尔德和菲斯克会面，这两个人便直接去了附近爱德华·皮尔庞特（Edward Pierrepont）法官的家中，爱德华刚刚被格兰特总统任命为美国司法部长。根据街头巷尾的传言，这里召开了一个伊利公司的秘密董事会。他们在皮尔庞特的后厅里讨价还价，菲斯克和古尔德发现德鲁、埃尔德里奇、沃克和其他伊利的董事们一致同意与范德比尔特协议的所有细节，这个协议没有给这新来的两人留下半点好处。

通过快速而洪亮的陈述，以及明目张胆地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菲斯克和古尔德竭尽全力改善了他们目前的处境。这些努力不会起到太大作用，但至少可以改善一些。最后的协议允许以每股 70 ~ 80 美元之间的价格购回范德比尔特 5 万股伊利股票，价款将以 250 万美元的现金和面值 125 万美元的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债券支付。此外，范德比尔特还将出售另外在 4 个月内回收的 5 万股股票，总价 100 万美元，以及伊利董事会的两个席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为保持股价稳定，这 10 万股股票将被慢慢输入市场。已经离开财务总监位置的德鲁辞去伊利董事的职位，还要支付 54 万美元用以赔偿对他的谴责。埃尔德里奇的波士顿集团同样辞去了董事职位，将 500 万美元的波士顿 - 哈特福德 - 伊利铁路债券换成伊利的承兑汇票。弗兰克和斯盖尔获得了 464 250 美元，以赔偿他们在德鲁的股票操纵中遭受的损失。

经过这一系列财务安排，伊利公司只剩下一个空壳。它深陷于新增的 900 万美元的债务泥潭，此外还有 2 100 万美元的股票、极少的有形资产和一个坏名声。一位记者称这些是“傻瓜奖品”，而现在它被留给了两个明显不怎么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将表演这最后的一幕。会议结束后，古尔德成为伊利公司的财务总监并代替埃尔德里奇成为公司董事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任命菲斯克为审计官，负责组建包括古尔德、菲斯克和伊利的首席顾问弗瑞德瑞克·莱恩（Frederick Lane）在内的执行委员会。

此时没有人嫉妒古尔德，因为伊利公司几乎不值什么钱。除此以外，这个 32 岁的年轻人是否能控制这条铁路也是个未知数。古尔德自己并不能掌握足够保住自己位置的股份。当 10 月新一届董事会选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出局了。即使他还能待在这儿，他又将领导谁呢？“伊利公司没剩下什么东西了。”德鲁告诉范德比尔特。

第十七章

恶棍



杰伊·古尔德在伊利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就是曾经当过海员的、34岁的意大利移民吉欧万尼·菩提奈克斯·莫若西尼（Giovanni Pertinax Morosini）。虽然他说自己来自威尼斯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但在1850年来到美国之后，相貌堂堂、天资聪明的莫若西尼却当了整整5年的快速帆船甲板水手。后来，由于命运的巧合，185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莫若西尼碰巧遇到一伙纽约南部街区的码头流氓在殴打一个年轻人。莫若西尼救了这个年轻人，而这个人正是伊利公司一位官员的儿子。作为报答，他被留在伊利公司审计部当职员。在接下来的13年里，聪明伶俐的莫若西尼升至审计员助理，还结婚组建了家庭，在布朗克斯的瑞沃戴尔（Riverdale）建立了一小份家产（埃尔姆赫斯特）。他有收集中世纪盔甲、长矛和金币的爱好。这就是古尔德入主伊利公司时莫若西尼的情况。自力更生的古尔德对其他自力更生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信任，他迅速撤销了莫若西尼上司的职务（老德鲁的亲信），任命莫若西尼担任执行审计官，并在几个月后正式任命。同时，莫若西尼也成为古尔德亲密的秘书、保镖，有时也是经纪人，他一直与古尔德的家人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直到古尔德去世，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很多利益。（莫若西尼死于1908年，身故后仍然与古尔德靠得很近，他被葬在伍德公墓一座和杰伊一样精致的坟墓里。）

莫若西尼需要审计的财务事项非常复杂。菲斯克回忆说，他和杰伊在来到伊利高层后发现的是“布满灰尘的金库”。为了壮大金库，古尔德和他的队伍在整个夏天开足马力印制了2 00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这些债券马上就变成公司股票。“在这2 000万美元债券的发行中，”《商业和金融编年史》写道，“公司除了拥有500万美元的其他公司债券（指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铁路）以外一无所有，它的利息由伊利公司担保偿付，一条刚刚铺好的新路线，微小的改进已经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日常维修就要花掉公司所有

盈利。”最后，虽然古尔德成功地填满了公司的金库，但却花光了股东的钱，伊利股票的价值由于新股发行还不足原来价值的1/3。（伊利股票6月新股发行前大约为每股70美元，到8月末，由于市场上股票发行太多，每股股价仅在44美元徘徊。此时，古尔德和菲斯克自己则卖空股票，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同时，古尔德还精心应对10月伊利董事会的改选。在9月，古尔德使用伊利公司的资金购买投票代理权，还利用手中的职权在8月19日关闭了伊利股票的转让登记，这比一年一度的董事会选举之前的正常关闭提前了一个多月。这当然不是巧合，正是在8月19日，一笔新股份（足够古尔德控制选举）转到了和古尔德关系较好的经纪商那里。因此，在10月13日，伊利董事会选出的董事全在古尔德的选择之内。这些成员包括古尔德姐夫丹尼尔·S·小米勒（Daniel S. Miller Jr.）、特维德老板以及在伯纳德指定的无所事事的坦幕尼派管家彼得·斯韦尼。通过招募范德比尔特的老盟友特维德并给他一定股份，古尔德把特维德所有的幕僚都拉到了董事会，其中包括一度让他头疼，但现在很驯服的伯纳德。“伯纳德的咆哮逐级降低，”亚当斯兄弟评论说，“后来像舔食的鸽子一样温柔，最后则一声不吭。”（此后不久，古尔德和菲斯克就给由著名艺术家杰斯珀·克洛普赛设计的伊利公司的精美新机车命名为乔治·C·伯纳德。）

这个新董事会听话地任命古尔德、菲斯克和莱恩为执行委员会成员，古尔德任董事长，菲斯克任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和莱恩担任顾问。新董事会还通过了一项重要变动，即古尔德建议修改伊利公司的章程。经过修改，伊利的股东在每年的董事会选举中被要求必须使用个人身份参加。这个新规通过减小使用代理权的可能性，有效地剥夺了那些在国外最大的伊利股东的投票权。更进一步说，古尔德甚至不必获取如此多的股份来保证董事会选举的顺利进行。在10月13日会议结束后，古尔德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他在第17街区的家里，菲斯克则兴高采烈地去找他的情妇。“我亲爱的卓西，”第二天早上他用便签给她写信说，“特维德和莱恩将在6点半和我们共进晚餐。所有的事情都完美地解决了。我们都安全了。我6点钟来接你。”

古尔德现在确实感到安全——就像他一直习惯的那样——达到了一个比

他现在更高的地方。他和菲斯克以及他们的老导师德鲁取得联系，并给他提了个建议。这只“大熊”会不会参与到这最后一场令人吃惊、史无前例的捕熊活动中呢？“如果他带着《圣经》和《圣书》从公司退休，来到普特南幽静的山谷里一个与世隔绝的角落，德鲁或许在享受生活，用宗教来安慰他所剩无几的财富，”亨利·克鲁斯在德鲁失败的几年后这样评论，“但是他受到某些潜在的神秘力量的吸引，成为魔咒的牺牲品。”熊市狙击和卖空已经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它有一种魔力和刺激使他不能抗拒。因此，大胆的古尔德提出的建议太惊险了。德鲁发现这个计划将会给他带来最后的巨大胜利，这将是他的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奥林匹克般的结尾。

古尔德将要表演的这场戏剧不仅将影响华尔街和伦敦的朗博德金融街（Lombard Street），而且还会影响到两大洲的货币市场。简单地概括说就是，他计划在秋季紧缩美国的货币市场供应，引起利率上涨，从而使股票价格——包括伊利股票的价格——下跌。古尔德利用1 000万美元的伊利公司现金储备，准备锁定货币供应。在任何时候，秋季总是华尔街现金紧缺的时候，因为农民卖出农产品之后会提取大量现金。以1 000万美元作基础，古尔德大量签发支票，迫使银行增加准备金。为了进一步紧缩货币供应，杰伊将签出的支票拿到其他银行，用它们作抵押从银行换取现金，然后将换取的现金锁在金库里。同时，德鲁这个从前的木偶大师仅被要求拿出400万美元放入由古尔德运作的资金池，用来在熊市时卖空股票，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债券的利息率。

古尔德并不为保守这个秘密而烦恼。“这是一个为了达到他的投机目的而对货币市场进行的恶作剧。”《商业和金融编年史》记者在11月写道：

“他们俩一个拥有巨额私人资本，一个通过主要的铁路公司控制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他们联合起来提走了银行的现金，然后锁起来，估计这笔资金不低于1 000万美元，可能多达1 500万美元。除了提走现金，他们还将进行一个不计后果、没有道德的铁路计划，目前这个计划尚未浮出水面，但是我们担心它将给股票持有者和公众对公司管理的信息带来难以预计的恶劣影响。”

股市下跌，伊利股票跌至 38.5 美元。

至于德鲁，他不久后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使唤的人。他从前如此频繁而放肆地抢夺自己运作的资金池里其他同伴的钱，现在一想到自己那放在古尔德资金池里的 400 万美元，他就轻松不起来，何况古尔德已经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当德鲁在 11 月初突然要求撤出资金时，古尔德和菲斯克发现自己被利用了，而当德鲁发现归还回来的资金只有 300 万美元时，他发现自己也被利用了。古尔德告诉他，这就叫做市场的时机，在错误的时间抽走资金的成本。为了补偿自己的损失，德鲁在 11 月 12 日开始卖空伊利股票（以 38 美元的价格卖空 7 万股）以便在股市下跌中赚钱。他确信古尔德和菲斯克此时还没有完全收紧货币市场，在他们最后释放货币之前，伊利的股价（和华尔街其他股票一样）还将进一步下跌。

古尔德和菲斯克对德鲁的口是心非十分愤怒，他们迅速采取了行动。为了报复，他们决定将自己的时间表提前一点，给这个票注股票的牧师来个大水漫灌。在德鲁卖空股票当天，伊利的股价跌至每股 35 美元，形势看起来非常好。也就是在那天，古尔德开始释放自己的卖空头寸，到了第二天早上，即 11 月 14 日（星期六），古尔德和菲斯克放出了自己的现金储备。在正规市场交易时间缩短的周末交易中，伊利股票的交易量占到当日交易量 8 万股的一半，价格也稳步升至 52.5 美元。

面对失败，德鲁开始思考对策。星期六下午，德鲁拜访了他曾经的合伙人奥格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这个受人尊敬的普鲁士移民比古尔德大 20 岁，很多年以来被称为“第五大道之王”。贝尔蒙特拥有 4 000 股伊利股份，更重要的是，他还代表英国、法国、德国（包括罗斯恰尔兹家族）的客户卖空股票。贝尔蒙特最近被古尔德的利剑搞得腹背受敌。在开始的几个星期，古尔德做空市场，贝尔蒙特手里的股票大幅度贬值了，几乎跌掉了一半。现在，古尔德又释放资金，促使伊利股价上扬，贝尔蒙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代理的欧洲投资者濒临破产。此外更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欧洲客户希望用来支付合约的股票凭证还在开往纽约的慢吞吞的船上。“俄罗斯”号汽船没有按期到达曼哈顿，直到 11 月 23 日这批股票凭证才运到。（古尔德特意向欧洲发行了大量股票凭证——包括一些特意准备的一张 10 股的股票凭

证——以便在自己释放货币时，让那些“大熊”们无法得到这些股票，从而抬升股价攫取利润。)

在德鲁的督促下，贝尔蒙特决定起诉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违法行为，并要求法庭指定一个接管人控制伊利公司。德鲁保证自己将提供支持，甚至写了一份宣誓书详细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伊利公司最近的运作——也不会太多。但真实情况是，德鲁这个两面派在这个时候发誓效忠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他说自己还要再回忆一下，或许还要重写，于是将这份宣誓书从贝尔蒙特家里带走。第二天（星期天），他径直去了西部杜南大街的伊利办公室，向古尔德和菲斯克挑衅。

根据菲斯克的记叙，德鲁哭着喊着要求保护利率为3%的股票贷款，用以支付他的卖空头寸，乞求这两个年轻人发行新的可转换债券并立刻转换成股票。菲斯克冷冷地告诉德鲁，“他将是最后一个抱怨拥有任何伊利股票头寸的人”，随后德鲁“进入辩护程序，说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将被带入法庭；他已经站在敌人的阵营里”。菲斯克回忆道，德鲁接着威胁他们说：“你们知道，在我们其他所有争斗中，我都反对提供书面陈述，但是这次如果你们不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我，我发誓我也会毫不留情地伤害你们。”最后，古尔德和菲斯克没有像范德比尔特和贝尔蒙特那样对老德鲁让步，仍然不为所动。“我是一个会毁灭一切的人，”这只“大熊”在离开时嘟囔着，好像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给古尔德和菲斯克的重要警告。

星期一，贝尔蒙特的律师（先前在伊利的案子中为范德比尔特作代理）带着德鲁的宣誓书和其他证据来到纽约高等法院的萨瑟兰（Sutherland）法官面前，要求指定一位接管人管理伊利公司。但在萨瑟兰刚要采取行动时，他们却发现另一桩起诉伊利的案子已经指定了一位接管人：杰伊·古尔德。

那天一早，古尔德、菲斯克、莱恩和莫若西尼带着伊利公司哈得孙河运输主管查尔斯·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来到伯纳德家里，他也是该公司的一个小股东。《纽约时报》一位愤怒的记者这样评论道：

“这几个阴谋家决定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的措施迅速而有特点。

查尔斯·麦金托什，这个伊利公司的运输雇员为他那少得可怜的股份向

伯纳德法官提起诉讼。他称赞公司的‘管理’，声称公众对于发行和未发行股票的调查不合理地干扰了公司的运行，他告诉我们最好是让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真正的补救措施——他祈祷这种方式——是指定一位接管人，而他的伙伴仍然享有权利。他们将这起诉讼带到伯纳德面前，不管贝尔蒙特及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起诉，不管其他法官怎样参与官司，只要这个运输主管、杰伊·古尔德、吉姆·菲斯克和法官伯纳德，根据公司顾问莱恩的建议全力以赴投入这个特别的案子，他们就会平安无事。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比麦金托什诉讼里提出的计划更大胆和厚颜无耻的话，那就要算伯纳德法官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个事实。

德鲁的合约很快就要到期，而伊利股票的价格稳步攀升。星期三，它的收盘价达到每股 58 美元。星期四早上一开盘就达到 62 美元，后来又下跌了一点点。这样，德鲁为了平仓合约每股的损失将超过 20 美元，而他一共需要 7 万股。“俄罗斯”号仍然在海上航行着。此时发生的事情无疑将使德鲁更加走投无路。新任命的接管人杰伊·古尔德突然怀疑起前一年夏天，公司董事长发行股票的合法性，于是在星期三下午，伯纳德法官授权古尔德以不超过面值的价格购进 20 万股新股。伯纳德还授权古尔德可以使用公司的资金购买这部分法庭指定的伊利股票。虽然纽约州法律禁止铁路公司的管理人员使用公司的资金买卖公司股票，但是法律对于接管人是否可以这样做并无明确规定。

在这次行动中，古尔德的一个失误是低估了华尔街众多模糊而不可预知的小投资者的作用。虽然欧洲有许多大宗股票存在——或者在拖拖拉拉的“俄罗斯”号上——但是纽约甚至全美还有许多小额股票持有者。在现成的伊利股票慢慢增加的情况下，古尔德和菲斯克每次通过各种手段打压股票时（这都会被媒体大肆报道），他们都无意识地创造了大量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投资者，这些人在 30 多美元的低点买入。现在，趁着古尔德和德鲁进行股票大战，这些面包师、卡车司机和牧师纷纷走出来抛售股票。到星期四，德鲁已经搜集了足够的股票支付合约，他以平均每股 57 美元的价格买入，总计亏损 130 万美元。古尔德和菲斯克则在同样的价位上买进了所有能买到的股票，尽其所能挤压德鲁让他支付的价格越高越好。星期五，德鲁和古尔德都停止

了买进，伊利股票迅速跌至每股 42 美元。

在这一事件结束后，古尔德和菲斯克立刻成了负面名人，被当作天才恶棍。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战胜了德鲁，虽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同时，古尔德和菲斯克也从成千上万个华尔街的小演员——那些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发横财的面包师和店主——喜欢的情节中走了出来，为人们所熟知。那时候，报纸的编辑在谈到古尔德时兴趣多于诋毁，玩味多于愤怒。似乎德鲁作为受害者让人们感到这不是件坏事，尤其是还有那么多小投资者大发横财。到 1868 年 11 月中旬，古尔德这个名字不仅为金融圈所熟知，还为大众传媒的读者所了解，但那时它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负面含义。

在评论古尔德这场伊利股票大战时，《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羡慕掺杂着些许恼怒地说：

“上个月的投机行动，其规模之大在华尔街史无前例，但在其他方面能不能达到第一还值得怀疑。几百万的资金就像几千美元那样拿来随意使用，所使用巨额的资本让外部公众瞠目结舌地看着操纵者大胆而勇敢的表演。”

贝内特还补充说，伊利高层的操作显示了一个金融指挥家的存在，“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值得怀疑，但策划者的技巧和成功显示了拿破仑般的才能”。《商业和金融编年史》的一个作者认为，如果说这次交易存在问题的话，那问题也不在于参与交易的人，因为他所进行的交易都是法律所允许的：“法律在公司权益管理方面的监管是苍白的。”古尔德和菲斯克一点都没做违法的事情。聪明的人利用法律空白获得短期利润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 ✱ ✱

“胜利者已经获得了战利品，”德鲁写道，“但是他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胜利的时刻也濒临灭亡。他们在垄断价位上购进股票并被迫持有，因为没有人想要他们。”事实上，华尔街对伊利公司还是非常警惕。两个星期前，即 10 月末，一帮华尔街的经纪商来到古尔德的办公室抱怨伊利股票的低

迷。基于流通中的伊利股票大致数目的猜测以及新股发行似乎没有限制的状况，他们将再也不会扩大基于股票的信用或者允许这种股票进行保证金交易。古尔德回答说，公司流通的股票大约有 3 950 万美元，为了保持流动性并确保伊利公司远离范德比尔特的控制，他将发行更多的债券，进行更多的股票转换以筹集资本。

亚当斯写道：

“无法形容的厚颜无耻。他的厚颜无耻强加给听众和部分媒体，让人们相信公众应该希望他成功，他描述了怎样在合适的时机发行股票、达到预期的数量，这都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最奇怪的事情是，听众似乎从没想到提出这种可笑的诡辩论的人是股东的托管人和守护神，而不是公开的捐助者。他们也没有想到，伊利铁路的所有者可能不希望为了保护竞争而剥夺自己的财产。”

第十八章
美国最聪明的人



这几乎成了纽约的传统，贝尔蒙特的法官萨瑟兰和古尔德法官伯纳德准备为两人在11月底相互矛盾的判决决一死战。24日，也就是“俄罗斯”号最终抵达纽约港的同一天，萨瑟兰还支持伯纳德关于任命古尔德为接管人的命令，并发布了一个陈述原因的命令，解释了为什么伯纳德的法令不应该被取消。可一天后，他却宣布取消伯纳德的命令，任命已退休的法官亨利·E·戴维斯（Henry E. Davies）为接管人。在萨瑟兰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的几个小时后，戴维斯和另一个以前的法官诺亚·戴维斯（Noah Davis）以及伊利公司已经退休的顾问D·B·伊顿（D. B. Eaton）来到伊利公司的办公室。前台一个不知情的职员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当戴维斯进来时，正在后面办公室和律师谈话的古尔德和菲斯克大吃一惊。后来菲斯克借机走出房间，不久之后就带着一个叫汤米·林奇的人和10个“面貌丑陋”的爱尔兰人走了进来。菲斯克告诉戴维斯，只要古尔德或自己给他们一点点暗示，这些人就将非常高兴地护送新接管人离开这座大楼。（不久之后，这群“伊利流氓”——在林奇的带领下，伊利铁路在新泽西终端附近的牡蛎养殖厂的人——就变成了伊利办公室的常客。）

具有绅士风度的戴维斯立刻对菲斯克的语调和表演提出抗议，古尔德则马上为自己朋友的行为道歉，但是同时他拿出一份纽约高等法院法官艾伯特·卡多佐（Albert Cardozo）关于取消萨瑟兰命令的文件。卡多佐是纽约最有名的西班牙裔犹太人的后代，未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父亲。与萨瑟兰和伯纳德一样，卡多佐也是曼哈顿区5个纽约高等法院法官中的一个。戴维斯注意到，卡多佐的命令发布于11月24日，比要取消的萨瑟兰的命令时间还早。戴维斯提出抗议，伊利公司的顾问莱恩同时摆出自己的观点，仗着林奇和他的兄弟们在场，劝说戴维斯将控制伊利公司的时间推迟到周末：即27日星期五。当戴维斯星期五再来的时候，他发现像亚当斯描述

的那样，伊利的高官们“被铜墙铁壁般保护起来，自己则像一个被关在屋外的流浪汉”。

与此同时，古尔德和菲斯克则全神贯注地开始钓另一条比贝尔蒙特更大的鱼。此时他们已经与德鲁将账目算清，开始讨论在下一个冬天发动一场伊利大战。12月初，经古尔德同意，菲斯克通过去范德比尔特家中拜访吸引了一帮反对范德比尔特媒体的眼球。托马斯·舍曼（Thomas Shearman）是一位拥有无可指摘的良好声誉的律师，同时在比彻布鲁克林教堂的星期天学校任教。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里，菲斯克在托马斯的陪同下不辞辛苦地从伊利大楼来到范德比尔特在华盛顿大街10号的别墅，菲斯克的旅行袋里装有5万股伊利股票。一进范德布尔特的家门，菲斯克就把旅行袋摊在他面前。菲斯克回忆说：“他告诉这个海军准将，我带来5万股伊利股票，我希望拿回为了购买这些股票所支付的现金和债券。”换句话说，菲斯克希望以每股70美元的价格卖给范德比尔特，而市场上的价格为每股40美元。可想而知，当时范德比尔特不想再以任何价位拥有伊利的股票。当然，在范德比尔特给出意料之中的答复时菲斯克一点也不吃惊。菲斯克后来将范德比尔特的回答提供给了记者。第二天，12月6日一早，报纸就登出了这条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范德比尔特和伊利公司进行的股票购回交易，并为他卷入官司提供的100万美元的补偿。

正如古尔德和菲斯克料想的那样，范德比尔特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并采取了不理智的做法。在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有勇无谋、表达错误的信中，范德比尔特平白无故地否定了在该年春天签订的、关于结束第一次伊利大战的协议条款。他写道：“我没有与伊利公司进行任何交易，也没有向公司出售过股票以及接受公司的补偿奖励。至于斯盖尔先生和其他人提出的诉讼，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关心他们如何解决问题。”几天后，菲斯克高兴地寄给《纽约时报》一封信，还有一份由范德比尔特签名的支票传真：

“这份文件显示一个叫‘范德比尔特准将’的人从伊利公司取走了100万美元，公司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范德比尔特先生除了那个被终止

的、他声称自己没有操纵的案件以外，还和公司有什么联系。范德比尔特先生似乎需要更多的解释，以消除自己若干次欺骗伊利公司股东的坏名声。”

12月10日，在范德比尔特第二次拒绝古尔德和菲斯克的好意邀请后，伊利铁路起诉范德比尔特违约，主要目的是使范德比尔特尴尬而不是敲诈金钱。起诉后来被撤销。范德比尔特对古尔德非常恼怒，但也从此记住了这件事，当时他告诉一个记者说，那个小伙子“是美国最聪明的人”。

✱ ✱ ✱

就在1868年12月之前，吉姆·菲斯克买入了纳拉干塞特汽船公司（Narragansett Steamship Company）的大部分股份，这家小汽船公司有“普洛维登斯”和“布里斯托尔”两条汽船，往返于曼哈顿和马萨诸塞霍普山谷（Mount Hope Bay）间的福尔河。通过这家公司，他获得了一套海军上将制服，并自豪地穿着这套衣服留了影。不久之后，菲斯克买下了位于24街区第五大道的布鲁曼剧院（Broughman's Theater），将它改名为第五大道剧院，用来上演说唱演员克里斯蒂的节目和其他各种戏剧和滑稽表演。菲斯克还暂时租借了14街区的音乐学院，在那里他圆了自己表演盛大舞台剧的梦想。12月份，他与古尔德讨论合伙购买派克歌剧院事宜。派克歌剧院位于23街区八大道的西北角，是同年由萨缪尔·N·派克斥资100万兴建的。由于这个剧院的位置过于偏西，大部分曼哈顿市民不习惯来到这儿看戏，所以没有什么盈利，派克以82万美元的价格把剧院卖给了菲斯克和古尔德。

这两个搭档买下了这座大楼，并将它改名为“大剧院”（Grand Opera House），投资五五分成。这座建筑的楼上有许多办公间，古尔德和菲斯克不久之后对它们重新进行了豪华装修，将其装修成一个符合菲斯克口味的巴洛克式宫殿。大楼历时8个月，耗资25万美元得以竣工后，古尔德和菲斯克将这个装修一新的地方租给了伊利铁路公司，年租金7.5万美元。《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在参观了这个被媒体称做“伊利城堡”的地方后写道：“这里一眼望去如此豪华，没什么地方适合做伊利公司的办公室。”这位记者称赞了

雕刻精美的木器、切割和染色精细的玻璃隔断，镶金的栏杆、精美的瓦斯灯具以及天花板和墙上“具有极高艺术品位的壁画”。

虽然古尔德自己的办公室非常简单，但是菲斯克将自己的办公桌放在一个高台上，边上围了一圈矮椅子。伊利的大楼还有一个相对独立但也非常豪华的食堂，行政官员和职员可以在里面用餐，这个食堂有单独的厨房和一个法国大厨。《纽约先驱报》记者特别注意了伊利公司斥资3万美元安装的巨大保险箱。他写道：“那个保险箱有7层楼那么高，每层都各不相连，完全独立，它建在一块结实的花岗岩上，一直向上升至大剧院的主房顶。这个保险箱制造得如此坚实，即使大剧院被烧成灰，它也会安然无恙。它虽背靠着剧院，但是绝没有和墙壁相连。”另一位作家米德·米涅罗德将伊利的新总部描述为“最美妙的公司办公室——那是一个杰作，镶有黄金大理石和黑胡桃木，银制的名贵餐具、深红色的帷帐、雕有壁画的天花板、装饰有宁芙女神和丘比特的盥洗池”。伊利城堡的地下是印刷新股和债券的印刷厂。大剧院的对角，也就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是著名的卡万纳夫饭店（Cavanagh's Restaurant），这是伊利公司最近的盟友和董事特维德老板经常出没的地方。

剧院本身还作为剧院使用，它有6个舞台包厢，27个前排包厢，总共可容纳2600人。可移动的座位可以轻松地将剧院变成舞厅。剧院的舞台是曼哈顿最大的舞台，70英尺长，80英尺宽。它的音响设备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这里，菲斯克开始上演闹剧、音乐剧、哑剧，让他心仪的女演员们表现自己的才华。这些演员中最有名的是他交往最多的情妇卓西·曼斯菲尔德。菲斯克安排她住在23街西359号别墅居住，那里穿过第九大道到达大剧院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菲斯克经常在那里过夜。菲斯克自己的公寓距离大剧院稍近一点点，位于23街西313号。菲斯克还在附近购置了很多房产，包括一个精美的马厩，那是“伊利王子”——记者们现在这样称呼他——用来饲养他的豪华四轮马车的马匹的地方。这些由四个衣着华丽的侍从喂养的马匹载着他出没于曼哈顿的大街小巷。

虽然生活奢华放纵、爱摆阔气，菲斯克从没有吝啬过自己的慈善之心。伊利城堡开业后不久，菲斯克就派了一帮疑惑的警察到附近街区，将乞讨食物、煤和租金的人们带到剧院里。菲斯克的私人秘书将分发施舍物当成工作

的一部分，这些资金都是菲斯克自己掏腰包而不是来自伊利公司的金库。菲斯克曾对附近一个有争议的黑人教堂进行过捐赠，给布拉托博罗的浸信会教堂寄去了 500 美元，帮助他们修建基地的围栏。“你对修建一个新围栏怎么看？”菲斯克在填写支票时问道。被问者答道：“那是一个进去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不想进去的地方。”在菲斯克无数次的小捐赠中，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他看起来好像与他的密友古尔德形成了鲜明对比。“杰伊·古尔德是詹姆斯·菲斯克的补充和陪衬。”威廉·福勒写道，“他又矮又小，留着厚厚的胡子，眼睛小而有神，他十分内向，还有一个清醒冷静的大脑。他擅长做计划，他体现了人的思想就像菲斯克体现了人的行动一样……他是一个工程师，手放在发动机的操作杆上，而菲斯克则是车轮的咆哮、烟囱的黑烟、车前灯的耀眼以及机车的尖声呼啸。”

古尔德容忍了伊利大厅里乞丐排起的长队，正如他也容忍了菲斯克在其他方面的古怪个性一样。“古尔德和伊利其他安静的灵魂，”莫里·克莱因写道，“……像被打扰的修道士一样走在大剧院昂贵的地毯上。他们卑躬屈膝，容忍了菲斯克不知羞耻的寻欢作乐、与卓西·曼斯菲尔德的亲密以及她用来招待特维德、伯纳德和其他政客的香槟和扑克牌酒会。”但是古尔德仍然很信任菲斯克，后者完成了他们的合作关系中大部分社交和公关任务。菲斯克代表了所有古尔德策划的公众形象。虽然古尔德需要那些迷恋香烟的人——像特维德和他的同伙那样的官员——但是他痛恨这些人周围的环境，所以他宁可让菲斯克处理这些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之事。同时，菲斯克在虚情假意地欢迎、取悦、吃喝玩乐和赢得媒体帮助方面比古尔德强得多。杰伊则带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每天晚上待在家中。

到 1869 年初，古尔德家中不仅有 5 岁的乔治、3 岁的爱德文，还有一个 1868 年 6 月出生、继承母亲名字的女儿。为了避免混淆，她的父母很早就叫她“奈莉”而不是海伦，这个名字仅限于古尔德家中使用。古尔德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仍然住在联合广场的岳父岳母家，古尔德在里屋有一间自己学习和读书的屋子。一直很喜欢书籍的杰伊现在开始收集图书，而且与其他收集者不同，他认真阅读了经典著作的古老版本。他的兴趣大部分转向自然科学，收集了类似托马斯·凯尔文（Thomas Kelway）翻译的奥格·费瑞（Oger Fer-

rier) 的《博学的天文学谈话》(*Learned Astronomical Discourse*) 这类书籍。他还收集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书，并花了大量时间同孩子们一起在米勒的后花园里种花。姐姐萨拉来到他家时，猜测古尔德种植花圃的奇思妙想，可能来自于他母亲曾经在罗克斯伯里农场里种植的那片花园。

✱ ✱ ✱

正当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垄断了进出曼哈顿的铁路客运时，古尔德和菲斯克开始全力以赴展开对纽约客运市场的竞争。1869 年夏季，就在伊利公司搬进新总部之时，铁路公司指派了两艘新的渡船“詹姆斯·菲斯克”号和“杰伊·古尔德”号每隔一小时穿过哈得孙河往返于西 23 街和靠近伊利铁路终端的新泽西码头之间。持有伊利客票的乘客可以免费乘坐这艘豪华游轮。他们在曼哈顿登陆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免费乘坐马车去西 23 街，经过大剧院达到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饭店。持有伊利铁路客票的乘客可以从市中心的饭店免费到达港口。乔治·古尔德可能还记得在 20 世纪 20 年代，父亲星期天带着他乘坐伊利渡轮的情形。每艘渡轮的大厅都有一幅命名者真人大小的画像，杰伊总是特地乘坐“詹姆斯·菲斯克”号，免得被人认出来。

此外，古尔德还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伊利铁路日益下降的地位，尽力加强它的竞争力。基于这个目的，在 1869 年夏末，杰伊开始收购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这条小铁路全长 143 英里，从阿尔巴尼的哈得孙河穿过卡茨基尔，到达纽约萨斯奎汉纳河的宾厄姆顿。和伊利铁路一样，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也是一条宽轨铁路，六英尺宽，在更窄的“标准尺寸”变成全美通用标准之前设计和建造。因此，这条铁路也要和伊利铁路一样，在宽轨之内另设一条铁轨，以满足交叉路段更窄的标准铁轨。另一方面，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则都是采用标准铁轨。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有 17 辆机车（伊利有 317 辆）、214 节车厢（伊利有 6 643 节车厢）。显然，这条铁路的装备不足以引起古尔德的兴趣，但真正吸引他的是该铁路与伊利铁路潜在的交接可能，一旦交接成功，便可以与纽约中央铁路直接争夺阿尔巴尼、布法罗和更西边的城市间的运输。同时，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在阿尔巴

尼的哈得孙河上的桥梁，在与伊利铁路连接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它担负着利润丰厚的宾夕法尼亚富煤产区到新英格兰缺煤地区之间的运输任务。

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由约瑟夫·H·拉姆齐（Joseph H. Ramsey）于1852年修建，这条距离虽短但盈利丰厚的铁路在1869年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他的控制。但是，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14名董事中有一半的人（由副董事长沃尔特·S·丘奇领导）反对拉姆齐的管理，拉姆齐本人最近也宣布在下一届董事会选举时可能离开。因此，丘奇和古尔德签订了一个协议，制定计划控制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为此，古尔德开始购买所有能买到的交易量甚少的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股票。在这个过程中，古尔德一度将该股票的价格从平均20多美元推至100多美元，但还是没能筹集足够的股票保证他和丘奇集团在董事会的控制地位。

通过调查，古尔德发现，造成公开市场上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股票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沿线的地方政府持有了大部分股票。根据纽约州法律，这类由地方政府持有的股票只有根据特别条款才能转让，即以现金按照不低于面值的价格购买。虽然古尔德最近成功地以面值购买了几百股股票，但是到7月末的时候仍然不够。古尔德将西部卡茨基尔很多村庄的官员（他们大约持有4500股）作为伊利公司的客人请到曼哈顿，菲斯克和古尔德在第五大道接待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上等的饭菜，邀请他们参观了伊利公司的新办公大楼，然后在8月1日向他们提出条件。如果这些托管人在接下来的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董事会选举中支持古尔德和丘奇，让伊利公司控制这条铁路，那么伊利公司将按照票面价值购买他们手中所有的股票，并为这些不同的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古尔德的要求显然没有法律强制作用，但这几个地方官员很愉快地同意了约定。只有来自奥那昂塔的代表坚持让伊利公司在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董事会改选前购买政府股票。这一意见迫使古尔德全力冲刺以便及时完成交易，因为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股票的转让登记在9月7日开会前的一个月，即8月7日就关闭了。

在拉姆齐这方面，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场反对他权威的阴谋。作为对古尔德和菲斯克深恶痛绝的范德比尔特的盟友和朋友，拉姆齐开始采取措施保

卫自己的地位。许多年前，法律授权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发行 4 万股股票。但是，由于需求量很小，再加上市场投机缺乏，有 12 000 万股事实上没有发行出去。现在，通过与几个合伙人合作，拉姆齐以每股 100 美元的价格发行了 9 500 股票，使用 15 万美元的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债券作抵押借入其中 10% 的资金，即 95 000 美元。接着，公司内部支持拉姆齐的财务总监尽量拖延奥那昂塔与伊利的 700 股股权转让。8 月 3 日，在接到奥维格 (Owego) 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命令后，这个财务总监非常愉快地拒绝了这次转让登记。但是 24 小时之后，托马斯·舍曼突然出现，迫使那个奥维格的法官撤销了自己的禁令。一天后，舍曼编造了一个伯纳德法官的命令督促奥那昂塔的股票转让登记。为了更好地采取行动，伯纳德还暂时中止了拉姆齐在董事会的权力。

沃尔特·丘奇计划在 6 日早上拉姆齐缺席的时候召开会议，强制通过决议解雇现任财务总监，任命一位有利于伊利集团的财务总监。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拉姆齐带着几位律师打断了会议。丘奇的几位律师和支持伊利的董事会成员拿着阿尔巴尼州高等法院鲁弗斯·佩卡姆法官的禁令，阻止他们进入董事会。这项禁令的生效使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几道禁令也预示着那些支持伊利的董事会成员仍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舍曼根据最近从伊利大战中得出的经验，迅速意识到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需要的是一个接管人。“今晚去纽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正在波吉普西 (Poughkeepsie) 照顾生命垂危的母亲的伯纳德在 6 日接到的电报中这样写道，“结果告知西 23 街 359 号。”这是卓西·曼斯菲尔德的地址。为了完成任务，伯纳德抛下母亲迅速赶赴曼哈顿，签署了一项文件，任命菲斯克和考博茨基尔的查尔斯·考特尔，一位支持伊利公司的董事，为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接管人。

那天夜里，菲斯克带着伯纳德的命令，在几位律师和保镖的跟随下，向北来到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这一行人在德拉万饭店会见考特尔。他们在那里休息了一晚上，而没有意识到此时拉姆齐的法官、阿尔巴尼的佩卡姆已经任命了一个叫罗伯特·H·普鲁恩 (Robert H. Pruyn) 的人来接管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第二天早上，即 8 月 7 日星期六，菲斯克、考特尔

一行来到位于阿尔巴尼河的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办公室时，普鲁恩已经占领了办公室，公司总经理约翰·W·范·沃肯伯格（John W. Van Valkenburg）带了几十个强壮的铁路机械工人守卫在那里。范·沃肯伯格允许考特尔进入办公室，因为考特尔作为公司董事不能轻易被解雇，但是他坚持让菲斯克和伊利公司的其他人待在接待室。当菲斯克和他的人试图破门而入时，范·沃肯伯格人多势众，轻易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随后，一个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的机械工假扮阿尔巴尼的警察将菲斯克带到监狱，此后才露出了马脚，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司法人员。

在电报通知伯纳德发布更多禁令之后，菲斯克回到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的办公室，那里的气氛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礼貌起来。拉姆齐的一位律师出现了，接管人普鲁恩“非常荣幸地将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詹姆斯·菲斯克先生”，《阿尔巴尼晚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菲斯克不停称赞范·沃肯伯格的细心和果断，并保证说，如果他愿意，伊利公司将是他永远的家。在那个闷热的下午，“律师云集，各方都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冷静、友好、和蔼，并愉快地达成了协议。他们谈了几个小时，谈论个人建议、开玩笑、谈生意”。后来，伯纳德通过电报传来一个没有签名和盖章的新命令，在场的所有人又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丝毫不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文件。伯纳德的新禁令撤销了佩卡姆任命普鲁恩作为接管人的命令。他还禁止普鲁恩，这个阿尔巴尼的治安官、阿尔巴尼的警察和铁路雇员，阻碍考特尔和菲斯克的任何行动。为了实现最终目的，他还给这个治安官发布了一个书面命令，“要求他如有必要，须帮助号召全区人民实行这个命令”。但是伯纳德的命令似乎没有什么可实施性，双方都预料到他们的矛盾没那么快解决。因此，他们同意“停止争吵，双方接管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办公室，到星期一早上9点再继续讨论”。

菲斯克坐着末班火车回到曼哈顿，与古尔德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星期天他又带着伯纳德正式的命令文件乘坐晚上的轮船返回，但是这对他们没什么帮助。拉姆齐在他所居住的阿尔巴尼势力很大。这座城市没几个人相信菲斯克在阿尔巴尼的利益将会通过伊利公司控制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实现。正如约翰·斯蒂乐·戈登说的那样，菲斯克和古尔德的计划将使阿尔巴尼变

成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由于伊利铁路和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一样都存在宽轨的缺陷，”戈登写道，“因此，伊利铁路通往新英格兰的运输将必须在阿尔巴尼卸货，同时，纽约中央铁路可能，并且很快会把阿尔巴尼当做一个交通重镇。”然而，这种关于铁路战略的优秀观点并不容易通过媒体宣传，至少不会那么快。

8月9日星期一上午8点，范·沃肯伯格向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铁路沿途各个站长发布指令，不理睬支持伊利公司的法庭禁令。同时，菲斯克带着伯纳德的书面命令来到宾厄姆顿。在那里，布卢姆区的执行官根据伯纳德的命令，于下午2点占领了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终点。执行官扣押了四个机车中的三个，另外一个直接逃往阿尔巴尼。30分钟后，执行官和H·D·V·普拉蒂（菲斯克新任命的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总经理，和前面提到的老赞迪克没有关系）和二十几个伊利铁路的机械工乘坐伊利火车穿过卡茨基尔开赴阿尔巴尼。他们向前飞奔，试图控制沿途的每一个车站。而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范·沃肯伯格命令将所有正常运行的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铁路都拉到旁轨上。随后，他派出一个载着150人的专列，向东开赴宾厄姆顿，这些人在亨利·史密斯律师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这个专列在经过每个车站时都要停留一下，留下一队保安以保护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财产不受来自伊利的侵袭。

在布伦布里治（Bainbridge），这两列火车狭路相逢了。史密斯的火车当时是先到的，当伊利的火车在傍晚缓缓驶入车站时，普拉蒂和他的人马发现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专列已被拉到了旁轨上。经过短暂停顿思考后，普拉蒂愚蠢地决定让火车继续向前开。如果有一个更精明的指挥者——或许古尔德可以——可能会预测到伊利铁路的机车不久会遭到蓄意破坏。铁轨上的道岔立刻让伊利的火车越出轨道，待在那儿一动不能动了。随后普拉蒂向史密斯投降，后者带人将伊利的机车拖回铁轨，然后将其劫持到阿尔巴尼。对这一变故毫不畏惧的菲斯克在特拉万饭店通知在宾厄姆顿的人准备另外一辆机车。这辆新火车于8月10日星期二下午出发，带着600多人和少量弹药：大部分武器是从附近森林里砍伐的棍棒。早些时候，在纽约哈珀斯维尔附近的铁路隧道，伊利的火车与载着450名范·沃肯伯格支持者的阿尔巴

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火车相遇了。

伊利的火车在看到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火车缓慢爬上隧道东坡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因此没有发生过度相撞。这次相撞损坏了两辆火车的排障器，将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火车一部分撞出了铁轨。全副武装的范·沃肯伯格的人马冲了出来，围住了只持有棍棒的伊利铁路工人。伊利工人不敌对手，躲进了黑暗的隧道，靠火车作掩护。几分钟后，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战斗者将机车拖回轨道，继续前行围堵在隧道西端的伊利部队，战役全面打响。“冲突再次激烈地展开，”《莱斯利画报》报道说，“伊利铁路的人死守阵地，拼命抵抗……阿尔巴尼的人因胜利而精神焕发，发起猛攻。步枪、石头、棍棒、拳头一齐上。”这场血腥战斗一直持续到州民兵部队 44 团赶来镇压——当时，包括伊利和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在内的所有战斗者都躲进了树林以免被捕。到了夜里，伊利铁路的火车占领了隧道的西端，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占领了东端。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战斗中虽然 10 人被枪击中，更多的人受伤，但居然没有人死亡。

第二天，即 8 月 11 日星期三，双方同意政府任命的詹姆斯·麦克奎德（James McQuade）少校，州民兵部队的检察官作为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的临时总经理。不到一个月，在 9 月 7 日每年一度的董事会选举展开，这是继上次血战后“在伊利历史上最完美的一次伴有诉讼、禁令、接管的流星雨”。紧接着一系列法庭诉讼开始了，其间法庭还一度允许伊利公司控制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在诉讼过程中，拉姆齐听取了 J·P·摩根的建议，将阿尔巴尼 - 萨斯奎汉纳铁路租给特拉华 - 哈得孙运河公司，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被伊利公司接管。

在这场收购战结束的时候，不止一个评论家注意到杰伊·古尔德的缺席。一些人错误地猜测在这场战斗中菲斯克一直是一个人坚守阵地，这促使“伊利王子”变成铁路业无可争议的大亨。这种猜测没有什么依据。事实上，此时古尔德正在筹划另外一件事，一件更重要的事——一个复杂的欺骗和阴谋。这件事使他自己和菲斯克永远与“强盗”的称呼联系在一起。

第十九章 一切化为乌有



1869年6月15日下午，刚刚上任三个月的美国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他姐夫亚伯·若斯伯恩·科宾（Abel Rathbone Corbin）位于西27街的别墅里会见了杰伊·古尔德。格兰特与早上刚刚参加西点学校毕业典礼的妻子朱丽亚一起穿过曼哈顿，观看一个为庆祝内战结束、已经延期的仪仗队表演——在波士顿举行的庆祝国家和平纪念日。在经历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肃穆气氛之后，格兰特、科宾、古尔德、财政部长乔治·S·布特维尔（George S. Boutwell）、大西洋电报公司创始人塞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和几位知名人士，在一对士兵的护送下走向钱伯斯大街码头。菲斯克的纳拉甘塞特航线汽船“普罗维登斯”号正在那里等候。菲斯克和古尔德自愿为总统提供方便。穿着考究的菲斯克容光焕发地站在过道上，在身后是曼哈顿最好的道德沃斯乐队（Dodworth's Band）。在总统登上船的时候，乐队鼓乐齐鸣。

将古尔德介绍给格兰特的是总统的姐夫科宾。他是一个鳏夫，最近刚刚与格兰特的老处女妹妹维吉尼亚·佩因·格兰特（Virginia Paine Grant）结婚。科宾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曾做过律师、投机者和政治说客，但声誉不好。虽然理论上已经退休，但他还涉足不同的金融和实业投资领域。1869年初的一次新泽西土地投机生意使他认识了古尔德。那时，古尔德已将科宾拉入黄金投机的冒险行动中。

直到1861年底，联邦政府只拥有全美货币供应的铸币权，所有的纸币供应都由各州银行根据自己的存款准备发行。但是在内战初期，《国家银行法案》和《法定货币法案》设立了全美性银行，并拥有根据政府债券发行货币的权利。同时，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行不可赎回的票据：不以黄金做支持的4亿美元纸币，以应付战争需要，但是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1865年中期开始，政府慢慢从流通中回收纸币，这导致每盎司黄金的价

格从1865年约300美元降至1869年的130美元。(当然，除了回收流通中的货币，美国财政部还通过精确计算卖出联邦储备中几百万盎司的黄金以影响金价。)

1862年，交易者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旁边正式建立了一个“黄金交易厅”。四年后，交易所的许多会员组建了黄金交易银行，这是一个清算机构。到1869年每天的平均交易量是7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保证金交易。正如古尔德后来对国会调查委员会讲的那样：“一个拥有10万美元的人可以进行2000万美元的交易。”后面这个数字碰巧是当时纽约市全部可用的黄金总额。

起先，古尔德并不想做得这么大。在1869年4月期间——只使用了自己资本的很小一部分——他大约拥有了70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价格最低为一盎司130美元，最高为137美元。在几个星期后卖掉合约的时候，他将价格抬至142美元。接下来，杰伊想把价格拉到145美元，这个数字将会使美国财政部长布特维尔加倍卖出黄金，拉低价格。此时，古尔德注意到财政部拥有影响和操纵市场的能力。他好像闲聊自己的白日梦一样，对吉欧万尼·莫若西尼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或者至少提前知道财政部关于黄金操作的动向，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狙击黄金市场，获取丰厚的利润。

美国在内战结束后慢慢回到牢固的金本位制上，而世界其他地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金本位。因此，所有做出口贸易的美国商人在国外卖掉货物获得黄金之前，都必须使用浮动的美元支付国内的商品和货物。对于美国进口商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不过他们一样需要面对由于美元币值浮动所带来的风险。莫里·克莱因解释道：

“为了保护自己，这些商人支付佣金借入黄金，然后卖出获得美元满足自己购买的需要。在外国交易所将票据贴现后，商人拿到黄金将它还给借贷者。这就是理论上黄金交易所的法定功能，但是它同时也提供了进行投机交易的机会。采用上述方法借入黄金的商人实际上是没有黄金的。价格的下跌将会抵消他们在交易中的利润。但是，金价的升高也要求商人为他们借入的黄金追加额外的保证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

可能在国外票据贴现之前就破产了。如果投资者能够控制黄金的供应，他们就可以借助缺乏黄金的商人们狂热的购买欲望拉升金价。

进入 1869 年夏季，古尔德开始考虑采取行动狙击黄金市场，他计划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他当然希望一夜暴富，但也希望慢慢压低商品价格，然后增加铁路的农产品运输业务。根据英国金融家詹姆斯·麦克亨利（他持有伊利公司的股票，同时也是大西洋—大西北铁路的总裁）的提示，古尔德意识到美元的突然贬值将降低西部小麦和谷物（不包括南部的棉花）相对于外国金本位市场的价格，美国农民也会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刺激美国农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在与总统一同乘船的几个星期前，古尔德告诉科宾，如果政府采取某些像 5 月份那样卖出联邦储备黄金的措施来强化美元，那么从长期来看将带来粮食减产、农民破产、货车空驶、经济危机蔓延全国。

为了确保科宾能为国家经济利益（也就是拉高金价）做出贡献，古尔德给他提供了一个没有保证金的 150 万美元黄金合约账户。从那时起，金价每涨 1 美元，考彬每天将会获利 1.5 万美元。6 月初，就在格兰特总统的妹妹获得那个账户不久，古尔德将科宾送到华盛顿，向他的小舅子游说收紧黄金供应的必要性。现在，当普罗维登斯号在 6 月 15 日傍晚带着蜜月套房里的格兰特悠闲地驶出曼哈顿时，古尔德准备私下里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享用过丰盛的晚餐、美味的威士忌和雪茄后，古尔德开始和格兰特、布特维尔讨论联邦黄金政策问题。“总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古尔德在国会调查委员会回忆道，“其他人在争吵。一个支持布特维尔卖出黄金的政策，另一些人反对它。在他们充分交换了观点之后，一些人问总统他是怎么考虑的。”古尔德后来说，当格兰特谨慎地说出支持金价的观点时，他非常失望。让古尔德大为吃惊的是，格兰特还支持强势货币和严格的金本位制度。格兰特说：“目前经济的繁荣很多是泡沫，这些泡沫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破灭。”古尔德后来说，这种言论让他和他的伙伴大失所望。古尔德回忆道：“我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实施这种政策，将会出现大萧条，并可能导致内战；它将制造罢工，工厂大面积倒闭……我进一步提出政府应该放开黄金市场，让它找到自己的市场价值；今年秋季政府应促进金价上浮。”格兰特在

接下来的行程中仍然不为所动，正如古尔德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从谈话中看出总统是一个经济收缩主义者。”

一贯不屈不挠的古尔德继续围攻这位行政首长。当格兰特总统在6月18日回到纽约时，他观看了杰奎·奥芬巴赫（Jacque Offenbach）在菲斯克第五大道剧院里表演的《街头歌女》，古尔德、科宾和他一起坐在菲斯克的豪华包厢里。杰伊在演出间歇谈论的话题只有黄金。在那个夏天，有几次格兰特总统住在科宾家里，古尔德又按照他一贯的作风使用大量数据，证明适度的通货膨胀是有益的。最后，在8月初，被激怒的格兰特告诉科宾的管家不要让古尔德出现在这里，因为这个伊利公司的董事长“总想从他那里打听什么事情”。

但是，古尔德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6月末纽约助理财政的位置空缺时，古尔德通过科宾成功任命了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准将担任此职。他是一位退休的内战军官，美国快递公司东部前总裁，现在看来可以作为一个“哀乐”作曲家。巴特菲尔德实际上是古尔德此位置的第二候选人。第一候选人是科宾的女婿罗伯特·B·卡瑟伍德（Robert B. Catherwood），当他得知自己将被指示做一些事情时却明智地退出了。“我很满意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卡瑟伍德对未来的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调查古尔德黄金投机事件的国会委员会主席）说，“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古尔德、科宾、我以及其他的人将会从事一些例如买卖黄金股票的操作，我们将变成同一条船上的人。”巴特菲尔德则毫不犹豫地于7月1日就任了副财长的职务。这个新职位要求他执行美国财政部在纽约市场上所有的操作指令。因此，巴特菲尔德将是除部长布特维尔以外，了解美国财政部在黄金市场上操作的第二人。不久之后，古尔德“借给”巴特菲尔德1万美元，不需要他偿还，还给他开立了一个和科宾一样无须保证金的黄金交易账户，虽然巴特菲尔德后来拒绝了这个做法。

到了7月中旬，黄金的价格处于136美元的位置上，并不断下跌。考虑到农业部关于农业丰收的预测，以及农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度下滑的状况，看起来好像即使布特维尔通过减少政府出售黄金的数量支持金价，金价下跌也不会停止。两个星期后也就是8月初（菲斯克当时正在进行阿尔巴尼-萨斯

奎汉纳铁路战斗)，古尔德买下了纽约第十国民银行的控制权，不久，便将这些股份转给菲斯克和其他几个伊利公司和坦慕尼派的同僚。因此，第十国民银行可以为古尔德提供足够的无担保贷款用于黄金投机，即使他所发行的保付支票不用存款资金所担保。此外，古尔德还从华尔街的经纪商和投资者（包括阿瑟·金伯、W·S·伍德沃德、拉塞尔·A·希尔斯、詹姆斯·埃利斯、H·K·伊诺士、爱德华·K·威拉德、查尔斯·昆西）那里筹集了大笔资金。

然而，菲斯克是第一个退出的。他认为格兰特总统态度强硬，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于是便将古尔德一个人留在这个计划里。虽然菲斯克仍然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的伙伴，但是在一开始却带走了自己的钱。“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吓倒了我。”他后来讲。事实上，在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一向谨慎的古尔德（总是希望控制交易中的所有因素）决定实施自己的计划狙击黄金市场，这一举动的确让人吃惊。起初，古尔德资金量很小。那些“成员”都是互相独立的，古尔德享有投资的委托授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自由买卖。同时，虽然古尔德的“内部知情人”科宾成功任命了巴特菲尔德，但是在和格兰特进行了无数次交谈之后，科宾明显对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力。（由于担心科宾的价值，古尔德不久开始拉拢格兰特的国防部长和亲信贺瑞斯·波特将军，给他提供了一个50万美元的无保证金黄金交易账户，但却被愤怒地拒绝了。）

7月末，古尔德错误地试图将金价从先前135.875美元拉升到140美元，在此之后，他和同盟们开始在8月中旬大量买进。25日，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古尔德安排愚蠢的约翰·比格洛，一位前法国大使、《纽约时报》新任命的编辑发表了一篇社论，假装透漏了格兰特黄金交易的具体头寸。这篇名为“当局的金融政策”的文章声称：“在粮食被运出之前，财政部不太可能卖出黄金，抬升币值……总统不会对市场输出黄金换成货币。”第二天，古尔德假装不知道社论的内容，给布特维尔写信说：“如果《纽约时报》正确地反映了您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月的金融政策……那么我认为国家将非常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能够考虑经济全局的金融领头人……只有抬升金价、减少供应量……我们才能在伦敦和利物浦的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一个星期后，休假中的格兰特总统从纽波特到萨拉托加的途中路过纽约时，古尔德在科宾的家中安排了和他的另一次会面。在谈话中格兰特透露，西部大丰收的报道让他开始赞同古尔德的观点。美国农民需要将多余的粮食销售到国外，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制造适度通货膨胀帮助他们。在9月4日给布特维尔的信中，格兰特开始明确地说：“不需要压低金价。”在与格兰特结束会谈后，古尔德立即安排自己的伙伴加快买进黄金合约。杰伊自己大部分的私人交易用以前的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的名义进行，让以前的同事史密斯通过一些二级经纪商购买合约，以免被外界发现。到了9月中旬，古尔德的资金池所控制的黄金量已经超过了联邦金库以外纽约所有能找到的所有黄金数量。古尔德自己持有的合约价值2 500万美元，其他成员持有的合约超过6 500万美元。

13日，当格兰特总统在返回曼哈顿途中前往宾夕法尼亚探望格兰特太太的亲戚时，古尔德给他提供了一辆伊利的私人火车送他去匹兹堡——这也巩固了他给格兰特灌输的观点。根据詹姆斯·B·霍奇斯肯（James B. Hodgskin），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主任的观点，“操纵黄金市场的参与者和政府所有的人结成同盟，从格兰特总统到国会看大门的人都卷入其中”，这已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但是古尔德试图强化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反映事实。实际上，格兰特很担心被古尔德和其他人利用。在他接受古尔德的伊利铁路盛情招待的同一星期，他就给布特维尔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一场殊死搏斗正在进行，每一方都希望政府能够解救他们……我认为我应该按照前方明灯的指引继续前行，没有改变，直到目前这场战斗结束。”

格兰特所指的战斗是古尔德和他最近资金池里的几个成员的战斗。由于古尔德及其同伙的疯狂买进，金价在9月8日已经升至138美元，此时，古尔德集团已产生分化。在那天，科宾担心金价进一步升高的前景，要求从杰伊那里拿走自己的利润。金伯也放弃了，在转向做空一方之前拿走了自己的1 000万美元盈利，加入了无数希望金价降低的熊市集团。伍德沃德在杰伊同意他从自己1 000万美元的账户中取走600万才同意继续做“多”。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熊市集团发起攻击，使金价降到135美元，并持续了几天，

造成这种状况不仅是因为金伯的叛逃，还因为纽约市场进入了許多来自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的新资金。

就在9月的第二星期刚开始的时候，媒体开始注意到了这些操作。《纽约论坛报》的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猛烈声讨古尔德和其他“黄金蛀虫”。格里利公开指责他称之为“巨大的黄金阴谋”的行为。他还要求美国财政部出售黄金、购买债券，以此来缓解日益紧张的货币供应。同时，其他所有主要报纸的首席金融记者（例如著名的《纽约时报》凯勒博·诺维尔、《纽约太阳报》的福特·巴克斯代尔、《纽约先驱报》的乔治·克让奇）都一齐对准了这场黄金狙击战。《纽约时报》的诺维尔尤其积极，该报至今仍然因为上当受骗做了支持古尔德的宣传而尴尬。此外，数以千计的中小投资者回忆起一年前，在古尔德狙击伊利股票的时候获得的暴利，便踊跃进行着高风险的赌博，或者做多或者做空。

由于古尔德和他剩下几个同盟的坚决买进，15日金价涨至138美元，此时华尔街无数支持“强势”（不贬值）货币的人开始请求布特维尔缩小美元和黄金之间的价差。接着，在采取了附和这种游说的行动后，日益焦虑的古尔德采取了致命一击。古尔德让科宾给大舅子写信再一次反对政府的干预。接着，他让一个伊利公司的雇员W·O·查品（W. O. Chapin）亲手将这封信交给在宾夕法尼亚匹兹堡18英里以外华盛顿郊区的总统。查品在16日早上到达总统的临时官邸，并看着格兰特读完这封信，但是格兰特没有回信。一个小时后，查品电报告知古尔德，信已经“送到，一切都好”。但是事情实际上并不好。格兰特认为自己的姐夫派一个信使在荒郊野外找到自己，劝自己支持金价非常古怪。格兰特最后意识到科宾也是这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长期做黄金交易，非常希望影响总统支持自己的金融头寸。同一天，愤怒的格兰特让自己的妻子给姐姐维尼亚写信，向她传递了一个特殊的信息。朱丽亚·格兰特写道：“告诉你的丈夫，我丈夫对你们的投机活动非常愤怒。你们必须尽快结束这种活动。”

当朱丽亚写信的时候，科宾正在和菲斯克一起娱乐，他非常自信地告诉菲斯克金价不会下跌。仍然持怀疑态度的菲斯克不断向科宾询问，后来被古尔德招募进来替代金伯和虚弱的伍德沃德，与日益强大的熊市集团进行斗争。

根据菲斯克后来在国会的证词，他忠诚的朋友欺骗了他，声称格兰特本人和波特将军也是计划的参与者。“我知道政府将不会再出售黄金了，”总统的妹妹这样告诉菲斯克，以支持古尔德的谎言，“我非常确信政府不会再出售黄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要再犹豫。”

看到古尔德和科宾对政府金融政策有十足把握，菲斯克加入了，同意帮助杰伊将金价拉到一个合适的高点，然后他们两个再悄悄退出。根据这一计划，菲斯克的买进将独立于杰伊，通过他的老搭档贝尔登控制的经纪商进行。正如杰伊后来说的那样，“我们的利益是完全独立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除了带来新鲜的资本，菲斯克还带来了古尔德所缺少的东西：迷人的个性和花言巧语，单就这些便可以拉升价格。“黄金！”菲斯克大声回答着威廉·福勒关于事态如何发展的询问，“卖空，我等着参加你的葬礼呢。”

同时，各大报纸的社论版追随格里利开始支持这一派或另一派。《纽约世界》在9月16日（星期四）早上批评熊市集团的共和党银行家们，暗示他们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当局建立某种亲密联系。“为什么连一个黄金赌徒都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获利……这是背负着沉重的赋税、辛勤劳动、不参加这场赌博的人们很想知道的问题。”《纽约先驱报》虽然认为布特维尔不应该根据任何一方的游说影响市场，但他还是倾向于支持古尔德所说的适度通货膨胀：“在这个时候希望黄金价格便宜的人只有那些卖空黄金的。那些希望金价上涨的人是大量粮食和棉花生产者，他们希望将更多的产品卖到欧洲赚取越来越多的钞票。”换句话说，根据《纽约先驱报》的分析，只有投机者能从强势美元中获利，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只会从货币贬值中获取收益。

下一个星期一，即9月20日，讨论黄金市场和股市从报纸的社论和金融版上了头版。《纽约太阳报》气喘吁吁地宣布：一个“华尔街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同盟，包括臭名昭著的伊利投机者们已经着手买下市场上所有的黄金”。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赞成古尔德的观点，拉升金价将有利于农产品的价格。凯勒博·诺维尔指出，黄金市场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外汇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恐慌，使得商品价格下跌。“大量面粉、谷物、粮食、石油等产品的出口订单由于货币兑换问题被迫中止。”诺维尔写道，这个问题只有在“黄金市场的联盟被打破后才能解决”。从欧洲进口可以解决；美国财政

部的行动也可以解决。但是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创造一个“不受投机者锁定或控制的自由供应的黄金市场”。

所有媒体如此大费口舌，但是到了9月22日（星期三）收盘的时候，菲斯克和古尔德将价格拉到141.5美元。菲斯克在那个价格上不动声色地持有的合约价值在5 000万~6 000万美元之间，其他成员也增加了购买量。（亨利·史密斯的合约量共计5 000万美元。）这场战斗已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熊市集团的猛烈攻击，信贷紧张致使利率飙升，并开始影响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和黄金反向运行，股票市场开始下跌。）星期三在繁忙的交易中，古尔德和菲斯克还抽出时间攻击了一下他的宿敌范德比尔特，神速狙击了纽约中央铁路，使它的股价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下跌了25%。同时，在黄金交易大厅，牛市集团每天拿出一半的资金量执行他们的合约。而一些熊市操作者则在借出资金后，使用这些收益买进黄金，继续做空。

星期三下午，古尔德给布特维尔写信说：“熊市同盟制造了华尔街的恐慌。他们大量提走现金，致使正常的商业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杰伊恳请布特维尔为公众利益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他没有提到自己也需要大量现金支持自己的计划。就在将信送至布特维尔之前，古尔德与惊慌的科宾刚刚结束谈话，他的妻子已经收到朱丽亚·格兰特的信。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古尔德向科宾许诺，如果他将这封信的内容保密，就会获得10万美元。古尔德告诉科宾：“如果走露了消息，我一分钱也不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间邮报》对古尔德的处境做了完全相反的报道，这可能是杰伊自己制造的错误信息：“在几个月内，牛市集团的操作者将比星期三更加自信。他们甚至可以不在乎布特维尔是否参与市场，鼓吹说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将金价拉到150美元。”

第二天早上在伊利城堡，古尔德没有告诉菲斯克关于朱丽亚·格兰特的信的事情。他只是简单地解释说科宾需要钱。后来，仍然蒙在鼓里的菲斯克要他的经纪人贝尔登将价格拉到144美元。同时，在另一间办公室，杰伊偷偷告诉史密斯停止买进，开始有步骤地卖出，并避免引起怀疑。考虑到如果金价进一步上涨，政府可能会进行干预，杰伊立刻调转方向成为一只偷偷摸摸的大熊。莫里·克莱因评论说：“杰伊唯一的希望就是趁菲斯克还在拉升

价格之际出售自己的合约。当价格崩溃时，菲斯克和其他经纪商将会损失惨重，而杰伊则会安然无恙。那时候的任务就是将菲斯克从废墟中解救出来。”通常的做法是：以法庭为避难所，逃避债务。

黄金交易大厅星期四早上的开盘价为 141.625 美元，收盘价为 143.25 美元。菲斯克和他的同伙疯狂买进，而一些缺乏偿付能力的空头操作者们由于需要不停追加空头合约的保证金而濒临破产。凯勒博·诺维尔高屋建瓴地说：“战斗的咆哮和牺牲者的尖叫，好像那些人正在遭受比但丁在地狱里见到的酷刑还要残酷的刑罚。”那天黄金交易大厅的交易量达到 2.39 亿美元，比星期三的交易量增加了 66%。贝尔登根据菲斯克的指示在 4 个小时里就买进了 1 400 万美元的合约，史密斯通过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二级经纪商以古尔德的名义买进了 340 万美元的合约，用以掩盖古尔德的真实意图。史密斯的另一个二级经纪商替古尔德卖出了 800 万美元的合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合约大部分都卖给了菲斯克。“我买进的数量非常少，”古尔德在描述星期四的交易时说，“我在那天是一个净卖出者。我买进只是让人们相信我是一个做多者。”

那天晚上，布特维尔在华盛顿见到了从宾夕法尼亚回到白宫的格兰特。在开始的几个小时，布特维尔不停接到来自商人和银行家的电报，他们要求政府卖出黄金平抑价格。他还收到了关于第十国民银行的可疑报告，它给“黄金蛀虫”提供大量没有存款担保的保付支票。布特维尔告诉格兰特，他已经派人调查第十国民银行，第二天早上一开业他们就开始调查。他还询问对黄金市场的操作问题——格兰特没有做出任何具体指示。他只是说现在的金价存在泡沫，布特维尔可以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 * *

9月24日（星期五）早上——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纽约时报》的凯勒博·诺维尔愤怒地描述了星期四的行动。

菲斯克一出现在黄金交易大厅，金价就大幅度上涨，其他操作者也不是无所事事……他们不仅抬升金价，而且还到处散布他们从华盛顿得

来的消息，政府不会妨碍他们。我们的最高行政长官被称为“和他们一伙”，他当然已经控制了财政部和纽约助理财长。虽然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谣言和怀疑被阴险地散布到市场，所以一般人都都会相信并且害怕政府将不会再出售黄金。

此时，古尔德知道格兰特和布特维尔出击只是早晚的问题。由于《纽约时报》公然挑战他们的影响，所以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

星期五一早，古尔德到财政部大楼拜访了巴特菲尔德，这个助理财长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任何指示。后来，古尔德和菲斯克在伊利城堡里待了一个小时，此时菲斯克已经明白形势了，但是同意为了制造假象要继续买进。大约8点半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布罗德大街威廉·西斯（他后来协助贝尔登买进）的办公室，古尔德和菲斯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待在西斯这里。几个伊利铁路公司的强壮保镖守卫着，他们俩分别待在不同的房间。菲斯克告诉贝尔登黄金将涨到200美元，然后让他去黄金交易大厅在145美元的价位上买下所有合约。同时，古尔德通过史密斯发布了不同的指令。“卖出、卖出、卖出”，史密斯悄悄地对一个二级经纪商爱德华·K·维拉德（Edward K. Willard）说。此时，维拉德没有和菲斯克的经纪人进行交易。不久之后，买方的西斯要求古尔德追加资金和保证金，古尔德写了一张支票让第十国民银行签发支票，给贷款展期。

在黄金交易大厅，10点正式开盘之前的大量买单促使开盘价达到150美元。贝尔登的二级经纪商阿尔伯特·斯派尔斯（Albert Speyers）出价购买，贝尔登自己迫使大多数绝望的做空者或者追加更多的保证金或者私下进行清算。在涨了5美元之后，菲斯克让斯派尔斯在150美元的价格继续买进。同时，古尔德继续缓慢卖出。到了11点——此时他收到两个消息——他加速了抛售。究竟是什么促使古尔德加快了退出的步伐呢？第一个消息来自第十国民银行，西斯告诉古尔德这家银行不能为他服务了。联邦调查员已经进驻银行，传言说该银行将会很快破产，他的总裁预计随时可能发生挤兑。紧接着，史密斯向古尔德报告，约瑟夫·塞利格曼——联邦助理财长丹尼尔·巴特菲尔德的经纪人——突然由买方变成卖方：这表明巴特菲尔德现在已经得知联

邦政府的下一步行动了。在获取利润之后，巴特菲尔德很快，事实上是非常快地辞职了。

整个上午，价格攀升至 162 美元，这使无数做空者损失惨重，他们被迫根据可怕的条款清算保证金账户。同时，拥有大量黄金的三藩市的银行发现自己不能满足来自纽约的黄金转让需求。转让请求被拒绝了，因为三藩市的银行家们担心西海岸的黄金被用光。中午一过，有消息说布特维尔通过布朗兄弟公司释放了 400 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到 12 点半，价格降到 135 美元。在一片混乱中，经纪商和商人们根据自己的头寸匆忙地拒付或者执行在高点交易的合约。

由于巨大的交易量（许多交易还在争论中），黄金交易银行几乎陷于崩溃，急需清算。布罗德和华尔街的大街上，阴郁却带着罕见的平静的破产人群聚集在黄金交易大厅、西斯的办公室以及第十国民银行外面。穿过布鲁克林的东河大桥，一对民兵正在待命，一旦曼哈顿的金融街失控，他们将立即采取行动。同时，纽约的混乱状态影响了全美的金融市场。波士顿的富商们慌乱地挤在商品交易所的大厅里，伺机攫取任何新消息。聚集在费城第三大街的投资者们，当看到一家大银行的金价指示牌（通过电报与黄金交易大厅直接联系）失效时愤怒异常。“人们雇用了小男孩从电报公司跑到一家又一家经纪商的办公室，嘴里喊着交易贴水。”《费城会计报》（*Philadelphia Ledger*）第二天报道说，“这使形势更加混乱。”接近 1 000 名个人投资者在当天的交易中破产。14 个经纪行和几个银行破产。星期五晚上，古尔德和菲斯克从后门离开西斯办公室，几个保镖跟着他们，随后两天他们一直躲在伊利城堡。

“杰伊也遭受了损失，”菲斯克对周日来拜访的科宾说，“他只剩下一堆衣服和一双眼睛了。”虽然最后一天他在黄金交易上赚了一些钱，但是整整一个星期的股价狂跌使古尔德追加了大量保证金。因此，这次黄金狙击对古尔德来说是净损失（虽然不像其他玩家损失得那么多）。此外，古尔德的黄金交易也被痛苦地卡在黄金交易银行的积压交易里。星期一，古尔德获得了多达 12 张禁令用于保护他和菲斯克的利益，就像他们以前的做法一样。一条命令是给黄金交易银行任命了一位亲古尔德的接管人。还有一条命令是禁止

黄金交易大厅扣押古尔德和菲斯克黑色星期五购买的任何合约。还有一条命令旨在保护古尔德的经纪人史密斯不受起诉，禁止黄金交易大厅向菲斯克和古尔德进行除了法庭以外的任何索赔。当被问及这些禁令是怎么回事时，黄金交易银行的助理出纳海勒姆·罗杰斯（Hiram Rogers）回答说：“哦，是的，他们穿戴整齐地走了进来，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我们被禁止采取任何行动。”

当被国会要求对投机利润如何处置作出解释时，菲斯克回答说：“一切都化为乌有”。古尔德和菲斯克预期的利润少得可怜，菲斯克都不屑于扔到厕所里。情况就是这样糟糕。正如莫里·克莱因讲述黑色星期五所带来的无数官司时说的那样，杰伊“花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处理它们，许多案子根本没有审理的价值”。最后一个案子直到1877年才解决。

总之，杰伊狙击黄金的计划使他除了在市场上遭受损失外，还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在黑色星期五破产的一个经纪行洛克伍德公司的老板莱格兰德·洛克伍德（Legrand Lockwood），曾担任湖岸—密歇根南部铁路公司的财务总监。这条铁路往返于芝加哥和密歇根、俄亥俄几个新兴城市之间。湖岸公司还拥有布法罗—伊利铁路，这条铁路连接了大湖区和伊利铁路，以及纽约中央铁路。由于自己的经纪行倒闭，洛克伍德被迫在“黑色星期五”低迷的股市中出售了自己大量大湖岸公司的股票。由于古尔德自己当时也是一团糟，所以他并没有及时做出反应。结果，范德比尔特按照协议价格购买了7万股大湖岸公司的股票，控制并确保了这条铁路线成为纽约中央铁路而不是伊利铁路的延伸枢纽。

从长期看，黄金狙击使古尔德受到的更严重的影响，是留下了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

第二十章

恶魔墨菲斯托菲里斯



“**黑色星期五**”灾难之后，杰伊·古尔德被媒体妖魔化为一个声音刺耳、举止疯狂的恶魔。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在1869年9月末从没有停止过，现在每年“历史上的今天”节目都要在9月24日谴责古尔德一次。在古尔德那个时代，1869年人们遭受破产的景象（暗指曾经富裕的家庭被搞成赤贫）成为古尔德长期被看成骗子和背叛者的事实基础。早期记录古尔德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古斯塔夫斯·迈尔斯写道：

“古尔德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冷血的行贿者、强盗和金融海盗……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个形象还一直跟随着他，并且变成了对他后代的谴责和恐惧。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杰伊·古尔德的名字一直是一个被嘲弄和讥讽的代名词，是公众谩骂和痛恨的对象，代表了每个通过肮脏和犯罪取得贪婪胜利的人。”

这个过程开始于“五十步笑百步”。在古尔德遭受黄金市场的不幸遭遇后，记者们将丹尼尔·德鲁一年前说的一句话翻了出来。当时在进行伊利争夺战时，德鲁提到了古尔德，“谁碰到他就会死亡”。随后，同样恶毒的话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纽约时报》的诺维尔称古尔德为“华尔街的墨菲斯托菲里斯”。漫画将他描述成一只飞翔的蝙蝠，犄角从他高高的帽子中伸出来，眼睛恶狠狠地望着特里尼蒂教堂和华尔街。该报那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它应用了标准的老套理论，根据古尔德有一个类似犹太人的名字便推断这个贪婪、狡猾的“金融大鳄”有犹太背景。《纽约太阳报》则联想到古尔德的手段有浮士德般的寓意：与恶魔签订了协议，虽然可以使古尔德战无不胜，但是最后将毁灭他自己。虽然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华尔街的操作者詹姆斯·R·基涅（James R. Keene）认为，“古尔德是创世纪以来

最坏的人。他背信弃义、虚伪、懦弱，是一个狭隘可鄙的蛀虫”。此外，《纽约论坛报》猛烈批评他和菲斯克在黄金合约上像德鲁一样的卑鄙行为：“他们使用律师的禁令组织诚实的债务支付，当他们盈利时就遵循黄金交易所的规则，当他们遭受损失时就不遵守；他们互相背叛，出卖自己的同盟，默认同伙的破产。”

整个10月，各大报纸重新翻出了古尔德职业生涯的每一个片断，重新描述以使其符合他们塑造的恶棍形象。查尔斯·卢普自杀时的偿付能力和精神失常被人忘记，他的死期也从1859年提前到1857年，以便与当时的经济危机相一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黑色星期五”的故事本身包含了这样的内容：一帮愤怒、破产的人们冲进金融街追杀古尔德，嘴里一直念叨着他先前的罪行，喊着：“谁杀死了卢普？古尔德！”但是根据当代的报道，当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卢普的名字也没有被提及。古尔德与普拉蒂的合作关系更被歪曲，虽然这位老人被问及自己的想法时，拒绝谈论他从前的合作伙伴。（在接近79岁时，普拉蒂或许正在全神贯注于自己28岁的新婚妻子。）

《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查阅了档案，发现了年轻的杰伊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故事，并重新进行了修改。现在，外祖父摩尔的老鼠夹子变成了杰伊的发明，它也变成了所有古尔德个性的象征。《纽约先驱报》称这个装置——无情、聪明、具有致命杀伤力——很像它的制造者，也聪明地为其他更具投机性的老鼠设下圈套。许多漫画还借用了这个老鼠夹子的形象，将杰伊描绘成一只在杀死猎物前残忍玩弄它的猫。为了与《纽约先驱报》竞争，《纽约太阳报》将触角伸到罗克斯伯里，搜集古尔德早期的故事。他们挖掘出那件关于杰伊背着爱德华·伯汉斯进行土地交易的轶事（那是千真万确的）。《纽约太阳报》甚至还找出了杰伊那篇《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的文章，发现它适合做那些长篇大论嘲弄文章的补充报道。在这种氛围下，古尔德与范德比尔特的几次最新的交手，例如伊利争夺战和阿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大战，都被蒙上了新的阴影，甚至菲斯克以前的过度玩乐都遭受了批评。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中写道：“大剧院建在牺牲于古尔德的贪婪之下的人们的白骨之上。”

在“黑色星期五”，只有上帝才能获利。虽然古尔德痛苦地明白自己在

黄金狙击战中损失惨重，但是这条街的每个人都不相信。在公众的眼中，“黑色星期五”是古尔德为了谋取暴利而一手操纵的大灾难。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他们将资本交易看成零和博弈，在那里，一个人失去的立刻变成另一个人所得到的——认为无数破产投资者的损失正好等于古尔德和他同伙没有良心的获得。各大报纸也随波逐流。几件丑闻——只是从空洞的愤怒话语中总结出来的几个片断——就迅速增加了全美报纸的销量。在一个对华尔街恶棍的片面描述过度饥渴的市场中，杰伊·古尔德正好突然适合了他们的口味。

那年1月，在对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詹姆斯·A·加菲尔德领导的国会银行委员会提供关于“黑色星期五”的证词时，杰伊模糊的回答也没有给他的声誉恢复带来什么帮助。当被问到他是如何知道美国财政部将要出售黄金时，古尔德并没有提到巴特菲尔德通过塞里格曼进行的私人交易，而是说：“这只是人根据直觉做出判断的一个例子，它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让他提供证据，他却说不出来。”委员会调查的重点全部集中在格兰特和其他联邦官员参与交易的程度上。最后，以共和党为主的调查团虽然给共和党总统出具了一份“无传染病的健康证明”，但当提到巴特菲尔德时，却无法给出直接的免罪证明。这个委员会只是说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助理财长是古尔德的同谋。委员会还批评科宾进行了“最恶劣的伪善行为”，在“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掩饰下操纵一个有权势的亲戚。

杰伊在这次黄金狙击中的无数失误，以及他和菲斯克的巨大损失，打破了他战无不胜的神话，但是国会在最后总结这件事情时也像媒体一样回避了事实。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黑色星期五”的废墟中，媒体仍然任意地将古尔德刻画成一个恶毒、是非不分、无法阻止的金融天才。杰伊自己并没有努力消除这种形象，因此这变成了他生命中第一个真实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在不久的将来，他对于毫无盈利希望的伊利铁路进行的操作将会进一步加深这一冷酷的、善于欺骗的、掐住对手脖子拼命吸血的金融吸血鬼形象。后来，在伊利之后，他鲁莽而背信弃义的传说将一直伴随他生命中从事的其他事业：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和密苏里太平洋公司，整合西南部其他几条主要的铁路，建立古尔德的铁路体系，控制西部联合公司和曼哈顿高架铁路

公司。

正如莫里·克莱因所说，古尔德在“黑色星期五”获得的坏名声“像一片致命的乌云覆盖了他所接触过的公司”长达20年之久。最后，不管管理上如何成功，也不管分给股东多少红利，都不能改变在没有事实依据、胡编滥造的故事基础上所塑造的强盗操纵者的思维定式。人们强加给古尔德的犯罪形象一直陪他进了坟墓。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的动机——和其他资本家一样只是想赚钱——都会被人们怀疑。人们总是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媒体和公众都形成一种观点，一些被投资者普遍使用的小技巧和策略在古尔德这里就被称为“欺诈和垄断的工具”。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坏名声，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运用这些普通技巧时，都使用一种以前从未用过的创新方式，灵活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巧妙地获取利润，这引起了那些旁观者的嫉妒。

“黑色星期五”过去了15年，当时古尔德早已证明自己有能力建立专一而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促进和扩大了几个大公司业务的首席执行官。伦敦《铁路时报》仍然这样写道：

“古尔德先生的上帝就是他的钱袋，以便随时补充他为了利益而出卖的各种品质。他反对所有人，所有人也反对他。那些试图用朋友的眼光对待他的人，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将一条毒蛇抱在了怀里。但是刻画杰伊·古尔德真实性格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准确地将其描述出来。他冷酷无情的恶劣行径如同他本人一样，残酷地欺骗‘朋友’，以至于现在他都没有人可骗了。”

新平社
PDF

第二十一章

一个特殊的恶臭弹



黄金狙击战结束后，古尔德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充实自己和同盟的个人财务账户上来。他总是很关注将受到自己在伊利的位置影响的附带交易。在与纽约中央铁路进行价格战以吸引从布法罗向东运往纽约的牲畜运输的过程中，古尔德将单车运价从范德比尔特原来的 125 美元降到 75 美元。当范德比尔特予以回击将价格降到 50 美元时，古尔德便将伊利的价格降到 25 美元，直到迫使范德比尔特将价格荒谬地降到每车 1 美元，每头猪或羊外加 1 美分。起先，范德比尔特很高兴看到报告说自己的火车满载，而伊利的车皮却是空的。后来，他才知道古尔德和菲斯克买下了所有从西部卖到布法罗的牲畜，然后通过纽约中央铁路运到纽约，赚取了巨额利润。“当老海军准将发现他花了巨额成本帮助对手运送牲畜，实现巨额利润时，他几乎气疯了。”莫若西尼回忆说，“我被告知范德比尔特那里的气氛非常阴郁。”

古尔德还投资美国邮政公司的股票，该公司从事包裹和邮件速递业务，依靠伊利铁路进行邮件运输。作为伊利公司的总裁，他总是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噪音，或者与这个独立的组织断绝关系，或者提高运费。他卖空该公司的股票，在股价下跌的时候获取利润。后来从古尔德那里传来积极的消息，声称将复兴公司在华尔街的地位，提升公司的股价。正如莫里·克莱因和朱利叶斯·葛朗蒂斯基（Julius Grodinsky）所说的那样，这些操作在古尔德那个时代并不是很普遍。“当商业说教者对这种行为皱眉头时，”克莱因写道，“那些道德不怎么高尚的人厚颜无耻地交易着他们的内部信息，获得在公司的地位。古尔德比大多数人都有创意，但是他不是艺术上的先锋。”

在进行这种附带交易获取利润的同时，古尔德还采取措施加强伊利公司与阿尔巴尼以及其他地方的政治联系。“获得政治提名的人经常会来这里寻求赞助，”杰伊在 1873 年对美国参议院调查员说，“我给他们提供赞助，相信他们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红利；在共和党选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拥护

者；在民主党选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在中立的社区，我也是中立的；在政治上，我永远是伊利铁路的人。”这些交易量太大了，杰伊自己无法单独完成。“事情太多、范围太广，我现在脑子里还没有考虑具体应该怎么做；我进行一项交易，完成它，然后就到此为止；我再去做别的事情。你可能回来问我某天有几节运货车厢，火车准时还是晚点；我无法让自己的大脑填满各种细节；我只能告诉你基本原则，我做事的基本原则。”就拿伊利本身的政治来说，古尔德采取了几个关键措施巩固自己的地位。1869年5月，从纽约州政府立法机关颁布的《分类法案》中寻求保护，使伊利董事会5年没有进行选举。因此，在1869年10月一年一度的选举之后，菲斯克、莱恩、特维德和古尔德将他们的位置一直保持到1874年。在菲斯克的纳拉甘塞特汽船公司担任采购经理的杰伊的弟弟艾布拉姆也加入了执行委员会，虽然他从没出席过会议，也没有将代理权给杰伊。

伊利公司在1870年1月发布的截至1869年9月上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突出了在古尔德的领导下公司在头12个月的业绩。毛收入提高了16.3%，达到16 721 500美元，运营成本降低了4.4%。但是，一旦支付了债务利息，伊利公司就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给78万多个已发行股票的股东。报告里没有提到的还有久未解决、（大部分已经无可补救）一直困扰着老态龙钟的伊利公司的基础设施问题。如同杰伊在一个秘密备忘录里写的那样，这条铁路除了宽轨问题还存在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木质桥梁（更不用说老旧过时的铁轨）需要更换成钢架桥。这条铁路还需要耐用的枕木，需要花巨资改进提升若干个档次。伊利铁路破旧的设备导致事故频发，发生致命事故已成为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伊利铁路只是单线往返，而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却有4条复线，宾夕法尼亚最少也有2条，它们的火车可以双向对开。

这些情况都是富有战略头脑的古尔德非常清楚的。由于这条铁路糟糕的基础设施状况，古尔德仅仅将它当成一个投机的装置：一个金融壳，一个适宜操纵的东西。为发展铁路而发行债券筹集的收入，虽然名义上花在伊利身上，但实际都服务于改善古尔德及其同伙的财务状况。例如，当古尔德和菲斯克私下以8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大剧院时，他们30万美元的定金就直接来

自伊利公司的金库，作为未来支付的高价租金。通过这种方式，古尔德和菲斯克没有从口袋里掏一分钱，就获得了纽约一条重要大街的控制权。同样，当古尔德总裁想扩大伊利公司在新泽西的土地时，古尔德以土地投机者的身份买下了河边码头的土地。从债券发行中获得的无数收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被花掉的。其中，当伊利股票的价格下跌，债务到期时，股东们——特别是占有绝对多数股份（45 万股）的英国投资者，他们意识到并且对于古尔德推卸被委托人的责任而愤怒——开始日益不满起来。

特维德老板确信，这帮英国股东的代表，一个叫约瑟夫·L·伯特（Joseph L. Burt）的人在 1870 年初来到阿尔巴尼，要求撤销古尔德的《分类法案》时非常不满意。同时，在曼哈顿，伯纳德法官驳回了伯特希望将大批英国股份撤出场外交易，而在由两个英国所有者罗伯特·A·西斯（Robert A. Heath）和亨利·L·拉斐尔（Henry L. Raphael）特别设计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注册的要求。伯特的这一做法将会使西斯和拉斐尔在下一轮的董事会选举中，替英国投资者进行投票，从而控制选举。伯纳德将这些英国股份指派给一个接管人，从而阻止了伯特进一步注册它们的企图。只要古尔德控制了法庭，并且通过坦慕尼派控制立法机关，那么伊利城堡就不会受到攻击。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1870 年 4 月，当伯特知道能够从纽约司法机关中获得想要的东西时，他便到联邦政府寻求帮助。起先，菲斯克和古尔德似乎没有意识到联邦立案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与大家预料的截然相反的是，”一篇报道称，“伯特的债券持有者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的传票，没费多大力气就被交到伊利官员手中。菲斯克在得知文件到达后，派出一名法律顾问前往美国联邦法律执行官的办公室，要求护送他的代理人到伊利公司的总部。然而，菲斯克和古尔德非常礼貌而幽默地接待了替伯特送传票的人，在周到的接待完毕后，菲斯克和副执行官共进午餐。”晚些时候，菲斯克告诉媒体：“如果这些英国人希望铁路公司的盈利花在诉讼上，而不是进行分红，那我也无能为力。”

在这次会面的过程中，菲斯克提出为他最近从事的一个有趣项目——招募士兵，组建纽约民兵第九团。作为该团武器装备的赞助人，菲斯克被任命为上校。《纽约先驱报》记者在 5 月写道，当菲斯克身着花费 2 000 美元在布

鲁克斯兄弟服装店做的制服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刚从学校出来，要当士兵的快乐小男孩”。因此，菲斯克坚持让所有的人称呼他为“上校”，甚至连卓西都不例外。他还为第九团中的每一位士兵购买了制服，给那些同意参军的伊利工人提供现金奖励。在5月底的时候，他们穿着艳丽的衣服在第五大道游行，随后右转穿过第二十三大街，一直到达第八大道。在第八大道伊利城堡的大剧院里，他们观看了菲斯克耗资7.5万美元编排的最新荒诞剧《十二宗诱惑》（*The Twelve Temptations*）。

据一位观看者讲述，顾名思义，《十二宗诱惑》讲述的是“12位穿着入时、为衣着保守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合唱团女孩的故事”。舞台布置非常精致，有瀑布，还有几个危险的硫化镁“火球”。当演员们耍弄火球时，火球便喷出危险的灰烬和火花。同时，合唱团每晚都在一队金发碧眼的女孩和肤色较深的女孩之间更替。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在那里，可怜的老帕克上演的高雅歌剧和莎士比亚戏剧，无法吸引纽约人到西部来观看，而菲斯克的“诱惑”或类似的表演却吸引了大量观众。“这种表演特别适合老年人的口味。”纽约讽刺性周刊《丑角》的编辑写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十二宗诱惑》如此吸引坐在大剧院前排白发苍苍的老绅士们眼球的原因……虽然乏味剧情，但是它却如此耀眼、如此鲜亮，让每个观看者头晕目眩。”

古尔德并没有观看《十二宗诱惑》以及任何一部菲斯克制作的戏剧。1870年春天，古尔德和他的岳父岳母搬出了联合广场的米勒公寓，搬进了第五大道一座时髦的别墅，这座寓所位于第五大道578号，西47街和西48街第五个路口的中间。虽然杰伊在一层给自己建了一个图书馆，但是他经常在地下室的一角工作到很晚。他在屋顶上建了一个温室，种植各种鲜花：玫瑰、风信子和各种特别的兰花，杰伊非常喜欢这些花。木匠在温室旁边建了一个盆栽园苗圃。在那里，他除了种植工具，还放了一个装满植物学参考书的箱子（在罗克斯伯里老家的遗物）。他对这种设计非常满意。“我有一个缺点，”古尔德当时对一个记者说，“不喜欢社交。华尔街的人喜欢社交和运动。一个在那里赚了10万美元的人立刻购买游艇，参加赛马，随后这就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运动。我的爱好却在其他方面。当完成工作回家以后，余下的时间我都会陪着妻子和孩子，或者在书房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喜欢的东西。

我的爱好在家里。这样不会让我在华尔街特别受欢迎，但是我没有办法。”

事实上，不善社交对于一个在公众社会里不太受欢迎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自从“黑色星期五”事件，以及被媒体过度报道过的，他通过牺牲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操纵伊利股票的事情以后，杰伊一直臭名昭著，人们视他为社会渣滓。既然已经成为美国最受鄙视的人之一，古尔德还是最好在家庭范围内寻找自己的快乐。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也是他一直乐意做的。然而，即使杰伊的顾家也被制造了负面报道。报纸引用许多乱七八糟的华尔街投机者的观点，认为古尔德是一个只有想从你身上赚钱才会接近你的势利小人。那些经常参加华尔街盛宴的记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不止一个记者拿言语简洁、沉默寡言的古尔德和性格开放、非常受欢迎的菲斯克作对比。他们一个被看做险恶的无耻之徒，一个被看做迷人而顽劣的坏男孩。最后，杰伊顾家的性格在公众的印象中变成了他没有朋友，除了自己的亲戚不会对任何人忠诚。古尔德最经常进行的夜生活就是饭后走到第五大道饭店，查看夜间交易，同经常出现在饭店大厅和酒吧的股票经纪商聊天。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在金融问题上，没有什么玩笑话；他的问题很集中，当他在交易者那里闲逛的时候，他的触角可以捕捉到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熟人们经常看到杰伊每天晚上在这里待一个小时，时间不会太长，只需把握市场脉搏就好。所以，在1870年夏天埃莉和孩子们去新泽西的朗布兰奇度假的8个星期中，人们没有看出沉默寡言的古尔德有什么变化。在这段漫长的单身生活里，他仍然保持良好的早睡习惯。他仍然避开菲斯克美女云集的喧闹生活，每个周末都会直奔朗布兰奇。船员们回忆说，每周五下午和周日晚上，古尔德都会紧紧地夹住公文包，站在他和菲斯克共有的“普利茅斯岩石”号汽船的甲板上，往返于曼哈顿和新泽西之间。

当8月19日登上甲板时，杰伊发现自己周围有600个菲斯克民兵团的士兵，他们开始前往朗布兰奇进行一年一度的露营。几十年后，乔治·古尔德回忆起和他那不像士兵的父亲一起在第九团“杰伊·古尔德营”参观的情景。在那里，6岁的乔治被允许对着海浪射击。“就像被养在宾馆一样，”《纽约先驱报》记者这样评论菲斯克娇纵的士兵，“他们没有带干粮，背着重重的行囊，但是里面装满了白裤子、白手套和其他没什么艺术性的装饰品。”

虔诚的埃莉·古尔德称赞菲斯克在星期天给士兵放假，虽然《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评论说，这是菲斯克9年里第一次听布道，“他被这种不寻常的感情深深地感动，流下了眼泪。对他来说这比一场戏剧要好得多。”

菲斯克继续这次夏季露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曼哈顿感情生活的破裂。就在他和这群人去朗布兰奇前不久，他受到了卓西的冷遇。后来，当菲斯克在朗布兰奇“训练”的时候，卓西结识了一个新男友：39岁人称“耐德”的英俊已婚男士爱德华·S·斯托克斯（Edward S. Stokes）。这个社交高手是布鲁克林炼油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由他的寡妇母亲所有。据熟悉他的人讲，斯托克斯“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他是一个急躁、紧张、乐观的人，当他认为自己被压迫或侵犯时，他会随时随地爆发。他对侮辱很敏感，会立刻恼怒地进行报复”。一年前，由于斯托克斯的暴躁和不理智地挪用公司资金，布鲁克林炼油公司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斯托克斯便引诱菲斯克（当时是他的朋友）加入公司董事会，进行了大笔投资。后来，菲斯克让斯托克斯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之间的石油享受伊利铁路的优惠运费；他还让斯托克斯垄断了伊利公司的大宗石油和煤油购买。结果，斯托克斯却偷走了菲斯克的女人。“曼斯菲尔德小姐，”描写菲斯克的传记作家R·W·麦克阿尔平写道，“对菲斯克没有真爱和激情，她和菲斯克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但是她真的爱斯托克斯；如果对这样一个老练而时髦的女人使用‘爱’这个字眼太浪费的话，那么安全的说法就是她对斯托克斯有热烈的情感。”

当然，菲斯克仍然像以前那样和一帮女明星和舞蹈演员混在一起，但卓西仍然是他浪漫生活的固定情人。当然，全纽约的人都知道菲斯克和卓西的不正当关系，所以当他突然将卓西赶出他付钱购买的豪宅时，自然让他非常尴尬。从卓西的角度讲，她好像也不太明白当一个男人包养一个女人时，作为回报他具有同样程度的排他性。“他给我提供丝绸、美酒、食物和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她后来说，“但是他不给我半点自由。”当菲斯克在9月初返回曼哈顿时，他见到卓西，拒绝了她愚钝的提议：作为继续供养她的回报，她将在和斯托克斯一起的同时，偶尔和菲斯克进行幽会。“那不可能，卓西，”菲斯克说，“你不能同时在一条铁轨上开两辆方向相反的火车。”

✦ ✦ ✦

1870年10月，英国人的股份仍然被冻结，那时有三个以上的亲古尔德的董事（其中包括古尔德的内弟小丹尼尔·米勒）以多数选票再次当选。在这次会议上，伊利董事会批准了自1869年以来管理层采取的所有行动、规章和项目。不久之后，随着英国人的诉讼在联邦法院的慢慢运转，古尔德尝试通过发行统一抵押债权取代先前公司发行的乱七八糟的债务，来解决伊利公司糟糕的财务状况。但是此时，这个华尔街臭名昭著的“荡妇”已经年老色衰、擦多少脂粉都无济于事了，古尔德发现这种债券无法吸引投资者。他自己以60美元的价格买了300万美元债权。在整个1871年，伊利铁路公司仍然在艰难前行。现在它不仅不是一条好铁路，而且作为投机工具也越来越没有利用价值了。

在伊利公司摇摇欲坠的时候，古尔德发现自己和曾经的盟友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古尔德和麦克亨利在1868年结成同盟，帮助拯救麦克亨利陷入麻烦的大西洋—大西部铁路——通过克里夫兰的中转站连接纽约的詹姆斯城、宾夕法尼亚的米德维尔和俄亥俄州弗兰克林的三条小宽轨铁路。麦克亨利将这条铁路租给伊利公司，和古尔德一起建立起一条利润丰厚的路线，用于克里夫兰和东海岸的石油运输。但是，后来由于两人意见的不一致，古尔德单方面（违法地）进行了有利于伊利公司租借条款的修改。在法庭诉讼战中，古尔德在1870年2月希望按照自己的条款控制大西洋—大西部铁路，而麦克亨利努力寻求重组公司，拖延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时间。到1871年10月，麦克亨利最终赢回了公司的控制权。

但是，如果不和伊利公司连接，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而只要古尔德控制了伊利铁路，新租约的条款就不可能优惠。因此，在接近1871年底的时候，麦克亨利和伊利的英国股东联合，准备共同将古尔德踢出伊利。麦克亨利还和1871年刚被选举出来的纽约革新共和党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查宁·巴洛（Francis Channing Barlow）结成同盟。虽然37岁的巴洛在纽约出生并长大，但是他自己声称和波士顿几个显赫家族有血亲。巴洛还是一个战斗英雄。他在安提塔姆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获取功勋之后，曾经因为在保卫葛底斯

堡的一个小山（后来命名为巴洛山）时受枪伤而暂时瘫痪。在他加入麦克亨利同盟的时候，巴洛（曾任纽约南部选举执行官）已经在帮助伯特进行反对古尔德的联邦诉讼。他还在司法部长的新位置上泰然自若地与萨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一起处理特维德腐败案。

或许是通过巴洛，麦克亨利的“伊利保护委员会”还求得了一个葛底斯堡退伍军人丹尼尔·E·希克尔斯（Daniel E. Sickles）的帮助。这个出生于1819年的希克尔斯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他在战前做过纽约城市大学坦慕尼派的公司顾问，美国驻伦敦使馆秘书，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民主党代表。希克尔斯在国会的两段职业生涯被他在1859年的丑闻破坏了，当时他枪杀了妻子的情人，美国国歌《星条旗》的作曲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凯（Francis Scott Key）的儿子菲利普·巴顿·凯（Philip Barton Key）。希克尔斯后来被判无罪，这成为美国第一例暂时性精神失常胜诉的案件。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为埃德温·M·斯坦顿（Edwin M. Stanton），也是后来林肯战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在战争期间，希克尔斯参加过半岛战役，并在转移到葛底斯堡前，在夏普斯堡和钱瑟勒斯维尔作战，他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不遵守军令使联邦第三军团遭受严重损失。但是，由于被南部军队的大炮炸掉了一条腿，希克尔斯获得了荣誉勋章。1869年从部队退伍后，希克尔斯和坦慕尼断绝关系，成为一名共和党人，后来格兰特任命他为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到了马德里，酗酒而无信的希克尔斯由于与放荡的前王后伊莎贝拉二世的亲密关系，迅速获得一个外号“西班牙的美国佬国王”。

1871年11月初，希克尔斯从麦克亨利那里拿了10万美元，在处理外交事务的空闲时间里回到纽约帮助起诉古尔德。一个月后，他对伊利公司提起了除伯特之外的第二个诉讼，攻击阿尔巴尼以求撤销《分类法案》。同时，麦克亨利的委员会通知全部伊利股东，“他将不考虑个人利益打破与伊利的合作关系”。古尔德看到这个通知，意识到反对自己的强大力量，明白自己的处境变得不安全起来。不仅伊利公开反对他，而且他的支持者也开始骚乱起来。就在几个星期前，共和党在曼哈顿和其他地区的改革运动，在民意测验中已经显示了坦慕尼派的绝对失败，使改革派控制了国家的立法体系。不久之后，特维德——《纽约时报》那段时间的焦点，成为每天托马斯·纳斯

特的讽刺漫画《哈珀周刊》的笑料——因为欺诈将被逮捕，辞去伊利董事的职位，失去作为坦慕尼派领袖的威严地位。至于菲斯克，他与卓西和耐德·斯托克斯的关系成为纽约每天报纸捕捉的焦点。负面的公众形象也使古尔德在伊利的控制地位受到威胁。

✱ ✱ ✱

整个 1871 年，“特别的恶臭弹”——乔治·泰姆普林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这样称呼他们——菲斯克、曼斯菲尔德和斯托克斯的三角关系稳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72 年新年刚过，因被抛弃而痛苦的菲斯克仍然是布鲁克林炼油公司的董事，他设法证明斯托克斯将公司 25 万美元挪作私用。他发出了贪污公款的逮捕令，给斯托克斯戴上了手铐。当斯托克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被判刑后，他立刻回过头来控告菲斯克恶意检举，索要 20 万美元。这一行动经法庭调解，最后以菲斯克同意购买斯托克斯家族在布鲁克林炼油厂的股份而告终。（这一交易给挥霍无度的斯托克斯带来一笔横财，但是切断了他将炼油公司作为私人银行提取现金的财路。）不久之后，斯托克斯虽然从菲斯克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但是他的偿付能力和信用立刻变得糟糕透顶，于是他准备采取其他行动。春季快结束时，这两个人同意将争端交给仲裁人处理。克劳伦斯·A·苏华德（Clarence A. Seward）律师最后裁决，斯托克斯——为了支持卓西的奢侈消费，迅速用光了从菲斯克那里得到的钱——除了从菲斯克那里得到在监狱里待了一晚上的 1 万美元赔偿外，不能再向菲斯克提出任何要求。

斯托克斯在 9 月花光了这最后的 1 万美元后，开始打菲斯克钱包的主意。这次，斯托克斯控告菲斯克盗窃布鲁克林炼油公司和伊利公司的资金，证据就是菲斯克在与卓西分手之前写给她的信。斯托克斯这次的把戏是诱使菲斯克买下这些信。事实上，这些信并没有涉及菲斯克的生意。然而，由于他提到了一些更为隐私和尴尬的话题，所以当菲斯克的朋友劝他将信公布于众时，他拒绝了。“你可能会笑我。”他在 10 月 27 日写道，“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能容忍将曾经最单纯的想法放在报纸上……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诅咒我，因为那件事情谴责我，或者其他事情嘲笑我——但是，你让我公开的是我的心，

我不会这样做的。”不久之后，斯托克斯将这些信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菲斯克，他这次又上钩了。后来，在付钱之后，斯托克斯再次想要报复，菲斯克便以敲诈罪将他逮捕。

那年秋季，菲斯克与斯托克斯的竞赛中途被打断过一次，当时是为大火灾后的芝加哥人组织筹集和运输救济。就像10年前他为安提塔姆的士兵组织募捐一样，活力充沛的菲斯克自己驾着马车（侧面喷有“为芝加哥的捐献”的字样）在10月10日傍晚驶过纽约大街。他挨家挨户停下来从伸出窗户的手中接过食物。同时，响应古尔德在纽约各大日报上的签名，批发商和慈善机构将大批食品、衣物和医疗供给运到大剧院。那天夜里，在剧院大厅，菲斯克指挥100多名志愿者，组织他们将货物放到贴有大幅宣传标语的向西行驶的伊利铁路上，将物资运往新泽西的铁路终点。

✦ ✦ ✦

在进行完芝加哥救援后，菲斯克开始做一些基础事务。11月26日，卓西在法庭上为斯托克斯的欺诈行为作证。在经验丰富的律师威廉·A·比奇（William A. Beach）的盘问下，卓西露出了她本来的面目：一个老练而财迷的狐狸精。几个星期后，1872年1月6日，B·H·比克斯贝（B. H. Bixbey）法官驳回了斯托克斯的上诉。同一天早上，大陪审团宣布斯托克斯和卓西勒索菲斯克成立，并发布了逮捕令。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的斯托克斯先到了卓西在西23街的家里，然后去了伊利城堡，要求见菲斯克，但是菲斯克并不在办公室。一个多事的警卫告诉斯托克斯，菲斯克正出席一个午宴，之后将去格林威治的中央大饭店。

斯托克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在下午4点左右赶到中央大饭店，比菲斯克稍早一点。理查德·万德尔（Richard Wandle），一个熟悉斯托克斯的职业赌徒碰巧在大饭店前徘徊。万德尔看到斯托克斯跳下出租车，飞奔出来，“不是跑，但介于跑和走之间”，走进了距离正门20码远的女士入口。他从女士楼梯走到二楼大厅，宾馆的服务员们则不安地走来走去。几分钟后，万德尔看到菲斯克从私人马车上下来，走进了斯托克斯走的那个入口。接着，这个赌徒听到了枪声：两声巨响，中间略有停顿。

“我看到爱德华·斯托克斯在楼梯尽头，”奄奄一息的菲斯克告诉验尸官，作为口述的临终遗言，“我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菲斯克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腹部，他摔下了楼梯。接着，菲斯克的左臂也被射中，当时，斯托克斯还站在楼梯顶端，逃离了现场。斯托克斯穿过二层大厅，将有4个枪膛的小枪扔到沙发底下，然后走下饭店的主楼梯到了一层大厅，说有人被枪杀。“是他，”一个看到整个过程的服务员大喊着，“他就是凶手。”斯托克斯对自己嘀咕了几句，然后站在那里，等着那个服务员从附近的莫瑟街警察局叫来警察。

起先，菲斯克看起来很好，在饭店医生的搀扶下能够走上楼梯，穿过一个小过道来到一个私人会客室。在那里，托马斯·H·翠普勒（Thomas H. Tripler）让他躺在沙发上。翠普勒医生将胳膊上相对较轻的伤放在一边，剪开菲斯克的衬衫查看腹部的伤口。医生的探针伸到了4英寸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子弹。那粒子弹射进了菲斯克的肠子拿不出来。菲斯克已血流不止。当被告知伤势太重可能没命时，菲斯克叫来了托马斯·舍曼和戴维·杜德利律师口述临终遗言。他还要求妻子露西从波士顿赶过来。纽约警察局的托马斯·贝恩斯（Thomas Byrnes）中尉后来回忆说，当他将斯托尔斯带到房间时，菲斯克“躺在那里好像没有受伤一样”。斯托尔斯“表情严肃，坚定不移，好像压抑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当贝恩斯让菲斯克指认时，菲斯克点头回答说：“是他，就是这个人对我开枪。他是奈德·斯托尔斯。”

菲斯克慢慢死去了。被被告的特维德（古尔德给他提供了100万美元的保释金才获得自由）和舍曼、菲尔德和古尔德一起来看望将要死去的菲斯克。古尔德开始很镇静，后来一向难以捉摸的他，最后打破了那种紧张气氛。“每个人，”一个在场的人说，“突然吃惊地看到古尔德将头埋在手裡，带着深深的哀伤无法自制地抽泣起来。”这时，一个伊利公司的人进来在古尔德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古尔德留下贝恩斯，建议他加强土姆监狱（斯托尔斯关在那里）的警备，因为他听说纽约民兵第九团计划揪出斯托尔斯，将他吊在伊利城堡的房顶上。纽约警察局长约翰·凯素（John Kelso）在监狱安排了250名警察。

1月7日上午6：20，露西从波士顿赶到纽约，菲斯克被注射吗啡处于昏

迷状态，10：45去世。根据《纽约太阳报》记者报道，几分钟后，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出现在会客厅门口。她坚持要表达对菲斯克的崇敬，她说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菲斯克已经连续6个月给她和孩子提供食物。正如当时一个社论家评论的那样，纽约到处都有接受或感受过菲斯克慈善捐助的人。“他们记得这个穷小子通过艰苦认真的奋斗取得了成功；他上升的地位和艳俗夸张的装束显露着他自由而慷慨的个性，这掩盖了他曾经犯过的错误。”此外，卓西在警卫的看守下待在菲斯克买给她的房子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很符合其个性地将焦点对准自己。“我希望人们清楚地明白，”她说道，“我和这些令人遗憾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用我的名誉担保。”

菲斯克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后，媒体在伊利城堡采访了古尔德，他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悲恸：“我无法描述自己有多么痛苦。我们在一起合作了五六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不愉快。他天性和蔼，所有和他共事的人都喜欢他。”对于菲斯克喜欢美酒和女人，古尔德说：“自从他和曼斯菲尔德小姐关系破裂后，他变了很多。他停止了以前的一些老习惯，开始做每个爱他的人希望他做的事情。他以前的酒肉关系迅速破裂，如果他能多活些时间，他的言谈举止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没有说他以前的不恰当行为是令人憎恨的。”

第二天（1月8日），詹姆斯·菲斯克上校的遗体被穿上制服停放在大剧院里，到下午两点大门关闭的时候，2万名纽约人来向他告别致敬。不久后，第九团的士兵护送着菲斯克回到家乡布莱特尔博罗。“沿着第二十三大街放眼望去，”《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写道，“人行道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大街两侧的住户和许多被邀请来的朋友……挤在窗户边。”只有卓西的公寓关着门。一队马车跟着灵车，杰伊、埃莉和露西坐在第一辆马车上。在老纽黑文火车站（位于第四大道26街，不久成为第一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所在地），菲斯克的士兵们将棺材放在铺满绸纱的车厢里，机车也盖上了绸纱。9个小时后，当菲斯克回到家乡时，5000名父老乡亲在黑夜里等他。他的尸体被停放在父亲的里维尔酒店，9日中午，他的亲戚将他送到希望山公墓（Prospect Hill Cemetery），几年前他曾半开玩笑的出钱修建了这个公墓的围栏。

耐德·斯托克斯的家人雇了最好的刑事律师。第一轮审判由于陪审团被收买而中断。第二轮审判将斯托克斯定为一等谋杀犯，判处死刑，但是被斯托克斯进攻性的精心策划而驳回。第三次，最后宣布斯托克斯为误杀，在纽约监狱服刑4年。在此之后，虽然任何一家有地位的俱乐部都不会再欢迎他，但是他至少留在了纽约，于1901年去世，终年60岁。至于卓西，谋杀案发生后她便去了欧洲，在那里住了25年。她有时做演员，有时做妓女，还曾经一度嫁给有钱但酗酒的、被美国驱逐出国的罗伯特·利维斯通·瑞德，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生活。1899年他们离婚后，年老的卓西一直由她在达科他州沃特敦的哥哥接济。10年后，他的哥哥也去世了，卓西又回到欧洲（主要是巴黎），在那里贫困潦倒地过了22年，于1931年去世，享年83岁。

菲斯克的遗产总共不超过100万美元，远远低于有些人猜测的那样，但是也足够了。和无数媒体报道的正相反，菲斯克将遗产留给了露西。和凡妮·哈罗德一起住在波士顿的露西，会定期找古尔德咨询财务方面的事情。露西在1881年曾试图写文章消除对古尔德的负面谣言，她认为古尔德是“菲斯克去世后，唯一一个提供切实帮助和需要的朋友”。露西死于1912年，终年76岁。她和吉姆及其家人葬在希望山，他们的坟墓花了2.5万美元请雕塑家拉金·米德建造。“墓碑的一侧雕刻着吉姆的肖像，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菲斯克的老朋友富勒在1927年写道：

“巨大基座的4个角用大理石雕刻着4个年轻女孩的形象：一个头上戴着火车花冠，代表铁路；第二个用水代表社交；第三个代表地位；第四个代表最广泛意义上的交易。数以千计的参观者前去瞻仰这个佛蒙特之子的纪念碑，其中许多人还抠下几块意大利大理石带回家留作纪念。这让这座纪念碑更适合纪念菲斯克的职业——在许多方面非常独特，但是也有污点。”

被谋杀后，菲斯克受到了媒体最温柔的礼遇。作者们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一个引人入胜的关于人类福祉的故事，不遗余力地将菲斯克夸大成一个仁慈的浪子、慷慨的盗贼、有着良好意愿的骗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习惯

性地缩小菲斯克原先被认为阴暗的一面，后者的名誉问题则更是只字不提。甚至有一个作者说，古尔德—菲斯克联盟中不该死的人反而死了。公众也持有类似看法。“我们不应该对詹姆斯·菲斯克草率地下结论，”J·G·杜德利上校在《纽约先驱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是时代的产物——他是职业中公众和私人道德共存状态的法律产物。他发现了司法体制的腐败，他贿赂他们；他发现法官的唯利是图，便开始行贿；他发现社会上大部分人喜欢粗俗的表演，富丽堂皇的环境，便迎合了这部分人的口味……但是他最后的死亡补偿了他生命中的放纵。”菲斯克作为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得到了这些作者们的谅解，但是他们却没有用同样的仁慈原谅古尔德。“让慈爱原谅菲斯克的罪孽——但愿他的同伴（古尔德）不要再骚扰这个世界。”

后来，一些记者甚至认为是菲斯克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将伊利整合成一个企业，古尔德只是一个跟在后面的附属物。“董事会中的大多数人，”《纽约太阳报》写道，“都是古尔德的敌人，都希望他从总裁的位置上退出，但他们都是菲斯克上校的朋友，为了菲斯克，他们忍受了他们的敌人处于领导地位，直到菲斯克去世。斯托克斯的子弹在驱走菲斯克上校姓名的同时，也消灭了杰伊·古尔德的领导权。”

其实，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第二十二章

被诅咒的恶棍



菲斯克在被谋杀之前的几个星期，辞去了副总裁和总经理的职位。虽然他仍留在伊利董事会，但是他知道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不久之后自己就要出局了。面对麦克亨利和英国股东的挑战，古尔德作了最后的反击，他于1871年12月11日写信给华尔街两个最受人尊敬的人，提出了新的伊利公司董事会建议。这两个人是未来的纽约州州长、美国副总统利维·P·默顿（Levi P. Morton）和华尔街著名的邓肯-谢尔曼公司的合伙人威廉·巴特勒·邓肯（William Butler Duncan）。古尔德建议成立一个由“全美最优秀的铁路和金融人才”组成的董事会。他相信，这种安排可以使伊利公司在世界金融市场重新获得信任。古尔德理想中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默顿、邓肯、他自己以及奥格斯特·贝尔蒙特、J·P·摩根、依拉斯塔斯·科宁（Erastus Corning，代表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詹姆斯·F·乔伊（James F. Joy，代表密歇根中央铁路）、范德比尔特的女婿贺瑞斯·F·克拉克（代表范德比尔特的湖岸-密歇根东南铁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其他显赫人物。虽然古尔德仍然处于控制地位，但是所有这些绅士都可以有自己的发言权，“公司的永久组织结构将由威廉·巴特勒·邓肯、利维·P·默顿选出”。从古尔德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里面少了菲斯克、莱恩和特维德。古尔德的姐夫米勒和弟弟艾布拉姆也不在其中。

在菲斯克去世的时候，邓肯根据古尔德的备忘录和古尔德控制的28万股股份前往英国取悦一大批英国股东。同时，麦克亨利也在英国更成功地从事了同样的活动。乔治·克罗奇最近从他原来老板的沉船中跳了出来，来到英国向广大英国投资者耳朵里灌输伊利城堡的阴暗故事：欺诈、盗窃，还有一个沉迷于权力和贪婪的执行委员会。

2月初，克罗奇离开麦克亨利回到纽约。在那里，他按照麦克亨利的旨意，和希克尔斯一起花重金在伊利董事会策划了一起政变。随着英国人联邦

诉讼案的不断进展，以及在共和党人控制的纽约州立法机构下，《分类法案》被取消只是时间问题，一批原先支持古尔德的伊利董事感到杰伊的时日已经不多。因此，他们希望从麦克亨利那里求得有利可图的妥协。克罗奇用 67 500 美元招募了弗雷德里克·莱恩，又分别用 67 500 美元和 25 000 美元收买了亨利·汤普森和约翰·希尔顿。菲斯克以前的支持者 M·R·西蒙斯也在 4 万美元的诱惑下投靠了克罗奇。新任命的副总裁 O·H·P·阿彻收到了 4 万美元。伊利公司的董事长秘书 H·N·奥蒂斯得到了 2.5 万美元，贾斯汀·怀特也拿到了同样多的钱。查尔斯·西森、乔治·豪和霍默·拉姆斯代尔（Homer Ramsdell，前总裁，现在的董事，对古尔德不满）则无条件地参与了反叛行动。同时，米勒和艾布拉姆·古尔德由于无法贿赂，所以没有包含其中。2 月 27 日，克罗奇给伦敦的麦克亨利发电报说：“伊利董事会的绝大多数都支持我们。古尔德的大权已被架空。这个消息将于 30 日被公布于世。”

知道这个情况后，麦克亨利买进了大量低价伊利股票，以便在古尔德出局的消息公布后借股价反弹获利。克罗奇第二天又发来消息：

“买下你所有想买的了吗？……我们已经从三个方面狙击敌人。第一，希克尔斯将古尔德的注意力转移到立法机构；第二，通过司法部长，古尔德将在侧翼受到法庭攻击；第三，在你的指挥下，成功地蚕食掉伊利公司的大本营。为了掩护我的暗中操作，我决定在媒体上加大攻击力度。”

事实上，克罗奇在媒体上的炮轰（通过他以前工作过的《纽约先驱报》）非常刺耳。“这里没有欺诈的容身之地，”该报在 3 月 1 日写道，“不管他们防护多么严密，他们都会向独立而强大的媒体的连续而准确的报道屈服……坦慕尼是溃疡，伊利是癌症。他们必须被立即根除，我们必须尽力保证他们不要在公众的肌体上复发繁殖。”

3 月 8 日，9 名伊利董事通知古尔德参加 3 月 11 日星期一召开的董事会，讨论如何应对“社会上日益增加的、对伊利管理的不信任问题”。这次会议

的目的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希望将先前由特维德和菲斯克控制的董事会替换成麦克亨利的人。在此之后，每个参与此次活动的董事都会辞职，替换成麦克亨利的同盟。但是，几个星期前，在伊利的董事会决定采取行动前，莱恩告诉了古尔德此次阴谋的内幕。“他们也收买了我，”莱恩告诉古尔德，但是“实话告诉你，他们并没有给我足够的钱来买动我”。古尔德后来评论说：“由于非常了解莱恩，所以这番话他几乎都听进去了。”因此，古尔德只是拒绝在11日召开董事会，那时副总裁阿彻将会取代自己。

即使古尔德迅速得到了控制这一进程的禁令，这帮合谋者还是在中午聚集在董事会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行动。简言之就是，一系列仔细规划过的任命、辞职和选举都按照计划进行。古尔德被解雇，新任命的总裁是约翰·A·迪克斯（John A. Dix），著名的美国前财务部长，纽约州参议员。古尔德在12：30来到会场，命令将所有叛变董事扣在会议室，由几个汤姆·林奇的人看管。后来，他们听说希克尔斯正带着美国警察强制任命新的董事会，杰伊便和舍曼、莫若西尼和几个林奇的保镖一起将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

大约到了下午1点，希克尔斯和警察来到现场，他们开始撞古尔德办公室的门。古尔德拒绝开门，警察用棍棒撬开门冲进房间。古尔德立刻逃进了另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一个小时前还属于莱恩。和他在一起的有莫如西尼、被打伤的舍曼和几个林奇的人。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夜，直到星期二一早才安静下来。希克尔斯同意将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资产从所有伊利债务中释放出来，也同意清算古尔德和公司之间的账务，归还由古尔德为伊利公司筹到的借款（大约200万美元）。根据这些条件，古尔德同意只要让他作为董事长重新召开会议，取代那个“不合法”的会议，他就立即辞职。

当古尔德最后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按照《纽约太阳报》的说法，“非常苍白虚弱，几乎不能走路”。古尔德直接走进会议室和新老董事一起迅速召开了秩序井然的会议。麦克亨利开始任命的两个人被提名，并确认取代菲斯克和特维德的位置。接着老董事依次辞职，并根据精心策划，选举麦克亨利的人依次坐上了圆桌。当这个漫长的过程结束后，古尔德宣布：“先生们，我辞去伊利铁路公司董事长的位置。”新董事会成员立刻投票赞成古尔德的辞呈。接着，通过了一个声明，支持废除由纽约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发布的

《分类法案》。

会议结束的时候，古尔德和迪克斯一起来到总裁办公室。“这里太乱了。”他抱歉地说，在这堆垃圾中挥舞着手臂。接着，古尔德叫来汤姆·林奇，让他带他的人离开。最后，古尔德自己永远地离开了伊利城堡。接着，新闻报道将伊利办公室发生的政变描述成“秩序和正义的代表赶走了古尔德”。卡通和漫画家们将古尔德画成一个像黄鼠狼一样逃走的懦夫——一个被逼急了跳墙的胆小鬼——并且很高兴。

✦ ✦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古尔德待在家里看着自己的财富暴增。他仍然是伊利股票最大的持有者。在他被踢出伊利董事会的第二天，伊利股价由于伦敦的大宗购买由 30 美元升至 40 美元。三天后，升到 47.5 美元，两个星期后，升至 67 美元。到了 5 月，涨到 75.875 美元。古尔德从中赚了几百万。

他缓慢而稳步地在每个最高点售出股票，因为他对股价没有任何幻想。他知道市场不久就会发现伊利公司仍然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新董事在检查公司账本的时候发现了 500 万美元的浮动利率债务，其中大部分都由古尔德同党持有，他们要求古尔德立刻偿还。同时，“新伊利”内部也产生了裂痕。代表英国股东利益的伯特不信任麦克亨利，认为麦克亨利的主要利益是想操纵伊利股票，从而支持大西洋 - 大西部铁路的股价。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在 3 月 16 日废除《分类法案》时，法案包含一条禁止任何大西洋 - 大西部铁路的董事成为伊利的董事。废除法案的文件中还要求在 7 月重新选举新的伊利公司董事会。当选举开始时，被看作是过渡期总裁的迪克斯被创建了南部开发公司的彼得·H·沃森（Peter H. Watson）取代。在废除《分类法案》和 7 月 9 日选举之间这段时间里，麦克亨利一直在取悦英国股东，维护一种不稳定的和平状态。因此，新总裁沃森和其他伊利董事在进入夏季时很多仍是麦克亨利的党羽。事实上，在沃森选举的那天，新董事会同意支付给麦克亨利 75 万美元，以偿付他赶走古尔德付出的成本。

✱ ✱ ✱

两个月前，老熊德鲁——现在是一个活跃在市场外围，相对较小规模的、非常不起眼的操作者——在12月底以55美元的价格卖空了5万股伊利股票。他将伊利公司糟糕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自己投资的依据。在沃森取代前总裁后的一个星期，公司搬出了伊利城堡（仍然属于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资产），回到公司原来较便宜的杜南西大街。经过在杜南大街几个夜晚的思考，沃森宣布伊利公司前6年的账务都是假的。接着，他授权起诉古尔德，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声称这笔钱都被前总裁错误地分配了。同时，沃森开始处理他声称是古尔德使用欺诈性行为发行的65万股股份。在做这两件事的同时，他已经否定了希克尔斯4个月前对古尔德的承诺。范德比尔特又给这种弥漫着官司味道的气氛添了一笔，他起诉伊利，要求支付在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债券上的担保利息，他已经在1868年将该部分利息作为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铁路违约的清算担保。

所有这些消息都使伊利股价一泻千里。8月，股价跌至40美元。德鲁在此价位买进5万单位合约，对冲掉自己55美元卖出的合约，净赚75万美元。德鲁将在9月赚的钱连本带利又投进了伊利，进行一次简洁的狙击战。德鲁的陷阱就是想擒住杰伊·古尔德。古尔德和他的老搭档亨利·史密斯最近正在从事卖空伊利和太平洋邮递（一家西海岸的汽船公司）股票的行动。他们两个各自勉强拿出40万美元对冲在伊利上的卖空。对古尔德来说，损失了40万美元虽然让人烦恼，但是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却不是致命的。对于史密斯来说却不是这样，在1870年8月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解体后，他没有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当古尔德拒绝补偿史密斯的损失时，史密斯宣布终止两人的关系，并威胁说：“我一年后将得到比你更好的合作伙伴。”

✱ ✱ ✱

改革派共和党的暴风骤雨扫除了古尔德的司法避风港卡多佐和伯纳德。卡多佐在7月辞职而没有面临被弹劾。他之后继续从事法律事务直到1885年去世。伯纳德拒绝辞职。相反，他在被纽约高等法院弹劾前，还进行了一个

包含参议院和上诉法庭的简单案件的审理。8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高等法院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同意解除伯纳德的法官职位。6年后伯纳德去世。至于特维德，他第一次贪污案的审理被搁置。在11月第二轮审理结束时，特维德被判12年徒刑，后来更高一级的法院减轻了这一处罚。特维德最后服刑一年。在刑满释放后，纽约州立刻起诉他赔偿600万美元，并将他关进债务者监狱，直到付了一半的保释金才出来。1875年12月期间，在获得探亲假释后，特维德逃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做了一年的普通海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后被认出来是因为纳斯特的卡通漫画。他被遣返回美国，于1878年4月12日死于纽约拉德洛街监狱。在特维德葬礼的当天，数以千计的人们前往他女儿位于东77街的前吊唁。特维德家族葬在布鲁克林绿树林公墓里，纽约记者们注意到，近1500个出席葬礼的人都是纽约的穷人，许多人以前接受过坦慕尼派的捐赠。没有重要官员出席特维德葬礼。古尔德也没有参加。

✦ ✦ ✦

在与亨利·史密斯进行代价昂贵的卖空伊利和太平洋邮递股票的同时，杰伊·古尔德实际上在通过一系列与不同经纪公司的特殊关系，将余生在华尔街的所有业务进行了交易。他进行奢侈的匿名交易，通过不同经纪商进行双向投机。最后，杰伊在华尔街建立了如此广大的交易网，以致他变成了一种幽灵似的人物：曾经现身过，但经常看不见摸不着。

9月底在他与史密斯的几次联系中，史密斯希望坚决持有太平洋邮递的卖空头寸，即使太平洋邮递的管理层已经在阿尔巴尼通过了允许将汽船公司股本减半的议案。看到这种大好形势后，古尔德随着太平洋邮递公司购回股票，该公司股价将不可避免地升高，而不会下跌。因此，他果断地止损平仓退出。但是让仍然持有卖空头寸的史密斯烦心的是，杰伊迅速购买股票，和公司购回股票一样大大刺激了股价上涨。在10月，太平洋邮递的股票从73美元涨到103美元，这给史密斯以致命打击，也被古尔德的心口不一和恶毒心肠而深深激怒。

不久之后，史密斯更加郁闷。古尔德很清楚，秋季的时候史密斯已卖空

了芝加哥 - 西北铁路的股票。事实上，他同意以 75 美元的价格卖掉 3 万股股票。古尔德也知道几个西北公司的董事和德鲁（他自己以同样的价格卖空了 1 万股）一样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所以，当跟随古尔德离开伊利的莫若西尼得到消息说，奥格斯特·斯盖尔和范德比尔特的女婿贺瑞斯·克拉克对西北公司很有兴趣时，这个信息对古尔德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两个人在近几个月一直疯狂购买股票。但是，直到他们告诉古尔德这个伊利事件中的复仇者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西北公司巨大的卖空头寸。现在，他们打算和古尔德一起囤积股票，拉升股价。

他们的拉升计划在 11 月 11 日被暂时中断，当时一场大火肆虐了波士顿，引起市场暂停。此外，史密斯在 75 美元的价位上增加了 1 万股的卖空头寸，因为在去年芝加哥大火后他卖空股票赚了一大笔钱。但是，这次市场立刻就恢复起来。西北公司的股票在 11 月 20 日（星期三）的时候涨到了 95 美元，当时，史密斯、德鲁和其他几个卖空者正满街寻找股票对冲他们的头寸。但是，“大熊”们不久就意识到，古尔德、克拉克和斯盖尔正设下熊套捉熊呢。“在这场战斗中，《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写道，“他们如此谨慎而细致地囤积股票，巧妙地拉升股价，牺牲者们或者优雅地同意割肉，或者为了妥协或复仇而进行绝望的一击。”

此时，史密斯找到古尔德希望他能提供自己需要的股票。古尔德拒绝了，史密斯发出了最后通牒。伊利公司对古尔德 1 000 万美元的诉讼最近由于缺乏证据被撤销。史密斯提醒古尔德，这些证据都放在史密斯 - 古尔德 - 马丁公司的老账本里，它可以告诉大家这些年里古尔德和菲斯克对伊利公司的金融操纵。史密斯威胁说，除非古尔德交出股票，否则他将把这些证据交给伊利总裁沃森。但是，古尔德似乎并不在意。“很好，”他对史密斯说，“交给他们吧，我不反对。”

西北公司的股票在 21 日（星期四）的时候达到了 100 美元，当天史密斯拿着账本找到了沃森。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沃森控告古尔德要求他赔偿 9 726 541.26 美元，法官发出了逮捕令。由于古尔德已经提前被史密斯威胁过，所以星期五当司法长官出现在布罗德大街 34 号的奥斯本 - 查品公司古尔德办公室的时候，古尔德早有准备。克拉克、斯盖尔佩和古尔德一起来到警

察局。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古尔德最新的私人顾问，此人也是特维德的顾问——年轻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未来的作战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古尔德的逮捕令要求他支付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克拉克和斯盖尔立刻支付了这笔钱。在古尔德待在监狱的半个小时里，西北公司的股票从105美元涨到165美元。交易所最后一笔交易价格是200美元，此后再也没有购买者。在第五大道饭店夜间交易中，该股价格涨到210美元，还有一个出价300美元。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西北公司以150美元开盘。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价格下跌意味着囤积的终结，或许是因为古尔德的被捕。事实上，古尔德和他的同伙只是可怜一些小投资者，给他们留了一个窗口在合理的价格逃走。古尔德的仁慈，根据《纽约太阳报》的观察，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小规模卖空者在一个他们能支付得起的价格清算，对经纪商来说是件好事情，对于古尔德先生的同党来说更是件好事，他们破产所造成的混乱将会抢走他们辉煌胜利带来的丰硕果实。”但是，像史密斯、德鲁这样的大操作者则只能自己顾自己。德鲁损失了150万美元，史密斯被迫以200美元平仓，个人损失了500万美元。之后，他在古尔德面前晃动起自己的手指大声说：“我一定要活到亲眼看着你拿着手风琴，带着猴子，靠在街头卖艺为生。”古尔德回答说：“或许你会看到，亨利，希望你能看到。如果我需要一只猴子，我会派人去你那里拿。”古尔德和他们的同伴们净赚了2000万美元。

看到西北公司这一幕，后，《纽约先驱报》的记者不情愿地恭喜古尔德道：“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金融投资战略”。但是在《纽约商业广告报》赞扬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同盟”的一部分人时，这个海军中将写信声称自己和此事无关。范德比尔特给《纽约商业广告报》编辑的来信刊登在26日：“亲爱的先生：最近在西北公司股票上的操作赢得了媒体的反响。我的名字也被和古尔德，以及其他参与此次活动的人放在了一起，这对我是不公平的……我的名字和古尔德先生经常放在一起会误导公众，对我造成伤害。”

一天后，《纽约太阳报》的记者要求范德比尔特讲述为什么贬低古尔德。由于不想再深究几年前那次复杂的金融交易的细节，老海军中将说他不喜欢古尔德是因为不喜欢他那张脸。“没有一个有那样面容的人会是诚实的人。

上帝已经把一个人的性格刻在了他的脸上，我第一次见到古尔德，就像是在阅读一本被打开的书……我可以授权你说，我认为杰伊·古尔德先生是一个被诅咒的恶棍。”被问及对此评论的看法时，茫然的古尔德说或许 79 岁的范德比尔特老眼昏花了。（古尔德当时 36 岁。）接着他补充说：“至于对我个人相貌的批评，他应该虔诚地反省上帝赐给了他同样糟糕的智慧。”

✱ ✱ ✱

杰伊意识到彼得·H·沃森和伊利公司的起诉，加上该死的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账本，在法官不能被收买的情况下不一定能取得胜利。但是，他也从其他渠道得知极度缺乏现金的沃森害怕长期的法庭较量和古尔德专家长达几年的拖延。仔细考虑相关情况后，12月初，杰伊和沃森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面，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达成双赢的结果。最后，在12月17日，古尔德给沃森写了一个正式的建议条款备忘录。在处理所有关于他的伊利公司债务时，古尔德可以提供不同的股票、债券和实物资产（包括伊利城堡），他认为这些将比所有债务值钱得多。杰伊写道：“我之所以做这些，只是希望谋求和平，因为这类问题的任何诉讼对我来说比损失钱财还要烦人得多，因为我真诚地希望伊利公司成功，我对伊利有特别的兴趣。”伊利董事会于19日同意了古尔德的要求，这个消息发布后，伊利股价涨到 62 美元。

古尔德这次在伊利公司花费的筹码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他所占有的是以每股 50 美元的价格购买 20 万股伊利股票的期权。因此，古尔德清算的消息传出后股价的反弹使他净赚 240 万美元。同时，他放弃的财产价值是 970 万美元。（交出的价值，包括伊利城堡，其抵押权也不是很明晰。）但是，到了 1874 年初清算结束时，距离最初清算已经过去了 15 个月，伊利公司比先前新管理层刚进入的时候还要破败不堪，而古尔德再次强大起来：一个不可动摇的金融巨兽。同时，伊利案件最后的希望，在该年莫若西尼和汤姆·林奇突然拜访亨利·史密斯在新泽西度假的寓所后也动摇了。在那里，由于史密斯在纽约，所以这两个古尔德的保镖逼迫保管员交出放有古尔德-史密斯-马丁公司账本的箱子。至于莫若西尼如何得知史密斯将账本放在那里则不得而知。当然，这些记录将再也不会被看到。

第二十三章

横贯大陆的铁路



1873年，古尔德认识了一个人，此人在接下来的19年里将成为他最大的合作者。罗素·塞奇，年长古尔德20岁，也像他一样来自偏远的内陆。塞奇于1816年出生于靠近奥奈达的一个农场，开始在特洛伊做杂货商，并在那里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他在1845年被选为市议员，1853年~1856年间作为辉格党成员在议会服务。在此之后，他进入银行业，于1863年移居纽约。6年后，也就是53岁那年，他和41岁的奥利维亚·斯洛克姆（Olivia Slocum）在纽约结婚。奥利维亚后来成为古尔德的妻子埃莉和女儿奈莉的密友。这对夫妇住在第五大道506号古尔德寓所偏南的一个街区。

塞奇不像古尔德以前的搭档菲斯克那么富有传奇色彩。虽然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但却非常节俭。杰伊的侄女爱丽丝·那斯洛普回忆说，塞奇曾在他叔叔面前自豪地挥舞着打折买来的帽子。“1美元。”他对古尔德吹牛说，“买一顶帽子不能超过那个价钱，不值。我的帽子和你的帽子戴的时间一样长。”爱丽丝还记得杰伊叔叔“仔细而礼貌，虽然没有多大兴趣”地翻看着塞奇的战利品。塞奇比古尔德高一点点，5英尺10英寸，穿二手西装，以从来不付小费而闻名。（在他1906年去世后，为了补偿他一生的吝啬设立的罗素·塞奇基金，用了他接近一半的财产。）在华尔街，塞奇被看做卖出期权、买入期权、利差和马鞍期权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严谨的财务保守主义者，塞奇习惯于保有大量现金。塞奇在才智方面也不像菲斯克，他却可以与古尔德相媲美。菲斯克总是跟随古尔德的投资活动，而塞奇有自己的主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塞奇和古尔德合作过无数次交易，但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他们的想法一致。但是，他们一直都是朋友。

虽然古尔德很喜欢塞奇，但是有时也会对他那情绪化朋友的经常自怜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小题大做失去耐心。古尔德曾经告诉过纽约中央铁路的昌西·迪皮尤（Chauncey Depew）这样一个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

段时间，市场与塞奇的预期不一样，让他背了大笔债务。这些债务虽然很令人烦恼，但是并没有触及塞奇财富的大部分。但是，迪皮尤回忆说，这个打击“使塞奇病倒了，他宣布自己破产。古尔德先生和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关心他的生活，去看望他。他们发现塞奇垂头丧气，精神状态很差。古尔德对他说：‘塞奇，如果你愿意把存在银行、信托基金和安全性良好的公司里的现金转让给我的话，我将替你承担债务，你可以持有你所有的证券和实业资产’”。这个建议——正如杰伊希望的那样，很傲慢地证明了塞奇在偿还债务后的净资产仍然很多——有效地消除了塞奇的焦虑。他喊道：“我不会这样做的！”然后他从床上跳起来，病立刻就好了。

1873年4月29日，塞奇和古尔德在代尔莫尼克餐厅吃饭，这时约瑟夫·J·马瑞恩（Joseph J. Marrin）——在“黑色星期五”中代理过许多反对古尔德案件的律师——走到他们的餐桌旁，谴责古尔德在处理案件时信用太差，并在古尔德的脸上打了一拳。古尔德起诉了马瑞恩，最后马瑞恩赔偿了200美元。纽约的各大报纸又津津乐道地报道了这一事件。《纽约先驱报》说马瑞恩应该因此被授予奖章。《纽约时报》的编辑虽然谴责马瑞恩的暴力，但却表示理解他的动机。（1872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了古尔德和他生意上的一些操作。）《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和《纽约夜间邮报》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同时，在所有的报道中，他们都强调在古尔德被打时表现得并不“令人尊敬”：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站起来还击，而是捂着流血的鼻子，做了缩头乌龟。接着，一个躲躲藏藏的懦夫形象，一个只吃尸体的秃鹫形象出现了。作为被攻击和被殴打的受害者，古尔德却也要受到诽谤和谴责。

只有一家报纸有力地谴责了马瑞恩的攻击行为。《纽约论坛报》批评马瑞恩太缺乏绅士风度，甚至将他和亡命之徒耐德·斯托克斯作了比较。《纽约时报》周刊挑出《纽约论坛报》文章的要义，接着引用了该报的报道，评论说，“马瑞恩事件”可以被看做古尔德每天正在稳步扩大对对手的影响的有力证明。正如《纽约时报》周刊编辑所痛心指出的那样，在1872年《纽约论坛报》编辑贺瑞斯·格里利去世后，格里利的助手怀特劳·里德已经用古尔德借给他的钱控制了报纸，作为抵押，古尔德持有了《纽约论坛

报》的股份。在此之后，所有关于古尔德的批评和负面报道都从该报纸上消失，人们普遍怀疑古尔德计划通过财经新闻达到他在华尔街不同操作的目的。《纽约太阳报》将《纽约论坛报》看做“由杰伊·古尔德的内线”操纵的“股票批发机器”。此时，该报的财经编辑也在交易所受到那些不喜欢《纽约论坛报》对古尔德友好态度的经纪商们的人身攻击。当《纽约论坛报》打算在市中心总部旁边建一座新的大楼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建议他们做一尊合适的雕塑：“杰伊·古尔德，在墨菲斯托菲里斯的面具下，以强大的《纽约论坛报》股份和一群被收买的4个州的立法官员做为后盾。”

爱丽丝·那斯洛普有一天说，她舅舅一点都不在意报纸的评论。“杰伊舅舅对媒体的态度，”她写道，“是非常消极的——傲慢和鄙视的混合体。”但是爱丽丝错了。事实上，古尔德是早期华尔街大亨们最了解媒体作用的人之一。他不仅促使《纽约论坛报》为自己服务，后来还直接拥有《纽约世界报》长达4年之久（1879年~1883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掌握了如何有策略地驱使对自己不友好的报纸为自己服务的非凡能力。“公众听到他的消息，”一个编辑回忆道，“只有当他——而不是公众——希望通过发表言论获利的时候，才会主动在媒体上出现。”当古尔德安排采访时，不管是在《纽约时报》还是其他的报纸，总是有一定的目的。他在这些场合的言论虽然完全真实，但通常是误导的杰作。同时，古尔德也很注意默默培养与所有记者的关系，给他们提供不同股票操作的建议。杰伊·古尔德在这些场合提供的不只是新闻，还有对记者如何买卖自己的股票组合提供优于公众新闻的良好建议。“持有一些联盟股对你没有坏处。”古尔德在1874年1月对《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沃德说道，“我认为它将是下一单大生意……我希望你能将它写得好一点。”通过这种交流，古尔德和关键记者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通过提供智力贿赂，引导舆论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古尔德还利用媒体培育自“黑色星期五”以来自己树立起来的公众形象——阴暗、高深莫测、没有良心、毫无同情心的金融市场霸主。莫若西尼回忆说，古尔德总是重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话，被人害怕比被人喜欢更好，并解释说他既是恶魔，又是少年天才的形象是他最有价值的财富。“现在华尔街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报纸评论说，“他的名字建立在毁灭的基

基础上，他低声说着‘毁灭’……那些诅咒他的人并不是盲目的，他们只是在诅咒一个在胜利之后进行大屠杀的人。”还不到40岁的杰伊·古尔德已经臭名昭著，但是这也使关于他的一句谣言就会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他的同辈们憎恨他，但是所有的视线都集中于他。上升中的股票只要听说杰伊做多或做空就会下跌。经纪商们互相竞争，以获得关于自己利益的智慧。

《纽约世界报》曾不只是推测地声称，杰伊对于市场影响的强大力量不仅在于他的技巧和技能，还在于他被假想的恶毒。这种恶毒是杰伊自己经常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宣传而来的。当被问及对愤怒的亨利·史密斯曾评论他是一个背叛者、犹太的看法时，古尔德只是神秘地微笑着，然后离开，并没有去否认什么，好像一点都不关心自己名声的好坏。通过这种方式，他给媒体塑造出的古尔德的形象留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操作者，还是一个喜欢毁灭别人，而不在乎其他人知道的冷血野兽。当有谣言提起古尔德的犹太血统时，杰伊在《纽约论坛报》安排了一篇社论，对自己的血统只字未提，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捍卫犹太人，反对那些经常使用的关于种族歧视的陈词滥调。这种回应在一个深受古尔德影响的环境里，一定会加深人们对古尔德背景的猜想，而他也明白这一点。

根据莫若西尼所说，为了保持自己的恶魔形象，古尔德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总是使用匿名。古尔德助手回忆说，古尔德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一直都在进行大量捐赠，但却坚持不使用自己的名字，以免自己在公众中冷血无情的形象被破坏。古尔德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非常烦恼，因为当时纽约政客、编辑瑟洛·威德（Thurlow Weed）——和杰伊一样出生在卡茨基尔的一个平民家庭——私下里对英国记者W·T·斯特德（W. T. Stead）说，他是杰伊的慈善顾问。“当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慈善项目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告诉杰伊·古尔德。他在何时捐赠、捐赠多少方面总是听从我的意见。我的建议没有被忽视过。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他的捐赠不能引起公众舆论。他是一个频繁而慷慨的捐赠者，但是从来不让他的右手知道左手要干什么。啊！如果这些记录被公开，它将写满整页纸。”据莫若西尼回忆，当《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拒绝相信或刊登这个英国人的报道时，古尔德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更好地行动，古尔德告诉《纽约论坛报》不

用理会这个故事，并告诫他的朋友威德，将来要注意保守秘密。

* * *

1874年，所有的编辑，不管是朋友还是仇敌，在得知杰伊·古尔德取得了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控制权时都大吃一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平洋联合铁路到达古尔德手中的每一个片断都和他当年获得伊利的过程一样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和毫无趣味可言。在1862年和1864年《太平洋铁路法案》制定的过程中，国会计划促进建设一条连接密苏里河和西海岸的铁路。太平洋联合铁路负责将美国铁路系统从密苏里向西扩展，中央太平洋铁路（由利兰·斯坦福和科里斯·P·亨廷顿控制）负责从萨克拉门托以东开始修建，这两条铁路在中部会合。建设速度快的公司将控制最多的长度和土地。1862年和1864年法案给建造公司提供了既定路线延伸长度的土地授权（包括在该地区发现的煤炭和钢铁授权）。这两个法案还以每铺设20公里就少量发行次级债券（代表第二抵押资产）的形式提供资本。他们还可以进一步授权其他私人公司发展分支机构支持太平洋联合铁路建设，后者最后拥有了许多分支铁路，例如堪萨斯太平洋、丹佛太平洋和密苏里太平洋。为了资助这些操作，国会授权太平洋联合铁路在20人的董事会（其中5个是联邦任命）同意的基础上发行第一抵押债券。

不正常的事情很早就发生了。那些购买第一抵押债券然后将其转换为股票的人们——其中包括托马斯·克拉克·杜兰特（Thomas Clark Durant）、奥克斯、奥立佛·阿姆斯兄弟（在黄金恐慌期间，通过在马萨诸塞州伊斯顿的工厂生产梳子和手套积累了一点财富）、西德尼·狄龙和一些其他投资者——试图掩盖日程。杜兰特（被称为“杜兰特医生”，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医生）以前也参与修建过一些铁路，其中著名的有穿过爱荷华州的密西西比和密苏里铁路。对于太平洋联合铁路，他曾经努力游说国会（包括马萨诸塞州代表奥克斯·阿姆斯）和林肯总统，使《太平洋铁路法案》得以通过。后来到了1864年，杜兰特购买了无数太平洋联合铁路债券，并在董事会获得了一席之地。他后来与阿姆斯兄弟进行权力斗争，试图取得董事长的任命，最后被选为副总裁和总经理。

在这个位置上，杜兰特将该铁路第一个价格奇高的建设合同包给了H·M·霍克西（H. M. Hoxie），一个宾夕法尼亚州公司的代理。该公司在一年前被杜兰特、奥克斯·阿姆斯、狄龙和其他几个投资者控制，改名为美国麦比列信用公司（Credit Mobilier of America）。该公司接着将该工程以同样优厚的条款，转包给由其他太平洋联合铁路股东控制的公司。三年后的1867年，麦比列信用公司将另一个建设合同给了奥克斯·阿姆斯，（就像霍克西在他面前）将该合同也转包给股东们控制的公司。建设利润估计在700万~2300万美元之间。这一过程用光了国家给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慷慨补贴，使该铁路在1869年关闭的时候负债累累。

正如莫里·克莱因写的那样，到了1869年5月——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中，中央太平洋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代表在犹他州的海角（Promontory）砸进了一颗“金钉”——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发起者们“分成几个派系，互相争斗暗中破坏，直到毫无希望地被卷入诉讼，才在三个建设合同上达成微弱的妥协”。在斗争的泥沼中，杜兰特在“金钉仪式”之后就退出了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会，离开了这个付给他高薪的职位。在他卸任之后，热情而迷糊的奥利佛·阿姆斯接替他当了三年董事长。虽然他没有铁路管理经验，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处理公司的巨额浮动债务（1300万美元），临近破产的谣言、下跌的股价，以及由于公司明显的偿付能力低下而导致的不断增加的资本成本。这些让他焦头烂额。（1869年的一笔债券利率高达17.5。）1871年初，随着太平洋联合铁路逐渐接近破产的边缘，阿姆斯辞去了总裁职位，但仍然留在董事会。然而，此时的阿姆斯是否已经察觉不久之后将要吞噬他哥哥的丑闻却不得而知。

早在1869年，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在公开场合抱怨麦比列信用公司，以及他称做“太平洋铁路指环”的连环欺诈。在1867年末和1868年初，奥克斯·阿姆斯（仍然是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为了防止联邦调查团调查此事，抢先一步贿赂了白宫和参议院的一些同僚。阿姆斯以面值价格将麦比列信贷公司的大量股票卖给他特别选出的官员，而当时该公司的股价已经是面值的两倍。白宫发言人斯凯勒·科尔法柯斯（Schuyler Colfax）接受了股份。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亨利·威尔森、俄亥俄州代表詹姆斯·A·加菲尔德

(曾参与“黑色星期五”调查)、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马萨诸塞州代表亨利·劳伦斯·道威斯、俄亥俄州约翰·宾厄姆、伊利诺伊州约翰·A·洛根、爱荷华州威廉·B·艾利森，以及詹姆斯·F·威尔森都接受了贿赂。阿姆斯还拉拢了两个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威廉·D·“生铁”凯利和G·W·斯考菲尔德。和阿姆斯一样，大部分接受麦比列信用公司贿赂的人都是共和党人。该计划中唯一一个民主党人纽约的詹姆斯·布鲁克斯作为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会中的政府代表受法律约束被禁止持有公司股票，但这不是问题：他以其子的名义完成了交易。

该集团最后临阵退出的成员是艾利森和两位叫威尔森的人。他们于1869年将股份还给阿姆斯，阿姆斯按照面值加利息将钱退给他们。阿姆斯接近的其他国会议员，例如缅因州的詹姆斯·G·布莱恩也没有牵涉进去。阿姆斯在一个黑色的小账本上记录了这些交易。他写信告诉助理亨利·S·麦克柯波(Henry S. McComb)说，他已经将股票“放在能给我们带来最大效益的地方”。随后，阿姆斯给麦克柯波提供了一些已接受或将要接受股份的国会议员名单。后来，阿姆斯和麦克柯波之间的不合，使得这些信件在1872年总统大选期间被刊登在查尔斯·A·达纳(Charles A. Dana)的《纽约太阳报》上。接下来的国会调查影响了当时的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柯斯和其他参与者的政治声誉。奥克斯·阿姆斯和詹姆斯·布鲁克斯受到谴责，1873年4月，布鲁克斯中风而死，一个月前饱受攻击和羞辱的奥克斯·阿姆斯死于同样的原因。

奥利佛·阿姆斯辞去总裁职务之后，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汤姆·斯科特(Tom Scott)担任了一小段时间总裁，后来太平洋联合铁路就处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控制之下。范德比尔特看好了这条铁路的潜力，将它作为自己的湖岸-密歇根东南铁路的支线。到1872年，范德比尔特持有了足够多的股份，让贺瑞斯·克拉克出任总裁——后来，1873年春天他不顾老岳父作何想法，让古尔德介入了公司。

许多年后，杰伊在国会作证词时说，克拉克和斯盖尔——后者作为湖岸-密歇根东南铁路公司的财务总监——将太平洋联合铁路作为一支好股票推荐给他。那是在1873年5月中旬的一段时间，杰伊在芝加哥会见了西北公

司狙击战中的同伴。克拉克和斯盖尔刚刚乘坐太平洋联合铁路，视察完这条铁路。“他们高度称赞这条铁路，引诱我给纽约发布指令买进股票……从每股 35 美元开始……按比例减低价格依次买进。”换句话说，古尔德授权他的经纪商买进了所有低于和等于 35 美元的股票。然后他和家人去怀特峰度假了几个星期。

当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古尔德对国会调查员说了以下版本的证词。古尔德还在怀特峰的时候，克拉克突然病倒。根据杰伊的证词，在克拉克病危的消息变得明朗的同时，市场对太平洋联合铁路股票的需求也一下子枯竭了。同时，由于预料到克拉克不久将会病逝，他的经纪商们也决定处理掉他的巨额股票。这两个因素——市场对该股票需求的缺乏和克拉克股票的大量抛售——引起了股价的大幅度下跌，正好掉进了古尔德的“买进指令的区间”。克拉克在 6 月底去世。当古尔德从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回来时，发现自己拥有了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 36.7 万股股票中的 10 万股。“我回家后，股价还在下跌，我开始关注这件事，着手调查这些资产的状况。”

古尔德是一个害羞而保守的人。克拉克在 1873 年 6 月没有任何预兆的去世也是事实。古尔德在克拉克得病之前发布了买进指令，然后离开纽约也是事实。但是古尔德对太平洋联合铁路股价大幅下跌，以及对于自己突然拥有公司资产的吃惊，看起来好像不符合他狡猾而注意细节的形象，就像古尔德在发现自己拥有太平洋联合铁路实际控制权之后才对公司事务熟悉的说法一样也不可信。开始，记录显示克拉克的经纪商在得知克拉克病危的消息时，并没有抛售股票。此外，事实显示，克拉克生病和去世的消息也没有引起股价下跌。正如格朗蒂斯基所注意到的：“克拉克去世一个星期后，股价从 26.125 美元降到 24.5 美元后，又升至 26.125 美元，但是两个星期后，又升至 29 美元。股价的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大盘的走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法律行动的威胁。在古尔德买进的过程中，司法部长对其建设公司、联合太平洋公司和一大批个人发布了一个法令，建议法庭宣布土地授权债券和收益债券为无效发行。”

这个行动——古尔德或许早就听说了——只影响了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价，其他并无大碍。该铁路糟糕的财务状况也早已公开。只要读读报纸，古

尔德也应该在买进他的 10 万股之前，了解到该公司的浮动债务状况和其他问题。

起先，由于以前的坏名声，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会的人对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像奥利佛·阿姆斯和西德尼·狄龙——即使他们已经与麦比列信用公司、奥克斯·阿姆斯和杜兰特有过广泛的交易——将古尔德看做另类：伊利的掠夺者。虽然开始受到冷遇，但是后来古尔德还是与董事会的大部分人和睦相处。不久，古尔德不仅将阿姆斯拉到自己的阵营，还将阿姆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以及其他一些董事会成员拉了过来，例如以利沙·奥特肯斯（Elisha Atkins）、伊斯拉·贝克（Ezra Baker）、F·戈登·戴克斯特（F. Gordon Dexter）和狄龙（与塞奇一样，后者出生于 1812 年纽约蒙马利区的农村。在接下来的 19 年里成为古尔德的密友和同盟。古尔德和狄龙都死于 1892 年）。一位与古尔德和大卫·B·斯科尔斯合作过的银行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回忆说，杰伊在 1873 ~ 1874 年冬季通过“与狄龙 - 奥特肯斯的秘密联合，买进了市场上所有的股票”，控制了这条铁路。（古尔德最后控制了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 20 万股股票。）同时，古尔德对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首席总工程师格伦维尔·M·道奇（Grenville M. Dodge）说，他打算在公司长期待下去，并“将它做大”。

古尔德对太平洋联合铁路股票后期的大宗购买在 1873 年 11 月和 1874 年 2 月进行，但是当时正在发生几个月前由欧洲开始的金融恐慌。伦敦和巴黎的混乱后来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导致美国非常著名的投资银行杰伊·库克公司破产倒闭。杰伊·库克是西北太平洋铁路的首席赞助人，他赞助了苏必利尔湖和普吉特湾之间的前期建设，还负责处理大部分政府战争借款。因此，其银行的倒闭在金融市场上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 10 天，信用丧失殆尽。失去抵押品赎回权也成为家常便饭。银行和投资银行家们（包括华尔街著名的菲斯克 - 海奇公司）和工厂一样关起大门，导致无数工人失业。在 1873 年秋到 1875 年秋两年的时间里，大约 1.8 万家美国公司破产。同时，美国 364 条铁路中的 89 条破产。到 1876 年，失业率达到 14%。分析家后来评论说，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国家铁路的过度建设为美国结束危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大萧条埋下了祸根。到了 1878 年，经济才全

面恢复。在这种环境中，当斯科尔斯为古尔德买下最后一笔太平洋联合铁路股票时，他付的价格只是这条铁路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

杰伊和4个经纪商在1874年3月入主太平洋联合铁路。在这次会议上，西德尼·狄龙持有2.6万股股票，成为公司总裁，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10年。奥特肯斯被选为副总裁。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在古尔德的保护下，太平洋联合铁路躲过了像其他铁路公司一样倒闭的厄运，不过这在短期内花费了古尔德大量的金钱。莫若西尼回忆说，危机让古尔德“相对变穷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能比古尔德先生在这场灾难中剩下更多的钱和证券”。在取得控制权后，古尔德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将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在8月到期的浮动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券。他还策划了一个以新债券取代旧债券的计划，将公司1000万美元的收益债券用新发行的低利率偿债基金债券（大部分发行者的长期债务在到期前根据严格的时间表被赎回）代替。同时，古尔德还状告联邦政府，因为从1873年3月开始，联邦政府拒付太平洋联合铁路运送政府货物的货款——用以补偿政府发行的帮助太平洋联合铁路建设融资的债券利息。此外，古尔德还卖掉了从1872年以来就很感兴趣的另一条小型、未完工的新泽西南部铁路的建设，损失了100万美元。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在大萧条中，自己不能同时支持两条铁路的运行，他要在太平洋联合铁路做一番大事。

从新泽西南部铁路解脱出来后，杰伊开始控制、从而压制太平洋邮政汽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和中央太平洋—联合太平洋（Central Pacific-Union Pacific）铁路的竞争。太平洋邮政提供从西海岸港口到巴拿马海峡的运输，是唯一能真正替代太平洋联合铁路和中央太平洋横穿大陆货物运输的路线。这条线路的重要性在于，东方各国的进口商到达西海岸港口需要换船到达东部市场，东部制成品要运往加利福尼亚和东方各国也需要经过它中转。在1873年12月，独立的罗素·塞奇——先前和古尔德一起操纵太平洋邮政的股票，进入该公司的董事会——进入太平洋邮政任总裁。上任后，他坚持原来的管理策略，与铁路大打价格战，虽然他的朋友杰伊后来控制了太平洋联合铁路。1874年夏秋两季，塞奇的业务量已经大得惊人。

12月初，塞奇由于卖空太平洋邮政的股票而被迫辞职，人们猜测古尔德

可能是泄密者。接下来市场的公开信息表示，塞奇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与古尔德一起是该股票最大的卖空者。相应地，在1875年初，太平洋邮政的股价跌至危机时的水平。在这几个月里，虽然外界认为古尔德是卖空者，但实际上他正通过几十个经纪商悄悄买进太平洋邮政的股票，直到他以很好的价格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1875年3月3日，古尔德和两个同盟阿姆斯和狄龙加入了太平洋邮政的董事会。已经是太平洋联合铁路总裁的狄龙在太平洋邮政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价格战立刻停止。“联合太平洋公司，由于控制了太平洋邮政，便可以任意提高运费而不必担心汽船业的竞争。”格朗蒂斯基评论说，“由于运输规模大和垄断价格，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盈利前景非常美好。”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从1873年11月的15美元，飙升至1875年6月的78美元，虽然当时还处于危机状态。

得知太平洋邮政盈利的消息后，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大股东、54岁的科里斯·P·亨廷顿有些不安。在取得太平洋邮政控制权不久，古尔德已经完全公开与亨廷顿一起建立一条铁路—汽船航线，西方—东方汽船公司。从长期看，亨廷顿意识到，他与古尔德建立新汽船公司的主意将会降低古尔德付给太平洋邮政的价格。在公司建成后，亨廷顿感觉到自己被玩弄了，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的是这样的。在亨廷顿的西部公司中，古尔德、狄龙和阿姆斯分别持有250万美元、200万美元、50万美元的份额。此外，古尔德对亨廷顿说，这两条汽船线路，不包括横穿大陆铁路的两个终点，将来要建立联合垄断。但是，亨廷顿仍然很警惕古尔德的高深莫测和对拜占庭式决战的偏好。因此，当古尔德为了体现良好的诚信，给亨廷顿在太平洋邮政董事会提供了一个位置时，亨廷顿拒绝了。他坚持相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古尔德对太平洋联合铁路和相关公司的野心只是为了投机，就像以前他对待伊利一样。亨廷顿预测，将来古尔德将拉升太平洋联合铁路股票，卖出，然后逃走。基于这个假定，亨廷顿设计了一个近期内与古尔德交易的简单战略：“避免和他发生争执，观察采取行动控制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时机，然后实行，控制它。”但是，亨廷顿和华尔街的其他人又被上了一课。

第二十四章
整 合



从 1874 年春天开始，古尔德的主要关注点不是股票投机——虽然他也做过一些，因为这非常容易——而是太平洋联合铁路的管理。他是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最高统治者，虽然除了在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有席位以外，没有任何名分和官方的职位。通过授权西德尼·狄龙，古尔德不仅巩固了公司的财务结构，而且还在太平洋联合铁路的竞争力和政治斗争中成为首席战略家。在短短的几年里，他重组了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债务，重新调整运费以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太平洋联合铁路沿线的财产和资源开发。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杰伊需要关注太平洋联合铁路运作过程中的细节，了解太平洋联合铁路的铁路、资源、长度和缺点等每一点，就像十几年前管理老拉特兰－华盛顿公司那样事无巨细。

在狄龙、弗瑞德·阿姆斯、莫若西尼以及其他人的陪同下，古尔德一年乘坐两次太平洋联合铁路——铁轨由竞争对手控制。他的私人车厢“护送号”挂在他自己的机车、煤水车和行李车后。古尔德坚持 1 小时行驶 50 英里，这在当时已是很快的速度，在不平坦的路段也不允许减速。“在这种旅行中，”《纽约时报》记者写道，“古尔德不停地换位子——从车厢的一端换到另一端——不是出于自愿，但是表情却没有改变。”古尔德在乘坐火车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男速记员，负责记录这位大人物持续不断的想法：铁路保养预案、成本节约方案或是改进建议。这些主意后来都由塞拉斯·H·H·克拉克负责实行，他是继狄龙之后，古尔德主要的执行助手。（此人在 1874 年管理西部铁路，比古尔德小几个月，出生于新泽西的一个农场，全部职业生涯都从事铁路行业。克拉克对华尔街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机车和运输却了如指掌。他和古尔德有两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工作狂，都爱读书。古尔德让克拉克成了富翁。）晚上，在火车停下来让机器和司机休息之后，杰伊便一个人走在西部小镇上，和任何一个遇到的人聊上几句，询问当地太平洋联合

铁路的职工，听听他们对于如何改进该地区公司运营的建议。“这里的员工有我们需要的智慧。他是我们的代理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将处于危险之中。”古尔德给狄龙的信中写道。

古尔德一年两次的旅行也让他和不同的太平洋联合铁路顾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例如，内布拉斯加的基思·巴顿的农场主和古尔德非常熟悉。“这个农场在戴克斯特设有总部，在现在的萨瑟兰附近设有分部。”《林肯州日志》的作者在1930年写道：

“纽约的杰伊·古尔德、西德尼·狄龙和波士顿的弗瑞德·阿姆斯每年在他们视察联合太平洋铁路的途中拜访基思·巴顿农场……巴顿先生知道他们要来，就告诉工头在特定时间放牧，准备好配有马鞍的马匹。他参加在北普拉特一个特殊火车上的晚会，然后陪他们到戴克斯特，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配有加利福尼亚马鞍的温顺马匹站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骑上它们在牛群中穿行，穿过高山和峡谷。他们谈论着牛的颜色、年纪和阉牛，看着小牛犊欢快地在母亲身边蹦蹦跳跳，忘掉了华尔街和股票市场。后来，他们登上火车，为这自由的牛犊生活而高兴，一连几英里，从车窗里都可以看到火车两侧大队大队的牛群。

在视察途中，杰伊经常去看望弟弟艾布拉姆。从1876年开始，曾在旧金山太平洋邮政工作的艾布拉姆在盐湖城克拉克手下担任太平洋联合铁路煤炭部经理。此前一年，即1875年9月，杰伊在纽约的塞勒姆，主持弟弟与德裔女孩索菲亚·凯格勒——罗特兰德—华盛顿铁路总工程师弗瑞德·凯格勒的妹妹——的婚礼。不幸的是，索菲亚死于1878年，留下一个小男孩杰伊·弗瑞德·古尔德（在家里被叫做弗瑞德）由艾布拉姆自己抚养。

✱ ✱ ✱

在杰伊·古尔德视察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全部行程中，以及在返回到纽约太平洋联合铁路办公室的漫长时间里，他总是在关注公司运行的核心基础问题。他一篇接一篇的备忘录强调了节省成本这一主要想法。既要保持高利润，

价格又不能升高到影响顾客的长期利益，即使太平洋联合铁路处于垄断地位。只有运输客户保持偿付能力，他们才能继续成为自己的客户。杰伊的总体政策是将太平洋联合铁路垄断的地方价格尽可能定高，在竞争领域进行价格竞争，如果有利于拓展新业务，可以大幅度降低价格。为了配合这些政策，必须经常密切关注成本开支——特别是煤炭、劳动力和资本的开支。

古尔德、狄龙和克拉克将太平洋联合铁路管理成一条有效率的铁路。和董事会里的波士顿人特别是奥利佛和弗瑞德·阿姆斯一起，古尔德设计了财务管理的细则。1878年——奥利佛1877年去世后的第一年——古尔德和弗瑞德一起发现了《瑟曼法案》中的关键漏洞，这个联邦法案要求太平洋联合铁路将净利润的25%用以偿还对政府的债务。由于古尔德和阿姆斯的游说，法案中的关键漏洞允许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剩下的75%的净利润不足以偿付债券利息时，动用提取偿债基金。结果使得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宣布无力偿付无数政府贷款的同时仍然可以继续扩张。

在任命艾布拉姆管理煤炭部后，杰伊显示出巨大信心。煤炭不仅是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商品，也是铁路的生命线。在古尔德控制这条铁路之前，先前腐败的管理层在1868年将太平洋联合铁路在怀俄明州的煤矿租赁给两位密苏里商人，塞勒斯·O·戈德雷（Cyrus O. Godfrey）和托马斯·沃德尔（Thomas Wardell）。太平洋联合铁路同意在未来的15年里以每吨3~6美元的不断浮动价格，购买戈德雷和沃德尔的煤炭，同时给这两个人对其他货物的运输提供25%的折扣。一年后，戈德雷和沃德尔——秘密成为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代理人——与内布拉斯加的怀俄明煤炭开采公司（该公司90%的股份由这些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控制）签订了合约。结果造成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对自己所有的煤矿支付了畸高的价格。古尔德在宾夕法尼亚布劳斯伯格拥有的一些烟煤矿，以每吨1.25美元的价格生产煤炭，所以古尔德意识到这其中存在很大的节约空间。在掌权后不久，他就采取措施结束了这种荒谬的状态。他废除了与戈德雷和沃德尔的合同，占有了7个怀俄明煤矿，将怀俄明煤炭开采公司告上法庭，这个官司打了6年，最后以失败告终。

古尔德在1874年开始管理的煤矿坐落在怀俄明州的岩石温泉、卡宾和阿爾密，效率低下，劳工关系很紧张。这些矿工大部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于

1871 年被带到怀俄明州替换工会运动中的前一代工人。但是，到了 1874 年，挪威人和瑞典人几乎联合起来，古尔德对此非常敏感，他像那个时代所有资本家那样对工人没有同情心。当这些人——古尔德认为每个月付给他们 52 美元太多了——在秋季濒临爆发罢工的边缘时，杰伊以每人每月 32.5 美元的工资雇用了中国劳工充实自己的力量。11 月，在白人劳工最后举行罢工时，杰伊让克拉克雇用更多的中国人。同时，古尔德还下了订单，购买新的、更先进的机器以最大化地提高效率。这些计划在 1876 年以后都由艾布拉姆负责执行。在 1875 年和 1880 年之间，太平洋联合铁路控制的煤矿产量增加了一倍，而成本却降低了 65 美分，降至每吨 1.35 美元，为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在艾布拉姆第一年上任时，他将中国劳工的工资降到 27 美元一个月，他的哥哥还认为高了 2 美元。）

降低煤矿以外的非亚裔劳工的工资后来证明非常困难。1877 年春季，杰伊联合了其他几个铁路的头领（包括在 1 月老海军中将范德比尔特去世后，掌管纽约中央铁路、湖岸铁路以及密歇根南部铁路的威廉·H·范德比尔特）宣布统一对全美工人降低 10% 的工资。接着，匹兹堡、巴尔的摩、芝加哥、布法罗、旧金山等地的铁路工人纷纷罢工。最后，卢瑟福·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总统动用了联邦军队平息暴乱。中央太平洋、伊利和范德比尔特的铁路由于运输量下降和设备损坏遭受了很大损失。

7 月末，在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爆发暴乱之前，杰伊通过计算，宣布降低工资是一个错误的方式。他原来计划扣工资的工人可以创造出超过损坏价值 10% 的利益。7 月 22 日，古尔德给盐湖城的克拉克发电报让他停止降低工资。于是，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工人在第二天早上举行了重大集会，在会上许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车站、修车场和机车设备。前一天还批评古尔德对工人残忍和背信弃义的《纽约先驱报》，现在开始批评他对资本家同盟背信弃义。当天晚上，古尔德接受了《纽约世界报》的采访，他谴责了其他铁路的罢工者，说他们进行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很可能以“破坏这个国家的共和政体”而告终。虽然他的话很无情，但是《纽约世界报》说古尔德“精神状态很好，似乎安静地注视着这将要到来的大灾难，就好像自己在与撒旦的火柴和石油交易中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事实

上，杰伊此时正忙着卖空那些受罢工影响的竞争者们的股票，因此，他对于未来欢乐的创造看起来好像并不令人乐观。

另一方面，古尔德也在忙于建设太平洋联合铁路沿线的社区和商业。1876年6月——也就是卡斯特在小比格霍恩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中牺牲的当月——在怀俄明的拉勒米，古尔德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税收减免，为一座炼铁厂融资，不久他就成为当地最大的资本家。通过这家工厂，杰伊为太平洋联合铁路创造了廉价的铁轨来源，并支持了拉勒米低迷的经济，刺激了城市的发展。同时，古尔德还将目光放在了刚刚发现金矿的小比格霍恩和黑山，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地质学家一起为联邦政府勘测了当地地形。两天后，他在备忘录中预测说，该地区前景非常好，它不仅是黄金产地，还是一片有价值的土地。当克拉克担心卡斯特战役后向北扩展路线可能会有危险时，古尔德打消了他的疑虑。他像往常一样用一种生动和无情的洞察力看待这个世界：“小比格霍恩屠杀的结果将会消灭印第安人，开放小比格霍恩和黑山地区，在这里开发和定居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收益。”（古尔德没有对克拉克提及的事情还有他的姐姐安娜及其丈夫就居住在这个地区。他们住在一个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窖的小土屋里，忍受着蒙大拿的贫瘠，向当地的探矿者和印第安人传播福音，直到安娜的身体在生活的重压下垮掉。杰伊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虽然他很有钱，但还是不能改变边疆的恶劣现状。）

在兴建支线铁路的同时，古尔德又为奥马哈的一家冶炼厂融资，从西部矿藏中提炼矿石和金块，这些都由太平洋联合铁路负责运输。他还花了很小的力气拓展太平洋联合铁路在西部内布拉斯加和怀俄明的土地。这些处于西经100度的土地非常干涸，不适于种植。因此，古尔德将放牧权卖给了农场，并给他们运送牲畜打了很大折扣。他还和这些客户一起在福特·布里杰的太平洋联合铁路沿线修建了运货中心、饭店和墓地。接着，在将福特·布里杰变成牲畜运送者和购买者的目的地后，他还将内布拉斯加州的几个城镇斯凯勒、卡尼和奥格拉腊也变成吸引北部运货者的目的地。

* * *

除了在西部铁路进行运作外，古尔德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其中包括对电

报业的投资和在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的事业。

创建于1851年的西部联合公司在美国内战期间初具规模。在那场血腥的内战中，西部联合公司占有了联邦政府绝大部分电报业务，并且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在1863年和被范德比尔特控制的1869年间，被票注的西部联合股票市值从300万美元升至4100万美元。当然，西部联合公司大部分的商业联系来自和铁路的密切关系。和其他电报公司一样，西部公司占有了全美12600个车站通讯中最大的部分，一直沿着铁轨蔓延下去，铁路为它提供保养，它为铁路公司提供无限制的信息服务。这些协议都建立在排他的基础之上。

太平洋铁路公司（包括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等等）是很少几条西部联合公司没有进入的铁路。1869年，太平洋联合铁路拒绝和该公司联合，坚持与一家更小的公司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签订协议。一年后大西洋-太平洋铁路与亨廷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签订了协议。太平洋联合铁路与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交易使其获得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2.4万股股票：这种控制权在大部分观察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产业观察家说，几年后西部联合将拥有长达154472英里的线路，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只有7460英里，还不及它所控制的更不起眼的弗兰克林电报公司。没有人相信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可以在西部联合在魔掌下长久地生存下来。

在古尔德进入联合太平洋时，他就意识到大西洋-太平洋铁路股票的潜力，它完全可能扩大影响，从长期看可以与西部联合公司合并。在控制太平洋联合铁路后不久，古尔德就劝说利维·P·默顿放弃手中取得的联合太平洋的大西洋-太平洋铁路股票期权。然后，在1874年4月，杰伊让狄龙取消了与西部联合长期的非竞争协议。同时，他着手改进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基础设施状况。12月，古尔德找到西部联合的总经理托马斯·T·艾科特（Thomas T. Eckert）将军，让他出任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艾科特最近一直被看做西部联合公司总裁人选，但是范德比尔特将这个位置给了其他人。因此，曾被剥夺了权利的艾科特慎重地接受了古尔德的邀请，并答应他仔细考虑。在艾科特考虑期间，古尔德利用他引诱了托马斯·A·爱迪生（Thomas A. Edison）。爱迪生是一个聪明的商人，当时受到西部公司的总裁威廉·奥顿（William Orton）的不公正对待，并被克扣工资。古尔德想让爱迪

生将他的四通路电报机的权益（一条电线可以同时传送 4 条信息，一个方向两条）卖给大西洋 - 太平洋铁路，而不是西部联合公司。

爱迪生并不是“门罗帕克的巫师”。他只是一个落魄的年轻发明家，也并非拥有这个专利的大部分权益。在今天看来最重要的发明——关于他的自动电报技术，通过打孔纸带加速信息传递——由以前的专家乔治·哈林顿（George Harrington）持有专利权，他个人资助了爱迪生的大部分研究。作为交换，从 1871 年开始的 5 年时间里，乔治·哈林顿对爱迪生的机器拥有 $\frac{2}{3}$ 的权益。哈林顿还和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财务代理乔塞亚·赖夫（Josiah Reiff）一起控制了规模极小的自动电报公司，该公司用以支持爱迪生自动电报机专利的使用。但是，爱迪生的专利问题复杂化了，他后来同意将西部联合公司的主要候选人乔治·普雷斯考特作为专利的共同持有人，以获得在西部联合公司的实验室。爱迪生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关心这个协议与先前哈林德协议是否冲突。

奥顿很不尊敬地将爱迪生看做一位商人，并且已经认为自己通过普雷斯考特控制了四通路电报机专利 50% 的所有权，所以他在 1874 年秋不停地就专利所有权的问题与发明者讨价还价。12 月 10 日，奥顿去芝加哥出差，但是仍没有与爱迪生达成一致，他错误地认为爱迪生已没有其他选择。奥顿对于爱迪生与哈林顿之间的合约毫不知情，也不知道赖夫最近与古尔德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赖夫能够拿到爱迪生的新发明，这正是古尔德所坚持的条款，古尔德将获得自动电报公司的控制权。赖夫同时也要移交爱迪生的新发明——四通路电报机。

到了 12 月末，由于奥顿离去，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爱迪生回忆说：

一天，艾科特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了一些关于钱的问题。我告诉他奥顿先生走了，没有留给我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我现在处境困难。他对我说，我不可能多拿到一分钱，但是他知道有人可以出钱购买。他说我与电气师有合约，不可能把专利全部卖出去；但是如果我能拿到足够的钱，我可以卖掉我任何份额的权益。我或许认为那个买家会答应这个条件。我在自己纽华克沃德大街 10 号和 12 号的店里有一套四通路电

报机，所以他想第二天早上来看这个机器。第二天早上，艾科特和杰伊·古尔德一起进来，并向我介绍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古尔德。我给他演示和讲解了这个机器，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第二天，艾科特将我带到第五大道温莎饭店附近古尔德的办公室。他在地下室有间办公室。那是在晚上，我们从员工通道进去，艾科特好像怕被别人看到。古尔德开门见山地问我想要多少钱。我说：“你想出多少钱？”他说：“我出3万美元。”我说，“我会卖掉我持有的所有权益”，因为这个价钱远远超出我的预料。第二天早上，我和古尔德到他的律师舍曼和斯特林的办公室，拿到3万美元的支票。古尔德说我得到了一艘“普利茅斯岩石号”汽船（菲斯克时代的古董），这条汽船他卖了3万美元，刚刚收到支票。

虽然爱迪生自己没有提到，但实际上他获得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3 000股股份和电气师的头衔。这个交易发生在1875年1月4日，当时赖夫对古尔德保证普雷斯考特的专利要求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星期后，艾科特离开西部联合，成为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总裁。4个月后，古尔德支付给哈林顿10.6万美元，买下了他另外2/3的专利权，憔悴的哈林顿启程去了南欧。但是同时，古尔德拒绝对赖夫履行关于购买自动电报公司的支付，理由是赖夫误传了普雷斯考特的专利权事件。正如古尔德后来在证词中说的那样，西部联合公司在他认为自己已经独自占有了四通路电报机专利权后仍然在使用这一专利。西部公司在爱迪生的专利上使用了普雷斯考特的名字：这件事赖夫曾向古尔德保证没有问题。在撤销了对老自动公司董事会的支付后，古尔德同时将自动公司的资产指定给大西洋－太平洋铁路。最后，诉讼和反诉讼的结果延续的时间比古尔德的寿命还长。

在接下来的接触中，爱迪生发现古尔德“一点没有幽默感。好多次我试图讲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结果他一点都不觉得好笑。我很喜欢故事，也会讲很多故事……我经常能让人捧腹大笑”。古尔德则试图和单纯的爱迪生细致地讨论铁路中转和融资的复杂性。他打开地图，就自己的一个特殊灵感讲几个小时。虽然一切都是没用的。他们很少有共同的兴趣点。爱迪生不久就对古尔德本人，以及为完善自动电报公司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下了很

大赌注的新技术失去了兴趣。

然而，由于垄断更好的技术仍然不能与西部联合竞争，古尔德因此转向使用更有效的工具。1875年2月，他开始打价格战。5月，他让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汤姆·斯考特在铁路沿线铺设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电缆。接着，安排联合太平洋董事会通过了以25美元的价格出售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股票，杰伊自己有1.6万股，其余的分别由塞奇、阿姆斯和古尔德圈子里的其他朋友持有。（在这段时间，古尔德自己还以15~18美元的价格额外购买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5万股股票。）7月，在讨论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出售还是租赁给西部联合的过程中，杰伊大量买进西部联合股票，同时让他的朋友也这样做。“我不认为西部联合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联手遥遥无期。”他对阿姆斯说，“我们通过促成两家公司的合并，让西部联合公司成为联合太平洋的积极盟友。”

但是谈判在9月破裂了。12月，杰伊由于肺炎的老毛病发作也倒下了。他在1876年1月重整旗鼓时，又开始进行价格战：这场战争将影响西部联合在4月的分红。接着，古尔德邀请约翰·W·加勒特（John W. Garrett）、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所有者加入——当时正在和纽约中央铁路就爱荷华段进行艰苦的价格战——说服他取消与西部联合的协议，与大西洋—太平洋铁路成为联盟。这就是1877年1月老海军中将去世时的情况，他让威廉·H·范德比尔特这个妥协者看管家族的生意。

在1877年上半年，古尔德继续给西部联合施加压力，成功地抢下了犹他州的几条铁路。在那里，控制公司决策的摩门教精英也控制了法庭。同时，古尔德向媒体透露，作为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代表，他将和伊利、西北和岩石岛铁路谈判。在继续对威廉·范德比尔特施加压力的同时，杰伊对西部联合的股票进行了一系列的熊市狙击。正如杰伊所预料的那样，西部联合公司由于与加勒特的长期价格竞争遇到了一系列的财务问题，其盈利也大幅度下跌。

范德比尔特的利益在1877年4月古尔德取得在西北、岩石岛董事会位置的消息传出后进一步受到损害。不久之后，古尔德控制了密歇根中央铁路。这条铁路与范德比尔特从芝加哥到底特律的湖岸—密歇根南部铁路并驾齐驱，

在古尔德的有效管理下，对范德比爾特的铁路形成很大威胁。但是古尔德错过了接管的时机，他浪费了时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接着，8月，在西部联合宣布以25美元的价格（比市场价略高一点）购买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72 502股的股份（绝大部分来自古尔德）时，没有几个观察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不到一年，古尔德让范德比爾特控制了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董事会，并成为该铁路的总裁。

最后的结果虽然让古尔德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并解决了在意识到无法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发展成西部联合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后，如何处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让他获得一直追求的东西：在电报业的重要地位。合并后不久，威廉·范德比爾特坚决拒绝了古尔德要求出任西部联合公司董事的要求。

✱ ✱ ✱

在与西部联合作战的同时，杰伊继续扩展他在西部地区铁路的权益。起初，他在太平洋联合铁路之后获得的第一条铁路是堪萨斯太平洋。太平洋联合铁路是从奥马哈开始，穿过夏延抵达奥格登（联合中央太平洋的中转站），堪萨斯太平洋在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南部，从堪萨斯城穿过富饶的农场到达丹佛，然后通过丹佛太平洋支线（他拥有其中75%的权益）直至夏延。在夏延，堪萨斯太平洋并入太平洋联合铁路，这样它便有了东部和西部的出口。古尔德第一次注意到堪萨斯太平洋是在1874年底，这条铁路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它在1873年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无力支付债务利息。1874年初，它的债务被重组为长期债券，但是问题仍然存在。1875年4月，古尔德向堪萨斯太平洋的总裁罗伯特·E·卡尔（Robert E. Carr，一个圣路易斯的银行家）建议，将过度资本化和负债累累的堪萨斯太平洋、丹佛太平洋以及另一条从丹佛到朗蒙特的毫无盈利的卡罗拉多中央铁路合并，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个公司将由盈利的太平洋联合铁路管理，太平洋联合铁路持有该公司一半的股份。但是，不久之后，这个计划由于卡罗拉多中央铁路的发起人威廉·A·H·拉夫雷地（William A. H. Loveland）要价过高而流产。几个月以后，到了1876年11月，堪萨斯太平洋被接管。一年以后，古尔德与拉夫雷

地和平谈判，将科罗拉多中央铁路从朗蒙特延伸到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夏延的终端，同时也与堪萨斯太平洋重修旧好。卡尔仍然愿意合并，但是他没有权力。他被要求接受法庭指定的接管人的建议，两个接管人其中之一是卡洛斯·S·格里利（Carlos S. Greeley），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批发商，他被指定看管拥有大量初级附属债券的一小部分圣路易斯投资者的权益。另一位接管人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代表大部分第一抵押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他们中大部分是德国投资者。亨利·维拉德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从那时起，古尔德和他进行了大量交易。

维拉德比古尔德长一岁，出生在巴伐利亚。1853年，他移民至美国，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女儿结婚后，开始做记者。到古尔德认识他的时候，维拉德已经既作为个人投资者，又是德国银行家的代理进入铁路和汽船公司。1875年，他帮助重组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铁路公司和俄勒冈汽船公司。一年后，他成为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成为堪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接管人。

在这条铁路三类投资者中——股票持有者、格里利代表的附属债券持有者和维拉德代表的第一抵押债券的持有者——最后一类是最大、最重要的投资人。因此，古尔德需要与维拉德进行交易才能取得真正的控制权。起初，古尔德的想法和维拉德不一样，他希望大幅度降低第一抵押债券的面值和利率，以便对堪萨斯的偿付能力进行全面重建，但是维拉德没有同意。

这两个人私下里非常投缘。古尔德经常到维拉德位于曼哈顿拿骚大街的办公室就一些非金融方面的话题探讨很久。维拉德的曾孙女写道：“他们提到过德国、歌德、内战、语言的获得、美国经济，互相评价对方的弱点和长处。”（德·鲍奇格雷夫还补充说：“维拉德很钦佩古尔德的勇气、技巧和私人生活的富裕。”）当然，他们也会谈到生意。“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古尔德，”维拉德在1877年写道，“某一天他会心平气和，第二天就会威胁我。不过我不怕他。”换句话说，维拉德是一个不畏强暴的硬骨头。

在1877年秋季，古尔德与爱荷华的一个联合公司（一组独立所有的铁路，通过收入分配协议组成一个实体）签订合约，以促进通过奥哈马的堪萨斯铁路的运输。不久之后，在古尔德对拿骚大街的一次拜访中，古尔德无意

中说出他想将卡罗卡多大部分交通运输，通过艾奇逊、托皮卡以及桑塔露其亚移至太平洋联合铁路，然后向东到达堪萨斯城。同时，他还与堪萨斯展开价格战，寻求其他的道路。当得知丹佛太平洋的大部分债券由荷兰投资者持有时，他租了一辆游艇，花了两个星期飞奔至阿姆斯特丹收购证券。正如古尔德后来所说，为了“以 74 美分的价格获得 200 万丹佛太平洋的债券，我在早上来到阿姆斯特丹，洗个澡吃完早饭。在 11 点的时候接待债券持有者，12 点的时候购买债券，下午返回”。

同时，古尔德还劝说极度缺乏现金的堪萨斯太平洋股东对铁路的浮动债务进行重组，并由他自己、阿姆斯和联合太平洋进行担保。为债券作抵押的资产包括堪萨斯在丹佛太平洋的股份。因此，任何违约情况的发生都会使古尔德和他的同盟们成为这条铁路的实际控制者。同时，古尔德私人以协议价格购买了大量堪萨斯太平洋的收益债券，并从自己的现金储备中借给该公司 85 000 美元。最后，在 1878 年 4 月——维拉德仍然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客户的利益，坚持对德国人持有的第一抵押债券给予优惠条款——古尔德将堪萨斯太平洋初级附属债券的持有人（包括格里利代表的大部分圣路易斯持有人）组成一个联合实体，成为初级附属债券最大的持有人，他立刻取得了控制地位。古尔德还让卡尔领导的堪萨斯太平洋董事会将自己私人的证券存入这个实体，算做他们对铁路浮动债务持有的份额。通过这个设计，古尔德取得了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控制权。5 月 2 日，古尔德、狄龙和弗瑞德·阿姆斯成为堪萨斯太平洋的董事会成员。通过这一行动，杰伊成功地防止了维拉德成为堪萨斯太平洋的内部人。随后，古尔德又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让维拉德这个精明的巴伐利亚人能够接受的重组协议。

在这次长期战斗将要结束、明显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6 月 20 日，维拉德将自己在堪萨斯太平洋的权力移交给狄龙。但是当天晚些时候——就在维拉德准备和自己的家人到欧洲旅行时——消息传来说，堪萨斯太平洋董事会在堪萨斯的劳伦斯召开会议，决定修改对原来德国持有人较有吸引力的条款。维拉德取消了自己的旅行，对自己的妻子解释说“流氓古尔德”和“圣路易斯的无赖……在西部铁路的问题上合伙背信弃义，欺骗债权人”。

最后，在维拉德弄清楚自己仍然需要斗争后，古尔德出奇制胜，成功地

将他从接管人的位置上踢走。但是，在德国债权人的直接要求下，维拉德仍然控制着他们的证券。用维拉德的话说，即使古尔德“给他在新组建的辛迪加集团中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他仍然会拒绝清算。这种僵局持续了一年半。1879年初，在1873年危机过后的华尔街的第一次井喷中，古尔德最后意识到维拉德不会屈服。“古尔德出现在维拉德的办公室，”德·鲍奇格雷夫写道，“宣称他自己害怕战斗，同意维拉德的债权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和要求。这次古尔德信守了诺言。”

像往常一样，做出妥协的古尔德也获得了另一笔财富，并提高了自己整体的战略地位。听到关于维拉德清算的消息后，堪萨斯太平洋的股价立刻飞速上扬。古尔德自己的股票盈利立刻达到1 000万美元。其中的一部分盈利，古尔德拿来作为平衡，用来在1879年秋收购一条小的支线铁路——中央支线（Central Branch）。当年末，这条铁路变成古尔德铁路王国密苏里太平洋的中转站，从圣路易斯穿行至堪萨斯。（这条铁路包括他的子公司堪萨斯中央和另一条小的堪萨斯铁路。）几乎在同时，古尔德还控制了瓦伯什河和堪萨斯城铁路。当然，维拉德和古尔德在堪萨斯太平洋的交易中也获利颇丰，像古尔德一样，他也同时获得更多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拉德拥有了《国家》杂志和《纽约夜间邮报》（在1881年获得）。他还从北方落基（Northern Rockies）手里极有挑战性地控制了北方太平洋铁路，开始在1883年失手，后来在1889年重新获得。1889年，维拉德还将两个小公司组合在一起成立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



古尔德附属铁路中没有一个——包括密苏里、堪萨斯、丹佛太平洋，以及更小的铁路——是作为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子公司收购的。古尔德和他最亲近的同盟（例如狄龙、弗瑞德·阿姆斯、塞奇和塞勒斯·费尔德）不是作为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官员，而是作为个人投资者控制这些铁路。正如古尔德利用在太平洋邮政的控制地位做出对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有利的决策一样，他也利用自己在堪萨斯太平洋、丹佛太平洋、密苏里太平洋，以及其他小铁路中的控制地位来帮助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运行。但同时，古尔德独立于太平洋

联合铁路所掌握的控制权还给了他额外的力量基础：作为公司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关键问题上威胁那些不听自己领导的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古尔德和他的联盟还独立于太平洋联合铁路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等地控制了各种各样尚未完工的铁路支线。但是，独立控制这些仍在建设的线路更多是出于必须而非机会主义的考虑。太平洋联合铁路狭窄的区域明显影响了支线的建设，虽然公司允许在完工之后再拥有它们。

古尔德谨慎的铁路联合计划在 1879 年到达紧要关头，他向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提议将堪萨斯太平洋 - 丹佛太平洋并入太平洋联合铁路。古尔德将这两家公司（堪萨斯太平洋和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以面值购回（每股面值 1 美元），尽管堪萨斯太平洋（每股 13 美元）当时毫无盈利，而太平洋联合铁路（每股 60 美元）每年支付 6% 的股息率。古尔德一手拿着“胡萝卜”，将所有丹佛太平洋的资本投入其中，另一手拿着“大棒”威胁说——如果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不同意他的建议——将堪萨斯太平洋延伸至奥格登，在那里同中央太平洋铁路对接，独自建立与西海岸的联系。经过几个星期的考虑（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尽可能地买进了堪萨斯太平洋的股票），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意了古尔德的条件。1880 年 1 月 4 日，协议签订。持有接近一半堪萨斯太平洋股票的古尔德后来估计，自己在这次仍在继续的交易中将净赚 4 000 万美元。当时他还不到 44 岁。正如格朗蒂斯基写的那样，“在这些交易中，古尔德恢复了曾经在伊利频繁出现的交易地位——既当买家，又当卖家。”

古尔德独立掌握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就如同他独立控制像堪萨斯中央和中央支线铁路等小支线一样。他告诉密友，他计划利用这些资产组建一个新的、大型的铁路联合体。他的密苏里太平洋不像太平洋联合铁路那样受到政府的限制。得益于维拉德的巧妙协商，它也不受仍然折磨堪萨斯太平洋债务的拖累。杰伊将实行这个计划。在他 1892 年去世的那天，密苏里太平洋将是古尔德铁路体系的王冠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 ★ ★

虽然古尔德对联合太平洋和其他持有的铁路进行着坚定且细致的管理，

媒体和公众仍然将他看做一个绝顶聪明，却又十分无耻的公司强盗。杰伊一点都没有辩驳。但如果人们认为他将所有的时间用来操纵华尔街、设下熊套、抢夺公司财产、欺骗寡妇和孤儿，那么说明大家没有抓住杰伊的真实想法。

不仅杰伊那个时代的媒体认为古尔德对于他关心的公司毫无贡献，就连几个同时代的学者——依靠当时的报纸进行自己的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论调。“没有几个他插手的公司最后没有走向毁灭……他不是一个建设者，而是一个破坏者。”亚历山大·D·诺伊斯（Alexander D. Noyes）在1909年的《美国金融40年》中写道。罗伯特·瑞吉尔（Robert Reigel）在《西部铁路故事》中也做出同样的结论：“古尔德不是那种致力于资产发展然后等待分红的人，他希望采取更多行动获得更多回报。”瑞吉尔还说：“古尔德的控制总是从东部开始，可能是由于他不经常去西部，所以从没有看过自己的资产……古尔德赢得了大量财富，但是他接触过的铁路由于他知识的缺乏和对健全铁路毫无兴趣，从来没有恢复到好的状态。”铁路历史学家理查德·C·奥沃顿（Richard C. Overton）在他1965年的《伯灵顿铁路》中认为，“古尔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交易者。他的特殊才能形成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不断寻求机会获得控制权……他关于联合太平洋的无数交易具有传奇色彩；他几乎毁了这条铁路。”除此以外，奥沃顿解释说：“古尔德是一个投机者，他从不关心铁路作为交通工具的质量，也很少建设铁路经过的周边地区；他的目光总是聚焦在如何快速赚钱。”

在杰伊去世后，只有几个人（莫若西尼和阿姆斯）回忆起穿越沙漠和山脉的长途旅行，古尔德要求查看每一条小支线。只有他们记得杰伊桌子上厚厚的地图——这些地图让爱迪生如此厌烦——这些地图上有古尔德亲手标出的矿产储量、等级、人口中心和类似的数据。只有他们记得他清楚表达的愿景。古尔德在西部的铁路体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纪念碑和贡献。只有《纽约世界报》的记者们可能还将杰伊随口说出的简单话看做事实。古尔德在1887年对该报的一位记者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铁路产生了兴趣。我现在认为铁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之一。我喜欢看着巨大的轮子呼啸而过。”

第二十五章

只缺一个好名声



1879~1880年冬，43岁的古尔德已经开始显出衰老的迹象。他被诋毁的名誉仍然没有什么新东西来改变。古尔德的脑袋秃了，胡子变成花白，在1875年卧床休息的一个月里，他羸弱的身躯总是出卖他。除了在1875年得了肺炎，他还遭受到其他疾病的袭击：失眠、面部和眼睛神经痛。杰伊最通常的表情是，出于必须忍受身体的不适，让注意力高度集中。“他的注意力如此集中。”他的侄女爱丽丝·那斯洛普回忆说，“在他讲话的时候，便完全忽略了周围的一切。当他倾听的时候，他的眼睛从来不离开说话的人。”杰伊将他瘦弱的四肢放在一件最普通、最基本、毫无特色的衣服里，不是黑就是灰。在秋季、冬季和春季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一顶老式的帽子。在夏季，他便休闲十足地戴一顶白色的巴拿马草帽。“他从来不带珍珠等任何装饰品，”爱丽丝回忆说，“除了端庄的手表和表链。你看到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个瘦小、灰暗，但很有力量的人。他不像那些身材矮小的要人，他既不需要也不喜欢炫耀。”

在他去世后，那些最爱他的人重新收集了关于他的详尽记叙：他的妻子埃莉非常擅长处理的日常生活琐事的片断。杰伊每天下午5点准时从华尔街的战场上回家，回到那个埃莉精心安排的舒适空间。爱丽丝写道：

“（舅母）用一双熟练而有力的手处理着家务。杰伊舅舅的家是他的避风港。当他疲惫地回到家、寻求宁静的时候，海伦舅母总是能够满足他。仆人们被透过秘密暗门看到的一切所感动。杰伊舅舅在吃饭的时候，由于太累或精力太集中而一言不发。有时整顿饭他都不说一句话……我经常想，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在这种时候，海伦舅母总是保持着沉默。”

在吃完一顿沉默的晚餐后，杰伊就会恢复活力，专注于自己的家人。爱丽丝回忆说，杰伊一直是“一个乐于奉献的父亲，一个体贴而周到的丈夫”。事实上，他很乐意花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现在他已经有了6个孩子。除了乔治、埃德温、奈莉，还有霍华德（生于1871年），安娜（生于1875年）和弗兰克（生于1877年）。乔治·古尔德长大以后回忆说，父亲大声朗读着书籍（其中有他的老朋友约翰·伯纳斯写的日益畅销的自然小品文），给家人讲故事，指导所有对他的花园感兴趣的人怎样养花。他总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做这些事情，将自己作为一个善于安慰人的家长。爱丽丝写道：

“杰伊舅舅非常沉默寡言。他的话极少，用词极其讲究。他总是保持优雅的状态。在我住在他家里的几个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生气。我认为，能够自我控制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在处理家务这件事上，他总是非常公平而周到……因此，不管男人和女人都为服侍他而感到光荣，真心希望他高兴……人们常说杰伊·古尔德的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他巨大而千篇一律的成功夺走了快乐……事实上，他虽然被很多事情夺走了无限的快乐和满足，但是他的快乐是深沉而有品位的。”

和大部分她那个阶层的女人不同，埃莉没有将子女的抚养任务委托给其他人。古尔德的家里有一个厨师和几个仆人，但是没有保姆。关于古尔德太太和她的子女，莫里·克莱因写道：

“无疑，她是孩子童年时代的主导人物。虽然杰伊非常和蔼，甚至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但是生意上的压力限制了他的表现。他的孩子很早就学会遵守他的旨意，除非被邀请，否则绝不去打扰他，但认为古尔德是一个严肃的维多利亚式的家长是错误的。他童年时代的体验让他认为，对家庭的付出是真正的信仰。他没有其他准则，也不想接受其他准则。”

因此，他不是个晚会的常客。即使在星期天，埃莉也会带着孩子到第

五大道的长老会教堂。星期天早上，杰伊虔诚的妻子进行祷告的时候，他就在摆弄花草或读书。人们可能想知道，当那个男人或为他祈祷的女人看到很少赞扬古尔德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是什么感受。那个报纸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称赞了古尔德的诚实。“我们并不喜欢古尔德。”编辑们写道，“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在宗教问题上他没有丝毫伪装。”

星期天下午，古尔德一家会招待客人。他们家的常客有罗素·塞奇、埃莉的父母和古尔德圈子中的其他人，例如西德尼·狄龙、耶西·赛力格曼、塞勒斯和大卫·杜德利·菲尔德。男人们谈话的大部分话题是金融，妻子们便和埃莉交谈。然而对于莫若西尼，杰伊和他的关系更亲密一些。他们两个都喜欢收藏古书，这丰富了他们非生意话题的谈话内容。古尔德在职业生涯中另外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是塞拉斯·克拉克，他们不常见面，但是古尔德对他怀有很深的报答之情。克拉克是一个慢性忧郁症患者，杰伊对他的健康问题非常关心。除了家人和他那不经常见面但非常喜欢的卡茨基尔的老朋友，古尔德在这个小圈子里最自在、最放松、最能找到安宁。（波士顿的弗瑞德·阿姆斯除了和杰伊一起旅行之外，在办公室之外很少和杰伊在一起。）

除了圈内的朋友，杰伊和埃莉很少参加其他社交活动。媒体和那些在杰伊的投机上遭受损失的人经常谴责他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个事实似乎并不让古尔德烦恼，他被社交场合排斥的情况正好和他独处的爱好与对家庭安静的喜爱相吻合。在极少几次杰伊和埃莉接到的宴会、舞会或“无法推掉的应酬”（用古尔德的话说）邀请的时候，他也坚持晚到早退。从埃莉的方面讲，她渴望社交生活，期待那少有的几个“无法推掉的应酬”的到来，不喜欢被排斥。在被隔绝在完全由参与和不参与者定义的社会阶层之后，埃莉比这个卡茨基尔的农场男孩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杰伊卑微的出身所带来的深刻的孤立。正如埃德温·霍伊特写的那样：“杰伊不是很喜欢社交或上层社会的生活。他从不喝酒，也不抽烟。他从不玩游艇，也不打台球。他的热情就是赚钱、读书、走路和享受大自然。”

但是，为了缓解妻子的焦虑，杰伊还是尽力去改变。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他和威廉·K·范德比尔特（海军中将的孙子，威廉·H·范德比尔特的儿子）以及其他几个非纽约富翁资助修建了新的大都市剧院。古尔德一

家——和范德比尔特、惠特尼·高利茨（Goelets）、迪瑞克斯尔斯（Drexels）、洛克菲勒、摩根和亨廷顿的家人们——一直被拒绝进入欧文音乐学院的包厢，而一些像阿斯特斯、利文斯通、凯勒斯和比克曼斯这样的古老家庭在那里可以享受最高礼遇。现在，他们在新剧院的“马蹄铁钻石”上出钱建了包厢。“所有最有钱的人都在这里。”《戏剧镜报》记者在1883年10月剧院开演的那天写道，“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和那些浑身带着铜臭气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层层包厢看起来好像垄断者动物园的笼子。有人评论新房子金光闪闪好像新钞票，那么说明他们找到了这群集会者的合适定位。以一种有品位的眼光看，这座建筑的装饰简直糟透了。”当埃莉被哄骗到剧院合适的位置后，她还是遭到了排斥。在她没有人选阿斯特夫人著名的“400强”的同一年，威廉·K·范德比尔特宣布了他自己的纽约精英“1200强”名单，古尔德并不包括在内。

* * *

杰伊坚持每个夏天都要在乡下待几天，做一个步行者、养马者和园丁。在朗布兰奇或其他古尔德喜欢的地方，例如怀特和格林山等选择之间作了对比之后，古尔德找到了一个他非常愿意长时间居住的乡村。1877年夏季，古尔德租了一个300英亩、有围墙的庄园，从那里可以看到欧文顿（靠近塔文顿）的哈得孙河。这个地方距离塞勒斯和大卫·杜德利·菲尔德的庄园不远，以前是乔治·默瑞特（George Merritt）的家。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纽约商人，死于1873年。古尔德从默瑞特遗孀的手中租来了这个地方。从菩提树后可以看到这座庄园的名字“林德赫斯特”，它是美国随处可见的复兴哥特式建筑的最好典范。这座建筑最初是1838年安德鲁·杰克逊·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为林德赫斯特的第一个主人威廉·波尔丁（William Paulding）——纽约城以前的市长，他称纽约为“小圆丘”——设计并建造的非对称建筑。它有奇妙的塔楼、尖顶、扶墙和三页草式的造型。26年后，戴维斯回来将原本就很大的建筑扩大了一倍，在默瑞特的要求下增加了新的侧厅和塔楼。从此以后，这座房子看起来就像一座阴暗而精致的哥特式城堡：一个非常适合金融大鳄居住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超自然肥皂

剧《黑暗的影子》就在这里拍摄。)但这只是从外面看起来的状况,这座房子内部敞亮、温馨,阳光从无数巧妙设置的窗子中透进来洒满房间。古尔德一家很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杰伊最主要的要求是这座房子的花园。宽阔的草坪(周围种满了古老的菩提树、榆树、山毛榉、桦树和松树)从房子门前一直延伸到河边。沿着岸边,这条长长的草坪一直延伸到纽约中央铁路的铁轨前,该铁路对铁轨周边地区享有占有权。从房子望出去,穿过哈得孙河向南可以看到帕利瑟德的美丽风光,向北可以看到塔潘海。在这里,杰伊可以和孩子们玩槌球游戏。他也可以在黎明的早上漫步在河边,或者在岸边读书。林德赫斯特还有一个大型马厩,可以满足杰伊和孩子们骑马的愿望。但是,对杰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城堡南部美国最大的温室:380英尺长,37英尺宽,每侧有60英尺的侧厅和100英尺高的穹顶。在晴朗的天气里,从梯子爬上天台站在穹顶上面,向北眺望,可以看到哈得孙高地,还能看到远处杰伊蓝色的故乡卡茨基尔。他指着那里,对孩子们说那就是“老家”。古尔德经常怀念他在卡茨基尔的日子和老朋友,偶尔还会回到那里。

在林德赫斯特度过的三个夏天让古尔德如此着迷,以至于1880年,杰伊花了25万美元从默瑞特夫人手中买下了这座庄园。在闭园前不久,古尔德在走廊建了一个两层的陈列室,在那里悬挂了他收藏的越来越多的巴比桑画派的作品。同时,他在主楼层的两个房间建了一个带有玻璃橱柜的私人书房。至于那个大温室,自从默瑞特死后就一直空着,杰伊让一个德国园林设计师费迪南德·曼格德(Ferdinand Mangold)——1864年默瑞特请来的——在其中布满珍稀玫瑰、兰花以及其他珍品花卉。那个夏天的每个夜晚,在乘坐纽约中央铁路回家和家人吃过晚饭后,喜欢安静的古尔德会穿着便装和拖鞋立刻来到温室,和曼格德一起愉快地工作,给花卉分类、种植。到杰伊和家人在秋季回到第五大道时,他已经在各式各样的花草上花了4万美元。那个秋季,他在周末还经常出现在林德赫斯特,摆弄他的树根和球茎。

因此,当12月11日早上的一场大火(可能是一个纵火者所为)烧掉了温室和一切时,杰伊几乎被击垮,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他的反应让人回想起许多年前被烧毁《特拉华历史》时的情景。在几个星期里,杰伊和一个

独立建筑师及著名的温室建造师罗德和布坎南一起，最后完成了他在 1882 年前建成一个同样大小的替代品计划：美国第一个钢结构温室。杰伊的新伊甸园包括一个葡萄园，西侧紧挨着一个冷室，用于种植山杜鹃、山茶花、风信子和球茎类植物。在另一侧，东边的侧厅用于种植康乃馨、玫瑰、兰花、杜鹃和其他花卉。杰伊最喜欢的是兰花厅，在那里他拥有在全北美范围内最重要的收藏：8 000 株，150 个品种的兰花。温室的半圆中央部分有一个大喷泉，周围种着奇异的棕榈树。在温室外，古尔德将自己的领地扩大到 500 英亩，后来其中大部分成了林地，还有一些转换为农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鄙视农场挤牛奶生活的男孩现在却很喜欢挤牛奶。古尔德自己养了 50 头牛和 3 头一等公牛。在曼格德的看管下，经过 20 个人的努力，林德赫斯特每年能够生产 250 吨草料和大量牛奶。

除了它的舒适和奢华，四周都有围墙的林德赫斯特还给杰伊和他的家人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不断有疯子、反对者和可能的刺客骚扰，古尔德不得不经常在身边配备保镖。正如以前提到的，杰伊有一次在代尔莫尼克餐厅被袭击。还有一次，在 1877 年当他走到交易大厅核心大街的交界处时，古尔德成为一个名叫 A·A·塞利佛（A. A. Selover）的强壮的华尔街交易员的袭击目标。那个人击中了古尔德脸部，抓住裤子后裆，将他拖下几个台阶带到一个地下室的理发店。（据说由于古尔德的坏名声，塞利佛的孙子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还表达了对自己前辈光荣事迹的骄傲。）从此以后，古尔德在公开场合都带着莫若西尼或一名机警的私人侦探。他的亲戚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爱丽丝·那斯洛普写道：“神秘和警惕的氛围弥漫在家中，家人不可避免地将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到处都是暗杀、绑架和勒索。其中一些来自狂热工人运动中的极端者，还有一些来自试图赚钱的机会主义者，甚至还有想象自己是能替上帝对付臭名昭著的古尔德，以行使公平正义的头脑简单的狂热者。

爱丽丝还记得 1881 年夏初在林德赫斯特和舅舅一起坐在白桦林里的情景，当时一个仆人给杰伊拿来一份电报。“爱丽丝，”读完电报后，他尖叫着说，“加菲尔德被刺杀了，加菲尔德总统被刺杀了。”杰伊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他将头向后靠着休息，以便重新振作他钢铁般的意志”。作为国会

代表，加菲尔德曾因“黑色星期五”事件调查过古尔德，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古尔德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这个人。事实上，他已在支持——没有公开，只是默默支持，以免将人们对古尔德的仇恨转移到加菲尔德身上——白宫里的共和党候选人。“在一个穷凶极恶的盗贼面前没有人能够安全。”在9月19日加菲尔德总统最终死于枪伤后，沉思中的古尔德对莫若西尼说。那个秋季的一天，爱丽丝和奈莉来到林德赫斯特，在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舅舅和舅母“面色死灰”，“可以感觉到舅舅在颤抖”。一个持枪的陌生人正试图越过庄园围墙，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直到一个被爱丽丝称做林德赫斯特的“带枪援军”的人发现了那个持枪者。杰伊的侦探发现这个擅自闯入的人藏在一片灌木丛中。过了一小会儿，受惊的古尔德返回书房，在那里所有家人都等着他。“那个疯子和他的弹药库，”他对他们说，“已经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 ✱ ✱

在建造那个新温室的同年，即1882年，古尔德还将曼哈顿的家从第五大道578号搬到一座更大的房子中。579号坐落在第五大道47街的东北角。古尔德和他的邻居达赖厄斯·奥格登·米尔斯（Darius Ogden Mills，达赖厄斯是一个采矿业和银行业的巨头，住在距离古尔德家北部一个街区的第五大道634号）一样，聘请了著名的赫托兄弟重新设计了内部装潢。当时的照片显示，古尔德房子巨大但并不豪华，4层楼、3个隔间，中间有一个过道。古尔德一家在二层和三层占用了7个卧室，4层和1层留给佣人。杰伊和埃莉的房间很大，连接两层，面向第五大道。第二层有古尔德精致并且装有壁炉的书房，里面有大量藏书，但与林德赫斯特相比还不是很丰富。

不管在579号还是在林德赫斯特，杰伊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家人都很受欢迎。鳏居的艾布拉姆·古尔德定期将他的弗瑞德送到哈得孙的大庄园里和他的堂兄妹们度过漫长的夏季。同时，贝蒂·古尔德和吉伯特·帕林的子女——安娜、鲁弗斯、小吉伯特，小吉伯特出生于1870年，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从他们宾夕法尼亚日耳曼顿舒适的家里（距他们的父亲和叔叔爱德华的皮革厂60英里）来到这里。（帕林的另一个儿子沃尔特·古尔

德·帕林于 1877 年在他两岁的时候夭折。) 更重要的是, 杰伊和埃莉的家还对杰伊的姐姐萨拉·那斯洛普那一大帮孩子们开放。

乔治·那斯洛普在后来几年的生活不太宽裕。他的皮革厂破产后, 杰伊在宾夕法尼亚距离帕林不太远的地方给他建了一个百货商店。但是最后, 古尔德的慷慨并没有帮得上那斯洛普。过了 60 岁以后, 对生意倒闭的极度伤心以及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 使这个骄傲的人最终选择了自杀。“不要难过, 萨拉。”杰伊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劝慰姐姐说, “我会帮你的。”不久之后, 萨拉收到杰伊一封长信, 在信中他详细讲述了如何关闭那间商店。他还解释说他将支付乔治生前欠下的所有债务, 此后, 萨拉还收到了大额支票以支付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费用。

此时, 乔治·那斯洛普在和萨拉结婚前, 他和前妻卡罗琳·帕林生下的 5 个子女除了夭折的外其他都已经长大, 但是萨拉还要抚养自己 9 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最小的第十个孩子在 1880 年十岁的时候死去。) 对于这些后代们, 杰伊强调每个人都要进学校读书, 他们的成绩单将送到他这里检查。从一开始, 杰伊就清楚地表示, 他不仅是萨拉一家生活费的支付者, 还将是一个代理父亲。爱丽丝·那斯洛普深情地回忆道: “杰伊舅舅对于我和兄弟姐妹们来说不仅仅是舅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他和我们在一起, 从经济上资助我们, 让我们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他的帮助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在他的余生, 他在很大方面填补了父亲的空白。”

在萨拉的大女儿艾达从瓦萨大学毕业后, 她对开一所预科学校表现出兴趣。杰伊将那斯洛普全家搬到新泽西的卡姆登——乔治·那斯洛普的故乡——资助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他建的学校有 12 间房子供萨拉和其他仍需要他保护的孩子居住。后来, 那斯洛普的一个儿子瑞德·那斯洛普在美国冷藏运输公司(密苏里太平洋的一个子公司)工作。爱丽丝在韦尔斯利发生意外导致腿部残疾, 被迫退学。古尔德使用他年轻时候遭遇困难、最后总是能够克服的故事鼓励她。后来, 他安排她到法国休养了 15 个月, 之后爱丽丝治好了跛脚, 开始在艾达的学校教法语。

在乔治·那斯洛普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杰伊和埃莉坚持让那斯洛普全家到 579 号过节。起初, 萨拉告诉孩子们不要期望太高; 毕竟, 杰伊已经

非常慷慨了。但是在圣诞节的当天，每个孩子桌椅前都放着一份包好的礼物。爱丽丝的第一份礼物是她的舅母送的刻有字母的瑞士金表，当时她尖叫着：“啊，这个圣诞节太让我满足了！”爱丽丝还收到他的堂兄爱德华送的星状胸针，如此等等，这些都花了杰伊很多钱。在礼物打开之后，全家一起吃了圣诞晚餐。长长的餐桌上布满了大量从林德赫斯特温室带来的大红色花烛和一品红。菜单上有水龟、牡蛎、充满填充料的火鸡、土豆、酸果蔓和蔬菜，上面还有李子布丁。在厨房里，仆人们也享用同样丰盛的晚餐。每个男佣、女佣和厨师也收到了古尔德慷慨的礼物，林德赫斯特的仆人们也是如此。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在书房的大圣诞树前唱着圣诞歌。接着每个男孩和女孩都收到一盒糖果，床前还有一份礼物。还有一个圣诞节，爱丽丝被带到都市大剧院的家庭包厢里。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她发现剧院里大部分目光都集中在古尔德一家人身上而不是舞台上。她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她舅母当年收到的圣诞礼物：拿破仑王后约瑟芬曾经拥有的珍珠吊坠。

✱ ✱ ✱

杰伊和埃莉自己的孩子们却是一个独特与矛盾个性的综合体。大儿子乔治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傲慢和苛刻。父母经常因为他对待下人恶劣态度而惩罚他，乔治充满了特权感。这也是古尔德在那些继承父辈们在华尔街打拼下的财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身上发现的令人不悦的事情。但是到了乔治这里，他令人骄傲的父亲不仅对儿子不劳而获的贵族特质熟视无睹，还对他的自我放纵、缺乏自律和天生才智方面的许多缺点视而不见。无可置疑的理性和在处理大多数事情时的冷静，让杰伊·古尔德坚持认为（虽然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了相反的结论），他的大儿子将会及时获得控制各类古尔德企业所必需的威力和奉献精神。

从另一个方面讲，乔治的弟弟不仅比乔治聪明，而且更加平易近人和有倡导力。次子埃德温继承了父亲的安静、勤奋和自律。同时，他还喜爱户外活动 and 大自然。埃德温非常喜爱独木舟，从小就在林德赫斯特附近的哈得孙河探险，长大以后独自一人在纽约环游斯塔腾岛时写下了很多杂记。他和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林德赫斯特庄园看门人的儿子成为一生的朋友。（从这

里和以后提到的其他事情可以看出，埃德温的毫不势利继承于他的父亲杰伊。) 三儿子霍华德同埃德温一样天生比乔治开朗，但是他的能力却很难被激发：一个温顺的“大马哈鱼”，虽然有才能，但是不愿意逆流而上。至于弗兰克，他继承了杰伊在高等数学、机械和工程方面的天赋。在7岁的时候就找来父亲以前的勘测仪器，坚持让杰伊教他如何使用。

在两个女儿中，奈莉很早就显示出清教徒的倾向，可能是继承了母亲的信仰。当她和父母一起去戏院的时候，在看主戏之前的短芭蕾时她总是望向别处。杰伊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回答说自己喜欢这种伤风败俗的表演，她认为芭蕾舞是不道德的。她的衣服总是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小时候，她大部分时间用在基督教传教社区的公益工作。她怀着巨大的热情为无家可归者缝制毯子，为酒鬼购买《圣经》，将她所有的精力用于各种形式的道德改革。她鄙视夸耀，很多时候在看到古尔德的财富时会显得很尴尬。她很少对追求自己的年轻男子发生兴趣。她曾告诉爱丽丝·那斯洛普，和他的父亲比起来他们什么都不是。奈莉的妹妹安娜却喜欢第五大道和林德赫斯特的花花世界，和乔治一样表现出一种特权感。在林德赫斯特的时候，安娜睡在高塔的卧室里，时时显得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和乔治一样，她脾气很坏、非常自私，对家里的下人很傲慢。安娜也经常因为脾气暴躁受到责罚。她很轻视那斯洛普家的孩子们，出于自己做善事的考虑，对他们只比对仆人们好一点点。

“我为了你们全身心地付出。”杰伊在19世纪80年代初一次西部旅行时给奈莉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所有的幸福都属于你们。”杰伊的孩子、外甥和外甥女们——或者那些了解他的最亲密的人——毫无疑问都知道，古尔德最重要的资产、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家庭。因此，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尔德开始关心自己名誉的原因。“我非常害怕，”他告诉莫若西尼说，“我可以留给他们任何东西，但却没有一个好名声。”

第二十六章

电报和高架铁路



在 1880 年古尔德购买林德赫斯特时，他不仅刚刚完成堪萨斯太平洋、丹佛太平洋、联合太平洋的合并，而且仍然独立控制着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他通过获得瓦伯什河、铁山和其他一些穿过大陆向西到达奥马哈、向东到达托莱多和底特律、向北到达五大湖和芝加哥的小支线，来拓展自己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同时，古尔德租借了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简称凯蒂铁路），在 1881 年 4 月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汤姆·斯科特（Tom Scott）手中买下了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子公司《纽约世界报》。另外一些小的铁路也同样被吸收到古尔德日益庞大的财富网中。这些被集合起来的资产——新扩张的联合太平洋、密苏里太平洋以及古尔德体系中的其他铁路——共计 15 854 英里，占全美铁路里程的 1/9。

在占据了这些制高点后，古尔德开始涉足力量强大的东部铁路市场。东部铁路市场中最有名的人物是波士顿名流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他拥有密歇根中央铁路、伯灵顿、汉尼拔—圣·约瑟夫铁路的大部分权益。和古尔德在许多市场大打价格战的福布斯，当听说古尔德从侧翼包抄，于 1880 年 1 月抢得凯蒂铁路的租约时大吃一惊。在此之后，这个波士顿名流逢人便讲古尔德不是一个绅士。福布斯曾对他们共同的伙伴弗瑞德·阿姆斯说：“当然，我不能拿古尔德怎么样……上次我们相见纯粹是恶作剧。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喜欢他。”

然而，福布斯和其他人还是对杰伊的操作心存敬畏。“他像一个非洲巫师一样神秘行事。”《纽约时报》评论说，“当他讲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倾听那眺望着毫无生机的埃及沙漠的狮身人面之神——斯芬克斯讲话一样。”《纽约股东》记者描述了杰伊的计谋、反计谋、计谋中的计谋，正确地表现了他宏伟战略的复杂性：“在他的脑中有一些系列棋盘，上面刻有各种曲线、抛物线、正方形和角——这些棋盘极少发生冲突，虽然每个棋盘上都有一盘

独立的各行其是的棋。卒、国王、车在五花八门的混乱状态中敏捷地穿行，在它们之外，世界上只有一双眼睛能够让它们井然有序地前进并与整个计划符合一致。”

然而，有些时候对古尔德灰暗而不可捉摸的描述——他辉煌的整合、对误导的喜好和狡兔三窟——却有点言过其实。对他的批评经过最合理的推断就会立刻显示出其中的荒谬，他们既贬低古尔德又称赞他的天才。早在 1875 年，《纽约时报》就指出，如果我们“没有立刻意识到‘杰伊·古尔德’就在整个事件的背后，正如人们说他站在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背后，那么全国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非常怀疑他与……寒冷的冬天、冻住的水管和管道工过高的要价有什么关系。无疑，他在 1874 年夏季的某个时候对管道工施了魔咒，接着制造了最近的严寒，以便让他的阴谋得以进行”。福布斯发现《纽约时报》的讽刺十分有趣。但仍然坚持认为，古尔德作为一个拜占庭式复杂的阴谋制造者的公众形象有一些合理性。

福布斯从来不愿意给古尔德留有余地。但是对于福布斯之外的无数玩家，基于对实用、有战略价值和有利可图的合约的共同兴趣，古尔德和他们保持了更友好的关系。当科里斯·P·亨廷顿在 1881 年侵入得克萨斯，将他的南部太平洋铁路向埃尔帕索铺设铁轨，同时买下了一个路易斯安那支线时，他对于古尔德的凯蒂铁路和得克萨斯 - 太平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亨廷顿的铁路如果建成，将对从旧金山到新奥尔良的货物运输（迄今为止，这些货物还是由古尔德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亨廷顿的中央太平洋的铁路垄断）提供一条有吸引力的路线。此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亨廷顿向北建造到达堪萨斯城或圣路易斯的铁路。

当古尔德意识到亨廷顿将不顾一切，在国会授权给克萨斯 - 太平洋的土地上建造他的新铁路时，一场战役打响了。律师在法庭上发生口水战的同时，古尔德的得克萨斯 - 太平洋建筑队神奇地向西沿着南部太平洋的方向修建了一条新路线。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这条铁路将和亨廷顿的铁路并行排列。这时，善于算计的古尔德和亨廷顿开始重新考虑。仍处于争议中的土地、接近 90 英里的荒漠对于当地经济没有任何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一条铁路线都不能指望被支持，更别说两条了。于是，古尔德和亨廷顿于 1881 年感恩节在古

尔德的家中坐下来谈判。古尔德呷了一小口白兰地（他注视酒杯的时间比喝酒还要多），之后这两个人达成了协议。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双方的工程队悄悄地改变了路线，向他们约定的理想路线修建。之后，古尔德和亨廷顿共同分担了那 90 英里铁路的麻烦。他们也公平地划分了通过加利福尼亚路段生意的利润。此外，亨廷顿打消了向西向北修建铁路的主意。这个协议几乎执行了 46 年。在 1881 年协议的 11 年后，古尔德已躺在棺材里，亨廷顿说：“我发现他总是说话算话。”事实上，后来是亨廷顿而不是古尔德违背了协议，修建了一条到新奥尔良的铁路。

* * *

购买林德赫斯特的同时，古尔德还涉足了美国无线电业务。1877 年 8 月，在西部联合公司和大西洋 - 太平洋铁路合并后，威廉·H·范德比尔特粗暴而生硬地拒绝了古尔德要求在西部联合公司董事会占有席位的要求。作为回应，两年后古尔德成立了美国联合公司，作为破坏然后接管西部联合的工具。西部联合公司的前总经理，古尔德曾引诱他出任大西洋 - 太平洋铁路总裁的托马斯·埃克特将军，现在是美国联合公司的总裁。莫若西尼是财务总监。巴尔的摩 - 俄亥俄公司的所有者，先前和古尔德在大西洋 - 太平洋铁路事件中竞争的约翰·W·加瑞特加入了董事会。该公司初始资本 1 000 万美元。接着，通过古尔德组建的中央建筑公司，美国联合公司飞速发展。在反复播放的电视采访中，古尔德将美国联合定位为民主的必需，并口若悬河地讲述了如何使电报业不在全美造成垄断。但是大多数评论家仍持怀疑态度。“我们同意古尔德先生的观点。”《纽约先驱报》说，“电报业的垄断就像其他任何垄断一样不是件好事情。但是我们怀疑，垄断者本身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其他联合的正义战争。古尔德的最终目的不管是什么，都一定是对古尔德自己而不是大众利益有利。古尔德可以被看做其他任何类型的人，但绝不是爱国者。”

杰伊将这些标准批评抛在脑后，专注于他的新公司。他不仅建起了全美性的新无线网络，还租赁了加拿大多米宁电报公司（Dominion Telegraph of Canada），与联合太平洋和堪萨斯太平洋（古尔德刚刚就所有权问题和维拉

德达成协议)签订了协议。但是,他无法从西部联合公司手中夺过密苏里太平洋——范德比尔特将会诉诸法庭申请保持特权,让密苏里执行先前的合约。但是,古尔德可以让西部联合公司失去它控制的其他大部分铁路合约,包括瓦伯什铁路。经过一年的运作,美国联合公司已经建立了连接2 000多间办公室的5万英里线路。同年,西部联合公司的利润下降了200万美元。古尔德继续使用他常用的思路,不仅与西部联合公司展开竞争,还筹集了一个资金池(包括塞奇和狄龙),对西部联合的股票进行熊市狙击,将这个蓝筹股击落到前所未有的低点。到1880年底,西部联合公司的股价创建以来第一次跌到了90美元以下。1881年初,当股价在78美元的时候,古尔德自己控制了90 200股的股票(价值超过700万美元),威廉·H·范德比尔特投降了。自从美国联合建立一年半以来,西部联合至少在账面上损失了25%的价值,超过1 000万美元。

1881年2月15日西部联合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备忘录上讲述了重组和整合的细节。美国联合公司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后者已经成为西部联合的一个独立子公司)将合并成一个总公司。西部联合将发行1 500万美元的股票用于交换美国联合的股票,据观察者计算,这次交易的价格是美国联合先前成本的两倍。西部联合还要发行840万美元的股票,以每股60美元的价格替代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发行的股票,同时安排1 550万美元的股息支付给重组前的股东(古尔德位列榜首)。在谣言传出后不久,西部联合的股票价格涨到116美元,美国联合跌至过去的94美元。最后,在这次重组中西部联合的资产价值定为8 000万美元。对古尔德来说,他不仅在合并前持有的股票上赚到了3 000万美元,而且控制了该公司。在两年的时间里,杰伊完成了19世纪的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建,并利用它为砝码促使其与IBM联合。到此为止,他在美国工业舞台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域都成了主角:交通和通信。

“那天早上,全国人民发现自己处于电报垄断之下。”《纽约先驱报》在1881年2月16日备忘录公布的第二天哀号道。即使对古尔德一贯友好的《纽约论坛报》也表达了对西部联合公司整合的关注,担心这次联合规模太大,可能会引发联邦当局的报复。《纽约论坛报》分析说,西部联合公司控制领域的巨大规模可能最终导致“政府对电报系统的控制,就像政府对邮政

控制一样”。在其他阵地，例如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纽约期货市场的阵地——发布了一个反对合并的声明。反垄断联盟组织了一个抗议会，纽约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议案阻止这次交易。（古尔德在阿尔巴尼的老朋友汉密尔顿·哈瑞斯向他保证该法案不会送到参议院。）一群西部联合公司的股东试图通过上诉阻止合并，在被股东的律师——臭名昭著的不可知论倡导者罗伯特·G·英格索尔——交互盘问中，古尔德对于合并本质的真实又神秘的双面论述，让英格索尔完全迷惑了。“我不相信，”英格索尔后来说，“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人能比杰伊·古尔德更加粗鲁无礼。”

古尔德、塞奇、狄龙和埃克特加入了西部联合公司的董事会。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古尔德搬进了西部联合公司在百老汇195号那栋漂亮而较新的办公大楼的顶层。这是他在余生处理曼哈顿业务的主要办公场所。西部联合公司的总裁诺维·格林（Norvin Green）——在奥顿1878年4月去世后接替奥顿的位置，作为威廉·H·范德比尔特的首席运营官，在反对古尔德接管战中赢得了古尔德尊敬——被允许留在公司。至于埃克特，他除了参加董事会，还是西部联合的副总裁和总经理。古尔德总揽全局。有人认为他开始使用西部联合公司的网络来窃听信息，帮助他在铁路和投资中与对手竞争，因为那些人都被迫使用西部联合公司传送秘密信息。当然，古尔德自己的反垄断言论也销声匿迹了。他所有的铁路都与西部联合签订了铁定协议。同时，纽约的首席检察官、古尔德的同盟汉密尔顿·沃德宣布，法庭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场合并。

合并的影响立刻被越洋电报的运营商感受到。之前，美国联合公司、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和西部联合公司分别通过三个最大的大西洋电报公司与欧洲连接，并签订有独立的协议。（第一家大西洋电报公司于1858年和1866年，由古尔德曾经的伙伴塞勒斯·菲尔德，以一种谨慎而有管理战略的眼光创办。）美国联合与一家法国电报公司连接，大西洋-太平洋铁路与直接电报公司连接，西部联合与盎格鲁-美洲电报公司连接。在合并后，古尔德获得了垄断力量，终止了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和美国联合公司的合约。后来，在9月份，古尔德自己的越洋电报试验——由古尔德控制的美国电报-电缆

公司建立，古尔德当时对媒体说美国的业务不会被外国公司操纵——第一次失败了。但是铺设的电缆一直到 1882 年仍然可以使用，这让古尔德可以强迫其他三家公司制定统一的费率，并瓜分利润。

古尔德是在西部联合公司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那个有思想、头脑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速记员的，后来古尔德将他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一年后，当这个 19 岁的年轻人埃德温·布克（Edwin Bok）——以后在杂志和出版界获得了极大成功——对古尔德提交辞呈的时候，这个商业巨头提出给他加薪以挽留他。布克解释说，薪水固然重要，但是比不上在他希望从事的行业中获得一个位置更有意义。“那你希望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古尔德问道。“出版业。”年轻的布克回答说。多年后，他在赢得普利策奖的回忆录《埃德温·布克的美国化》中谈到了这次谈话。“你错了。”古尔德回答说，“书籍是一种奢侈品。公众将大部分金钱花在一些生活必需的方面：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生活。人们必须打电报，但是不一定需要读书，你可以在图书馆读书。像你这样有前途的年轻人在生活面前应该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走向错误。”但是，由于布克一再坚持，古尔德只好祝他好运，并给了他一份奖金作为离职的礼物。

7 年后，命运让布克又一次遇到了古尔德。那是 1889 年的一天下午，布克在哈得孙河帮忙驾驶游艇，杰伊·古尔德的林德赫斯特的美妙景观“引起了甲板上的女士们的兴趣，她们希望看看古尔德著名的温室里的美丽兰花”。得知此事以后，布克向船主说明自己以前认识这位金融家，请求去找古尔德以便达成大家看花的愿望。不久后，这次舞会的另一个年轻人（不是布克）划船到岸边取来古尔德的通知。消息传来，古尔德欢迎他们参观温室。杰伊自己接待了船员们。接着，在安排自己的首席园丁曼格德照顾参观者以后，古尔德将布克拉到旁边聊天。

在其他人走过去的时候，这位金融家说道：“我从报纸上看到你正在从事出版业。”当布克对古尔德一直关注他表示吃惊的时候，古尔德回答说：“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不是在出版业。你天生就是为

华尔街而生的。你能够在这里取得巨大成功，这是我对你的看法。在出版界，你只能走这么远；但在华尔街，你可以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在这里有你发展的空间，但在出版业里没有。现在改变还不太晚。”布克依然拒绝了古尔德的邀请。他还是更加满意自己在文学世界的职业生涯，就像古尔德对他和他的前途具有真正的兴趣一样。

另外一个受过古尔德帮助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是后来的美国国会议员W·伯克·考克南（W. Bourke Cockran）。1878年在曼哈顿开了一间办公室后，24岁的考克南——他们共同认识的人向古尔德推荐考克南，说他非常聪明和有战斗力——接到通知让他在第二天早上去杰伊的办公室。第二天，这个爱尔兰移民见到了一个瘦小而沉默的商界绅士。“年轻人，”古尔德说，“我希望将下一年生意中遇到的所有法律官司交给你处理。你愿意吗？”在考克南点头同意后，古尔德填写了一张支票，折起来隔着桌子递给他。虽然考克南很想知道支票上的金额，在接下来和古尔德谈话的一个多小时中，他仍假装漠不关心，根据法律习惯和实践单调地背诵建议。来到大街上以后，他打开那张纸，发现古尔德给了他5 000美元。后来，即使古尔德在该年需要处理大量法律事务，他也没有找过考克南。那张支票不仅是律师费，还是对一个在生活上刚刚起步、有精力、有开创精神的年轻人的巨大帮助。就是这种年轻人，古尔德才最愿意和他建立联系。

✱ ✱ ✱

在建立起全美性的铁路网络和获得西部联合公司之后，古尔德开始创建古尔德帝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纽约高架铁路。这三桩生意都是古尔德寄予巨大希望的晶胚。在黄金时代，这三项事业可以被看做是新经济。这三个行业都有一段短暂但麻烦的历史，充满了无效、欺诈和巨大野心的失败。

前两次在曼哈顿建设高架铁路的尝试在1873年危机后陷入低谷，只留下两个由单独的私人实体拥有的未完工的路线：纽约高架铁路公司和大都会（先前是吉伯特）高架铁路公司。纽约高架铁路公司管理着从西部格林威治到30街第九大道的线路，大都会高架铁路公司管理着从纽约金融街的教区到

第六大道，然后至中央公园的线路。危机后的第二年即 1875 年，纽约州立法机构成立了高速交通委员会，力图合并和改进这两条线路，建立一条新铁路，形成一个整体。经过研究，委员会让纽约高架铁路公司将它破烂的铁轨铺到哈勒姆，沿着南部渡口到达第十三大道。它还授权大都会公司在第六和第二大道之间建立一条平行于纽约高架铁路的线路。为了推动建设，委员会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修建在特定日期里纽约或大都会高架铁路公司没有完工的线路。

纽约高架铁路的发起者——其中有纽约州长萨缪尔·J·蒂尔登——劝说古尔德的朋友塞勒斯·菲尔德在 1877 年 5 月买下纽约高架铁路，之后，菲尔德成为公司总裁。在两年内，纽约高架铁路公司从 6 英里的铁轨发展到 31 英里。大都会公司——包括古尔德的朋友加里森中将、他的儿子威廉、乔治·M·普尔曼、贺瑞斯·波特（在黄金狙击战中认识的）和一个名叫卓斯·德·纳瓦若（Jose de Navarro）的西班牙投资者——与拟定的铁路建设地点的土地所有者发生了纠纷。不过，大都会公司还是设法在 1878 年 6 月前开始建设通往第六大道的线路。

· 不管是大都会还是纽约高架铁路的建设都由纽约贷款和发展公司（New York Loan and Improvement Company）负责。这家公司由两家高架公司的董事和主要投资者组建，使用类似先前莫比列信贷公司的手段，与自己签订合约获得双倍盈利。（例如，对大都会公司的工程造价 970 万美元，但是收取 2 150 万美元的费用。）接下来，由于两家公司都准时地沿着路标在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的领地内铺设铁轨，所以后者发现自己事实上无事可做。

按照既定的进程，大都会和纽约高架铁路公司的巨额嫁接利润让人开始考虑，合并（纽约州宪章明确禁止）可能是值得做的。也就是在当时，即 1878 年底，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的出现为绕过法律限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每个铁路公司将自己的线路租给曼哈顿公司 999 年，并提供给曼哈顿公司 900 万美元完成接下来的建设。（这项任务在 1880 年完成。）作为回报，曼哈顿公司给每个公司 650 万美元的股票，同意支付每个公司未清偿的债券利息，保证对每个公司持有的股票支付 10% 的红利。这种古怪的公司结构表明曼哈顿公司是一个只拥有两项资产的控股公司：它的租约。该公司不持有它“控

制”的两家公司的任何股票，并且要执行严格的支付条件。曼哈顿公司取得了纽约高架铁路的垄断权，但是这种租约结构却意味着曼哈顿公司不可能给它自己的股票发放任何股息。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一旦铁路完工，菲尔德和他的纽约高架铁路的工人们将变得难以控制。纽约公司比大都会的盈利能力强得多。但是由于两家公司被混在一起支付红利，所以菲尔德和他的搭档们感到他们在支持大都会的运行。大都会集团后来卖掉了所有曼哈顿股票，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作为回应，菲尔德清算了他 13 000 股曼哈顿股票，从董事会辞职。之后，蒂尔登也抛出了他在纽约高架铁路的长期投资。

同时，1881 年春季在阿尔巴尼，一个试图让州政府制定高架铁路运费的议案差点获得批准。在这个威胁结束后，法庭宣布高架铁路周边的财产所有者可以在他们的权力之内，对吸烟、恶臭、煤渣等快速交通的负效应提起诉讼，在这个决定面前，曼哈顿公司的管理者们再也无法表现得轻松。接着，一项法律诉讼宣布高架铁路应该像其他房地产一样被征税，这项决定对曼哈顿公司的底线予以毁灭性打击。古尔德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嗅出了他最喜爱的机会：巨大的潜在机会等待他以协议价格收购这残破资产。

4 月底——在古尔德购买斯考特的得克萨斯 - 太平洋铁路及其子公司的几个星期里——《纽约世界报》开始列举了一系列理由，批评曼哈顿公司的运营结构、管理和资本定位：所有操作都会降低估价。虽然曼哈顿公司的管理者们抗议他们自己以及公司被不公正地描述，但是到了 5 月初，曼哈顿公司——在 1880 年股价曾达到 57 美元——现在降低至 21 美元。（这个事实与曼哈顿公司的实际情况无关。《纽约世界报》对古尔德利益的经常性指责——长期利益或是短期利益，大部分认为是后者——足够吓走买家以影响公司股价。）两个星期后，纽约首席检察官汉密尔顿·沃德寻求并获得了纽约州高等法院的许可，宣布对曼哈顿公司的许可无效。这是一个他从未使用的选择权，因为古尔德让沃德获得禁令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曼哈顿投资者的信心，以便进一步打压股价。

此刻，罗素·塞奇作为古尔德的盟友经常参与古尔德的操作，已经在华尔街闻名。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低价买进了大量股票，发布了一个计

划，保证曼哈顿公司在接下来的 24 个月中履行自己的租赁义务。同时，古尔德和他的盟友们在和纽约高架铁路与大都会高架铁路公司发动“熊市大战”的同时，私下里悄悄买进了更多的曼哈顿股票。6 月，当市场上开始对古尔德的操作有传言时，他便漫不经心地开始停止投机。《纽约世界报》在“华尔街传言”栏目 6 月 15 日刊中写道：“关于古尔德的同党们对曼哈顿非常感兴趣以及大都会公司已经采取行动的谣言，只不过是為了出售这些公司的股票制造市场环境。”《纽约世界报》对古尔德参与其中的否认只是更加确认了他的参与。古尔德自己并不在意。人们对于他的行动和目的的迷惑可以帮助他实现最迫切的愿望：让人们继续猜测。同时，其他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那些无意帮助古尔德的报纸，却在发布对曼哈顿公司财务状况的冷静分析中不知不觉帮助了古尔德。大多数人都同意曼哈顿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一半业务（大都会）毫无盈利，新开征的、沉重的基础设施资产税和公司组织结构的不健全（一个不拥有所属公司资产的控股公司）。《费城北美人》的金融版作者积极地断言，曼哈顿公司的股票不久将“和收破烂的人收购废报纸的价格一样，不会再高了”。真正的解决方案——古尔德和塞奇，不久之后再加上塞勒斯·菲尔德，则非常乐意提供。

7 月初，首席检察官沃德向纽约高等法院请求对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实行接管。在阿尔巴尼的西奥多·R·威斯特布鲁克（Theodore R. Westbrook），古尔德的前律师没有听曼哈顿公司的任何辩解就同意了这一请求。威斯特布鲁克任命 A·L·霍普金斯（A. L. Hopkins）和约翰·F·狄龙（John F. Dillon）为接管人。霍普金斯是古尔德瓦伯什铁路的管理人员。约翰·F·狄龙是古尔德的一个律师，他和西德尼·狄龙没有任何关系。在任命霍普金斯和狄龙的同时，古尔德加入了大都会高架铁路的董事会，继续在 16 ~ 20 美元的价位买进曼哈顿公司的股票，慢慢影响纽约高架铁路公司董事会。

与此同时，古尔德、塞奇和菲尔德达成统一战线——不久，在古尔德可以影响以及无法影响的所有报纸上都有回应——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是一个必须清除的腐败空壳。《纽约世界报》在 9 月 23 日评论道：“今天下午，我们从非常权威的地方得到消息，纽约高架铁路和大都会高架铁路决定联合起来对抗曼哈顿公司，希望将他们的铁路拿回自己手中。如果他们成功——我

们看不到任何不成功的理由——曼哈顿公司将成为过去时。”两家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自由。接着在9月，古尔德现在的法官（威尔斯特布鲁克）同意古尔德现在的接管人（霍普金斯和狄龙）发行票据，筹集资金支付曼哈顿的债务请求——所有这些必须经过古尔德本人的同意——古尔德在一个广泛发行的宣誓书中抨击票据发行。“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他作为大都会的董事说，“毫无希望，不可能有偿付能力，通过接管人借钱只是一个最绝望的权宜之计，他只能给公司带来暂时的缓解，并不能避免致命的尴尬。”

在古尔德发表言论的同时，他对曼哈顿公司股票的熊市狙击仍在继续。10月8日——曼哈顿交易登记的结束日，每年董事会召开的30天前——古尔德持有了128 000股发行股票中的48 000股。加上他的同盟持有的股票，他便控制了公司。在一个月后的选举中，古尔德、西德尼·狄龙、塞奇和菲尔德都加入了董事会，古尔德出任总裁。（菲尔德原来不希望这种结果，他希望将纽约高架铁路从曼哈顿的联合中解脱出来。所以为了安抚他，古尔德不仅让他加入公司董事会，还在未来西部联合公司股票的上漲中及时给了他一些好处。但是，在他公开反对将曼哈顿的运费从5美分提到10美分时，他还是迅速地回到了古尔德身边。菲尔德在12月组织了少数股东后打消了那个想法。从长远来看，菲尔德和古尔德在曼哈顿公司的联合将不会有好结果。）

至于曼哈顿公司本身——在几个星期前被古尔德认为将遭受“致命尴尬”——只要和杰伊及其同盟攀上联系，它的前途立刻变得光明起来。韦斯特布鲁克法官解除了对该公司的接管，同时拒绝了纽约高架铁路要求撤回线路的要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一个名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年轻改革派众议员试图证明，古尔德与韦斯特布鲁克和沃德是同谋，但没有成功。罗斯福的游说使得纽约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了一个正式的问询，但很快就演变成了掩盖真相。在新董事会成立的一周后，曼哈顿公司的股票升至55美元。很快，杰伊就掌握了纽约高架和大都会高架铁路的主要位置。11月底，曼哈顿董事会授权发行2 600万美元新曼哈顿公司的股票。1 100万美元给曼哈顿股东，780万美元给纽约公司股东，720万美元给大都会公司的股东。接着，在票注曼哈顿股票快速获得现金之后，古尔德采取了几个关键措施，改善了曼哈顿公司在未来的运营地位。他安排了一个

法律折中方案，减轻两家公司的税收负担。之后，他重新协商了曼哈顿公司与纽约和大都会公司的租约条款，所有这些都对曼哈顿公司产生了深远的有益影响。

在意识到古尔德接管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出这样的新闻：

公众信任被欺骗

高架铁路的证券批发丑闻：古尔德集团如何获得目前的控制权

《纽约时报》忽视了对曼哈顿及其状况批评的事实准确性，咆哮着说古尔德控制的“日报制造假象，影响市场”，被“用来打压曼哈顿股票，贬低高架铁路的价值”。《纽约时报》接着说：

“在证券批发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记录杰伊·古尔德、罗素·塞奇、塞勒斯·W·菲尔德和其他盟友控制纽约高架铁路系统更可耻的章节……古尔德和他的同伙们利用证券批发这个工具，诉诸任何方式，威逼利诱财产所有者成为投降的牺牲品，以此控制其他人的财产，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特别让人吃惊的。在成百上千的利益面前，我们从来不要指望他们会关心其他人的权利或者公众的利益……但是让人吃惊并感到可耻的是，他们成功地利用了该州司法机构和高等法院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对古尔德的操作进行这种马后炮式的喋喋不休和批评中，古尔德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伟大而长期的三个财富支柱：西部铁路、西部联合公司和曼哈顿高架铁路。这个“黄金三角”将在他短短的11年余生中形成他的财富和权力网络，但是仍然强大的是那灰白、阴郁和无法令人遗忘的更饥渴岁月的遗迹。现在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被驱逐的是古尔德恶劣的名声。它掩盖着他，推动着他全身心地勤奋努力，这种勤奋只有死亡才可以与之相匹配。

第二十七章
壮志已酬



在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古尔德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开始仅仅是感到疲倦，然后便是疲倦、生病。“我有时候想，”他在 1882 年初对《商业和金融编年史》记者说，“我应该完全放下生意。除了这种方式经常受到责难，人格经常受到攻击让人感到不快以外，我在这一大摊生意上操心太多了。”另外一名记者说古尔德看起来“有些忧心忡忡，非常疲倦”。同年春天，面对他很快就要破产的谣言，他将塞奇、费尔德、弗兰克·沃克和其他利益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让莫若西尼在他的桌子上摆了一大堆证券——包括密苏里太平洋、西部联合、曼哈顿高架铁路和其他一些小的企业资产。这些证券面值共计 5 300 万美元，市场价值则远远超过于此。这些证券都没有签名，表明它们从来没有被转让和借出过。当古尔德平淡地提出再拿出 3 000 万美元这样的证券时，在场的人都谢绝了。

一年以后，当古尔德将《纽约世界报》卖给约瑟夫·普利策后（后者很快将该报变成讽刺古尔德的机器），关于退休的谈话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同时，古尔德在 1883 年 6 月要求建造一艘大型游艇。他这个经常感到需要急速前进的宿命论者将这艘船命名为“阿塔兰忒”，来源于希腊神话中一个敏捷的女猎手。“我要开始尝试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了。”当他的游艇在宾夕法尼亚的船坞中成形时，古尔德对记者说，“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玩，我必须在自己的晚年好好享受生活。如果我喜欢，我会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阿塔兰忒”号全长 233 英尺，于 1883 年 4 月 7 日从克莱姆造船厂（Cramp's Shipyard）起航。在这个庞然大物下水的时候，还不到 15 岁的小奈莉负责在船首打开一瓶香槟酒以示庆祝。25 号，杰伊指定了一个技术熟练的海员约翰·W·沙克福德（John W. Shackford）试开新船，查看船只性能。沙克福德后来成了一个管理 52 名船员的船长。《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试航过程中评论说：“杰伊·古尔德先生说……他将退出华尔街的世界，不会毁坏

更多的铁路，不会再操纵市场，也不会再购买更多的报纸……这个老谋深算、个子矮小的人有很多手段。这个忏悔游戏也是其中的一个。”《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纸没有一个人相信杰伊关于退休的坦诚表达。“我一直以来都处于紧张状态，我需要休息。”他对《奥哈马论坛报》的记者乔治·米勒说道，“我壮志已酬，准备安静地退休，希望不久以后能有这个机会。”

古尔德提到过想做一次环球旅行，一半原因是想逃避媒体经常出现的含沙射影和妄加猜测。当繁忙的业务让他无法走开时，他不停重复的、立即离开的美好愿望在《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那里变成了一种笑话。就近来说，“阿塔兰忒”虽然适合在任何海域行驶，最远也只去过纽波特、罗德岛和弗吉尼亚海滨。每天，杰伊乘坐这艘游艇往返于林德赫斯特和曼哈顿。他还曾有一搭无一搭地试图参加游艇俱乐部。在他因为卑微的出身和坏名誉被纽约游艇俱乐部排除在外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1887年以前美国游艇俱乐部一直被排斥在市中心的俱乐部会所之外。后来，杰伊和他的几个伙伴在纽约拉伊南部长岛海峡的密尔顿角买了12英亩的海滨土地，直至今天，该俱乐部还在那里。

古尔德专注于退休是因为他相信可以提供长期期望的淡出许诺吗？他对家人和朋友的谈话似乎蕴涵着这个意思，但是退休似乎难以实行。1884年初——古尔德公开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莱茵（James Blaine）还处于童年时期，后者因为支持他的纽约财团的过分张扬而适得其反——没有几个人表面上会接受他断然离开华尔街。权威人士指向了古尔德和华盛顿考纳公司的特殊合作关系。该公司是一个由古尔德的老朋友“瓦什”·考纳先生所有的经纪行，考纳先生在以前的威廉·贝尔登公司占有重要地位。考纳处理了古尔德家族业务的很大一部分。莫若西尼是另外一个特殊的合作者。杰伊的长子乔治自1883年1月也开始工作了。古尔德与考纳的协议原定于1884年底到期，但是据记者报道，杰伊将会延期。实际上，不管他已经还是想要结束多少伙伴关系，他都无法完全从华尔街退出。他建立的帝国太庞大了，要处理的事务太复杂，不允许他退出。总是有地方需要他捍卫，总是有资金需要他筹集，总是有赌注需要他支付。这是古尔德为自己建造的“监狱”。他控制的这块美国经济太大了，以至于它不容被忽视、或者最后由他

人代理——虽然他曾试图退出。1885年在乔治生日那天，杰伊给予了这个初出茅庐的21岁孩子行使代理人的权力，管理他所有的私人保险箱和保险库的钥匙。两年后，他也给了次子埃德温同样的权力，后者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参与到家族生意中。埃德温的特权只有一个限制，那就是乔治是他的老板。之后，他的儿子们相继被安插进古尔德无数的董事会中。

* * *

到1881年，古尔德一直以来从事的进攻、打击、夺取、控制公司的行动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剩下的就是打好防御战。虽然他偶尔还寻求扩大业务，特别是他在西南部的铁路业务，不过像范德比尔特一样，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用在防御新生力量对他经营权的挑战上。古尔德最大的一次业务收缩发生在1884年，当时一场熊市狙击导致了市场低迷。就在此时，太平洋联合的政府董事主席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成功地破坏了古尔德在太平洋联合铁路的统治地位，取代西德尼·狄龙成为总裁。艾布拉姆·古尔德和狄龙、赛拉斯·克拉克一起离开了太平洋联合铁路，担任密苏里太平洋采购部经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一直从事这个工作，他还是杰伊几条西部铁路的董事会成员。克拉克最后也加入了密苏里太平洋，狄龙则参与处理各种不同的事务，有些和古尔德有关，有些则无关。

在1884年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古尔德暂时失去了他控制的其他两条铁路：瓦伯什铁路和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但是和被现金和监管束缚的太平洋联合铁路不同的是，这些铁路是古尔德急切希望重组并重新纳入自己版图的铁路，它们是密苏里铁路的支线。与此同时，在电报业方面，古尔德面临一些潜在的竞争者，例如共同联合公司、银行家-商人公司、美国高速公司和邮政公司。其中的一些他可以像拍苍蝇一样轻易拍死，另外一些他则希望对其采用租赁和控制的方式。但是慢慢的，他的统治地位受到了考验。甚至在纽约，盈利能力较强的高架铁路天天在自己耳边轰轰作响，他也需要保卫自己的地位。

1886年中期，塞勒斯·菲尔德引起了古尔德注意，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在没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获得了曼哈顿高架铁路的大量股票，很明显他们想

取得公司控制权。到了10月，菲尔德的购买行为使曼哈顿公司的股票涨到175美元。虽然股价在上涨，他们也没有怀疑迷糊的古尔德正设下圈套，但菲尔德父子还是在急剧上涨的股价下疯狂买进曼哈顿股票。菲尔德的买进一直延续到1887年，这时古尔德将自己几万股股票像潮水一样投向市场，使股价跌至125美元。菲尔德的借款人让他们追加保证金，迫使他们卖掉了自己大部分库存。这使得原本低迷的曼哈顿股票下跌得更厉害，由此需要追加更多保证金。最后，古尔德以12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菲尔德大约75 000股股票，而菲尔德买进的平均价格是175美元。

接着，一些人控诉古尔德故意恶毒地伤害塞勒斯·菲尔德。其他人则认为菲尔特的行为是自取灭亡。爱丽丝·那斯洛普记得，有一天在林德赫斯特，菲尔德乞求古尔德的帮助。菲尔德“看起来好像病了一样……像一个将要沉入河底的人拉住岸边的救命稻草……一幅可怜而绝望的画面。”爱丽丝的妈妈后来告诉她：“菲尔德先生的破产将会引起几个股票交易所和一个国民银行破产，以及华尔街的巨额损失，可能会造成混乱，这也是为什么你的舅舅决定给他提供帮助的原因。如果他对菲尔的这种自作自受的罪孽袖手旁观的话，对他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和失望。”

当然，杰伊并没有像他姐姐说的那样仁慈，那时华尔街里的游戏和今天一样残酷。杰伊不能允许笨手笨脚的菲尔德控制曼哈顿，他也不会市场上被人看做不会惩罚厚颜无耻、大胆鲁莽而无能的冒犯者和挑战者的人。不过，杰伊对于老资格的开拓者的忠诚还是很坚定的。在这件事结束之后，菲尔德自己告诉媒体“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古尔德以一种完美而直率的方式行事”，他们之间还存在“最友好的感情”。甚至连《纽约时报》都采取了捍卫古尔德处理这件事方式的态度。《纽约时报》评论说：“事实的真相是，菲尔德先生对曼哈顿公司的投机行为让他自己疯狂起来，因此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同伴对此采取了抗议行动；最后，即便古尔德先生刺破了这个泡沫，但也处理得很小心……给菲尔德先生留下了一些东西。如果他无可避免地走向深渊，那么将被剥夺一切。”

除了要抵御来自潜在狙击者的袭击，古尔德还要对抗劳工组织。在由电报者兄弟之家（Brotherhood of Telegraphers）发起的长达一个月的西部联合公

司工人罢工中，古尔德在1883年取得最后胜利。在后来对美国参议院劳工和教育委员会——不仅关注古尔德自己，还关注全美的劳工关系，古尔德作为专家证人——做国会证词中，古尔德断言，我们劳工组织中“最穷的部分”经常处于所有罢工的最底层。“最优秀的工人并不在意自己工作了多少小时，他们只是寻求增加工资，或者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公司，或者提高自己的职位。”关于古尔德在作证时的风度，《克里夫兰领导者》的弗兰克·卡彭特（Frank Carpenter）描写说，这位身材矮小的百万富翁坐在那里，“一脸倦容地回答着对他提出的问题。他用一种类似女人的腔调简单地回答着，没有一点夸耀和咄咄逼人的感觉。他的几个保镖坐在他旁边，他的律师坐在他后面，在他需要时给他建议。但是古尔德自己回答问题，在朗读铁路罢工者饱含情绪的谴责书时没有一点恐惧。”

这是古尔德在国会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国会证词。第一次是在加菲尔德委员会面前接受1869年“黑色星期五”的调查。几年后，他被传讯对联邦政府拥有重要金融权益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管理问题做证词。但是1883年在参议院劳工和教育委员会面前，在对他反对工会表示同情的参议院友好的询问下，古尔德讲述了自己早年生活的历史——他在卡茨基尔艰苦的创业——本书以前的章节已经引用。古尔德早年奋斗历史蕴涵的意思是，一个人并不需要工会，他只需不断努力，怀有雄心并不断向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在提到与华尔街的银行家和经纪商交易时，经常批评和诋毁古尔德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的专家和立法者们，在反对劳工组织方面却和他站在了一起。在这场战斗中，古尔德至少被他的精英同事看做一个勇于采取行动的卫士，他捍卫了他们都希望使用的东西——资本。

在西部联合公司事件发生两年后的1885年，此时铁路兄弟之家和劳工骑士发动了密苏里太平洋工人反对由于经济的低迷引起的削减工资的罢工，古尔德对此一点都不害怕。1885年的罢工使密苏里的业务停滞，最后在密苏里和堪萨斯州长的仲裁下，迫使铁路恢复削减前的工资。一年后，对于密苏里的损失仍然很懊恼的古尔德，面对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9000名工人罢工时拒绝放弃原主张。“我低声下气地说，我是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他给劳工骑士的首领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写信说，“我已经年过49

岁。出身卑微的我，通过勤奋、忍耐和对生意的关心，取得了成功，或许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正如你所说，除非我放下男人的自尊，否则我就会被劳工骑士摧毁，那么就让它摧毁吧。”由于对铁路的蓄意破坏，古尔德暂停了运输。同时，古尔德聪明的公关人员巧妙地将公众对出行不便的怨恨转移到了劳工骑士身上。到了年底，罢工者（由于饥饿）最后投降了。之后，古尔德再也没有遇到发生在自己铁路上的罢工运动，虽然在这件事上他遭受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广泛仇视。

和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其他那些通过艰苦卓绝，甚至暴力方式击退了工会罢工的巨头一样，古尔德也是一个对有价值的事情进行频繁而有实效的慈善捐助者，他支持的方式总是直接、精确、有效率的。许多慈善行为完全是他以个人身份进行的。除了对亲戚的慷慨帮助以外，杰伊还将他童年时期的牧师安置在林德赫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别墅里，让其在退休后以享天年。从1884年开始，他经常对他在罗克斯伯里的老朋友赖斯·巴顿管理的五点教堂进行捐赠。杰伊慈善行为的另外一个吸引人的方面逃脱了传记作家的注意。好几次，他都为住在579号和林德赫斯特的人们提供了奖学金。在这方面，杰伊将其中最大的部分留给了年龄较小的雇员：用一种有趣的方式选出的三个候选人。在获得邀请后，那些在空闲时间经常利用古尔德私人书房的人依次被主人叫去谈话，为他们继续接受教育提供帮助。因此，不止一个替古尔德擦地板、照顾花园或者驾马车的佣人最后从事了教书、法律或会计等职业。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杰伊永远不会遇到一个他不希望为之喝彩和提供帮助的系鞋带的仆人。

除了佣人、家人和朋友，古尔德慈善捐赠的范围非常广。在1879年孟菲斯黄热病流行的时候，古尔德给该市慈善机构霍华德协会的主席发电报说：“我给您电汇了5 000美元资助霍华德协会。我确信全国慷慨的人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给你的城市提供捐赠。你要一直努力工作直到我让你停下来，我会给你支付账单。请告诉我你的日常开销是多少。”在接到答复说每天开销接近1 000美元时，古尔德便一直按这个数目支付，直到危机结束。还有一次在参观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弗农山时，古尔德察看了当地的地图，并询问故居的主管为什么华盛顿邸宅西北部那片突起的土地不属于故居资产。当被告知这

片房子和花园的主人——弗农山妇女协会虽然很想买下这座小山，但是宪法却禁止他们直接投资邻近的土地时，古尔德立即买下了那片土地并捐了出去，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公布他的名字。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杰伊对匿名捐赠的偏好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公众中不太良好的形象。后来，在他真正变成这个神话的囚徒而很难再摆脱时，匿名捐赠就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了。事实上，他极少数的几次署名捐赠被媒体捕捉到以后，他的善心通常都会遭到嘲笑、诋毁和侮辱。1890年初，古尔德听说欧文顿的两座教堂之间的空地将要建一座旅馆，教堂的神圣性将面临被破坏的威胁。虽然消息不是很确切，但古尔德还是自己买下了这片地，分别捐给了这两座教堂。当《纽约时报》听说此事后，头条刊登出《古尔德安抚自己良心》的报道。几乎同时，在杰伊捐给纽约城大学25 000美元购买在布鲁克林的新校区之后，他又一次受到了非难。他对爱丽丝·那斯洛普说：“我猜测我的捐赠……只会引起麻烦。我所说的一切都被曲解。我所做的一切也被故意歪曲。我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只是担心对家人的影响。”事实上，他还是继续进行捐赠，只不过仍像以前一样默默无闻地进行。

* * *

1884年初，莫若西尼的女儿维多利亚和家里的马车夫私奔，这个消息震惊了纽约的社交界。不久之后，惊恐的埃莉对爱丽丝·那斯洛普详细地讲到，如果古尔德或者那斯洛普的女孩们和家里的仆人结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接着，埃莉的儿子乔治则更好地阐述了那种做法会带来的可怕后果。但就在维多利亚冒险行动的几个星期后，乔治却宣布他已经与女演员艾迪斯·金顿订婚两年了。金顿小姐出生于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的家庭。根据爱丽丝的回忆，埃莉认为乔治和一个下等阶层的女人结婚“太让人厌恶、太可怕，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即使她不断地强调“家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也无济于事。那些旧传统（我们可称做“莫里·希尔”吗？）深深植根在她的脑中，使她天生无法接受这些。财迷的卓西·曼斯菲尔德的形象一定充满了她的大脑，这让她大声抗议儿子与贫穷家庭的人结合，但她丈夫礼貌而坚决地让她安静下来，因为杰伊自己的卑微背景让他对于普通大众没有类似的感情习惯。

“她走上舞台表演挣钱养活母亲，”杰伊在1886年9月14日婚礼后的一天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道，“我想这充分证明了她的信誉，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的婚礼在林德赫斯特以一种秘密的家庭仪式的方式进行，以免引起埃莉在公开的大型豪华宴会上的尴尬。艾迪斯的母亲代表艾迪斯一方出席了婚礼。乔治的父母、兄妹和仆人代表乔治一方。古尔德的一个管家玛格丽特·泰莉不久之后对爱丽丝·那斯洛普描述了那场婚礼。“你的舅舅让人吃惊地叫我们来到大厅，”这个管家回忆说，“他只是简单地宣布‘乔治结婚了’。当我来到大厅时，乔治和艾迪斯都在那里，你的舅舅、舅母和其他孩子也在那里。牧师乔特先生（欧文顿长老会教堂的牧师）主持了婚礼。我也被叫去作为证婚人签名。你的舅母一直反对这场婚姻，她站在那儿，看起来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我也很遗憾乔治找了一个演员……我也为艾迪斯遗憾。整个过程她都表现得很好，然后她将头靠在乔治肩上离开了。乔治搂着她，你舅舅走上前吻了她一下为她祝福。她站在乔治旁边。仪式结束后，两辆马车开走了。乔治和艾迪斯乘坐一辆，乔特先生乘坐一辆。就是这样。”

这对夫妇搬进了乔治父母提供的一座大房子，就在579号后面。一年后，到了1887年8月，艾迪斯为杰伊和埃莉生下了一个孙子，取名金顿。但是，到那时，家里所有人都明显看出埃莉·古尔德身体状况的下降。不到50岁的埃莉长期疲倦虚弱，持续发烧、消瘦。关于她的病还没有确诊，10月，杰伊决定和妻子以及4个孩子一起出去彻底放松一次。一次欧洲旅行准备就绪，这是他一直企盼的旅行。

8月25日，“阿塔兰忒”号去了马赛，古尔德一家将在几个星期后和它相遇。4天后，杰伊和家人——埃莉、奈莉、霍华德、安娜、弗兰克和埃莉的姐姐——登上“翁布里亚”号开始了他们的跨洲旅行。《纽约时报》记者注意到出行的古尔德“看起来就像他平时一样，穿着有些破旧的衣服”。杰伊在甲板上和送行的人们聊天，其中有塞奇、狄龙和J·P·摩根，前两个人负责盯住乔治和埃德温，他们可能在父亲离开的时候“掌管”一些事物。后来，一脸笑容和轻松的古尔德走到过道同聚集在那里的记者握手，这让他们大吃一惊。“你们这些孩子们如果没有我将会怎么样呢？”杰伊开玩笑地说。

当被问到他是否带了医生时，他回答说除了一个普通记者外他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人。当《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询问股票市场行情时，古尔德耸耸肩回答说：“有些人说古尔德离开，股市会上涨。再见！”接着他回到了船上。

在5个月的国外旅行中，古尔德一家游览了伦敦和巴黎，然后乘坐“阿塔兰忒”号巡游了地中海沿岸港口：尼斯、圣雷莫、佛罗伦斯、那不勒斯、罗马、西西里岛和希腊。之后，游艇停在直布罗陀和加那利群岛。接着启程去西印度洋到佛罗里达，在那里等待1888年3月的暴风雪过后返回曼哈顿。埃莉虽然得到了放松和温暖，但是并没有好起来。甚至连杰伊自己在度假回来之后看起来都好像更加疲惫和消瘦。虽然难以确定，不过可能是因为1888年春季——在旅行结束前不久——古尔德的医生约翰·P·穆恩（John P. Munn）告诉他得了肺结核。这种疾病害死了他的父亲和许多亲戚。当年5月，由于妻子和自己的身体状况，52岁的古尔德让伍德公园公墓的所有者加快速度，尽快完成几年前他要求建造的豪华陵墓。

古尔德的诊断以及死亡的宣判将会引起人们对他职业生涯最复杂的猜测。穆恩医生发誓保守秘密。古尔德坚持不让已经很脆弱的埃莉知道这个消息。他的子女以及华尔街的重要人物也不能知道。到了春天，穆恩已经成了古尔德的全职医生，几乎不再接待其他病人。每次古尔德旅行的时候，穆恩都跟着他，以免古尔德在纽约之外必须去找某个多嘴的医生。在接下来的4年半时间里，古尔德在承担巨大工作压力（古尔德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尽可能地为下一代梳理、处理好复杂的事务）的同时，尽最大努力掩盖自己的症状。

那年5月，古尔德乘坐新购买的豪华列车去美国西部考察，这列精致豪华火车宫殿和他的游艇同名：阿塔兰忒。月底的时候，有消息说他在堪萨斯病倒了。当记者询问古尔德的公司时，他们确认古尔德这次生病是因为他的老毛病——肺炎引起的，医生建议他到山区疗养。因此，“阿塔兰忒”号去了卡罗拉多的普艾布罗，在那里古尔德坐着一辆敞篷马车去往城里。几天后，一个记者在卡罗德里特车站的站台上遇见了古尔德。根据该记者的描述，古尔德看起来很虚弱、疲倦、不健康，“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桀骜不驯地伸直脖子。”当记者接着走过去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时，古尔德轻声地并带些歉

意地解释道，“我们刚进行完一次劳累的旅行。”他在孟菲斯停留以便查看新购买的火车，两天后的6月16日却返回纽约——他发现在那里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正传得沸沸扬扬。在媒体关于他是否会很快死去的讨论中，古尔德派塞奇去平息谣言。塞奇严厉地警告记者说，等古尔德“身体恢复后将会立刻找这帮人在华尔街上算账”。

夏初，古尔德仍然在林德赫斯特同自己的家人和花草待在一起，与外界隔离。7月中旬，他安排了一个采访以平息恐惧。《费城时报》记者描述说，杰伊从那个著名的温室中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两大盆刚长出的玫瑰花。他头戴一顶草帽，穿着蓝色法兰绒外衣和拖鞋。他看起来消瘦而苍白，但是精神很好。“它们让我走出了原来认为已没有希望的生意，”他笑着说，“这样说来得这场病并不是很糟糕。其实我的命运比得病还要惨呢。”他背诵着自己肺炎和长期失眠症的历史，还说他很幸运地发现自己这些日子两次逃脱了对生意的操心。他的儿子们，特别是大儿子乔治在塞奇先生和狄龙先生的帮助下，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金融家。古尔德现在认为自己“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园丁。”他希望在这个夏季余下的时间里彻底放下生意的重负，等待他第二个孙子在8月的降生。“负责地说，我并没有将自己的思绪完全从公司解放出来——一个人不可能把智慧留在办公室，而仅仅带着身体的空壳回家——但是我正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两个星期后，杰伊和埃莉以及爱丽丝·那斯洛普、穆恩到萨拉托加旅行。在那里，古尔德一行住在美国饭店两栋大别墅里。（莫若西尼夫妇和他的小女儿古莉亚在古尔德一家安顿好的两天后也来到了这里。）虽然古尔德拒绝在这个著名的温泉胜地泡温泉，但是也获得了放松。这个百万富翁公然在酒店大堂里打瞌睡，在公共食堂就餐，每天晚上都和莫若西尼一起散步。当马戏团来到城里的时候，古尔德还在广场上耍椅子，赢得了游行队伍的称赞。该酒店里入住的其他熟人（包括弗兰克·沃克和亨利·克鲁斯）告诉记者说，古尔德虽然在谈到非金融话题时非常健谈，但是拒绝谈论本行。（酒店的管理层当时确认，古尔德已提交申请在他的别墅里安装一条私人电报线。）“如果说有一个人不关心股票和市场波动的话，”《纽约时报》记者在看到这种情形时说道，“那么杰伊·古尔德正在假装这个人。”通过一些更近

距离的观察，爱丽丝发现记者所说的并不正确：“在去任何地方之前，他的舅舅都要躺在床上歇一会儿。”穆恩一刻都不离开古尔德。此外，埃莉的身体状况也继续日益恶化，在一家人待在这个避暑胜地的时候，还得了轻微的中风。

结束萨拉托加的旅行后，埃莉回到了林德赫斯特。但是，杰伊坚持和奈莉、霍华德、安娜、弗兰克一起绕道去了罗克斯伯里。杰伊上一次回家是一年前和埃莉一起去的。在此之前，他在1880年一个人回去给父母和姐姐立了墓碑。现在，他希望通过约翰·波尔·古尔德的孙子们看看自己的故乡。古尔德一行在城里待了几天，便不再乘坐“阿塔兰忒”号火车，让其停在罗克斯伯里车站附近的阿尔斯特和特拉华铁路的旁轨上。在那里，杰伊——没有保镖陪同，因为那里不需要——徒步带领这群年轻人来到村庄。他给他们看了古尔德一家的旧址，那家锡器店，给他们讲述了例如他和汉密尔顿·伯汉斯和他的“堂妹”马里亚·伯汉斯·劳伦的烦恼。后来，杰伊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孩子们到了“黄色礼拜堂”的墓地。他们还去了古尔德以前的农场，参观了杰伊和约翰·伯纳斯曾经摔过跤的学校，爬上乌特萨亚撒山（Utsayantha Mountain）。还有一天，杰伊怀着童心来到阿克维尔附近的佛露湖钓鱼，阿克维尔是一个距离罗克斯伯里几英里的美丽小镇。（乔治后来买下了这个地方，计划为父亲盖一座乡间木屋。）“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高兴，”奈莉给母亲写信说，“他是如此地不同，往日的回忆和老朋友让他非常兴奋。”就在杰伊参观自己的出生地时，消息传来说他的第二个孙子降生了。后来这个孩子被起名为杰伊·古尔德二世。（乔治和埃迪斯在杰伊活着的时候还生了两个女儿玛乔里和维维安。）

在杰伊无数的老友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彼得·范·阿姆博格，他在一个雨夜戴着一顶低檐帽登上阿塔兰忒。虽然带着帽子，但杰伊还是立刻认出了他。“你不需要伪装自己。”他笑着说，“我认识你。”第二天，古尔德和孩子们参观了阿姆博格的农场，在那里他们共进晚餐，吃了自制的面包、黄油和蜂蜜。吃完饭，杰伊和彼得便愉快地一起在彼得的农场散步，回忆往日的时光和人们。当古尔德最后坐上自己的马车准备离开时，他邀请彼得在任何他想去的时候都可以去林德赫斯特做客。以前，杰伊曾夸耀自己获奖得来的好

牛。现在，他引诱彼得说，如果彼得来的话，他可以任一挑选林德赫斯特牲畜中的一只据为己有。

受到这一邀请的诱惑，一向节俭的范·阿姆博格穿着他星期天做礼拜时的衣服，一个月后来到林德赫斯特。他们两个待了一个上午，杰伊带着彼得参观了他的牲畜和温室。后来，由于要处理城里的一些事务，杰伊让曼格德照顾彼得，去参观林德赫斯特饲养的“牲畜”。当古尔德晚上回来时，他发现范·阿姆博格微笑着和曼格德站在一起。“他挑中了我们珍贵的泽西，”这个管家抱怨说，“它是最好的一头。”根据他外甥女的记述，古尔德见证了交割的全过程，并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镇静了一下，然后说：“彼得，我一直都说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我想曼格德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头牛是你的了。我将让你拿去它的血统记录，并给你支付运费。”那天晚上，范·阿姆博格和失眠的古尔德度过了余下的夜晚，聊着逝去的时光，两人都认为老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

刚才提到的事情发生在10月份。11月6日，埃莉第二次中风，这次中风让她完全瘫痪，只能说出一个单词：是的。医生表示她已没有康复的可能。佣人们从林德赫斯特搬到579号来照看她。开始，穆恩预测埃莉最多只能活一个星期，但是她坚持了两个月，非常虚弱，气若游丝。古尔德日日夜夜在床前陪伴她，只是在自己需要休息或者（经常发生的事情）某地的生意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离开。

* * *

此时，古尔德的第一要务和全美的铁路所有者一样，就是阻止由于1887年《州际贸易法案》所导致的恶性的价格竞争。通过打破铁路公司先前限制竞争、支持价格、保证盈利的垄断性联营，1887年的法案引起了一系列残酷的价格战，使得每一家大规模的铁路公司都受到伤害。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日记中总结说：“我们铁路公司需要法律和秩序。我们毫无组织，每家都有自己的法律，都在嫉妒别人、怀疑别人，但是大家都因为担心被外界的强权所压迫而联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铁路界的俾斯麦。”

12月20日，全美主要的银行家、铁路所有者和投资者在J·P·摩根麦

迪逊大道的家里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在那里，古尔德、亚当斯、布朗兄弟中的约翰·克罗斯比·布朗、基德·皮博迪的乔治·玛刚（George Magoun）和其他要人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在价格制定上合作，一致支持全美的铁路运价。虽然古尔德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他还是签署了这个文件。亚当斯也是如此，尽管他批评这个协议没有实施效力，是“用沙子做的绳子”将铁路绑在一起。休会后的第二天早上，经过进一步深思熟虑，亚当斯和他的“复仇之神”古尔德走在麦迪逊大道上，他形容古尔德看起来“非常虚弱和疲惫”。当亚当斯表达了自己对协议的不满时，古尔德疲倦地表示同意。当亚当斯建议让州际贸易委员会参与其中，支持这个协议时，古尔德恢复了活力。“对呀！”古尔德突然满怀热情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去叫委员会的人，邀请他们一起筹划这个计划呢？”古尔德知道，这样做既可以让大家顺从，又可以消除共谋、固定价格和垄断。他同意第二天早上提出这个建议。

亚当斯意识到筋疲力尽的杰伊已把心思完全放在生命垂危的妻子身上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没有。埃莉生病的消息没有公布，杰伊不是一个愿意泄露私人信息的人。不管怎样，当第二天早上古尔德不符合他个性地迟到，并缺少往常的力量和注意力时，亚当斯的建议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亚当斯回忆说，古尔德“提出让州际贸易委员会参与的建议，但是其虚弱而模糊的方式却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随后，亚当斯奋力劝说，最后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们离开谈判桌，决定保持两个月的价格，在圣诞节后再次在摩根家里举行会议讨论最终解决方案。但是1月8~10日举行的第二轮会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亚当斯说古尔德——正处于看护临死前妻子的最后一周——看起来“很疲惫、瘦弱、焦虑不安，眼睛里显现疲倦的神色”。

当伯灵顿的查尔斯·E·帕金斯抱怨说如果州际贸易委员会的人参加他就不会出席会议时，古尔德什么也没说。在这场让人筋疲力尽的会谈结束时，各方最后同意组建一个州际贸易铁路协会（ICRA）——可以经常出席会议、裁决争端、保护运价的总裁们的集合，但是这个组织从开始就注定走向灭亡。在几个月内，亚当斯自己开始拒绝参加会议，声称在州际贸易铁路协会他最

担心的事情（缺乏效力的协议等于没有协议）发生了。最后，亚当斯公然反对协议精神，在1889年底，他代表太平洋联合和西北公司结成联盟，有效地合并了两个公司，实现了联运。同时，古尔德的密苏里太平洋受到了来自洛克岛铁路的价格冲击。1890年1月，就在州际贸易铁路协会组建的一年后，古尔德问克拉克：“我们有必要参加芝加哥总裁协会的会议吗，还是只为死者送束花？”

✱ ✱ ✱

在1889年1月最后一次摩根会议的两天后，埃莉陷入昏迷状态。一天后的1月13日，埃莉去世。“死亡来临的时候，”《纽约世界报》记者一反常态地抱有同情地说，“人们发现古尔德先生坐在妻子身旁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恢复意识，最后安详地死去。在她生病的全过程，古尔德先生都陪在她的身边，或者在可以叫到的地方，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他才离开。”在葬礼后的一段时间，生来就有老处女情节的奈莉成了父亲的女主人、家里佣人的总管，并对弟弟妹妹们有了很大权威。至于杰伊，他花了几个星期才恢复过来，此后他阴郁地返回到工作中去。

2月，一场小危机发生，这时杰伊重要的合作伙伴A·L·霍普金斯突然辞职。霍普金斯12年前加入到杰伊的组织中，当时古尔德控制了瓦伯什铁路，从那时起，他成为古尔德仅次于塞奇的第二个亲密战友。《纽约世界报》评论说：“乔治·古尔德宣传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霍普金斯先生因为想休息所以退休，但是这真让人发笑。消息灵通人士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对这个年轻的古尔德的行为方式有所了解……他们指出这个年轻人精力充沛，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确信自己可以管理所有不同种类的大型企业……在没有那些有能力并值得信任的人的帮助下也能自己进行投资……大家都知道，古尔德先生为了取悦自己的儿子放弃了G·P·莫若西尼。莫若西尼先生很敏锐地感受了这点，但是没有说一句古尔德先生的坏话。”《纽约世界报》的报道夸大了莫若西尼的分离。古尔德在1886年底取消了和莫若西尼以及考纳的特殊合作关系，乔治在此之前就离开了公司。但是，华盛顿·考纳公司仍然与古尔德家族有大量生意往来，甚至在西部联合公司的大楼里有办公室。莫若西

尼和霍普金斯一样仍然在古尔德几个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但是很清楚的是，杰伊已意识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匆忙地推荐大儿子乔治，其次是二儿子埃德温领导公司时，一些家庭事务仍然在古尔德的阵营中进行。

同时，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以及全美客运、货运激烈的价格战中，古尔德坚定地致力于降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和相关线路的一般管理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古尔德给克拉克送去一大包信件（他们称之为“蓝色杰伊”，信头有杰伊蓝色墨水的笔迹），详细讲述了如何规划、减少支付成本，以及在棉花带、瓦伯什铁路和其他所有周边比较繁荣的铁路线的沿线发展经济。任何一个微观管理层次的问题都逃不过古尔德这个严谨的失眠症患者，漫漫长夜里他不停地思考，将注意力都用在薪水册和类似的重要数据上。除了克拉克外，其他一些官员也根据实际情况受到了赞扬和批评。当杰伊的外甥瑞德·那斯洛普——后来成为密苏里一个子公司美国冷冻运输公司的总裁——在没有咨询克拉克的情况下着手采取了一些改组措施时，蓝色杰伊立刻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于是这个年轻人便注意在克拉克的指导下管理公司，“我希望能和他自由协商，将他的指导作为信条”。

✱ ✱ ✱

随着时间的流逝，杰伊的身体功能越来越弱，而思维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一般的旁观者猜不到这个衰弱而呼吸困难的人日日夜夜投身到市场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同样，也没有几个人想象得出这个消瘦的商业巨头正计划进行一场更大的游戏，一个在棋盘上更突然、更庄严的游戏。

1890年夏季，市场下跌，太平洋联合陷入巨额浮动债务的泥潭，开始进入亚当斯的旗下。到了秋季，银行收回票据，引发了自1884年5月以来华尔街最严重的一次恐慌。在这种大气候下，古尔德在11月间重新进入市场，以拯救（或者说是没收）6年前丢失到亚当斯手中的铁路。开始，没有几个人怀疑古尔德是狙击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幕后操纵者。此外，在早些时候，也没有人猜到古尔德会是这种无用评论的制造者——被无数金融专家提起并重复引用的话：“铁路界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感觉，太平洋联合由一个想法很多但是实践经验很少的哈佛毕业生管理。”不久之后，另一个无根据的谣言产生

并被重复提起：古尔德的神秘疾病奇迹般地痊愈了。他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又一次站在游戏的顶点，将会“制造或打破西部铁路的运费，并随意操纵股价。”11月10日星期一，一个空前大的卖单导致所有铁路股票尤其是太平洋联合铁路大幅度下跌。“有一件事情很明显，”亚当斯对银行家R·S·格兰特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古尔德干的，他正在打压我的股价。”

就在此时，上帝或许是受了阿塔兰忒的追赶，站在了古尔德的一边。15日，伦敦传来消息说巴林兄弟银行倒闭了。这个消息让普遍的恐慌又延续了几天，在短期内影响了所有股票的价值，对于亚当斯来说尤为糟糕，他最近正依靠巴林银行的英镑贷款保持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现金流。接着，17日一早，杰伊突然宣布他要入主太平洋联合铁路。古尔德用他一贯的做法，从侧翼包抄抓住战利品，疯狂买进获得控制权，同时抬升价格。

亚当斯和摩根在当天下午约见了古尔德。在得知古尔德计划后，阿姆斯写信给亚当斯说，古尔德的目的是要对太平洋联合铁路实行一个“关于铁路合并的巨大而模糊的计划，以便解决问题，消除竞争，在一次阵痛中让每个人都获利，减少混乱恢复秩序”。总而言之，古尔德正寻求让自己成为亚当斯曾经希望的铁路业的俾斯麦。20日，亚当斯来到古尔德办公室表示投降。他们定于下周三正式交接。到了那天，古尔德、塞奇和公平人寿保险的亨利·B·海德和银行家亚历山大·E·奥尔被选为董事，狄龙再一次出任总裁。在一个由助手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古尔德表示将尽最大力量支持这条现金短缺的铁路。当《纽约世界报》记者问道为什么要返回太平洋联合铁路时，古尔德轻声说：“其实没有什么奇怪或者神秘的。在它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它，我只是回到我的初恋。”

* * *

这是他最后一次欢呼。1890年末到1891年初以后，古尔德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891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西部，夏季则在林德赫斯特度过。在1891年10月举行的太平洋联合铁路董事会年会上，古尔德病倒了。对于他的朋友塞奇对年报提出的批评，古尔德在思绪断掉之前只能说出两三句话，坐下来，用手捂住脸，“他整个人因为兴奋而颤抖”。肺结核晚期造成的混乱

和兴奋经常发生，但是《纽约世界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报道说，古尔德的问题不是器质性的：“所有的问题在于他紧张的神经，是神经系统的状况影响了他的胃。”太平洋联合铁路的一个官员告诉亚当斯，古尔德是“如何因为管理公司造成身体状况恶化的”。现在，他的回忆和访谈都被小心地安排，他的属下替他说出大部分要说的话，并且进行的时间很短。有的时候情况会好一些。

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塞奇差点被刺杀的消息让古尔德大为震惊。一个叫亨利·诺克罗斯（Henry Norcross）的疯子进入塞奇在西部联合公司的大楼的办公室，向他索要150万美元。当塞奇拒绝他后，诺克罗斯拉开了他放在手提箱里的炸弹导火索。爆炸炸死了引爆者和塞奇公司的一个职员，但是，塞奇本人没怎么受伤，他从废墟中走了出来。乔治·古尔德坐在隔壁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的办公室里，听到爆炸的巨响，然后一大堆碎屑掉落下来，坐在楼下的考纳和莫若西尼也有类似的经历。乔治很快把消息告诉父亲，后者立刻来到第五大道塞奇家里，安慰塞奇夫人，并陪他等待丈夫归来。塞奇回忆说，当医生给塞奇处理伤口时，古尔德坚持在旁边陪着他。“我觉得很奇怪，这个瘦小、身体也不好的人会为我做这么多，并且还坚持这样做下去。”

1892年2月，古尔德又得了肺炎。21日（星期天），他觉得身体状况很好，便在距离他家一条街的温莎饭店的大堂里待了半个小时。在那里，他和经常去那儿的记者和经纪商聊天。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偶然提到想去南部待一段时间。星期二，他同意了奈莉提出的召开教堂扩展协会会议、并给该组织捐献一万美元的要求。接着，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古尔德没有出发，所以谣言开始流传。有消息说教堂会议后古尔德很快就病倒了。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或许是来自家里的一个佣人，告诉《纽约世界报》的记者说，星期二晚上，古尔德好像有所好转，但是到了星期五，开始大量吐血。“古尔德先生剧烈咳嗽，他的手绢浸满了鲜血。”

穆恩医生坚持认为古尔德得了重感冒，除此以外没有疾病。同时，古尔德的“阿塔兰忒”号提速，古尔德坐上它前往西部埃尔帕索的干燥环境中。奈莉和安娜陪他一起前往，在哥伦比亚读书的霍华德不久之后也随后跟去。古尔德一来到西部食欲就恢复了，咳嗽也停止了。5月，气温升高，让人不

舒服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普埃布罗附近的山区。他坐在疾驰的火车上看报纸得知他老朋友们的死讯。赖斯·巴顿在1891年9月去世。现在，古尔德又听说了约翰·夏普主教（一个摩门教首领，和联合太平洋公司有许多年密切的交往）和纽约商人爱德华·杰弗瑞（Edward Jaffray）去世的消息。6月9日，病重的狄龙——刚刚升任太平洋联合的总裁，就给下任总裁克拉克让位——最后安葬在伍德公园，正好可以看到古尔德的陵墓，远处还能看到莫若西尼的陵墓。不久之后，到了7月，塞勒斯·费尔德也离开了人世。

古尔德在夏季中期回到纽约，在林德赫斯特待了几个星期，只和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会面。他于9月回到579号，偶然几次人们看到他在深夜打着灯在房前走来走去，一个疲倦的管家跟着他。每次停下来时，他都要靠在那里咳嗽一会儿，往手绢上吐出很多血。每次温莎饭店的服务员走在街上看到他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微笑着和他们握手，但是一言不发。接着，他便走回屋里，在那里他的娱乐活动很少。有时，他和奈莉玩纸牌，也愿意奈莉给读他最喜欢的作者的文章：狄更斯、塞克利和他的老朋友约翰·伯汉斯。

杰伊在10月11日出席了密苏里太平洋董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两个星期后的26日，他喜气洋洋地出席了二儿子埃德温和萨拉·卡婷·施拉迪（Sarah Cantine Shrady，一个著名医生的继女）的婚礼。那年感恩节，爱丽丝·那斯洛普在579号住了几天，她发现舅舅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再也不像先前那个样子。在开始几天，当爱丽丝和他坐在一起时，他突然弯下身子忏悔，让爱丽丝大吃一惊，他说：“爱丽丝，我不怕死，我不怕死。但是我年纪尚轻的孩子们，我不愿意离开他们。”两个晚上之后，爱丽丝正和奈莉聊天时，杰伊慢慢地、摇摇晃晃地走进来，“重重地”坐在他最喜欢的沙发椅上，头靠在沙发后背上。他刚刚和穆恩医生从外面回来，显得筋疲力尽。“杰伊舅舅，”爱丽丝说，“你看起来好疲惫！”“是的，”他有气无力地小声说，“我很累。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停了一小会儿看马匹展览。那儿有很多上等的马匹，很值得一看——但是我感冒了。”

那天晚上，杰伊大出血持续了几个小时后，穆恩宣布古尔德去世只是早晚的问题。不过，大家都严守这个秘密。杰伊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之后消息传到了华尔街，出现在12月1日（星期四）的早报上。那天，记者

们积聚在 579 号外面冰冷的人行道，看着古尔德的子女和亲密的朋友进进出出。大街另一侧的温莎酒店里，古尔德的熟人（投机者、经纪人和记者）计算着他最后一口气给市场造成的影响，设下赌注。他的家人和杰伊告别了。古尔德在 12 月 2 日（星期五）凌晨两点的时候最后一次恢复意识，他轻声对穆恩说，他要和家人告别，之后，他依次对每个孩子说了几句话，并在合上眼睛失去知觉之前和家里的每个佣人告别。上午 9 点 15 分杰伊·古尔德停止了呼吸。云集在第五大道的记者看到玛格丽特·泰瑞在门口挂了一块黑纱后散开了。几个小时后，穆恩发布了死亡证明，媒体最后得知了折磨了杰伊·古尔德几年的疾病的具体细节。

全世界的社论都在谴责这个死去的人。《伦敦标准报》称古尔德是一个“产业的破坏者和让人倾家荡产的人”。伦敦的《新闻报》将他描写成一个“赚钱的机器”。在纽约，《纽约时报》提醒读者，古尔德的财富建立在“抢夺别人的所得，改变它最初用途”的才能的基础上。《纽约先驱报》说古尔德的死讯传来后，整个华尔街洋溢着“默默的欣喜”。所有报纸都刊出一则报道，怀疑古尔德灵床边安了一个股票行情收报机。还有谣言说那个机器随着他最后的呼吸而滴答作响，在那个临死的百万富翁死时正好处在一个合适的点上。甚至在去世以后，杰伊·古尔德都无法逃脱公众对他邪恶的浪漫想象。

新平船



杰伊之后的古尔德家族

杰伊·古尔德的遗嘱很复杂，在一些方面非常精巧，证明了家族的衰亡，或者至少证明了杰伊一直希望留给家族的凝聚力、世代相传和殷实富裕的努力的失败。

去世的时候，古尔德资产评估的价值为 7 200 万美元，其中 200 万是房地产。（事实上，这个数字只是为了避税而作的保守估计，其实际价格超过 1.25 亿美元。）根据遗嘱条款，每个孩子获得 1/6 的未支付税款和债务的权益。这些资金成立信托基金，剩余收益支付儿女的生活费。对于信托基金的核心资本，杰伊要求 6 个子女共同作为托管人管理和运作信托资金，两个最小的孩子安娜和弗兰克，在他们长到 21 岁的时候可以成为享有完全投票权的合伙人。为了保护奈莉和安娜不受看重他们钱财的男人的侵害，杰伊规定，如果她们结婚其投票权不能转让给丈夫。如果托管人之间意见不一致，乔治享有最终裁决权。最后，任何一个未结婚的继承人必须经得大多数托管人的同意才能结婚，否则将丧失一半的股份。

杰伊还进行了一些特殊的遗产规定。在安娜和弗兰克成年之前，乔治和

奈莉作为他们的监护人，年轻的子女都要和奈莉住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个条件，杰伊将 579 号和林德赫斯特交给奈莉作为生活之用，在弗兰克 21 岁之前，每月提供 6 000 美元的生活费。此外，为了补偿乔治长子的地位以及与日俱增的责任，杰伊多给了乔治 5 百万美元作为他的股份。另外一份 50 万美元的特别馈赠是给杰伊的第二个孙子杰伊·古尔德二世的，因为他们的名字相同。

此外，古尔德的姐姐们和艾布拉姆每人分到了 25 000 万美元，外加每年 2 000 美元。（萨拉很快也去世了，艾布拉姆于 1899 年去世，享年 56 岁，和他哥哥年纪一样大，当时仍然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采购部经理。安娜·哈夫和丈夫现在已经从洛杉矶退休。贝蒂·帕林在德国城，她们两个活得时间长一些，安娜活到 90 岁。）杰伊还给萨拉·那斯洛普学校和房子，以及他在卡姆登用自己的名字持有但是安娜使用的资产。此外，杰伊还将 579 号后面的房子送给埃德温，原来乔治和埃德温都认为这个房子归自己所有，最近埃德温和萨拉住在里面。

家庭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分到遗产，也没有遗产捐给慈善事业。杰伊任何一个子女都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股份和资产进行捐助。杰伊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将他的财产留给那些他最爱的人。

信托基金的每个 $\frac{1}{6}$ 都要完整地留给下一代。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杰伊的儿子或女儿的子女、孙子和曾孙都会从这 $\frac{1}{6}$ 中分享收益，不管他们任何一支如何繁衍。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某一支没有后代了，那么之后，核心资产必须被分为 5 份，然后 4 份，依此类推，仍然存在的一支则可以增加份额。

如果乔治能够担当起保持并扩大核心基金的任务，如果杰伊·古尔德的子女能够有一点维持其运转的能力，那么一切将进行得相当出色。但乔治的愚笨和懒惰使基金在他手里毫无起色。他不愿意帮助家庭打理好基金或者花些必要的时间待在办公室，而是沉迷于雷克伍德和新泽西被称为“乔治宫廷”的地产投资。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以及卡茨基尔佛露湖畔建的“佛露木屋”里，乔治和艾迪斯奢靡挥霍。“乔治宫廷”有种象棋游戏，它的棋盘占了整个房间。带着各种标记和徽章的活动“棋子”，在百万富翁棋手的指挥下郁闷地从一个方格走到另一个方格。

沉迷于香槟、骄纵浮夸的乔治·古尔德用在工作上寥寥无几的时间也可以说漫不经心、狂妄自大。他好高骛远地致力于和精力充沛的 W·H·哈里曼 (W. H. Harriman) 竞赛，希望最终创建美国的跨州铁路体系，最后乔治于 1911 年宣布认输，并不得不放弃密苏里太平洋总裁的位置，也损失了古尔德家族信托基金的几百万美元。两年后，乔治控制了奈莉以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破坏了杰伊时代资产的基石：西部联合和曼哈顿高架铁路公司，让信托基金又遭受了巨大损失。

到 1919 年，安娜和弗兰克对核心资产的损失警觉起来，状告乔治管理不善。他们要求撤掉乔治首席执行官和托管人的职务。他们还要求乔治支付 2 500 万美元，用以赔偿自从乔治管理基金以来给他们两个带来的损失。这起诉讼持续了 8 年。到了 1927 年最终解决的时候，乔治已经去世，光支付给无数律师的费用就达到 270 万美元。在乔治管理期间，信托基金的价值降到 5 200 万美元，最近由于股市行情较好地达到了 6 650 万美元（仍然低于杰伊去世时留下的大约 1.25 亿美元的价值）。最后，法庭将资产分成独立的 6 份（每份基础价值只有 1 100 万美元多一点），分别由 4 个独立的信托公司管理（一个管理奈莉和乔治的份额，一个管理埃德温的份额，一个管理霍华德的份额，一个管理弗兰克和安娜的份额）。这几个独立的公司负责投资本金，为符合条件的代代子孙支付收益。

乔治和艾迪斯·金顿·古尔德一共生了 7 个孩子。到 1913 年，艾迪斯逐渐变胖，失去了先前的好身材。于是乔治开始将目光转向曼哈顿各大剧院的年轻女演员。他最终选中的是一个 20 多岁的爱尔兰人，一个在音乐剧《电影里的女孩》里扮演“快乐女孩”的舞蹈演员格温娜维尔·辛克莱 (Guinevere Sinclair)。辛克莱出身显赫，他的祖父埃德华·辛克莱是都柏林特里尼蒂学院的院长。乔治给格温娜维尔在曼哈顿 74 街买了一栋别墅，在拉伊美国游艇俱乐部附近还有一座更大的都铎式公寓，在那里他可以很方便地乘坐“阿塔兰忒”号。他们的儿子乔治·辛克莱于 1915 年 4 月 15 日降生，女儿简紧接着于 1917 年出生。还有一个女儿格温娜维尔于 1922 年初出生。乔治对于他与辛克莱的关系或者与她所生子女的事情并不保密。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已经成年的法定长子经常阴郁地提到“乔治的私生子”。

随着事情的发展，艾迪斯·古尔德开始伤心欲绝地热衷于减肥。她疯狂的减肥计划包括按摩、蒸汽浴和每天与丈夫在乔治宫廷里的九洞球场打高尔夫。1921年11月一个温暖的早晨，艾迪斯在与乔治打高尔夫的时候突然猝死。后来，人们发现她在高尔夫球衣下面穿了一件几乎让人窒息的橡皮紧身衣，这会让她看起来更瘦一些。6个月后，乔治和格温娜维尔在乔治宫廷结婚，此后这对夫妇搬到了苏格兰埃尔金郡一座租来的城堡里。但是，他们结婚不到一年乔治便在1923年春季去法国度假的时候死于肺炎，终年59岁。

乔治·古尔德对古尔德资产的胡作非为，以及对自己股份的挥霍浪费，导致在他死后给艾迪斯的7个孩子每人只留下税后100万美元。当然，每个人还收到了大大缩水的家庭信托基金中乔治的1/6份额中的1/7。接着，他们依次也有了子女。后来，事实上每一个乔治的后代或者通过工作养活自己、积累财富，或者和有钱人结婚。此外，乔治的私生子只收到了100万美元。（本来他们要求的更多，包括乔治从家庭信托中获取的剩余收益中的一部分，不过在艾迪斯的子女对乔治遗嘱中正式承认三个辛克莱子女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时，他们改变了先前的计划。）

在乔治去世后的一年之内，格温娜维尔和邓斯福德子爵乔治·圣约翰斯·布罗德瑞克（George St. Johns Brodrick）结婚，后者继承了第九世子爵和一世米德里顿伯爵的勋位。结婚后，格温娜维尔买下了肯特郡艾施福德附近的伊斯特维尔公园。乔治、简和格温娜维尔依次由子爵抚养，他们的名字也改了。老格温娜维尔死于1976年，这发生在她与87岁的丈夫离婚的一年以后。（第十世子爵则迅速与一个年轻女人结婚。）辛克莱“私生子”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是乔治，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被称做乔治·布罗德瑞克。他于2003年去世，享年88岁，在他漫长而显赫的职业生涯中，曾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当过兵、农场主和绅士。他的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无数个古尔德的堂兄堂妹们。

* * *

埃德温·古尔德在事业和生活上都比他的哥哥成功。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他曾在古尔德控制的公司中做过多种职业。后来在厌倦了乔治无能的统治后，

他开始自己做事情。通过对每年剩余收益的精明投资，埃德温在家庭信托基金之外积累了相当多的私人财产。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婚姻方面也很幸福。埃德温的两个儿子——小埃德温和弗兰克·米勒·古尔德——继承了他喜欢户外运动和冒险的性格。在很早的时候，埃德温和他的两个儿子就成为哈得孙河的奥希宁夏特马克独木舟俱乐部的会员。接着在1913年，埃德温买了两架飞机学习驾驶。他和儿子一起在家族的两座房子——哈得孙河上阿德斯里（Agawam）和乔治亚岛的哲基尔的敕邱塔（Chichota）附近的乡间狩猎和钓鱼。

23岁的小埃德温1917年在哲基尔的一次狩猎事故中死亡，他也成为古尔德的子孙中第一个葬入杰伊和埃莉在伍德花园公墓的后代。儿子死后，埃德温和他的妻子萨拉放弃了他们在哲基尔岛的房子。这个始建于1897年的公寓有一个特别的游泳池，埃德温在1900年买下它。后来，埃德温给它加了一个码头和船库。他还在1904年到1907年间，穿过马路给自己的姻亲建了另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豪宅“切罗基本屋”。切罗基本屋仍然存在，但是敕邱塔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年久失修，于1941年被拆除。今天，还有两个古科林风格的狮子暗示着这里曾经是别墅的大门台阶，旁边是废弃的游泳池。1928年，埃德温的儿子弗兰克·米勒·古尔德在这个岛上又建了一座别墅，用他女儿的名字玛丽娜（Marianna）命名，现在仍然存在。

小埃德温死后，老埃德温（虽然已经51岁，并且还有万贯家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做供给军士。他的儿子弗兰克也参了军。弗兰克从耶鲁休学，作为预备役继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中尉军衔。埃德温自己在战后仍然活跃在国民护卫军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军衔的其他古尔德子孙还有乔治的两个儿子：杰伊·古尔德二世，他自愿参军，任海军机械师第一助手；金顿·古尔德，是第一批在迪克斯·金顿堡接受训练的1000名学员之一，做过下士、中士、上士、营长，后来由于愿意和他的连队待在一起，放弃了参加军官培训学校的机会。小乔治·古尔德也想参军，但是体检未合格。埃德温和奈莉都是美国志愿救护队的主要捐赠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维拉德的孙子（也叫亨利·维拉德）和他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都是救护队的司机。

一战结束的时候，埃德温卖掉了阿德斯里的房子，在奥伊斯特贝的长岛海峡上建了一所新的别墅。之后，他便从曼哈顿的办公室搬出来，致力于自己的各种投资生意（火柴公司，纽约房地产和铁路）。此外，他还是纽约慈善业的支柱，建立了埃德温·古尔德儿童基金，为贫困儿童提供帮助和接济。埃德温没有将这个基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使用了他死去儿子的名字。此前，甚至在埃德温出事之前，他的父亲就致力于各种慈善活动帮助年轻人，其中主要的是与奈莉合办的坎普·伍迪峰（Camp Woody Crest）。在这些活动中，埃德温贡献的不只是钱。“让我入迷的是，”埃德温·古尔德基金的现任管理者迈克尔·奥施维兹（Michael Osheowitz）说，“他对帮助儿童的个人兴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钱有势，但喜欢帮助儿童，认识和教育儿童的人。”就像杰伊对那斯洛普一家的无私帮助一样，埃德温自己亲自参与其中，通过基金会建立了无数学校和孤儿院，他与许多孩子都非常熟悉。

在1933年67岁去世的时候，埃德温·古尔德将他一半的财产留给了基金，这个基金会现在还一直存在。他的另一半财产加上埃德温在杰伊·古尔德基金中多得多的剩余股份都留给了埃德温的独子弗兰克·米勒·古尔德，弗兰克有两个孩子。

✱ ✱ ✱

奈莉和埃德温一样也从事了大量慈善事业。她对教堂布道协会和世界上其他慈善组织进行了大量捐赠。她同样支持了他父亲最喜欢的一个机构：纽约城大学，在杰伊去世后4年改名为纽约大学。由于这种关系，奈莉让斯坦福·怀特在纽约大学的布鲁克林校区（现在是布鲁克林社区大学）设计了一个宏大的古尔德图书馆，还建了许多其他建筑（包括美国名人纪念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该校应用科学院主任查尔斯·亨利·斯诺博士成为爱丽丝·那斯洛普的丈夫，他们于1897年结婚。和她的表兄一样，爱丽丝也投身纽约大学斯诺博士门下，奈莉自己也是纽约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在19世纪90年代，她资助和参加了由只招收男生的纽约大学法学院为女士举办的几个非正式、不修学分的法律课程。

就像奈莉对纽约大学的兴趣起源于父亲对该学校的捐赠一样，奈莉的其

他慈善活动也都直接受到了杰伊的影响。在去世前不久，杰伊许诺帮助重建被大火烧毁的罗克斯伯里革新教堂。杰伊死后，在奈莉的倡导下，杰伊的子女们帮助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耗资 10 万美元的杰伊·古尔德纪念革新教堂完工于 1894 年中期。两年后，奈莉（已经拥有了 579 号和林德赫斯特）在教堂附近买了一个很小的旧房子，后来扩建成一个有 22 张床、14 个洗澡间、12 个佣人房、6 个房间、一个大厨房、两个餐厅和一个有走廊的房屋。之后，她将这个房子命名为科克萨德（Kirkside，意为教堂之侧）。

此后，当地摩尔和古尔德一年几次的家庭成员聚会便在奈莉家旁边的花园举行。这个占地 11 英亩的花园是奈莉在林德赫斯特的费迪南·曼格德的帮助下，为城里人修建的美丽花园（名为科克萨德花园）。现在，这片布满良田和森林的地方被恢复原貌，将特拉华河东部支流的美丽风景中的一部分包括进来，又恢复成人间明珠。海伦的科克萨德作为“退休者之家”保留了下来。除了创建这个花园，奈莉——在杰伊的老朋友约翰·伯纳斯的鼓励下，后者当时正在罗克斯伯里消夏——还在约翰·波尔·古尔德曾拥有的埃尔姆大街（现在叫维格山路）资助了一个公共图书馆。1911 年，她在图书馆旁边为该城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现在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已作为罗克斯伯里艺术中心，是罗克斯伯里艺术品社团的所在地）建了一个漂亮的希腊复兴风格的房子。至于约翰·波尔·古尔德在梅因大街上的锡器店，现在是当地的一个当代艺术品中心：恩德林画廊。

在奈莉和乔治在卡茨基尔建造消夏之用的别墅时，其他家庭成员的归来也只是时间问题。爱丽丝·那斯洛普和查尔斯·亨利·斯诺在杰伊·古尔德纪念革新教堂举行婚礼，买下了一套房子供消夏之用，从教堂和奈莉的科克萨德穿过梅因大街就能到达。就是在这里，爱丽丝和她的儿子亨利·尼古拉斯·斯诺（Henry Nicholas Snow）一起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创作了《海伦·古尔德的故事》一书。她死于 1947 年。13 年后，她的女儿海伦·古尔德·斯诺在罗克斯伯里的湖滨大街买了一所房子。此外，安娜·帕林，贝蒂和吉伯特·帕林的女儿，也是杰伊·古尔德的另一个外甥女，在 1944 年去世之前在罗克斯伯里住了几十年。她的家在爱丽丝·斯诺的附近，从奈莉的科克萨德穿过梅因大街就能到达。在她之后是弟弟吉伯特·J·帕林医生，后者是一个

费城的耳鼻喉专家，他曾经在城外拥有一个农场，于1958年在梅因大街的房子中去世，终年88岁。（他的儿子吉伯特·M·帕林医生，杰伊·古尔德的曾外甥，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卡茨基尔。这个帕林医生创立了玛格丽特维尔医院，后来在沃尔顿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于1986年去世，终年73岁。）此外，虽然弗拉克·杰伊·古尔德不怎么待在卡茨基尔，但是对此却一直抱有很大的兴趣。他曾经为罗克斯伯里高中的钟楼买了一个大钟。还有一次在1948年，他为杰伊·古尔德革新教堂买了一个新的火炉。

1913年1月奈莉在44岁那年终于成家，这让她的家人和整个世界，或许还有她自己大吃一惊。她的丈夫芬利·J·谢巴德（Finley J. Shepard）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一位英俊潇洒、温文尔雅的执行董事。这位牧师的儿子和奈莉一样，对《圣经》、反共和、捍卫四面楚歌的维多利亚价值观有强烈的热情。他碰巧还是波尔家族的后代：古尔德家族的第七代表兄。由于年纪太大，他们没有生养子女，但领养了3个孩子。这对夫妇还是另一个孤儿路易斯·塞丁的监护人。4个孩子都由奈莉和芬利抚养，他们对孩子非常慈爱，但是由于一贯的宗教虔诚导致生活也很乏味。4个孩子都上了最好的学校，还经常与父母在奈莉后来修建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球。这个高尔夫球场在科克萨德花园旁边，有一个人工湖和石头建造的俱乐部会所，至今仍作为私人设施对公众开放。

奈莉于1938年去世，终年70岁。芬利在1942年去世。他们领养的孩子在本书写作之际仍住在罗克斯伯里附近。

◆ ◆ ◆

古尔德的三儿子霍华德·古尔德——他和埃德温、弗兰克一样，比他的大哥有出息多了——杰伊死后在乔治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乔治共同拥有一艘名叫“警觉号”的游艇，该游艇由赫雷肖夫设计，获得过1893年“美洲杯”。但是由于奈莉在乔治的支持下阻止他与一个女演员结婚，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但当艾迪斯·金顿·古尔德（我们对他已经很了解）公开抨击家里完全不能接受第二个女演员时，霍华德被激怒了。他于1898年和这个女演员维奥拉·凯瑟琳·克莱蒙斯（Viola Kathrine Clemmons）结婚，一

点不在乎自己的财产将被分成两半。同时，霍华德和乔治在生意上一刀两断，开始通过只剩下 1/12 的剩余收益进行投资，着手建立自己的财富。

霍华德和娇纵、暴躁的凯瑟琳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为了凯瑟琳建造了豪华的“古尔德城堡”，位于现在长岛海峡北岸的沙点。这座城堡在 1904 年完工时，凯瑟琳声称这个地方不适合她。为了取悦她，霍华德立刻将“古尔德城堡”改成马厩和佣人房，着手在几百英尺外建起另一座别墅。到 1912 年，当有着 40 个房间、80 英尺高的塔楼、都铎风格的亨普斯特德别墅完工时，霍华德和凯瑟琳已经分居 4 年了。霍华德于 1917 年将它卖给了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自己在英格兰的一套乡间别墅定居，在那里他度过了 20 年的单身生活，后于 1937 年结婚，10 年后又离了婚。霍华德于 1959 年去世，终年 88 岁。霍华德没有对他的巨额财富采取半点避税措施，英国政府从霍华德的 6 700 万净资产中拿走了 5 200 万美元。他的 88 个继承人包括他兄弟姐妹的子女、孙子、孙女，最后每人获得了大约 17 万美元。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如果他好好规划后代肯定会得到更多，可是霍华德并不在乎。

✱ ✱ ✱

奢侈骄纵的安娜·古尔德在她突然决定解除与奥利佛·哈里曼（乔治后来的竞争对手 E·H·哈里曼的侄子）婚约的时候，还不到 20 岁。安娜的新男友是一个比她年长 7 岁的专门玩弄和取悦女人的穷光蛋，马力·欧内斯特·保罗·博尼费斯·德·卡斯特雷伯爵（Count Marie Ernest Paul Boniface de Castellane），人称“博尼”。博尼说他发现安娜“非常害羞……孩子气，有一点点恶毒；但是她非常迷人，也具有——男人总是很喜欢的东西——追求的可能性”。博尼还补充说：“古尔德小姐的财富是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令人吃惊的是，乔治同意了这桩婚事，并允许安娜皈依罗马天主教，不过形式多于实质。这对新人于 1895 年 3 月在乔治第五大道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博尼以令人吃惊而愤怒的方式挥霍着安娜的财产，甚至自由开支乔治的钱。更糟糕的是，博尼还拿了大量现金取悦其他女人。最后在 1905 年，在和博尼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安娜离开了他。最后，安娜的律师按 35% 的比例清偿了博尼无数的债务。

后来，在从梵蒂冈买了一个婚姻无效法令之后，安娜和博尼的一个表兄达克·海利·德·泰利兰德-佩利戈尔（Duc Hellie de Talleyrand-Perigord）结婚。海利不仅富有而且非常虔诚。这对幸福的夫妻生了一双儿女。安娜的第一任丈夫博尼于1932年去世，这是在他继承了爵位，成为卡斯特雷侯爵头衔的15年后。安娜第一次婚姻中的三个孩子大都英年早逝，只有大儿子小博尼活的时间较长，并获得了侯爵的爵位。他和一个半美国血统的女孩伊冯·帕特诺特（Yvonne Patenotre）结了婚。他在1946年去世，享年49岁，留下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后来和吉恩·康德·德·卡蒙特·拉法斯（Jean Comte de Caumont La Force）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安娜的曾孙），这几个孩子依次结婚并育有子女。伊丽莎白的继伯父——安娜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是安娜与第二任丈夫所生——在与一位中年妇女恋爱失败后于1929年自杀。安娜的第二任丈夫海利于1937年去世。安娜第二次婚姻中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后来与法国人约瑟夫·德·鲍特尔斯（Count Joseph de Pourtales）结婚并育有子女。因此，安娜今天的后代在语言、性格、爱国情感上都完全是法国人。

爱喝香槟酒、一点也不虔诚的安娜在30年里避免与完全禁酒、虔诚的奈莉相见，但是在奈莉死后却立刻回到美国买下了林德赫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娜一直住在林德赫斯特和广场酒店的套房里。在1945年秋季返回法国后，她在哈得孙河上建了一座别墅供自己消夏之用。每年7月和8月，她就像小时候那样睡在塔楼的卧室里。安娜于1961年去世，终年86岁。在遗嘱中，她将林德赫斯特赠给国家历史保护基金，还建了一个基金用于林德赫斯特的维护。在与安娜的法国继承人展开辩论之后，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丧失了维护基金，但是获得了这处房产。今天，这项资产（已经从杰伊时代的500英亩缩小到67英亩）、豪华公寓，以及杰伊奇妙的温室仍然对游人开放。

* * *

古尔德最小的儿子弗兰克于1898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得工程学学位。之后，他也以同样的方式为乔治工作。但是他很快就像哥哥一样，开始对乔治处理事情的方式感到不满。于是，他也买回了自己的份额，并成功地进行

了投资项目。弗兰克的第一任妻子，社交明星海伦·凯莉，杰伊·古尔德早期在华尔街一个盟友的孙女于1904年与他离婚。之后，弗兰克获得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与一个歌舞演员结婚，在法国诺曼底买了一座庄园。没有人知道究竟什么事情引起10年后弗兰克的精神失常，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行为具有破坏性而且很古怪。这段时间里，弗兰克酗酒严重，还经常出没于巴黎妓院。他的第二个妻子于1918年离开了他。4年后，他遇到了另一个拯救他的女人。

弗兰克于1923年和弗劳伦斯·拉凯兹（Florence La Caze）结婚，后者是一个来自三番市很有理想的女演员。他当时46岁，拉凯兹28岁。弗劳伦斯花光了他的钱，让他重新回到生意场上。弗兰克在安提比斯、路昂雷奔、尼斯和巴诺拉投资赌场和酒店，奢侈的安娜经常光顾这里，安娜和弗兰克仍然走得很近。虽然弗兰克后来被誉为“赌场之王”，实际上他只是专注于他自己企业的实业投资，将赌场、夜总会和酒店管理的细节问题留给其他人。例如，弗兰克斥资500万美元在尼斯建了地中海豪华舞厅，然后将它租给蒙特卡洛公司30年，每年租金100万美元，在收取高额租金的同时还享受了资产增值的乐趣。弗劳伦斯还在路昂雷奔建了一个文学沙龙，招待像F·斯科特·菲茨拉杰德（F·Scott Fitzgerald）和简·哥克顿（Jean Cocteau）这样的文化名流。

弗兰克在二战期间仍然留在法国。在他60多岁、身体状况很差的时候，纳粹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敌人的盟友，而是看做一个慈祥的法国老人。二战结束的7年后，弗兰克捐给纽约大学150万美元兴建了一个学生活动中心。两年后的1954年，77岁的弗兰克——由他的姻表兄、前校长91岁的查尔斯·亨利·斯诺发起——又捐给这座大学100万美元。1956年，弗兰克还将他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没有再去过的哈得孙—阿德斯里的地产转让给该学校。

查尔斯·亨利·斯诺去世于1957年，终年94岁。弗兰克·杰伊·古尔德于1958年在路昂雷奔（Juan-les-Pins）去世，终年81岁。他的巨额资产留给了他的妻子弗劳伦斯、两个已婚的女儿和女儿的孩子。弗劳伦斯帮助创办了“国际爵士音乐节”。这项国际盛事自1960年开始每年都在弗兰克·杰伊·古尔德位于路昂雷奔的松树林圆形剧场里举办一次。弗劳伦斯死于1983年，她还建立了弗劳伦斯·古尔德基金会，用于支持全美国的法国文化事业

(例如艺术展览和音乐会)。2003 年 9 月，为了纪念这个基金会和它的创始人，纽约的法国领事馆文化服务部向公众开放了在第五大道 927 号总部的一个全新的弗劳伦斯·古尔德花园。

✦ ✦ ✦

乔治·古尔德和艾迪斯的次子杰伊二世成为了一名网球冠军，这项古老的王室运动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球场进行。在 20 年的顶级赛事中，杰伊二世只输过一次单打和一次双打比赛。他于 1906 年第一次在美国业余公开赛中夺冠，当时只有 17 岁，从此以后一直到 1925 年，除了 1918 年和 1919 年没有比赛或杰伊在服兵役，未能参加以外，他一直拥有冠军称号。杰伊二世还在 1908 年奥运会上获得金牌。1914 年，他成为第一个赢得世界冠军的业余选手。接着，他和不同的搭档赢得了 14 个双打冠军。杰伊二世于 1935 年英年早逝，年仅 46 岁，他的子女后来都有了后代。

乔治和艾迪斯余下的子女都过了各不相同的生活。长子金顿·古尔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和以前家里的一个女佣结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乔治和艾迪斯二女儿维维安·古尔德于 1911 年和一个爱尔兰贵族约翰·格雷厄姆·侯普，迪西斯第五世男爵结婚。她于 1931 年去世。(她的儿子亚瑟·乔治·马可斯·道格拉斯，迪西斯第六世男爵，于 1992 年去世。她的孙子马可斯·哈夫·特瑞斯特莱姆，迪西斯第七世男爵，生于 1948 年，是都柏林的一个律师。) 三儿子小乔治·古尔德，乔治和艾迪斯第五个孩子，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后来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乔治·杰伊·古尔德三世和毛姆·卡特·古尔德 (Maugham Carter Gould)，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小乔治和他的妻子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乔治和艾迪斯的大女儿、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玛乔里，同出生于银行家庭的安东尼·迪瑞克塞尔 (Anthony Drexel，安东尼给乔治在里盖特-迪瑞克塞尔公司安排了经纪人的工作) 结婚。乔治和艾迪斯三女儿、第五个孩子艾迪斯过着奢侈的生活，挥霍掉了那一点点继承来的遗产，并和第一任丈夫卡洛尔·利文斯通·温怀特离婚。她在 36 岁去世前又结了一次婚。(她的儿子斯图佛特·温怀特二世在 1953 年到 1961 年间担任东长岛区共和党国会议员。)



乔治和艾迪斯的小女儿格劳瑞亚和艾迪斯长得非常相像。在经历了许多年的不愉快和酗酒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凤凰城附近的家中因酒后游泳溺水而死，留下了一个女儿。

✱ ✱ ✱

在仍在世的这代古尔德家族的子孙中，最像杰伊·古尔德的要数他的曾孙小金顿·古尔德。他在二战期间参加美国部队，拥有两枚紫心勋章和两个银星勋章。他同时是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律师，华盛顿特区的长期地产商，盈利颇丰。金顿常常到距离罗克斯伯里不远的干溪路（Dry Brook Road）鳟鱼湖边的乔治·古尔德老佛卢木屋消夏，他周围还有其他几个古尔德家的房子（其中还有他姐姐艾迪斯·古尔德·马丁的一座房子，艾迪斯于2004年夏季去世）。

金顿是古尔德长子的长子的长子。除了从事商业外，他还担任过美国驻卢森堡（1969～1972年）和荷兰（1973～1976年）大使。作为约翰·F·肯尼迪国际曲棍球大赛的主席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法律顾问，金顿能讲5种语言，还是一个运动健将，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身影。他也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金顿和他的妻子玛丽——她是马里兰州霍华德县著名的格莱内尔格乡村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该校在2004年进行了50年校庆活动——生了9个子女，28个孙子和无数的曾孙。这对夫妇还是业余演员，有时还出演小A·R·格尼（A. R. Gurney, Jr.）的爱情喜剧《情书》。2004年5月，他们在若干年前奈莉作为对杰伊故乡的礼物建造的房子里，为罗克斯伯里艺术团进行了这个演出。

不知道杰伊看到金顿的聪明才智、做生意的毅力、对家庭的热爱，以及关于古尔德卡茨基尔遗产的敏感程度时会作何感想。他想必会非常知足。

